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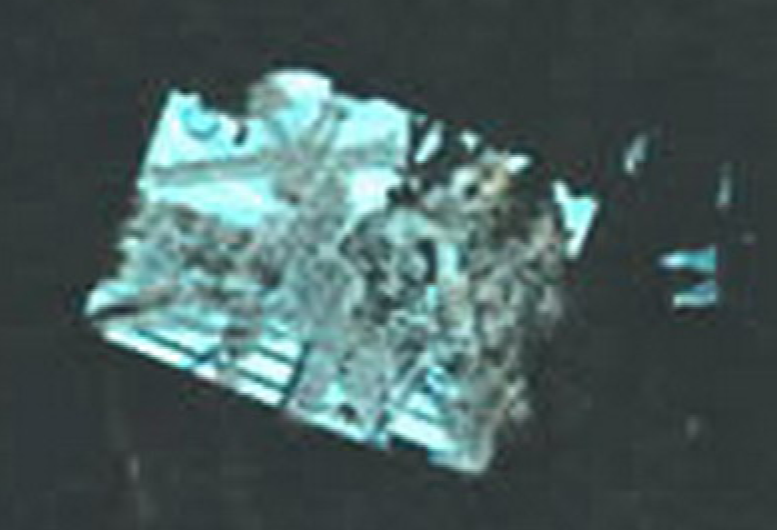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JOSEPH S. NYE, JR.

[美] 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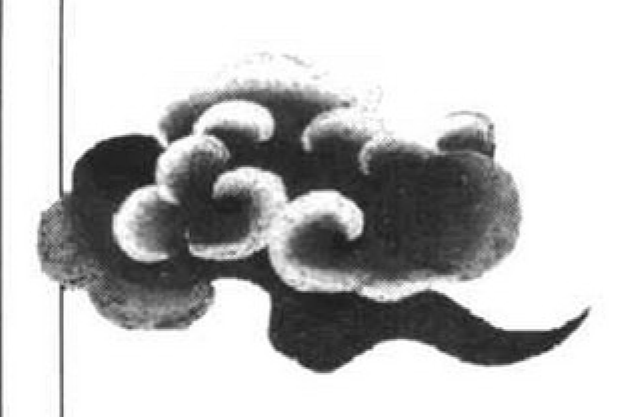
BY
JOSEPH NYE, JR.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美]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美)奈(Nye, J.)著；
张小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SBN 7-208-04195-4
Ⅰ.理… Ⅱ.①奈…②张… Ⅲ.国际争端—冲突
—研究 Ⅳ.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14 号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Third Edition by Joseph Nye, Jr.,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美]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255,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195-4/D·730
定价 23.00 元

作者简介

小约瑟夫·奈，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

译者简介

张小明，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和《冷战及其遗产》等书。

中文版前言

这本教科书来源于我在哈佛大学教的一门关于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冲突的核心课程，我教这门课已经有十多年了。它也得益于我在华盛顿担任助理部长级决策人的5年经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学生在转向冷战后比较流行的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他较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冷战后十分流行的建构主义)之前，先掌握好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我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晦涩难懂的概念，这样学生们就可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了。

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

国际政治本身以及研究国际政治的学科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连接跨国行为体的相互依存网络的加强与深化，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学科都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我们从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性事件中所看到的，跨国恐怖主义者这样的非国

家行为体对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技术创新成果,例如互联网,可以被用来帮助恐怖主义者采取破坏性行动,也可以被用于传播民主的观念和促进经济往来,它甚至还可以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的家园。今天,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相互依存网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密集和快速”,它们正推动着跨国间的合作。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国际理论方法,比如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已经完全过时了。诸如均势这样的概念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很多地区的国际政治,其中包括东亚的国际政治。21世纪的世界的确是一个由延续性和变迁性所构成的奇异的混合体。

没有一位好老师可以准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分析的工具,帮助他们在今后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本书的宗旨。但这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教科书,学生不可能从中了解到所有的相关概念和历史事实。它只是一个关于如何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范例。读者不能出于获取完整的事实描述的目的来阅读本书,而应该注意本书如何把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

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作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这本教科书就是要提供一个历史和理论进行对话的范例。此书加上所附的阅读参考材料,可以为一门入门性的课程提供一条基本的线索。另外,它也可以被当作分析这个主题的方法的一个范例,并起着补充性的作用。伦理(ethics)问题在本

书的各章都有所论及,特别是在第一、第五和第六章中得到了阐述。

这本教科书的第三版增加了涉及如下内容的新材料:建构主义理论(第一章以及其他地方);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冷战后时期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第八章);全球安全所面临的跨国性威胁例如恐怖主义(第八章);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和相互依存性质的变化之详细分析(第七章)。本书的其他地方也有所修改或者更正,以反映国际舞台上的新动向,比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竞赛、非政府组织(NGO)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上升。此外,每一章后面的阅读参考材料都根据最新的版本和新出版的参考书作了更新。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有时与一些年轻的同事一起上这门课,他们是: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孔越(Yuen Khong),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以及M. J. 彼得森(M. J. Peterson)。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也相信,我无意中偷取了一些他们的想法。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也是这样,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的老师了。我特别感谢他以及戴维·德斯勒(David Dessl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以及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他们对我的书稿提出了意见。其他评论过书稿并且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的人还包括:迈阿密大学的琼·托伊费尔·德雷尔(June Teufel Dreyer),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卡蒂·斯特罗迈尔·戈尔登(Kathie Stromile Golden),安德森大学的道格拉斯·纳尔逊(J. Douglas Nelson),乔治墩大学的乔治·香博(George Shambaugh);西南得克萨斯大学的爱德华·米纳卡宁(Edward S. Minalkanin);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的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北科罗拉多大学的凯勒奇·卡鲁(Kelechi Kalu),犹他大学的霍华德·雷曼(Howard Lehman),布朗大学的理查德·米兰逊(Richard A. Melanson)。我从那些优秀学生和助手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要特别感谢这门课最近的几位主要助手:文·奥杰(Vin Auger),彼得·费沃(Peter Feaver),默利·凯斯勒(Meryl Kessler),肖恩·林恩-琼斯(Sean Lynn-Jones),帕姆·梅茨(Pam Metz),约翰·欧文(John Owen),吉登·罗斯(Gideon Rose)以及戈登·西尔弗斯坦(Gordon Silverstein)。维罗尼卡·麦克卢尔(Veronica McClure)是一位很棒的同事,她帮助我做了文字整理和更正的工作。从很多方面看,除了我之外,这本书也应该是属于她的。理查德·伍德(Richard Wood)和丹·菲尔波特(Dan Philpott)帮助核对事实和注释。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卡尔·纳金(Carl Nagin)以及尼尔·罗森道夫(Neal Rosendorf)在从图片到文字的各种问题上都给予我宝贵的帮助。亚利克斯·斯卡柯(Alex Scacco)为准备这个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颇有见地的判断。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感到很幸运。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也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小约瑟夫·S.奈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逻辑吗？

两个理论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世界正在变小。“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用了3个月的时间。1924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机飞越大西洋花了24个小时。今天，协和式飞机和弹道导弹穿越大西洋分

别只需3个小时和30分钟。在20世纪9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航班飞行费用只及1950年的1/3,从纽约打电话到伦敦的费用只有20世纪中叶的6%。全球互联网通讯几乎是在瞬间进行的,而且其费用微乎其微。今天,一位亚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或非洲的人权活动家,拥有了过去只有政府或跨国公司那样的庞大组织才享有的通讯权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核武器的问世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内涵,即一个作家所说的"双重死亡":不仅是个人丧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整个人类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然而,古往今来,国际政治中的某些东西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是它同1947年开始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末的世界是一个由延续性和变迁性所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自修昔底德迄今,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冲突的逻辑,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随相伴的安全困境。千百年来,同盟、均势(balance of power)以及战争与妥协的政策选择等行为,一直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

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从不需要担心核武器、臭氧层或者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国际政治研究者的任务是借鉴历史以理解延续性与变迁性,而不应为过去所束缚。我们必须学习传统的理论,并把它们运用于当前的环境之中。

如果独立国家消亡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但是,世界政府并不会很快就产生。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建立独立

国家的愿望,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日益强烈起来。在新的世纪里,国家的数量不会减少,而且很可能还会增加。世界政府并不能自动解决战争问题,因为今天的绝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者族群(ethnic)战争。事实上,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欧洲交战国之间,而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将生活在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之中,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什么是世界政治?

在世界上并非一直都存在着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从古至今,世界政治有三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帝国体系中,有一个政府主导着与它交往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行为。在西方世界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帝国。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末的法国试图获得类似的主导权,但是没有成功。19世纪,英帝国的势力遍及全球,但是即便这样,它还必须同其他大国一道,共同主导世界。古代的世界帝国,比如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实际上只是地区性的帝国而已。这些帝国的君主认为自己统治了全世界,事实上,它们只是因为交通阻隔,才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它们同帝国周边蛮族的战争,与大致平等的国家间的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政治的第二种基本的形式是封建体系。在该体系里,个人的效忠对象和政治义务主要不是由领土边界所决定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主义在西方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个人除了要效忠本地的封建主外,还可能对离自己较远的一些贵族或主教以及罗马教皇负有义务。政治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上级的命运。如果君主结婚了,那么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义

务可能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而发生变化。一位法国城镇居民很可能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佛兰芒人或英国人。城市或者城市同盟有时具有一种很特别的半独立地位。伴随封建体系而来的疯狂的战争,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modern)领土战争是不同的。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领土之内,也可能是跨越领土界线的,并且与上述那些错综复杂的、与领土无关的效忠和冲突密不可分。

世界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它由相对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组成,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这样的例子包括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和15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时代的意大利。另一类无政府国家体系是王朝领土国家,其内聚力来源于一个统治家族的控制。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或者中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大的领土王朝大约于1500年左右在欧洲出现,而与此同时城邦国家或松散的地区同盟开始消亡。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这场战争有时被人们称之为最后一次宗教战争和第一次现代战争。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和约使得领土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主要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政治,通常是指领土国家体系,而且我们把国际政治定义为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的政治,即在各行为体之上没有统治者的政治。国际政治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的。正如君主制(monarchy)意味着有一个统治者,无政府(anarchy,"an-archy")则表明没有统治者。所以,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这样的无政府体系称为"自然状态"。在某些人看来,自然状态所描述的景象就如同佛蒙特州的一群奶牛在安然地吃草。然

而,这并非霍布斯的本意。我们应该想想在美国开拓西部边疆的年代里一个没有警察的得克萨斯小镇,或者 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状况下的黎巴嫩,或者 20 世纪 90 年代的索马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友善,它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正如霍布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

其结果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区别。国内法要求被普遍遵守,警察和法院会对违法者施以强制性的惩罚。而国际法则不然,它以相互竞争的法律体系为基础,而且也不具有普遍的强制力。没有国际警察去执行国际法。

武力(force)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等级森严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政府垄断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在国际政治中,谁都不能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国际政治属于自助的范畴,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因此总是存在着这些国家诉诸武力的危险。由于不能在国际政治中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国家间必然存在着互不信任和猜疑。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还在于各自的共同体观念不同。在秩序井然的国内社会里,有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观念,并且因此产生了共有的效忠对象、正义标准以及合法权威的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民不具有相同的效忠对象,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是很弱的,人们对正义和合法性问题经常具有不同的认识。其结果是,在秩序和正义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正义摆在国际正义的前面。法律和道义在国际政

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体的观念,它们不像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具有约束力。

在上述三个基本的体系,即世界帝国、封建主义和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中,第三个体系最接近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现实。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了解到的,某些人猜测在21世纪可能会逐步演变出一种新的封建主义。

两种关于无政府政治的观点

从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但甚至在政治哲学上,人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危害性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霍布斯生活在17世纪饱经内战之苦的英国,他强调不安全、武力与生存,并且把自然状态归纳为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相隔大约半个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ke),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英国,他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中缺少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但人民仍然可以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和订立契约,从而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这两种有关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是当今国际政治两个的思想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分析方法的哲学源头。现实主义是比较悲观的,而自由主义则是比较乐观的。

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使用武力的问题,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actor)是国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著述和政策主张,代表着现代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观念。有关无政府国家体系的假设是现实主义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力争最大限度地增强美国的实力和削弱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独立国家间的相互

关系贯穿于国际政治的始终。

另外一个传统被称为自由主义，这不是由于美国的国内政治，而是因为它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和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 19 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之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则集中反映在政治学家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著述与政策主张之中。

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比如学生在外国就学)以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比如联合国)，导致了难以用现实主义者那种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观点解释清楚的情势。自由主义者批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一些坚硬的台球弹子，相互撞击以实现均势。他们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有着跨国界的交往，而且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分夸大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别。由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是很极端的情况，所以自由主义者声称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的形成。

现实主义者引用霍布斯的话来反驳自由主义者：“暴风雨天气并不意味着雨下个不停，所以自然状态也不意味着战争是没完没了的。”[1] 如同伦敦人在 4 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带着雨伞一样，处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支军队以防备战争。现实主义者指出，自由主义者过去的一些预测都是错误的。比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在 1910 年说过，未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

当时的一些书籍声称，战争已经过时了，文明已经跨越了战争的阶段。人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工会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以及资本的流动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当然，这样的预言在1914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现实主义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

历史或争论都没有停留在1914年。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会改变国际政治性质的自由主义观点开始复兴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国家可以通过领土征服或和平贸易这两种途径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以日本的经验为例来加以说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领土扩张，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了灾难；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贸易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东亚的主要大国。日本的成功靠的并不是军事力量。因此，罗斯克兰斯以及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眼光更远。他们认为，迅速发展的生态相互依存将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人类将步入无国界的世界。例如，大气层中的臭氧层遭到破坏会导致皮肤癌，危及每个人的生存。如果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从而导致温度上升的话，那么极地的冰山将加速融化，从而引起海平面的升高并危及沿海国家的生存。艾滋病和跨国犯罪正迅速地蔓延等问题，可能使我们正步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认为，这些跨国性问题和价值观念将导致新的、与领土无关的效忠对象，从而改变在过去400年中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体系。跨国性力量正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人类将迎来新型的国际政治。

1910 年：战争是看不见的吸血鬼

如果没有其他阻止战争的因素，那么战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迟早会让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产生良知。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塔夫茨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他说，欧洲的战争债款高达 260 亿美元，"每个人都对看不见的吸血鬼欠债，任何国家都还不起这个债，可怜的民众每年因此要交纳 9500 万美元的税。"和平时期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负担，正在日益侵蚀那些已经不堪承受债务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大战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全面衰败。

——《纽约世界》[2]

现实主义者则在 1990 年反驳说："请把这些话讲给萨达姆·侯赛因听吧！"伊拉克的行为表明，武力和战争是国家始终面临的威胁。自由主义者申辩说，中东政治只是个例外。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有关国际政治的性质及其是否变迁的不同观点，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调和。现实主义者强调延续性，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迁性。自由主义者通常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他们只关注过去，无视将来。而现实主义者则声称，自由主义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并且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冠以"全球孤独论"(globaloney)的称号。

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者都对，也都错。直截了当的回答自然很好，但是它也很可能不太准确和不太令人满意。进入 21 世纪的世界既有延续性的方面，也有变迁性的地方，不可能有一个简单易懂和包罗万象的答案。

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变化不定的人类行为，所以它永远

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不可能有很确定的理论。不仅如此，分析国际政治的方法不仅限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少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导致战争的预言。然而，甚至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经由于未能解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以及一些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现象，而为一些人所怀疑。依附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十分流行。它预言，处于全球市场"中心"地带的富裕国家将控制处于"边缘"地带的贫穷国家，前者使后者越来越贫困。但是依附理论由于没能解释为什么东亚的边缘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和欧洲这样的"中心"地带国家还快，从而失去了可信性。这种可信性丧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20 世纪 70 年代依附论的学界旗手之一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在 90 年代当选巴西总统后，转而采取了增强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来自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试图创立类似微观经济学那样的演绎性理论。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和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分别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模式。两者都把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变得更为简洁和讲究，与此同时，他们也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其结果是，"到了 80 年代后期，理论上的争论也许只能归纳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模式内部比较细微的分歧"[3]。

最近，一群观点并不一致、被称为"建构主义者"的学者，批

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未能对世界政治中的长期性变革加以充分解释。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改变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建构主义者吸取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知识,考察领导人、民众以及文化改变偏好(preference)、产生认同(identities)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behavior)的过程。比如,19世纪的奴隶制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曾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后来却遭到普遍的反对。建构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变化?观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战争行为今后是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民族主权国家概念的命运又将怎样呢?在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政治实体,比如部族(tribes),民族(nations)和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只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建构主义者指出,像民族、主权这样和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外在的现实。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者还指出,有关战争的语言与描述,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工具,深受性别的影响。

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approach),而不是一种理论。但是它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主流理论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并且补充了这两个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时显得不甚严谨和缺乏预见力,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两个主流理论经常忽视的东西。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论及的,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上,还必须思考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在有的时候导致国家政策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甚至导致国际事务发生深刻的变化。建构主义者帮助我们理解在工具理性产生作用之前,偏好是如何产生的,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补充而非否定上述两种主流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以及最

后一章中讨论如何理解长期变革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当我在华盛顿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努力理解国际政治和帮助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思想中都汲取了养分。

基本概念

行为体、目标和手段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但是每个概念都在变化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把国家视为惟一重要的"行为体"，而且认为只有大国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多。1945 年，世界上大约只有 50 个国家。到了 1998 年，联合国已经有了 185 个成员国，而且其数目还在增加。比国家数量增多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例如，大型的跨国公司跨越国家边界，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常常比许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还要多。至少有 12 个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比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还要大。壳牌(Shell)、国际商用机器(IBM)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比匈牙利、厄瓜多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要大得多。虽然这些跨国公司缺少某些类型的权力(power)，比如军队，但是它们绝对可以影响一国的经济。从经济上说，IBM 对比利时的重要性要大于比利时的前殖民地布隆迪。

在观察中东局势的时候，无视国家间的纷争和外部大国的插手，是绝对可笑的。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那同样也是愚蠢的。跨国石油公司，比如壳牌、英国石油和美孚公司等，同属于一个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体。有一些较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例如联合国，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阿拉伯联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大赦国际。另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跨国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譬如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和分布于整个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阿拉伯人。游击运动、毒品卡特尔和反政府秘密组织等都是跨越国界的，它们通常在几个国家之间瓜分其资源。国际宗教运动，特别是中东和北非的政治性伊斯兰宗教运动，也属于非国家行为体的范畴。

问题不在于国家和非国家集团哪一个更重要——通常是国家更重要，而在于这些新型的、错综复杂的联合体会怎样影响地区政治。这正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解释不了的。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它们并没有占据整个舞台。

其次，目标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无政府体系中，传统上，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今天的国家无疑关心自己的军事安全，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富、有关贩毒或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态的变化。而且随着威胁的变化，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追求的惟一目标。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位加拿大外交官曾经说过，他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会像在1813年那样，再次入侵加拿大和占领多伦多，而是多伦多可能因为来自得克萨斯的一台电脑的攻击而处于瘫痪之中——这种困境不同于在国家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传统的威胁。经济实力尚未取代军事安全(正如科威特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中所认识到的)，但是国际政治的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

最后，国际政治的手段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看法是，只有

军事力量才是真正重要的手段。英国历史学家 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 1914 年以前的世界时,把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今天,国家无疑也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力量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说的,军事实力和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

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估计)

美国	7.61 万亿
中国	3.39 万亿
日本	2.85 万亿
德国	1.70 万亿
印度	1.54 万亿
俄罗斯	7760 亿
越南	1087 亿
叙利亚	983 亿
危地马拉	390 亿
牙买加	84 亿
阿尔巴尼亚	44 亿

资料来源:1997 年《中央情报局世界资料汇编》

部分跨国公司销售额(美元)

通用汽车(美国)	1684 亿
三菱(日本)	1402 亿
皇家荷兰壳牌(英荷)	1282 亿
丰田汽车公司(日本)	1087 亿
国际商用机器(美国)	759 亿

戴姆勒-奔驰(德国)	716 亿
西门子(德国)	637 亿
菲利浦·莫里斯(美国)	546 亿
联合利华(英荷)	521 亿
雀巢(瑞士)	489 亿
埃尔夫阿奎坦(法国)	468 亿
百事公司(美国)	316 亿

资料来源:《财富全球 500 强》,载于 1998 年《胡佛世界商务手册》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军事力量最后手段的核武器难以被加以使用。虽然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已经超过 5 万件,但是自 1945 年迄今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由于其巨大的破坏力,难以成为人们追求任何理性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使得领导人不愿意使用它。所以,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最后手段以追求所有实际的政策目标,那么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即便是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统治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其代价也比过去要大得多。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通过派遣少量的、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士兵,征服了地球的其他地方,然后再用较少的驻军,统治自己的殖民地。但是,在一个民众已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时代,很难占领一个其民众具有民族主义自我意识的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美国在越南认识到这一点;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则在阿富汗获得相同的启示。越南和阿富汗都没有核超级大国那么强大,但是不管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说,统治这些已经进入民族觉醒阶段的民众,其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武力的作用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同国内制约因素有关。一

种反军国主义的伦理观已经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中形成并日益深入人心。这样的观念虽然并不能防止使用武力,但是它会使得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尤其是选择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时,必须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武力并没有过时,但是现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难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最后,有一些问题是绝对不能靠武力来加以解决的。以美日经济关系为例。1853 年,海军准将佩里(Perry)率舰队闯入日本的一个港口,以炮击相威胁,要求日本开埠通商。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当今的美日贸易争端,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是难以被接受的。也就是说,虽然武力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是惟一的手段了。经济相互依存、通讯、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过时,但是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今天的国际政治比过去更为复杂。

中国的崛起

自修昔底德论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学家们都知道,伴随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而来的总是不确定性与焦虑,暴力冲突经常(虽然不总是)随之而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解释为什么民主的雅典决定背弃条约、从而导致战争的时候,修昔底德指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这种观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和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4]

——《克林顿在中国》,载于
1998 年 6 月 27 日《经济学家》

尽管如此，基本的安全游戏还在继续进行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海湾战争爆发前的5年里，世界上共发生了36场战争，死亡人数在300万至500万之间。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均势通常是由领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所决定的，16世纪的西班牙、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美国，就属于这样的霸权国家。到头来，最强大的国家会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或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个新的条约确定世界新秩序，正如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以及1945年以后的联合国体制(United Nations system)。如果自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以来国际政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挑战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者说霸权战争的循环过程已经结束了？核技术是否已经使得世界大战太具毁灭性了？经济相互依存是否使得世界大战的代价太高了？全球社会是否使得世界大战在社会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下一个霸权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战争。但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国际政治的延续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是现实主义之父,虽然大多数人在思考国际政治的时候不一定有意识地运用一种理论,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理论是我们组织材料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那些讲究实际的人认为自己从不使用理论而只注重实践,但其行为很可能

受到一些不知名作者的思想的左右，而这些作者的名字早已被他们忘记了。今天，许多政治家和社论作者尽管不一定知晓修昔底德的名字，但都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说实在的，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20 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对国家行为的了解，是否超过了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的修昔底德及其同胞的认识水平?" 接着，他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5] 吉尔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为了讨论这个观点，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修昔底德的思想。理解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是分析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所有大的历史事件一样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得的一个启示，就是要避免简单化地解读历史。

修昔底德半身像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亲身经历了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述的一些事件。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的鼎盛时期。公元前 431 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才 20 多岁。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修昔底德从一场瘟疫中逃生，而这次瘟疫夺去了成千上万个雅典人的生命，其中包括雅典政治家、提洛同盟创建者伯里克利(Pericles)，修昔底德曾经在他的这部书中记载了伯里克利的演说。公元前 424 年，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一位将军，受命保卫色雷斯的城市安菲波利斯，抗击斯巴达的进攻。由于他未能守住这个城市，修昔底德被流放了 20 年。公元前 406 年，也就是他回到雅典几年之后，修昔底德去世。

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简述

在公元前 5 世纪初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曾经结盟，联合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它在战胜波斯之后，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个商业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到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雅典经过了 5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创建了提洛同盟，即环爱琴海国家的同盟，其目的是共同防御波斯人的威胁。而斯巴达则领导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国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原先站在雅典一边并免费享受保护的国家，很快便不得不向雅典人纳税。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在不断扩张的雅典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势力，在公元前 461 年，也就是希腊人击败波斯人大约 20 年之后，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公元前 445 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一项和约，约定维持 30 年的

和平。这样一来,希腊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享受了一段和平的时期。

图 1.1

公元前434年,处于边缘地带的较小的城邦国家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大规模冲突常常是由一些发生在边缘地区的那些规模较小和不太重要的危机所导致的,我们在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会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在埃皮达姆努斯，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就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斗争。民主派向曾经帮助埃皮达姆努斯建国的城邦国家科西拉求助，但遭到拒绝。然后他们转向另外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求救，科林斯同意提供帮助。这激怒了科西拉，科西拉派出舰队，占领其前殖民地埃皮达姆努斯。科林斯感到受了侮辱，并向科西拉宣战。科西拉害怕科林斯的进攻，因而求助于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都派使节到了雅典。

雅典人在听完双方的陈词之后，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并不愿意破坏已经保持了10年的和平环境，但是又担心如果科林斯（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变得不利于雅典。雅典人认为他们不能让科西拉的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所以决定“介入一点”。雅典采取一个小小的举动，即派出10条船，来吓唬科林斯，雅典船只得到的指令是，除非受到攻击，否则不可动武。但威慑失败了，科林斯发动了攻击，而且在科西拉人将要战败的时候，雅典船只被拖入而非主动卷入一场纷争之中。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同时也让雅典人感到不安。雅典人特别担心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制造麻烦，帕提地亚虽然是雅典的盟友，但是它同科林斯间有着历史上的关系。斯巴达表示，如果雅典进攻帕提地亚，那么自己将帮助科林斯。在帕提地亚发生叛乱之后，雅典出兵镇压。这个时候，斯巴达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雅典人呼吁斯巴达人保持中立。科林斯人则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交战，并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另一个重要的城邦国家墨加拉站在科林斯的一边，这是因为雅典人背弃和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左右为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投票赞同向雅典开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对雅典的力量加以制约，雅典就可能控制整个希腊。斯巴达走向战争的目的在于维持希腊城

邦国家之间的均势。

雅典拒绝接受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战争于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雅典人怀有一种帝国的傲气，为自己的城邦及其社会制度感到自豪，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战争在初期的时候处于胶着状态，在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和平是脆弱的，战火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在公元前413年，雅典采取了一个很大的冒险行动。它派两支舰队和大量步兵去征服意大利南面的西西里岛，该岛上有一些同斯巴达结盟的希腊殖民地。结果，雅典人遭受惨败。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得到金钱的支持，波斯人希望看到雅典遭受打击。在征战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内部产生了分裂。在公元前411年，贵族派推翻了民主派政权，400名寡头政治支持者试图统治雅典。这些事件虽然并没有导致雅典历史的终结，但是它们的确使得雅典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10年，雅典取得一场海战的胜利，但是5年之后，斯巴达就在海上战胜了雅典，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求和。斯巴达要求雅典拆除其漫长的、用来防御陆上强国进攻的城墙。雅典的力量就这样被击垮了。

根源与理论

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战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修昔底德心里很清楚。在叙述完发生在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等地的一系列事件之后，他告诉读者说，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动因。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雅典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呢？如果雅典比较有远见的话，那么它是否可以避免那场灾祸？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在战争初

期，曾经向其民众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你们支持雅典帝国的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恰当的。你们的帝国现在就像一个专制政权，实行专制可能是不对的，但放弃专制肯定是极其危险的。"[6] 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雅典人既然建立了一个帝国，除非冒更大的风险，否则他们就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伯里克利主张战争。尽管如此，在雅典内部还有别的声音。比如，公元前 432 年赴斯巴达参加辩论的雅典代表就对斯巴达人说："请你们在决定参战之前，好好想一想不可预测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偶然性的事情就越多。"[7]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雅典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劝告呢？也许雅典人被爱国主义情感或者愤怒情绪冲昏了头脑，从而丧失了理智。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虽然很理性，但是陷于一个安全困境中。

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没有一方的行为是出于愤怒或者骄傲，而是由于另一方实力增强所导致的恐惧感。不管怎么说，增强国防是对所认知的威胁的理性反应。

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看上去，国家显然应该相互合作，但为什么它们并

不这么做呢？我们可以从“囚徒的困境”(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的博弈中找到一个答案。囚徒困境的情形是这样的：假设警察在某个地方抓住两个身上带有少量毒品的人，这两个人可能因此被判处 1 年的监禁。警察相信这两个人确实是贩毒者，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两个人如果被认定为贩毒者，那么将很可能被判处 25 年徒刑。警察知道，一个嫌疑犯针对另一个嫌疑犯的供词，将足以使后者被量以重刑。警察告诉他们，揭发对方为贩毒者的一方将获得释放。警察还告诉他们，如果双方都招供的话，那么两人将被判处 10 年监禁。如果双方都招供，那么警察就可以把他们关押 10 年。假如两人都拒不承认，那么他们只能被判 1 年徒刑，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出狱并再次干贩毒的勾当。

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囚室中，不允许相互沟通。两人都面对同样的困境：或者揭发对方，使对方坐 25 年的牢，而自己获得释放，或者保持沉默，争取蹲 1 年的监狱。但如果双方都招供，那么两人均被判 10 年徒刑。每一方都在想：“揭发别人对我最有利。如果他和我都保持沉默，那么我只要蹲 1 年的牢。但假如那家伙招供了，这可怎么办？如果我也招供，那么我将被判 10 年的徒刑；假如他招供，而我拒不承认，我就得蹲 25 年的牢，而他却获得释放，这样一来我成了一个大傻瓜。假设我为了他而保持沉默，谁敢肯定他不会出卖我呢?”

这便是独立理性行为的基本结构困境。对于每个囚犯来说，最优的结果是出卖别人和自己获得释放。次优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招供，只蹲 1 年的监狱。较差的结果是双方都招供，在铁窗后生活 10 年。最差的结果是对方招供，而自己却保持沉默和被判处 25 年的徒刑。如果每个人都力争最优的结果，那么双方最后所面对的结果都是很差的。争取最优结果，即获得释放，是

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果双方都独自寻求最优的结果，那么两人的下场都不好。在相互间缺少沟通的情况下，双方很难进行合作。如果两个囚犯可以相互交流，那么他们就可能达成协议，都拒不招供，从而两人都只需要蹲 1 年的监狱。

然而，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也还存在信任与信用的问题。我还用囚徒的困境来加以说明。每个嫌疑犯可能都这么想："我们都是贩毒者。我了解对方的行为。我怎么敢肯定，在我们俩达成协议后，他不会在心里想'太棒了！我已经说服他保持沉默。现在我可以追求最优的结果，以免被人出卖了。'"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由于缺少相互沟通和信任，每个国家都可能只努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告诉另一个国家，"你别扩充军备，我也不扩充军备，这样我们大家以后都会过得很好"，但是第二个国家可能不敢相信第一个国家。

雅典在公元前 432 年的处境类似囚徒的困境。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有一个共识，即停战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使在发生埃皮达姆努斯事件以及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争端之后，雅典人还是不愿意破坏停战的局面。科西拉人最后是用这样的论点说服了雅典人："在希腊有 3 个海上强国，它们是雅典、科西拉和科林斯。如果科林斯首先控制了我们，而且你们允许我们的海军同科林斯的海军合并，那么你们就不得不同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假如你们同意与科西拉结盟，那么我们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作战。"[8]

雅典人是否应该遵守停战协定和拒绝科西拉人的要求，从而同伯罗奔尼撒人进行合作呢？假设雅典人这么做，而伯罗奔尼撒人背信弃义，夺取了科西拉舰队，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海上力量对比态势将是 2 对 1，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雅典人

应该相信伯罗奔尼撒人和信守诺言吗？雅典人最后决定违背条约,此种行为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一个嫌疑犯招供了。修昔底德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大家普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和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9] 既然如此,雅典人不可能冒险让强大的科西拉海军落入科林斯人的手中。

不可避免性与未来的影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往往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雅典人认为,既然战争很快就要爆发,那么雅典就应该争取拥有 2 对 1 的海军优势,避免面对 1 对 2 的海军劣势局面。有关战争即将来临和不可避免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决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囚徒的困境。乍一看,每个嫌疑犯都应该出卖对方和让对方当傻瓜。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很清楚,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两个人还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即都拒不招供。在一次性的博弈中,人们是很难进行合作的。在多次进行的博弈中,人们可以学会进行合作,而在一次性的博弈中,只是欺骗别人的一方受益,相信别人的一方受害。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电脑上选择不同的战略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他发现,经过多次博弈后,最好的结果通常是由他所说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战略导致的。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如果你首先欺骗我,那么我以后也会欺骗你。如果你还接着欺骗我,那么我也会再欺骗你。如果你合作,那么我也合作。如果你还接着合作,那么我也会再次合作。结果是,参加博弈的人发现,学会合作所获得的回报是比较高的。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提醒人们说,只有当你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持续进行博弈和存在“未来长长的影像”(long shadow of

future)的时候,“一报还一报”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博弈者只有在知道自己将长时间地与同一个人进行博弈之后,才能学会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那么具有破坏性。当你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已经接近于走最后一步棋了。在你决定走最后一步棋(它可能决定你的命运,或者说决定你是否还能再接着参加博弈)之后,你可能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对手。如果你怀疑对手将会欺骗自己,那么最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冒险采取欺骗对方的手段,而不同对方进行合作。雅典人就是这么做的。雅典人由于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所以决定不能相信科林斯人或者斯巴达人。他们认为,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走的最后一步棋,那么最好的战略是把科西拉的海军拉到自己的一边,共同对付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吗?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他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撰写一个迎合当前大众口味的东西,而是创作一个可以永世流传的作品。”[10]他的这部史书揭示了任何时候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的本性。修昔底德没有故意误导人们,他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必须强调一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修昔底德的结论是,战争的根源乃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是,古典主义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声称,雅典的力量并不是在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前夕才增长的,实际上当时雅典的力量增长态势已经开始有所减缓。而且他还指出,斯巴达并不是像惧怕战争那样惧怕雅典。雅典和斯巴达都属于奴隶制国家,双方都担心战争可能给奴隶起义提供机会。两者的区别在于:奴隶占斯巴达人口的90%,这个比例大大超过奴隶在雅典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而且斯巴达在不久前即公元前464年经历了一次奴隶起义。在卡根看来，斯巴达固然担心雅典力量的增长，但是它更惧怕一场奴隶起义。

于是，卡根认为，战争的近因或者导火索，比修昔底德根据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所阐述的原因要重要得多。比如，科林斯认为雅典不会参战，对雅典的反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科林斯是那么痛恨科西拉。伯里克利也反应过头，他向帕提地亚提出最后通牒和以断绝贸易关系来惩罚墨加拉，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这些政策失误使得斯巴达人认为值得冒战争的风险。卡根指出，雅典力量的增长导致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30年停战协定已经浇灭了这个引起战祸的火种。因此，为了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埃皮达姆努斯问题的火星，必须落在那些极少的与尚未湿透的可燃物体上。然后，还需要科林斯人以及后来的墨加拉人、帕提地亚人、爱琴海人(Aeginetans)以及斯巴达主战派不断地使劲煽风。如果雅典人不在关键的时候添加一些燃料的话，那么火星也可能熄灭掉"。[11]换句话说，战争并不是由那些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人在困难环境中所作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

对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提出质疑可能有点冒失，但是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虽然人类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但它始终是自发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古代希腊人作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那场给雅典带来灾难的无限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它与人的决策有关联。偶然的因素和人的个性常常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是在一个较大结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不安全情势)所

限定的范围中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从这段古代历史中获得哪些对当代有意义的启示呢？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

我们也要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类比。在冷战时期，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是民主和海权国家，苏联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这就好比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苏陷于一种类似雅典和斯巴达争斗的历史大冲突之中。然而，这种庸俗的类比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古代雅典是个蓄奴国家，它面临国内动乱，民主派并不总能掌握政权。而且，与冷战有所不同的是，斯巴达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个启示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没有人能够叙述一个事件的全部内容。描述过去 1 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无疑比描述一个人一生的经历或者整个战争要容易一些，即使这样，它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已经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叙述过去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即使是描述过去 1 小时或者 1 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

历史学家还受到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的制约。修昔底德

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于是把重点放在了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囚徒困境情势的那些方面。然而，这些方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所有内容。修昔底德没有写雅典与波斯的关系、雅典断绝同墨加拉贸易关系的命令以及雅典提高提洛同盟其他成员应交纳的赋税等。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但是它说明，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所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历史著述都是骗人的。优秀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地思考问题和客观地研究问题。然而，他们及其学生们应该清楚，自己所选取的东西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要经常想想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他或者她是否在仔细和客观地对事实加以解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是否存在偏见。选择是历史和书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误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多阅读，而不是少看书。

道义问题和国际政治

鉴于安全困境的性质，某些现实主义者坚信，道义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然而，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与道义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自从修昔底德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使用道义的论点。例如，科西拉在向雅典求救的时候，就使用了道义的语言："首先，你们不应帮助侵略者，而应帮助人民，他们是侵略的受害者。第二，我们将永远感激你们。"[12]假如把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分别换成科西拉和科林斯，

我们今天还可以说这样的话。

道义观念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的力量是强大的。然而，道义论点也可能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13]也就是说，雅典人认为，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伊拉克、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侵略科威特、入侵格林纳达和镇压东帝汶起义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类似的逻辑。但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人在米洛斯如此露骨地表达的观念，在当今世界里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这能否说道义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比较显著的地位？或者干脆说国家已经更精通于宣传了？能否说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更加关心道义问题？或者说2500年前雅典的行为同20世纪末伊拉克或者塞尔维亚的行为之间，是否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人们的道义论点并不相同，某些论点比较具有说服力，我们要看看它们是否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比如，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声称，核武器是个好东西，因为上帝把它赐予了自由世界。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也把核武器给了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呢？所以道义论点并非都是同等的。

无偏见(impartiality)是道义论点的试金石，也就是说，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利害关系。你的利害关系与我的利害关系要得到同等的关注。然而，在无偏见这个框架下，对于判断

道义论点正确与否，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另外一个传统的源头是18世纪初英国的实用主义者，比如杰里米·边沁。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看问题的不同方法。假设我们走进中美洲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看到一个军官正要枪杀并排站在墙前的3个人。你可能会问那位军人："你为什么要杀害这些农民呢？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恶意。"那位军官回答说："昨天晚上，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把我的一位弟兄杀害了。我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人是罪犯，因此我要枪毙这3个人，以杀鸡给猴看。"你会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将要杀害无辜者。如果你的人是被一枪打死的，那么这里至少有两个人是无辜的，或许这3个人都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做。"这时，军官从他手下那里拿来一支枪并交到你的手中，对你说："你帮我把其中一个人打死，我就把另外两个人放了。你打死一个人，可以拯救两条性命。告诉你吧，在内战中，你可不能采取这种高尚的态度。"你到底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想到用兰博的方式，试图把在场的军人都干掉，然而那位军官手下的一位士兵正用枪指着你。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开枪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并挽救两条性命，或者把枪放下以维护自己的清白。康德传统，即只能做那些正确的事，要求你不施恶行。而实用主义传统则可能暗示你，如果可以救两个人，那么你应该开枪打死一个。如果你选择康德的解决办法，死的人数就要增多。假如墙前站着100个人，或者假设你可以拯救一个城市的人，那么你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而不管该城100万人的生死吗？在某些时候，结果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道义论点：动机或者意图；手段；后果。尽管这三个方面不总是那么容易得到调和，好的道义论点应该把它们

都加以考虑进去。

道义作用在国际政治中所受到的限制

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如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大。其原因有四个。第一,有关价值观念的国际共识是很少的。在对某些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的判断上,存在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第二,国家与个人不同。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尽管国家领导人是个人,人们用不同的标准分别判断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作为个人的行为。比如,在选择一位室友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愿意选一个坚信“你不应该杀人”的人。然而,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采取可能导致死亡的行动”,那么选民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公民要求总统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如果总统们只顾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能保护其国民,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信任,当不了好的庇护人。

在个人的道义观念中,牺牲是道义行为的最好体现。然而,领导人可以牺牲其领导下的民众的生命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告诉米洛斯岛的当权者,如果他们加以反抗,那么雅典人将杀死该岛上的所有人。米洛斯当权者进行了反抗,结果其属下的民众都被屠杀了。米洛斯领导人应当让步么?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应该冒核战争的危险、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有类似的导弹)吗?不同的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个人作为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判断其行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三,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就很难知道行动的后果,而在国际关系中还要考虑一个复杂的层面,即国家间的相互作

用，这使得准确预测结果的难度更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1933 年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牛津联盟里所进行的一场学生辩论。鉴于 2000 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学生投票支持一项动议，即宣布他们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但是，有一个人在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从中得出结论，民主国家很软弱，他可以向民主国家随意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国家不会反抗。最后，希特勒走得太远，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是学生们不想看到、也没有料到的结局，他们曾经投票表决，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后来很多学生都参战，而且不少人死在战场上。

另外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汉堡包论调”。当时人们担心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学生说，“我们坚决不在餐厅吃肉，因为 1 磅肉相当于 8 磅粮食，它们可以用来救济世界各地的穷人。”许多学生停止吃汉堡包，而且自我感觉不错，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印度或者孟加拉的饥民提供任何的帮助。为什么呢？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并没有到孟加拉饥民的手中，因为那些饥民无钱购买粮食。省下来的粮食只是美国市场的过剩商品，它使得美国国内市场价格下跌、农民减少产量。帮助孟加拉人民的办法是给他们钱，让他们可以买一些美国学生不吃汉堡包所节省下来的粮食。学生们在开展不吃汉堡包运动的时候，没能看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他们没能使得出于良好意愿的行动与其结果相统一。

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制度特别软弱无力，秩序和正义在国际政治中相互脱节的情况比在国内政治中要严重得多。秩序和正义都很重要。在国内政治中，我们倾向于把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有时示威者为了伸张自己的正义观，故意破坏秩序。然而，一旦出现全面的混乱，正义也就

荡然无存了，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发生在黎巴嫩和索马里的爆炸、绑架和杀戮事件就十分清楚了。某种程度的秩序是正义的前提。在国际政治中维持秩序就更难，因为缺少共同的立法机构、中央行政机构和强大的司法机关，而秩序则是正义的前提。

三种有关道义作用的观点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际关系道义观，即怀疑论、国家道义主义以及世界主义。尽管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是现实主义者在分析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采取怀疑论者或国家道义主义者的分析方法，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国家道义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的观点。

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认为，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毫无意义，因为在国际关系中缺少可以维护秩序的制度（institutions）。不仅如此，在国际关系中也不存在共同体的观念，因而没有道义权利与义务。在怀疑论者看来，雅典对米洛斯要求宽恕的反应，就是对道义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经典表述："强者做其能够做的事情，弱者接受其必须接受的东西"。强权即公理。怀疑论者认为，这就是事实。

哲学家经常说，"应该"（道义责任）暗含着"能够"（做某件事的能力）。道义要求你作出抉择。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某些事，就没有义务非做不可。如果国际关系只是杀戮与被杀，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怀疑论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然而，生存并不是国际政治的惟一内涵。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声称别无选择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选择方式。如果一位政治家说自己只从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他实

际上就是偷偷地挪用了价值观念,嘴上还不承认。一位法国外交官曾对我说过"符合道义的行为就对法国有好处"这样的话,但是他避而不答为什么法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说"我别无选择"的政治家经常是有选择余地的,或许是一种不情愿的选择。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共同体,即不是无休止的杀戮与被杀,那么国家就有政策选择的余地。"无政府"意味着没有政府,但它并不一定指混乱或者毫无秩序。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惯例和不太完善的制度,它们保证世界具有一定的秩序,并且使得国家可能有一些较大的选择余地。这些惯例和制度包括:均势、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怀疑论者的观点是有偏颇的。

托马斯·霍布斯声称,为了摆脱那种每个人都可能杀别人的"自然状态",个人要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利维坦或者政府以寻求保护,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生存是艰难的、血腥的和短命的。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不共同组成一个超级利维坦呢?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政府呢?霍布斯认为,原因在于国际层次的不安全感没有个人层次的不安全感那么强烈。政府可以向个人提供一些保护,避免强者为所欲为,国家之间的均势也能确保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秩序。尽管国家处于准备战争的对立状态,"它们仍然保证其民众日常工作顺利进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随的苦难。换句话说,霍布斯相信,国家间的均势减轻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从而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秩序。

自由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世界上存在着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虽然这样的行为规范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它们使得违反这些规范的国家要承担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让我们来看看1990年的海湾危机。萨达姆·侯赛因声称,他兼并科威特的行

为就是收复伊拉克的一个省，科威特在殖民主义时代被他人夺走了。由于国际法不允许国家以这种理由出兵他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12项决议明确表示，萨达姆的论点与国际规范相违背。虽然法律和规范并没能阻止萨达姆侵略科威特，但它们确实使得他失道寡助，并为建立起一个反伊拉克联盟和把侵略者赶出科威特作出了贡献。

尽管国际制度还不完善，但是它们通过促进和鼓励国际间进行相互沟通和形成某种程度的礼尚往来的行为习惯，使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国际政治中基本上总是存在着国际间相互沟通的情势，国际政治并不是像怀疑论者所说的那样总是表现为杀戮和被杀。领导人并不永远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安全和生存问题上，他们还要考虑经济、社会和军事互动等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领域中，都可能产生合作与冲突。虽然人们在对正义的认识上存在着文化上的分歧，但是国际政治中还是存在着道义的呼声，一些原则包含在国际法之中。

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中，法律和道义有时也能发挥作用。发端于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正义战争原则在17世纪以后开始世俗化，它反对杀害无辜平民。禁止杀害无辜平民原则的前提是“你不该杀生”。但如果说这是个基本的道义前提的话，那么是否能说任何杀戮都是非正义的呢？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认为，不能以任何理由杀害别人。然而，传统的正义战争观却认为，如果有人要杀你，而你又不愿自卫，那么结果将是邪恶占上风。不自我保护的结局是好人丧命。如果一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那么采取自卫的手段把对方杀死是符合道义原则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谁是可以杀的，谁是不能杀的。打个比

方说，如果一个士兵用枪指着我，那么我就可以采取自卫手段杀死他；而如果他放下枪，举起双手，并且说“我投降”，那么我就没有权力杀死他。事实上，这已经写进国际法和美国军队条例中了。如果一位美国士兵枪杀一名俘虏，那么他会因谋杀罪而受美国法庭的审判。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官兵就是因为违反这样的条例而被关进监狱的。虽然这样的法律经常被人违背，但是它们的确是一种行为规范，即使在最严酷的国际环境中也能够发挥作用。国际法中包含着基本的正义观念，虽然它并没有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这表明怀疑论者所说的在战争状态中没有选择余地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不必赞同怀疑论者的观点，因为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确有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道义是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不尽一样。危及生存的威胁越大，道义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声称，“真正值得称赞的人，就是那些虽然崇尚权力，但是很有正义感、不为形势所迫的人。”[14]不幸的是，雅典人后来在战争中没有牢记这一真知灼见。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势是罕见的，国家安全和威胁的程度经常是不甚明确的。怀疑论者以道义不起作用为由规避道义选择问题。总而言之，正如一个格言所说的，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而活。

许多作者和领导人在描述和分析问题的时候是现实主义者，同时他们在世界政治价值观念上又是怀疑论者。然而，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十足的怀疑论者。一些人承认的确存在着道义责任，但是他们认为秩序是最重要的。和平，甚至是非正义的和平，是符合道义的、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战争所带来的无秩序状态使得正义目标难以实现，在核时代尤其如此。维护秩序的最

好办法就是保持国家间的均势，而道义征讨的行为会破坏均势。比如说，如果美国过于关心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或宣扬人权，那么这可能会导致混乱，从长远角度来看它所造成的弊大于利。

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国际秩序的确很重要，但这涉及到秩序的程度以及如何平衡正义与秩序二者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开始关注正义问题之前，需要何种程度的秩序呢？例如，1990年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采取镇压行动并导致一些人丧生，当时有的美国人呼吁美国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美国应当在其对外政策中表达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念，甚至不惜导致不稳定的局势和军备控制谈判的破裂。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关注和平与人权固然不是小事，但控制核武器和达成一项裁减军备的条约要比这更重要。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政府继续同苏联进行军控谈判，但把它同提供经济援助以促使苏联尊重人权挂起钩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常常不是在秩序和正义二者中选择一个，而是如何在特定形势下平衡各种政策选择。虽然现实主义者阐述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但是他们过于绝对了，认为秩序总是优先于正义。

国家道义主义者

国家道义主义者声称，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它有一些行为规则，但是国家不一定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原则，它禁止国家跨越边界、干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正如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国界具有道义上的重要性，因为国家代表着所有个人的权利，这些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走到了一起。因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密

不可分的。还有的人说得更明确,即尊重主权是维护秩序的最好方式,好的篱笆墙才能使你拥有好的邻居。

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这些行为规则经常被违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以及伊拉克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干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1979 年,美国以强烈的道德语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苏联人则提到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即美国在 1965 年向该国出动一支 25000 人的军队,阻止当地共产党夺取政权。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背后动机是防止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的政权,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动机是防止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政权,两者是极其相似的。

我们如果抛开动机,就会看到美苏行为的不同之处。从两国所使用的手段来看,美国入侵多米尼加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很少,而且美国很快就从该国撤军;而在阿富汗,很多人丧失生命,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驻留的时间将近 10 年。最近,一些批评者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入侵巴拿马这两个事件加以比较。1989 年 12 月,美国出兵巴拿马并推翻曼努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独裁政权,伊拉克则在 1990 年 8 月,出兵科威特并推翻埃米尔政权。显然,美国和伊拉克都违背了不干涉原则,但两个事件的手段与后果是不一样的。美国在巴拿马扶植了一个由于诺列加的阻挠而未能宣誓就职的民选总统,但它没有兼并巴拿马。而伊拉克则试图兼并科威特,并且制造了很多流血事件。我作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判断巴拿马事件到底是完全正确的,还是完全错误的。读者在本书第六章中将会了解到,简单地运用不干涉原则和主权原则,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干　涉

让我们想象一下1979年12月阿富汗的情景：

一位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掌权并努力对苏联保持一个更加独立的立场。这使得苏联领导人深感不安，因为苏联身边出现一个独立政权的事实可能在整个中亚（包括苏联的中亚地区）引起麻烦，而且可能开一个弱小的共产党邻国脱离苏联势力范围的危险先例。让我们设想一下，统帅入侵军队的苏联将军在面对即将被处死的、背叛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的时候，如何解释自己那些违背国际公认的主权与不干涉原则的行为。他会说："就我们的行为是对还是错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并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假如我们不进攻你们，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害怕。因此，通过征服你们，我们不仅能够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而且可以增强本国的安全。我们统治着中亚这块陆地，你们则是比其他国家弱小的一个邻国。这样一来，让你们继续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些正是修昔底德所描述的米洛斯对话的语言，不过"中国"这样的词是被添加上的，而"中亚"和"邻近国家"则分别替代"海"和"岛屿"。这就是说，干涉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世界主义者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主义者声称，我们所说的正义应当是指个人的正义。现实主义者过于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如果把焦点放在有关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即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上，那么就会注意到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持续不断的、跨越国界的经济介入有时会产生极其重要

的影响。比如，你是菲律宾的一位农民，你的孩子死于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因为当地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都到美国工作去了，对你来说这种外部的经济介入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边界并没有道义上的地位；如果我们从公平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只是在维护理当废除的不平等状况。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包括道义怀疑论者与某些国家道义主义者）反驳说，世界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很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因而是很危险的。旨在从根本上重新改变分配状况的行为，极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因为人们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财富。一些比较温和的世界主义者认为，人们通常有多种效忠的对象，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国家，或许还有某些跨国性宗教组织和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大多数人都被那些有关生活在饥饿中的苏丹儿童或者科索沃难民的画面所震动，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跨越国界的、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很弱。我们毕竟都是人。世界主义者提醒我们，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分配方面的问题，就这样的问题来说，道义不管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起作用。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政策，促进人类基本需求与人权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又不破坏世界秩序。

在上述三种分析国际道义的思路中，怀疑论者的观点，即秩序是正义的前提，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怀疑论者忽视了秩序与正义的权衡（trade-offs）问题。国家道义主义者看到了在国家组成的社会中存在着反对干涉的行为规则，从而揭示了维护秩序的制度途径，但是他们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某些干涉行动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解答。最后，世界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体的、颇有深度的看法，但是这种思路有

可能导致极大的混乱。绝大多数人试图找到一种综合的视角，上述各种论点的名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权衡这些论点。

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所不同，因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然而，不能因为原则的多样性而认为原则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国际政治中运用道义原则呢？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如果道义判断决定一切，那么道义观念会促使愤怒情绪的产生，进而导致过激的冒险行为。要知道，被激怒的人是无视道义问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每个人都必须审时度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权衡各种的考虑。国际冲突中存在着永恒逻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进行道义选择，它只是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是很难采取抉择的。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反映的道义与安全困境是很特殊的，但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我们在回顾国际关系发展历程的时候，会一再看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怀疑论者与世界主义者、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我们也会不断碰到囚徒的困境和战争中的道义难题。我们还会了解到，世界舞台中的行为体如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变量是修昔底德时代所不具有的。那时不仅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卡特尔。国际冲突的研究是一门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的、不甚精确的学问。在我们运用理论和实例开辟前进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哪些是已经变化了的，哪些是依然如故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并且

避开未来航程中的险滩。

注 释

1. Thomas Hobbes, *Liviathan*, ed. C. B. MacPherson (London: Penguin, 1968, 1981), p. 186.

2. "From Our Dec. 13 Pages, 75 Years Ag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3, 1985.

3. Miles Kahler,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1945",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7), p. 38.

4. Joseph S. Nye, Jr., "As China Rises, Must Others Bow?" *The Economist*, June 27, 1998, p. 23.

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27—228.

6.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ed. M. K. Finley, (London: Penguin, 1972), p. 161.

7. Ibid., pp. 82—83.

8. Ibid., p. 57.

9. Ibid., p. 62.

10. Ibid., p. 48.

11.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54. 关于雅典扩张的另外一种解释，见 G. E. 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60, 201—203。

1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55.

13. Ibid., p. 402.

14. Ibid., p. 80.

精选阅读材料

1.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89),

Chapter 1.

2.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5.

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ex Warner, ed. M. K. Finley, (London: Penguin, 1969), pp. 35—87, 400—408.

4. Kagan, Donald,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1—56, 345—356.

其他阅读材料

1. Axelrod, Robert M.,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1984).

2. Bagby, Laurie,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1 (Winter, 1994), pp.131—153.

3. Baldwin, Davi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Betts, Richard,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50:1 (October, 1997), pp. 7—54.

5. Beitz, Charles R.,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6. Brown, Michael, et al.,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7.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8. Caporaso, James A., ed.,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y in the Global System*,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1 (Winter, 1978).

9. Doyle, Michael W.,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10. Doyle, Michael W., *Way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Norton, 1997).

11. Elshtain, Jean Bethke, *Women and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2.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Eng-

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 Hinsley, F. H., *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4. Hoffmann, Stanley, *Duties Beyond Borders: On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Eth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Jervis, Robert,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40:3 (April 1988), pp. 317—349.

16. Katzenstein, Peter J.,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Fall, 1998).

18. Keohane, Robert O.,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20. Lapid, Yosef, and Frei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6).

21. Levy, Jack S.,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22. Mercer, Jonathan,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2 (Spring, 1995), pp. 229—252.

23. Moravscik, Andrew,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4 (Autumn, 1997), pp. 513—553.

24. Rosecrance, Richard N.,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1986).

25.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Spruyt, Hendrik,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7.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28.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Spring, 1992), pp. 391—427.

思考题

1. 道义考虑是否应当在国际关系行为中起作用？在现实中，它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能够有意地向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的人民谈论道义责任吗？

2.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内的道义责任是否一样？根据米洛斯对话，雅典的行为符合道义吗？米洛斯元老的行为符合道义吗？

3. 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同自由主义世界政治观区别何在？

4.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哪些是直接原因？哪些是深层原因？

5. 在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的描述中包含着哪种国际关系理论？

6.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是什么，它应该在何时爆发？如果是可避免的，那么如何以及何时可以被制止？

伯罗奔尼撒战争年表

公元前 490 年	第一次波斯战争
公元前 480 年	第二次波斯战争
公元前 478 年	斯巴达放弃领导权
公元前 476 年	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建立
公元前 464 年	斯巴达赫洛特起义
公元前 461 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公元前 445 年	30 年停战协议
公元前 445—前 434 年	十年和平
公元前 434 年	埃皮达姆努斯和科西拉发生冲突
公元前 433 年	雅典干涉帕提地亚
公元前 432 年	斯巴达代表大会辩论是否参战
公元前 431 年	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公元前 430 年	伯里克利葬礼演说
公元前 416 年	米洛斯对话
公元前 411 年	雅典贵族反叛
公元前 404 年	雅典战败并被迫拆毁城墙

奥托·冯·俾斯麦

第二章 20世纪重大冲突的起源

国际体系和原因层次

人们经常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解释战争,那么"国际体系"到底是指什么呢?按照字典的解释,体系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单位。我们很容易对国内政治体系加以定义，因为它们都包含着明显的制度性的东西，比如总统、国会和议会等。而国际体系则不然，它比较分散和抽象。即使没有联合国，国际体系也依然是存在着的。国际体系不仅仅包括国家。国际政治体系是国家间关系的格局(pattern of relationships)。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国内政治中存在着具体的制度而产生误解。国内政治实际上也包含一些难以确定的东西，比如公众态度、新闻界的作用、宪法中的不成文条款等。但是，任何体系的重要之处都在于，整体格局总是大于个体的总和，这些个体正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所定义的行为体、手段和目标等基本要素。体系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意想不到的结果。让我们用经济学中的市场体系来打个比方。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所有商务公司都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竞争会把公司的利润减低到收支相抵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受益。商人并无意让消费者受益，但是理想市场中的行为模式会导致这一结果。换句话来说，体系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与体系行为体的愿望大相径庭。

国际政治体系可能导致行为体始料未及的结果。例如，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国家间的外交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的极其荒唐的东西。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体系，认为革命将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废除边界，无产阶级的跨国联合将取代国家体系。事实上，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领导俄国外交部的时候，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人民发布革命的宣言，然后把世界“连为一体”。但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发现自己本身就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行为受到该体系的制约。1922年，这个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与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两个被

一战后的外交世界所排挤的国家结成了同盟。约瑟夫·斯大林接着在1939年同自己最大的意识形态敌手阿道夫·希特勒缔结了一项条约，旨在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尽管(前)苏联在刚成立的时候发布了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也表述了革命的幻想，(前)苏联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没有什么不同。

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种行为模式的例子。例如，早在基督诞生之前3个世纪，印度作家考提亚(Kautilya)就指出，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倾向于同远方的国家结盟以保护自己，从而导致跳棋盘似的同盟模式的产生。马基雅弗利也提出，公元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有类似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建立国家，而且热衷于讨论非洲国家的团结这个话题。但是，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建立考提亚所说的、古代印度那种跳棋盘似的同盟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加纳、几内亚和马里比较激进，而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则相对比较保守，但是它们都通过结盟来对付自己的邻国。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后东亚所形成的格局。如果在地图上把(前)苏联和越南涂成黑色，把中国和柬埔寨涂成红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跳棋盘似的格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依据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即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会引起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假如美国较有远见的话，它应该把东亚看作一个跳棋盘，而不是多米诺骨牌，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陷入越南。跳棋盘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

即:“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预测国家在无政府背景中的某些行为。

分析的层次

体系并不是解释国际政治的惟一分析层次。肯尼思·沃尔兹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即他所说的三个“层面”(image):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个人层次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由国家而非个人所决定的。过于关注个人的动机会使我们忽视人们意想不到的个人行为的后果,这样的行为后果是由一个更大的体系所导致的。我们还以非洲为例。假如我们只关注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等非洲领导人关于泛非团结的思想,即他们个人的动机,我们就看不到无政府结构对这些非洲新独立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

这并不是说个人毫无作用,事实正好相反。伯里克利个人极大地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1991年海湾战争来说,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面对着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但是,我们仅从个人的分析层次解释不了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那是某些结构性因素使然。同样地,了解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或者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当然,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我们在本书后面将看到,德皇威廉二世解除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首相职务,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威廉二世带来的。

体系和战争

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两个阵营僵持对峙的局面。这种两极状态导致灵活性的丧失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个国家同盟以一个极权的陆权国家为中心,另外一个国家同盟则以一个具有扩张性商业和文化以及海上优势的民主国家为中心。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在即将来临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然是发生在一个弱小国家内部且对同盟关系影响甚微的冲突,使得两个国家同盟的危机感增强,从而引发战争。

这种情况体现在何种战争中呢?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

另一个从第一个分析层次思考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努力解释人类的共性或者"人性",而不是分析个人的特性。比如,我们可以采用加尔文主义国际政治观,把战争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个人心中的邪恶力量,把战争解释为人性不完美的产物。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邪恶的领导人好战,而有些邪恶的领导人不好战,为什么有些好的领导人好战,而有些好的领导人却不好战。人性层次的分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样的理论预见力过大(overpredicts),也就是说它可以解释某些事情,也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这正如一只停了的钟,每天它只有两次是正确的,而大多数时候它都是在误导我们。

预见力过大的缺点也同样存在于第二个分析层次,即国家或者社会的性质。我们在这个层次上面临着一个与上面类似的问题,即如果某种类型的社会能导致战争,那么为什么有些好的社会或者国家也会介入战争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

"民主的"、"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定性为"好的"或"坏的"国家。举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热衷于一种观念,即民主国家的胜利将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但是,民主国家也会介入战争,而且经常这么做。不管怎么说,雅典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所有国家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战争就消亡了。然而,我们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诸如中国和苏联、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因此，社会性质，不管是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不足以决定国家是否介入战争。

有一种观点(本书后面将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事实上,虽然世界上发生过民主国家同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确实难以找到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交战的例子。我们尚不清楚民主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无战事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这种局面今后能否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民主国家间尚无战事的事实告诉我们,从第二个分析层次探讨问题是有一定意义的。

有意义的解释通常都把第二个(国家或社会)和第三个(国际体系)分析层次结合起来。但是,比较体系和体系内国家的性质,何者更重要呢?体系层次的分析是从外部来解释问题,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第二个层次的分析是从内部解释问题,也就是通过内部发生的事情来解释结果。

我们通常同时需要两个分析层次的信息,那么应该首先从哪个层次着手分析呢?一般来说,人们通常首先采取最简明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如果简明的解释是恰当的,那么它就

是较为可取的。这就是“简约原则”(rule of parsimony)或者“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14世纪哲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抛开不必要的细节。简约——以简单语言概括较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我们判断理论是否恰当的一个标准。我们也关注理论的适用范围(range of a theory,即理论可以解释多少行为)和解释力(explanatory fit,即它可以解释多少不甚清楚的目的和反常的现象)。不管怎么说,简约是我们着手分析的起点。体系层次的解释最为简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的起点。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

体系的结构与过程

体系分析到底是简明一点好,还是复杂一些好呢?肯尼思·沃尔兹等人认为,简约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斯坦利·霍夫曼等人则认为,沃尔兹的体系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我们如果分清体系的两个方面,即结构和过程,就可以理解这种争论。体系结构指权力分布,体系过程则指体系单位之间互动的模式与类型。显然,结构和过程相互影响,而且它们都可能发生变化。当然,结构是更为基本的,而且其变化速度比过程要缓慢。

经济学家把市场结构称之为卖方权力的集中。单头垄断指有一个大的卖方,双头垄断指有两个大的卖方,多头垄断指有多个卖方,而在理想的市场中,卖方的权力是分散的。同样地,政治学家把有一个主导国家的国际体系结构称为单极结构。在两极体系中,有两个权力中心主导着国际政治,它们或是两个大国,或是两个紧密的同盟体系。在多极结构中,有三个或三个以

上的权力中心,但如果有很多国家的力量大致相等,那么我们则把这种多极结构称为权力分散结构。

同经济学家相类似的是,政治分析家通过考察国际体系结构,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和战争倾向。当国家通过平衡主导国家或者霸权国家来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或者一个新兴的国家挑战领导国的时候,单极体系就开始走向瓦解了。在多极或者权力分散的体系中,国家会缔结同盟以实现均势,但盟友并不是固定的。在多极体系中,可能发生战争,但战争的规模是相对有限的。在两极体系中,同盟变得比较僵硬,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的分析家声称,"两极体系或者消亡,或者爆炸"。这种情况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时雅典和斯巴达都加强对各自盟友的控制。1914 年前夕的形势也是如此,当时欧洲的多极均势开始逐步演变成两个强大同盟体系的对峙,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灵活性。然而,用多极还是两极体系来预测战争的分析方法,却解释不了 1945 年以后的现实。在冷战时期,世界是两极的,美国及其盟友和苏联及其盟友是两个主要角色,然而全面的大战并没有发生。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世界大战的前景太可怕了。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粗略的答案,但是我们单靠体系层次的分析并不能充分解释问题。

假如我们不仅仅关注体系的结构,也关注体系的过程,即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那么我们将学到更多的东西。在一个给定时期内结构和过程两者的区别可以用纸牌游戏来加以解释。纸牌游戏的结构即权力分布,它指的是玩牌的人手中有多少筹码以及需要应对多少张好牌。过程指的是游戏如何进行(玩牌者是否为高明的虚张声势的人?她遵守规则吗?假如她骗人,

是否被人识破?)以及玩牌人之间互动的类型是什么样的。例如,允许参加囚徒困境游戏的人进行相互间的沟通,会改变游戏的结构。同样地,国家相互沟通和达成互利协定,改变了国家传统的战略选择,因此会改变政治后果。国际政治体系的过程是由以下3个因素决定的:(1)体系的结构(两极结构倾向于导致不甚灵活的过程);(2)文化与制度环境,它环绕着结构并决定国家参加合作的动机与能力;(3)国家的目标和手段属于革命性的还是温和的。

革命性与温和性的目标和手段

国家的目标如何影响国际体系的过程呢?建构主义者指出,大多数体系都存在于一个具有一些基本规则或惯例的文化背景之中。国家可能挑战或者接受这些规则或惯例。国际体系的过程到底是稳定的还是革命性的,取决于主要国家的认同(identity)和目标。例如在18世纪,基本的游戏规则是君主制国家正统地位(统治者享有神圣权力)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均势。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明确提到均势的重要性。在这个时期里,尽管小战不断,却没有发生破坏该体系的大战。让我们看看普鲁士大帝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对待其邻居——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的方式。1740年,弗雷德里克下决心夺取属于玛利亚·特里萨的省份西里西亚。弗雷德里克并没有宏大的革命目标,只是想兼并领土。他并不想鼓动西里西亚的人民发动矛头对准玛利亚·特里萨的革命,从而推翻维也纳操德语的贵族统治政权。毕竟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是操德语的贵族,他统治着波恩。他兼并西里西亚的动机就是因为自己想得到这块地方,同时他也小心不做其他有损奥地利或君主制正统性原则的事情。

结构和过程

政治家判断欧洲均势状况是否令人满意的基本依据，通常与权力及其分布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包括国家享有的地位、国家的荣誉与威望、结盟是否必要以及能否允许在国际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声音等。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均势没有受到影响或威胁的时候，如果满足平衡（balance of satisfactions）受到影响或威胁，那么也会爆发危机。它告诉我们，其他非权力政治的手段，诸如国际法、协调一致惯例（Concert practices）以及利用同盟限制自己盟友的行为等，比建立敌对同盟或集团联盟那样的权力政治的手段，更有助于促进和维持欧洲的均衡。

——保罗·施罗德:《19世纪的体系》[1]

让我们把它同40年后的法国革命加以比较。当时法国的主流观点是，所有君主都应当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而把权力交给人民。拿破仑把这种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欧洲，拿破仑战争对当时的游戏规则和均势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8世纪中叶那种温和的过程和稳定的均势，到18世纪末已转变成革命的过程和不稳定的均势。我们把法国革命这样的变革视为结构理论视野之外的因素，因为该理论无法对它加以解释。这个例子说明，建构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补充现实主义结构理论。

国家除了改变目标之外，也会改变手段。国家所采取的手段也影响体系的进程，不同的手段会产生促进稳定或者破坏稳定的作用。一些手段随着技术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例如，机关枪等新式武器的问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场血腥味极重的较量。手段也可能由于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在18世纪，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目标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有限的。他只有一支不太忠诚和后勤补给不足的雇佣军。18世纪的军

队通常是在夏季从事战事，因为这个时候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军队，或者有足够的金币向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提供军饷。当食物或金币用光之后，士兵们会开小差。法国革命把战争的社会组织改变成法国人所说的征兵制。公民们为了祖国的利益而集合起来，而且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所有人都应该参战。战争不再是到远方征战的数千名雇佣兵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这种大规模的参与和群众的支持，大大超过了过去雇佣兵的力量。国家所拥有的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 18 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

19 世纪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过程

搞清楚这些区别有助于我们从 19 世纪寻找 20 世纪大冲突的根源。根据简约的原则，我们首先要运用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那种简明的结构分析方法，来解释整个 19 世纪所发生的事。

在 19 世纪初期，拿破仑企图在欧洲建立法国霸权，但是他没能获得成功，因为其行为促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并且最终打败了法国。假如拿破仑获得成功，那么当时的国际体系将会变成单极结构。然而，在拿破仑被击败之后，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过去的多极秩序，5 个主要国家相互制衡。革命的法国改变体系的过程(the process of the system)达 20 年之久，而且它试图改变该体系的结构，但是法国到头来还是没能把欧洲国家间的体系结构变成单极结构。

在强调结构的现实主义者看来，1870 年德国的统一导致了巨大的变革。虽然多极体系依然如故，但是中欧的权力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意志在统一之前由 37 个国家组成，是国际纷争之地。在 1870 年以后，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不仅如此，德国位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具有极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力。从结构的视角来看，一个统一的德国很可能会太强大，或者太弱小。如果德国强大到足以同时抵御俄国和法国威胁的程度，那么它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同时打败俄国和法国。假如德国不拥有同时击败俄国和法国的力量，那么它就可能显得很弱小，从而招致俄国和法国联手入侵德国。

由于有了奥托·冯·俾斯麦这位聪明绝顶的德国第一任首相，新近统一和地处中欧的德国并没有导致不稳定的局面。在1870年到1890年间，俾斯麦以其老练的外交手腕，减轻了邻国对德国的忧虑，从而使得重大的结构变化并没有马上影响到体系的政治过程。但是，俾斯麦的继任者并没有那么机敏。从1890年开始，欧洲的同盟体系变得越来越僵硬，一方是以德国为中心的同盟，另一方是以法俄为中心的同盟。两极同盟体系日益僵化，最后于1914年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解释19世纪的变迁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单靠这样的分析方法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它解释不了俾斯麦这样的个人的作用，也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欧洲其他国家允许德意志统一。为什么德国的邻国不去阻止德国的统一呢？如果英国和法国看到德国是正在兴起的挑战者，为什么它们当时不去遏止德国的崛起呢？我们必须从认知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结构分析解释不了为什么两极同盟体系的形成要花30年的时间，它也没有为探讨领导人个人可能起的关键作用留下余地。假如德皇没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或者俾斯麦的继任者继续执行与俄国同盟的基本政策，两极局面或许不会出现。如果俾斯麦的继任者不挑起海军军备竞赛，从而挑战英国，那么也许英国就不会介入冲突之中。尽管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探讨19世纪的体系变迁能给我们以很多启示，但这样的分析还是过于绝对。它抛开了个人选择的因素，让人

们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结构分析的方法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但它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完整的答案。

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提醒的，我们需要考察欧洲的文化和观念变化是如何影响 19 世纪体系的过程或者关系的模式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国家的目标与手段的变化会改变合作的意向。在 19 世纪，民主化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日益上升，并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目标。国家和当权者不再是一回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已经过时了。在 18 世纪，弗雷德里克在普鲁士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其行为不受民选的阁员或议员的制约。民主化使得国际政治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拿破仑把新观念传遍欧洲，挑战和煽动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拿破仑战争虽然没能改变欧洲政治的结构，但是它确实导致欧洲政治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化。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仁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成功地恢复了旧秩序，但是在稳定的表象后面深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火山，这座火山在 1848 年的革命中开始喷发。

此后在 19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民众和领导人对自己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民族主义挑战王朝统治政权，并导致一些蔑视古典均势原则的奇特同盟的形成。例如，在 1866 年，普鲁士进攻奥地利，后者没有得到法国的支持。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法国犯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法国反对奥地利镇压其占领的意大利部分领土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俾斯麦曾经利用德意志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把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的领导权之下，但是后来民族主义成了一个制约国家行为的力量。俾斯麦在 1870 年的战争中从法国手中夺取阿尔萨斯 - 洛林的同时，也促使了法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法国和德国在以后的时期里无法成为盟友。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新的

意识形态改变了国家的目标,它使得19世纪的国际政治过程不如原先那么温和。

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新工业技术在军事中的运用,创造了重型但机动性好的战争手段。铁路由于其机动性,可以很快地把大量军队投放到一个地方,它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战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到19世纪末期,机关枪和战壕已经使得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所运用的短兵相接、速战速决和有限战争的军事思想变得令人可笑。结构和过程都有助于我们解释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的变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我们从现实主义结构分析方法着手分析,因为这种方法较为简明。但是,这样的分析只能提供部分的答案。建构主义者对过程的关注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社会的变迁。

现代续编

当1990年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走向统一的时候,19世纪开始出现的所谓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议题。(前)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宣称,德国统一会严重破坏欧洲的均势。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讲德语的国家的数量到底应当多少,才可以维持欧洲的稳定?"在过去,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时候,讲德语的国家有37个。俾斯麦认为应该两个,而不是1个。他没想把奥地利纳入其构想的新的德意志帝国之中,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普鲁士对新国家的控制力。希特勒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建立一个讲德语的国家,它应该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希特勒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决定建立3个讲德语的国家: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还有一个关于一个法国人的笑话,即有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一个法国人应该有几个德国,这位法国人回答说,"我太爱德国了,当然是越多越好"。

苏联在东欧的力量退缩,导致战后两极政治结构不复存在,并且使得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但是,德国的重新统一,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和位处大陆心脏地区的欧洲最大经济实体的忧虑。德国会努力扮演新的角色吗?它会再次虎视眈眈,先进攻东线,然后进攻西线吗?它会插手德国一直可以施加较大影响的东面邻近国家的事务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声称,答案就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他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未来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因为未来和过去的情势结构是相似的。

然而,已经出现了3个方面的变化。在结构层次上,美国介入了欧洲,而且美国的领土大约是统一后德国的4倍。结构主义者担心,美国今后会不再介入欧洲事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在某个时候可能转向孤立主义和"回家"。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欧洲国际政治的进程由于新制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个变化不是发生在国际体系方面,而是发生在国内政治方面。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而且公众观念的变化已经使德国从一个好战国家变为一个福利国家。分别于1870年、1914年和1939年在欧洲心脏挑起事端的德国不是民主国家。结构、过程以及国内方面的变化哪一个最能预示欧洲的未来呢?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

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

注重体系层次分析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制

约,所有国家的行为都是类似的。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该国会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国际体系中地位相近的国家其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大国以一种方式行事,而小国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行事。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由于高度简约的体系层次的分析通常是不够充分的,所以我们必须考察体系单位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否认国内政治的作用。不管怎么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埃皮达姆努斯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国内冲突开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冷战的结束,我们必须考察苏联内部的因素,即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容易找到国内政治起作用的例子,但是我们因此可以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吗?除了说国内政治很重要之外,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们都注重第二个分析层次,认为国内社会性质类似的国家行为相近。

它们通过考察国家的国内组织,来预测国家的对外政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在列宁看来,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战争:“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2]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来解释战争的。但是它同 20 世纪下半期的现实情况并不相吻合。像苏联、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共产党国家都卷入了相互间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导致战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

古典自由主义,即 19 世纪在英国和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因为战争会对商业造成损害。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自由贸易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科布登领导了反对英国谷物法令的斗争。英国谷物法令属于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它指导英国的国际谷物贸易长达 500 年之久。科布登同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贸易和繁荣比战争要好。他声称,如果我们希望国家越来越富裕和公民的福利不断得到改善,那么我们最好保持和平的状态。他在 1840 年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观点,“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3]。

自由主义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影响很大。一些著作,包括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经典著作《大幻觉》(1910),声称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可以用那个时代慈善家的例子,来说明一战前夕的经典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 1910 年创建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想到了持久和

平到来之后基金会款项的用途问题，所以他在遗嘱中写上一个相关条款。一位名叫爱德华·吉恩(Edward Ginn)的波士顿出版商，为了不让卡内基把即将到来的持久和平都归功于自己，于是成立了世界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与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宗旨一模一样。吉恩也考虑到了持久和平到来后基金会余款的用途问题，所以他要求把这些钱用于为年轻的工作女性提供经济住房。

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虽然银行家和贵族间的跨国交流十分频繁，劳工也有国际联系，但是它们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统计分析表明，一国介入战争与该国是否为资本主义或民主国家并无多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是从国内政治，特别是从经济制度的性质寻找战争的根源。

自由主义的复兴

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名誉扫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美国的国际政治著述都带着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人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理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自由主义思想有三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制度，一种关注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者特别关注贸易。他们认为，贸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国家介入战争，而是由于它会使国家以特定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战争。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

国际地位的途径。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提到了日本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认为获得市场的惟一办法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因此试图征服其邻国,迫使它们同日本进行贸易。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早在1939年就指出,日本的部分行为可以用当时流行的经济保护主义来加以解释。斯特利认为,当经济围墙沿着政治边界构筑起来之后,占有领土与经济机会是相统一的。避免战争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一个开放的、没有军事征服的贸易体系中寻求经济发展。今天的日本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相反,它通过贸易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在世界生产总量中的份额从1960年的大约6%上升到1990年的大约15%,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实主义回答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别国向它提供了安全保障,它尤其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抵制邻近的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的安全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预言,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不再介入东亚的安全事务,并且会限制自己与日本的贸易。根据霸权转移理论,日本将会重新军事化,美国和日本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

自由主义者反驳说,当今日本的国内社会同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它已经是一个非军国主义的社会(non-militarist society),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机会。在今天的日本,最吸引人的职业是商人,而不是军人。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者未能对国内政治以足够的关注,而且没有注意到日本已经由于经济机会而发生变革的事实。自由主义者声称,贸易可能并不能防止战争,但是它会改变国家对自身机会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

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社会自由主义。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减少冲突。这种跨国交

流在学生、商人和游客等多种层面上进行，使得相互间不那么陌生和敌对，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事实的证实，也遭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的否定。在1914年的时候，银行家、贵族和工会领袖的国际接触的确很频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他们穿上戎装并相互杀戮。显然，有关社会接触促进理解和防止战争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这种观点对我们理解问题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今天的欧洲同1914年的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跨国交往十分频繁，教科书的编者们努力公正地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同1914年相比，如今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形象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舆论调查表明，欧洲认同观念正与国家认同观念共存。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会受到跨国社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看看法国人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反应。虽然对外政策专家们有些焦虑不安和不知所措，但是民意测验却表明，大多数法国民众对德国统一持欢迎的态度。这与1914年8月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个自由主义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著：《贸易国家的兴起》[4]

自由主义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因此经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说国际制度起作用呢？因为国际制度提供了一个影响人们期望（expectations）的框架。它们使民众相信，不会再发生冲突。它们也使未来影像变长，从而缓解了

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制度减轻了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无政府状态的程度。霍布斯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同时他又很谨慎地指出，战争状态并不等于无休止的交战，而是指战争的倾向（propensity），正如阴天有可能下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状态指的是和平的倾向，当无政府程度因国际制度而有所减轻和相对稳定之后，民众会产生对和平的期望。

制度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期望。首先，它们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连续观念（a sense of continuity），比如大多数西欧人都期望欧盟永远存在下去。欧盟今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许多东欧人同意和希望自己国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欧盟，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这种连续观念的影响。其次，制度创造了礼尚往来的机会。如果今天法国人得到了较多的好处，那么明天意大利人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过于计较每一次的交易，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收益可能是均等的。第三，制度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大家在做些什么呢？意大利人是否会遵守欧盟通过的决定？贸易往来是否大致均衡？欧盟的制度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信息。最后，制度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欧盟国家可以在部长级会议（the Council of Minister）和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此外，还有一个欧洲法院。这样一来，制度创造了一种气氛，促使人们期望稳定与和平。

古典自由主义者期待“出现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则是寻找和平群岛（islands of peace），它具有相关的制度和稳定的期望。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把这样的区域称为“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在这里，国家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和平的期望是很稳定的。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曾经相互残杀，美国也同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打过仗。但

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难以产生的。发达的工业国家具有和平的倾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制度创造了一种人们期望和平的文化，并且为谈判提供了论坛。人们对稳定的期望，有助于国家摆脱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囚徒困境似的情势。

许多现实主义者预言，即使存在着欧盟这样的自由制度，欧洲今后也将重新陷入安全的困境。人们曾经对1992年欧洲一体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紧接着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强烈抵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的时期，这特别体现在有关欧洲单一货币的斗争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就担心，给欧盟更多的权力可能有损各成员国的独立与繁荣。然而，这些国家感觉到有一种压力促使它们必须同意增加欧洲共同体的权限，如果它们不积极参与，那么将使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等国家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现实主义者认为，东欧和前苏联新近独立的国家的出现，使得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许多新近获得独立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并且加强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实现向繁荣和稳定的民主国家的过渡，那么随之而来的混乱，极可能造成一个祸及西欧国家的权力真空地带。当国内集团努力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时候，国内政治就可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东欧国家陷入混乱的境地，那么这些国家内的某个集团就会寻求俄罗斯或德国的帮助，让俄罗斯或德国在内战中站在自己的一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约翰·米尔斯海默预言，这样的混乱状况将会破坏西欧的自由制度框架，并且促使德国改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俄罗斯将同德国发生冲突，其原因并不是这两个国家想这么做，而是由于它们会被拖入权力真空地带之中。接着，安全困境就会重新出

现。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会再次处于1914年前夕那样的地位，并想办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困境。

自由民主与战争

自由主义者反驳说，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存有这些疑虑，是由于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的第四个表现形式，即民主价值观念。今天的德国与1870年、1914年或1939年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已经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其政党和政府都发生了和平变革。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扩张性的角色。因此，自由主义者质疑现实主义者的预言，认为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民主观念的影响。

国内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战争倾向有关系吗？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1990年由华盛顿的和平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两个原里根政府的官员阐述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主席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声称，“民主的社会在其对外关系中比较倾向于采取和平的行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前主任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则认为，“有关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介入战争的说法，是理想主义者所制造的种种神话中的最新的一个，他们希望以此使自己免于战祸”[5]。

极权统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使自己的国家介入战争，正如弗雷德里克大帝因为想得到西里西亚而在1740年发动战争，或者萨达姆·侯赛因由于想得到科威特而在1990年发动战争那样。伊曼努尔·康德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可能投票表决反对战争。然而，国家的民主性质并不意味着该国的人民总会投票表决反对战争。正如前面所提到过

的，在统计学上，民主国家似乎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介入战争。民主制度下的选民经常投票表决支持战争。在古代希腊，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介入战争。在1898年，美国选民把不愿意介入战争的麦金利总统拖入美西战争之中。在1991年，美国的民意调查和国会表决都支持总统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命题，即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和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两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交战这个事实，属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但是有些相互关联现象并不包含真实的因果关系。火灾和救火车的出现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救火车引起了火灾。这种因果关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造成这种因果关系不真实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主国家一般是富裕国家，富裕国家倾向于从事贸易，而根据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富裕国家不太可能相互交战。然而，这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富裕国家经常发生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相互关联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合法性问题。也许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同其他民主国家交战是不对的，因为通过杀戮来解决争端是错误的行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是否同意的权利（right of consent）。不仅如此，只有当公众可以对战争的合法性进行广泛辩论的时候，宪法中有关战争的制衡原则才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专制恶魔，那么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太容易被动员起来。

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理论还需要通过对特定事例进行详尽的个案分析来加以检验，但它们的确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假如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至少民主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减少。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还缺乏新

闻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机制以及正常的选举制度等自由民主程序，它们可能只是公民投票式的民主国家。冷战后处于战乱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些国家还远不是民主国家。厄瓜多尔和秘鲁也是这样，两国在1995年发生过边界冲突。

民主与和平

民主国家联合起来，这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不管怎么说，民主国家更加稳定，不太可能从事战争。它们可以增强市民社会。它们可以为人民提供建设自己家园的机会，不会迫使他们逃到境外。我们促进民主的努力，将使我们更安全、更繁荣、更成功，我们要让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

——1994年9月26日美国总统威廉·J.克林顿在第4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国家利益的界定

不管政府类型如何，"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这种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家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的，否则的话，它是毫无意义的。现实主义者声称，由于国际体系的制约，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利益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必须根据均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否则自身的生存就成问题。正如理想市场中的一家公司，如果只考虑利他而不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那么肯定是要破产的。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着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并且预示着该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期望和国家利益如何形

成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看重经济福利和贸易，并且认为反对其他民主国家的战争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就不同于专制国家，尽管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国际体系相当缓和，也就是说不是处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那么上述论点便是正确的。如果制度和沟通渠道使国家期望持久和平，那么囚徒困境可能就不会出现。

既然这些非权力的动因可以影响国家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判断一个特定情势的无政府状态同抽象的无政府概念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如果一个国际情势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也就是说，明天你可能被自己的邻居所杀害，那么有关民主或者贸易的期望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很有限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国际体系不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着制度以及对和平的期望，那么国内社会的相关因素就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比较适用于中东，而自由主义者的预言则比较适用于欧洲。分清不同的背景，有助于我们衡量不同理论的预测力。

对外政策上的差异

国际地位相似的国家确定自己利益和战略的方式有时是不一样的。俾斯麦、德皇和希特勒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德国所处的安全困境，这就是明证。如果从体系层次上的区别不能解释对外政策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国内层次上的因素。这些国内层次的因素有一些是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各自所特有的，有一些则是所有国家普遍共有的。

一些国内因素使得国家的行为十分相似。我们已经讨论过

贸易和民主,但还需要考察其他的因素。例如,在国家内部是否爆发了革命?革命的领导人通常认为以前的对外政策,甚至整个国际体系是不合法的。革命经常在整个地区造成不稳定的局势。革命的领导人时常试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邻近的国家则努力对它加以遏制,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与它的邻国之间以及1980年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革命的国家有时侵略别国,有时受到别国的入侵。另外一个低水平的结论是,内聚力较弱的国家,比如1914年以前的德国和奥地利,更可能把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德国领导人用向外扩张来转移人民对国内社会民主的关注。然而,这种关于在国外寻找替罪羊的说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一些国内凝聚力不强的国家,比如今天的缅甸,却把注意力放在内部。

我们还可以从官僚机构的行为中看到国家的其他共性。一些分析家认为,由于官僚机构是按部就班地运转的,而且其变革速度很慢,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外交和军事官僚机构的惰性,来预测国家的对外政策。本书第5章将结合古巴导弹危机来分析这个问题。德国的军事官僚在1914年的确反对改变军事计划。然而,从官僚机构的角度分析问题,也可能将人引入歧途。美国军队在越南被机动的和非正规军的游击队击败后,在海湾战争中采用了高度机动的战略并获得成功。官僚机构虽然变革很慢,但是会发生变革。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一直努力把世界经济和国内利益联系起来,以寻找简约的方式来解释对外政策。例如,自由贸易影响劳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的不同方式,会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我们将在下一章有关德国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国内政治联盟会由于国际机遇和压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对外政策行为上的许多差异,只会产生低水平的结论。它

们最多只能算是有待于检验的假说，而不是准确的预言。国内政治的确很重要，而且自由主义理论对我们也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我们必须分清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以及不同的地点。

反事实推理

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美国国会发表一次演讲。他在6个月前还是一名政治囚徒。哈维尔说道："作为剧作家，我习惯于幻想。我常常梦见各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把它们写进我们的剧本中。所以，我可以适应这种从蹲监狱到在你们面前演说的角色的突然变化。遗憾的是，那些可怜的政治学家们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是极力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6] 几乎没有人，其中包括（前）苏联人和东欧人，曾经预见到1989年苏联在东欧统治权的瓦解。人类有时会作出令人惊奇的抉择，而且人类历史总是充满着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分清哪些原因和哪些分析层次比较重要呢？

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科学。在国际政治中，无法进行可以人为控制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观察一个事件的时候，保证其他事件不会发生变化。亚里士多德说，任何学科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做到精确。如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精确，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要求太精确。国际政治中的变量很多，会同时发生许多变革，我们可以找到的事件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仍然需要对五花八门的原因加以筛选，搞清楚哪些原因比较重要。我们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被称为"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s）的思维实验（mental experiment）。

反事实推理就是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contrary-to-fact conditionals),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确定因果关系的思维实验。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可能拥有一个真实和有形的实验室,只能靠自己想象出一些情势,并假定在这些情势中只有一个事情发生变化,其他事情是不变的,然后依此勾画出一幅有关世界面貌的图画。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反事实推理。许多学生可能会说,"假如我今天晚餐没吃那么多,那么我阅读注意力就会更集中一些。"也有的学生可能运用更具想象力的反事实推理:"假如我那天没有错过学生会的那顿晚餐,那么我就可能同她认识,这样我的生活可能因此要比现在简单得多。"

历史学家也运用更为精细的类似方法来判断事件的根源,只是他们经常不承认自己这么做而已。比如,我们可以假定德皇并没有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职务。这是否会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呢?俾斯麦的政策能否继续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威胁的恐惧心理,从而避免两个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呢?在这个例子中,运用逆向思维有助于我们理解,除了结构因素之外,个人的个性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反事实推理的例子。假定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司机开车到达萨拉热窝那个重要路口时向左转弯,而不是向右转弯,以及那位奥匈帝国皇储没有被暗杀,那么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呢?这个反事实推理的例子揭示了偶然因素的作用。那个暗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呢?鉴于当时的同盟结构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如果这个暗杀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是否可能出现其他的导火索将战火点燃呢?

设定与历史事实相反的条件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但这种"不确定的历史"(iffy history)也存在着漏洞。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

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它也可能否定这么一个事实，即当某个事情发生后，其他事情就不可能与它处于同等的地位。时间是关键的尺度。我们经常说，历史事件是“取决于道路的”，这指的是一旦事件沿着特定的道路发展，所有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的概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要比其他的事情大。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反事实推理实验是否恰当和有用。这四个标准是：合理性（plausibility），相近性（proximity），理论性（theory）和真实性（facts）。

合理性

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cotenability）。我们必须合理地设想出两个同时存在的条件。假设某个人说，如果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那么他就能够赢得滑铁卢战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说明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但在19世纪背景中设想20世纪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当笑话说可能很不错，但它并没有正确地运用反事实推理，因为其中包含着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有这种联系。

相近性

每个重要的事件都处于一个长长的因果关系链当中，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都具有多重的原因。如果我们在时间上追溯得更远，那么就必须把更多的原因看成是经久不变的。原因事件（question event）和结果事件（subject event）（也就是说，A是否导致B?）在时间上越相近，那么答案越可能为“是”。让我们来看看帕斯卡（Pascal）的一个著名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即

假如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都将重写。于是,克利奥帕特拉鼻子的长度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到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及其原因是无数个的。克利奥帕特拉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之远,她的鼻子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最多只能逗人乐一乐,而对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没有丝毫的意义。时间上接近意味着因果关系链上的两个事件比较相近,这样我们就能够相对较好地控制其他的原因,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各种因素作用的大小。

理论性

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当借助现有的理论,理论浓缩了我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认识。我们应当分析导致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所有个案,来判断某个反事实推理是否合理。理论使我们在分析众多原因时具有思想上的条理性和组织性,从而避免随意猜想。例如,有关拿破仑如果拥有隐形飞机就不会在滑铁卢战败的反事实推理就缺少理论依据。这种随意猜想能让人觉得好笑,也会妨碍我们通过大脑的思考获取有益的启示。

假定我们在探讨冷战的起源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1945年的时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或者我们假定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会发生呢?这些反事实推理的问题,可以用来探讨有关冷战主要源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是否正确。另外一个同冷战相关的假说是,两极国际结构导致冷战的发生。

也就是说，即使美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力分布也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冷战。共产党国家相互交战的事实，增强了这种反事实推理的说服力。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有助于我们比较均势理论和意识形态动因理论的解释力。总之，与理论相结合的反事实推理更有意义，也更有用处，因为这样的思维活动运用了更加广博的知识。

真实性

只设想出有意义的假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真地用已知的事实对这些假说加以检验。进行反事实推理需要确切的事实和详尽的历史分析。为了检验一个思维实验是否有道理，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谓不变的因素是否与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相吻合。我们必须谨防在同一个思维实验中，把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建立在另外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的基础之上。这种多重的反事实推理会导致混乱，因为同时发生变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通过仔细分析所有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判断思维实验是否准确。

总而言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反事实推理。反事实推理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特别有用，因为国际政治没有物理学那样的实验场所。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地构建反事实推理，因为有些反事实推理构建得比较好，也更有成效。反事实推理有助于我们把历史和理论相结合起来，并且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具备进行可以人为控制的实验的条件。

一些历史学家追求纯正性，他们认为，假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反事实推理不属于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设想可能发生什么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忽

视了一点，即我们不仅要努力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努力了解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为此，我们还需要知道是否可能发生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反事实推理。因此，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但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主张，恰当的反事实推理分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纯正论者提醒我们，不可提出诸如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这样不甚严谨的反事实推理的论点。然而，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下一章中看到的，粗浅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与深刻的反事实推理分析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注　释

1. Paul Schroed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Swords and Ploughshares*, 4:1 (October 1989), p. 4.

2.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 119.

3. Richard Cobden, quoted in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04.

4.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1986), p. ix.

5. *U. 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 3:2 (June 1990), pp. 6—7.

6. Vaclav Havel, "Address to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February 21, 1990, pp. S 1313—1315.

精选阅读材料

1. Waltz, Kenneth,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5, 224—238.

2. Levy, Jack S.,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9—99.

3. Detwiler, Donald, *Germany: A Short Histor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04—148.

4. Ritter, Harry,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in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70—73.

其他阅读材料

1. Albrecht-Carrie, Ren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Harper &Row, 1973).

2. Bartlett, C. J., *The Global Conflict: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y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90 (London: Longman, 1994).

3. Brown, Michael, and Sean Lynn-Jones,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4.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David Lalm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Systemic and Dyad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41:1 (October 1988), pp. 1—20.

5. Craig, Gordon A., *Germany, 1866—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6. Dole, Michael,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3 (Summer 1983), pp. 205 - 235.

7. Evangelista, Matthew, "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in Michael Doyle and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8. Fearon, James D., "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43:2 (January 1991), pp. 169 - 195.

9.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Hoffmann, Stanley,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pp. 394—417.

11. Hopf, Ted,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

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 (June 1991), pp. 475—494.

12.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 Kennedy, Paul M.,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14.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arper & Collins, 1989).

16. Kissinger, Henry A.,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17. Mearsheime, John, "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pp. 5—56.

18. Milner, Helen,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 1997).

19. Nye, Jr., Joseph 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40:2 (January 1988), pp. 235—251.

20. Schroeder, Paul,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Summer, 1994), pp. 108—148.

21. Taylor, A. J. 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 - 1918*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71).

21. Zelikow, Philip,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思考题

1. 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次会议是恢复了战前欧洲的秩序还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

2. 1815 年到 1848 年欧洲体系的特点是什么？它们是否不同于 18 世纪的均势体系和 19 世纪末的国际体系？导致体系变迁的因素是什么？

3. 德国的兴起对欧洲体系产生了哪些影响？俾斯麦的欧洲战略是什么？他是关心维持均势还是破坏均势？

4.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可以防止战争？他们的观点有什么

缺陷?

5. 沃尔兹的三个层面指的是什么?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吗?

6. 什么是反事实推理的历史研究方法?你会怎样运用这个方法?

欧洲大事年表

17 世纪

1618—1648	三十年战争: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的冲突;最后一场宗教战争;德国被击垮
1643—1715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在位
1648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结束
1649—1660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联邦
1652—1678	英法和英荷争夺海上霸权的一系列战争
1660	英国斯图亚特改革;查理二世登基
1682—1725	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西方化"过程
1683	土耳其对维也纳的围攻被击退
1685	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镇压法国新教徒
1688/1689	英国光荣革命
1688—1697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反对路易十四的全面战争

18 世纪

1700—1721	北方大战:俄国、波兰和丹麦反对瑞典在波罗的海的主导权;俄国成为欧洲强国
1701—1714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乌得勒支条约》;法国和西班牙王室的永久分离;法国实力继续衰落
1707	英格兰和苏格兰组成大不列颠王国
1740—1748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1763	英国和法国的七年殖民地战争;法国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大不列颠王国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强国
1775—1783	美国革命战争
1789—1799	法国革命
1799	法兰西拿破仑·波拿巴政变

1799—1815	拿破仑战争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主导国

19 世纪

1801	大不列颠王国和北爱尔兰组成联合王国
1804—1814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在位
1806	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弗朗西斯二世取消皇帝称号
1810	荷兰王国并入法兰西帝国
1812	法国入侵俄国;拿破仑军队覆灭
1814—1815	维也纳会议,欧洲君主制国家被恢复
1815	滑铁卢战役: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但被英国和普鲁士军队击败
1833—1871	德意志统一
1837—1901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工业大发展和繁荣
1848	法国、德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革命;卡尔·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
1848—1916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时期,他在 1867 年成为奥匈帝国皇帝
1852—1870	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位
1854—1856	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在同俄国的战争中支持土耳其帝国
1855—1881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
1859—1870	加里波第领导的意大利政治统一和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1861	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俄国农奴
1862—1890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
1864—1905	俄国在波兰、巴尔干和中亚的扩张
1867	奥匈帝国建立
1870—1871	普法战争:德国入侵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1870—1914	欧洲帝国主义的巅峰期;工业发展;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
1871	巴黎公社:巴黎成为革命中心,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国家政府的战争
1878	柏林会议: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帝国
1881	俄国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882	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条约；1907 年续约
1899—1902	南非布尔战争

<u>20 世纪最初 10 年</u>

1904	英国和法国的双边协约
1904—1905	俄日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日本成为世界强国
1907	俄国和英国、法国建立三国协约

第三章　均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均　　势

人们经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结为均势的产物。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国际政治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但它也是含义最不清楚的词汇之一。这个词被广泛地使用，用来描述各种事情和为各种事情寻找合理的依据。18 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把均势视为永恒的、明智的政治规则。但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却把它称之为"一个怪物，一个没人描述过、没人能够描述清楚以及没人

可以理解的虚无的东西。”[1] 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总统，他认为均势是个邪恶的原则，因为它鼓励政治家像切奶酪那样，根据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不顾民众的意见，对国家进行瓜分。

威尔逊之所以不喜欢均势，还由于他相信均势会导致战争。均势政策的捍卫者则认为，均势将使世界走向稳定。然而，和平与稳定并不是一回事。欧洲国家体系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发生了119次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和平并不是主流的情势，因为至少涉及一个大国的战争就占了3/4的时间。在那些战争中，有9次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许多大国都介入其中，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霸权战争或者世界大战。假如要问均势是否维持了过去5个世纪里现代国家体系的和平，答案是否定的。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国家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独立，而不是维持和平。均势有助于维护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无政府体系，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国家都生存下来。比如说，波兰在18世纪末被其邻国像切奶酪那样地瓜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大块波兰的领土。离我们更近的一个例子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达成了一个协定，波兰再次被瓜分，苏联获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国家。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1年为止。总之，均势不能维持和平，也不总是能够维护各国的独立地位，但它维持了无政府国际体系。

权力

我们为了理解均势，首先要理解权力(power)的概念。权力和爱情一样，比较容易被感受到，但是很难被界定和衡量。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按字典的解释，权力就是做事情和控

制他人的能力。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把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然而，我们要想根据别人行为的变化来衡量权力大小，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偏好。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如同狐狸以为兔子布里尔(Rabbit Brer)被自己扔到灌木丛里后已经受伤一样，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我们假如不付出劳动的话，通常是很难事先知晓别的国家或人民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的。

对分析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花费很多时间来反复思考过去的事情。而对务实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他们可用的时间或许就太少了。由于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通常与该国所掌握的特定资源是分不开的，所以政治领导人一般是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界定权力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以及政治稳定等。与根据行为界定权力的方法相比，这种界定权力的方法使得权力看上去更具体、更容易被测定、更能够被预见到。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政治纸牌游戏中拥有多少张好牌。纸牌游戏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如果对手亮出的牌是你手中的牌所无法匹敌的，那么你就应该赶快认输。如果知道自己打不赢，那么就别挑起战争。

然而，有一些战争往往是由最终战败的国家所挑起的。这表明，政治领导人有时会冒险或者犯错误。1941 年的日本或 1990 年的伊拉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对手常常不把手中的牌全部亮出来。这就好像在纸牌游戏中的玩牌技巧，比如虚张声势和欺骗，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对手没有欺诈的行为，国家在选择最佳资源以应对某个特定情势的时候也会犯错误。例如，法国和英国在 1940 年时所拥有的坦克数量要比希特勒多，但是德国的军队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先进的

军事战略。

在从资源的角度思考权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权力的转换这一基本的问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转换成实际的影响力，这就好比纸牌高手往往能够以弱胜强。权力转换是指把潜在权力（用资源来衡量）变成实际权力（用别国行为的改变来衡量）的能力。为了准确地预测结果，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而且也要知道该国转换权力的能力。

我们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什么样的资源是最好的权力基础。在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判断权力资源。例如，在18世纪欧洲的农业经济体中，人口是个重要的权力资源，因为它是税收和征召步兵的基础。法国在人口数量上居欧洲之首。因此，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在维也纳和会上向胜利国提出了一个详尽的德国复兴计划，以维持欧洲的均势。该计划列出了德国在1805年以后所失去的领土和人口，并且提出德国要收复这些领土与人口。在前民族主义（prenationalist）时代里，人们并不在乎那些地方的人是否说德语或把自己当作德国人，实际上那里的很多人都不讲德语，也不把自己当作德国人。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民族主义已经起到相当大的作用。19世纪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工业和铁路系统越来越重要，这使国家可以快速进行动员。在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当政时期的德国首先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并且很快就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国的人口虽然总是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但是动员起来却很难。俄国于20世纪初在其西部建立了铁路系统，这成为1914年德国担心俄国力量增长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铁路遍及欧洲大陆，这也使得英国不能只关注海上的权力。没过多长时间，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的确有必要在欧

洲投放一支军队，以防止另一个大国主宰这片大陆。

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自从 1945 年核时代开启以来，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一直是特别重要的权力资源。然而，核武器的毁灭性是如此之大和令人可怕，以至于核力量难以被灵活地加以使用。核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在很多情况中，使用武力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其代价太大了。

即使一些国家被禁止使用武力，军事力量仍然会扮演着重要的幕后角色。例如，美国可以向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以抵制外来威胁，或者美国军队能够确保重要能源（比如波斯湾的石油）的供应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别国提供军事保护力量，也可以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发挥作用。有时这种联系（linkage）可能是很直接的，而在更多的时候，它是存在于政治家头脑中的、没有公开表述的一个因素。

领导国家和主要权力资源

时　期	领导国家	主　要　资　源
17 世纪	西班牙	金条，殖民地贸易，雇佣军，王朝纽带
17 世纪	荷　兰	贸易，资本市场，海军
18 世纪	法　国	人口，农业，公共管理，陆军
19 世纪	英　国	工业，政治凝聚力，金融和信贷，海军，自由规范，岛国地理位置（易于防御）
20 世纪	美　国	经济规模，科技领先，世界性文化，军事力量和同盟，自由的国际规制，跨国通讯和信息技术的中心

除此之外，人们还在讨论“第二种形式的权力”（the second face of power）。迫使他国改变行为，大概可以称为直接地或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的方法。这样的“硬权力”既可以依靠奖励（胡萝卜），也可以依赖威胁（大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软的”或间

接的使用权力的方式。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而在世界政治中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和决定情势的结构,其重要性不亚于在特定情势下改变他国的行为。这种形式的权力,即让别人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叫作“同化权力”(cooptive power)或者“软权力”(soft power)。软权力所依赖的资源包括思想的影响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影响别人偏好的能力。身为父母的人都知道,假如父母能够影响孩子的信念和喜好,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比仅仅依赖严格管制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同样地,政治领导人和哲学家早就知道,决定议事日程和辩论框架也可以产生权力。确立偏好的能力总是同无形的权力资源密不可分的,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硬权力和软权力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物质上的成就会使得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则会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然而,软权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梵蒂冈的软权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积变小而减弱。今天,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欧洲拥有很强的软权力,但是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这种权力就被浪费掉了。

今天,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观察过去5个世纪里的现代国家体系可以看出,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权力资源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在今天的世界里也会继续发生变化。

在信息经济和跨国相互依赖的时代,权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转移(transferable)、不太具体和缺少强制性。然而,权力变革

还没有完成。在 21 世纪,信息和制度权力肯定会起较大的作用,但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也告诉我们,军事力量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市场和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也将依然重要。随着现代经济体中服务行业的发展,今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信息量将变得更大,快速和灵活反应的组织能力将是重要的资源。政治凝聚力以及世界性和可输出的大众文化,也将依然十分重要。

政治家在判断均势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如何衡量变化中的权力资源。国际政治分析家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一个词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必须努力搞清楚人们随意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各自到底指的是什么。“均势”这个词一般来说有三种含义。

作为权力分布的均势

均势的第一个含义是指权力分布,也就是说,谁拥有权力资源?有时人们用均势来描述现状,即当前的权力分布状况。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美国人声称,假如尼加拉瓜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均势将发生变化。这样使用该词并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小国改变自己的立场,可能对当时的权力分布状况产生一点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无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政治中较深层次的变化。

权力均衡也可以指一种特别的(或稀有的)情势,其中的权力分布是很均等的,如同处于平衡状态下的天平。一些现实主义者声称,权力均等才会产生稳定,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在一国权力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不敢攻击它的时候,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霸权稳定理论认为,权力不平衡会产生和平的局面。如果存在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就会出

现稳定的局面,而当这个国家权力衰落以及一个新的挑战国兴起的时候,就很可能发生战争。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即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正好符合这种霸权转移的理论。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与该理论相吻合。

然而,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95年,美国和英国在南美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似乎可能动用武力。美英两个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另一个是日落西山的霸主,这正是两国会走向冲突的一个动因。然而,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读到关于1895年英美大战的描述,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所指出的,我们可以从狗不吠叫的现象中得到重要的线索。在这个例子中,英美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这促使我们去寻找其他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则把原因归结为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日益增强的民主性质,以及衰落的领导国和崛起的挑战国之间存在着超越国界的文化纽带。我们至多只能从均势这个词汇的第一种用法中得出这么一个有关均势的结论,即主要国家间不均等的权力分布状况的变化是我们用来解释战争和不稳定局面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

作为政策的均势

均势的第二种用法是,把它当作一种平衡政策。均势预示着,其他国家会采取行动阻止一国发展成为主导国家。这种预言由来已久。1848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

(Palmerston)勋爵曾经说过,英国没有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1914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并不想让英国介入战争,但是他最终还是认为英国应该参战,这是因为他担心德国通过控制欧洲大陆而主宰整个欧洲。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丘吉尔(Churchil)主张英国同斯大林结盟,而在此前的几年中,他一直猛烈抨击斯大林。丘吉尔说过:"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那么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给魔鬼说几句好话。"[2]这些都是均势被当作政策的很好例子。

这样来预测国家的行为,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假设:(1)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体系。(2)国家把独立视为最重要的东西。均势政策不一定意味着国家采取行动,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事实上,国家为了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可以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方法。它可以选择搭便车(bandwagon),也就是加入较强大的一方并分享胜利者的成果。在国内政治中,搭便车是个常见的现象,即政治家们倾向于站在明显占上风的一方那边。然而,均势却预示着国家会加入处于下风的一方,以阻止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主导地位。一国在国际政治中搭便车,可能面临着丧失独立地位的危险。墨索里尼在1939和1940年支持希特勒进攻法国,希望以此分得一杯羹,但是意大利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德国。这就是为什么均势政策要求国家站在弱者一边。均势就是帮助失败者的政策,这是因为,如果帮助胜利者,那么自己很可能有朝一日遭受胜利者的侵害。

国家可以通过单方面增加军备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借助他人的权力资源,来追求均势的目标。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比较具有意义和说服力的预言。当代中东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正如本书第六章将论述的，当伊朗和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战争的时候，一些观察家认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统治下的伊朗，因为前者代表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和阿拉伯势力，后者代表着波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但是叙利亚这个其领导人同属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国家，却成为伊朗的盟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担心邻近的伊拉克在伊斯兰世界壮大自己的权力。叙利亚选择均势政策来对抗伊拉克，尽管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目标。用意识形态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而用均势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常常是正确的。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我们对人类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人类总要进行选择，他们不总是按预言的那种行为方式行事。特定的情势会促使人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人们行为的细节。如果有人在拥挤的报告厅里喊"着火了"，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学生们会向出口跑去，但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个出口。假如所有人都选择同一个出口，那么大家会拥挤在一起，结果谁都跑出不去。国际政治理论经常都有解释不了的例外情况。虽然政策意义上的均势原则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很强的预见力，但是它的历史记录绝非完美。

国家有的时候会违背均势的原则，加入强者的一方，而不是帮助弱者，或者采取超然的立场，甘冒丧失独立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国家会说，我们别无选择，或者我们无力影响均势。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小国可能认为自己不得不处于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同时希望以中立来保留某些行动自由的权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芬兰无法同苏联抗衡，并且远离欧

洲中心。芬兰人认为,保持中立比参加欧洲的均势更为稳妥。芬兰人身处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失去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换取对内事务上的独立权。

用均势预测国家行为有时并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原因和人们对威胁的认知有关。举个例子说,人们根据对1917年国家权力资源的机械统计,应该预言美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的一边,因为英国、法国和俄国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30%,而德国和奥地利只拥有世界工业资源的19%。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战争中的侵略者,而且德国人也低估了美国的军事潜力。

威胁的邻近性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一个邻近的国家可能算不上是一个世界强国,但它对其所在的地区或当地来说,可能极具威胁性。让我们看看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的英国理应和美国交战,但是它最终还是选择了姑息美国的政策。英国在很多事情上都作出了让步,包括在修建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使得美国增强其海上权力。其中一个原因是,与遥远的美国相比,邻近的德国更让英国感到恐惧。尽管美国比德国强大,但由于德国离英国很近,在英国人的眼中,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更大。距离上的邻近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1945年后的同盟状况。美国显然比苏联强大,但是为什么欧洲和日本不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呢?部分答案就在于威胁的邻近性。在欧洲和日本看来,苏联的威胁是紧迫的,而美国则离它们很远。欧洲和日本于是请来远方的强国,以便在自己的邻近地区重新确立均势。威胁的邻近性影响了国家对威胁的认知,这个事实表明,通过简单、机械地统计权力资源来预测国家行为的方法是有

很大缺陷的。

从均势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不甚准确，这也同世界事务中经济相互依赖作用的不断增大有关系。根据均势政策，法国应该不希望看到德国实力的增长。然而，由于经济一体化，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可以促进法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法国政治家们在本国经济增长的时期，比较容易竞选连任。由于法国和德国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遏制德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愚蠢的。从经济上考虑，过于简单化地推行均势政策，往往会导致双赢(join gains)机会的丧失。

最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有时也会使得一个国家站在强者而非弱者一边。甚至是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民主制城邦国家更可能和雅典结盟，而寡头制城邦国家则更可能和斯巴达结盟。英国在19世纪90年代姑息美国，或者欧洲国家在1945年以后和美国结成民主国家间的同盟，这些都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威胁的邻近性有关联。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不要过于根据意识形态因素来预测国家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要经常犯大的错误。在1939年的时候，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斯大林和希特勒会走到一起，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但是，均势的考虑促使他们结成了同盟，反对在意识形态上介于苏德之间的国家。同样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错误地、不加区分地对待中国、苏联、越南以及柬埔寨，因为它们都属于共产党国家。如果我们从均势政策的角度来预测，那么这些共产党国家会相互制衡(事实上就是这样)，这应该是一个代价较小的、促进亚洲地区稳定的途径。

作为多极体系的均势

均势这个词的第三种用法是，它被用来描述历史上的多

极体系的例子。19 世纪的欧洲体系有时被称为温和的多极均势体系模式(the model of a moderate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爱德华·久利克(Edward Gulick)等历史学家用“经典的均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均势的结构变迁

1815—1870	松散的多极
1870—1907	德国的崛起
1907—1914	同盟的两极化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这个词来描述 18 世纪的欧洲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均势要求有几个国家,通常是 5 个或者 6 个国家,遵循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由于均势这个词的这一用法指的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所以我们将考察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体系的两个层面,即结构和过程。显然,19 世纪的多极均势体系,使 1815 年到 1914 年之间的 100 年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历史上最长的、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但是,我们不能太理想化,不要把复杂的现象看得过于简单。

19 世纪欧洲的均势结构在该世纪末发生了变迁。在 1815 年到 1870 年期间,欧洲有 5 个主要大国,它们经常改变结盟对象,以此阻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从 1870 年到 1907 年,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欧洲有 6 个主要大国,但是德国力量不断增强,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终结。在接下来的 7 年中,两个同盟体系,即三国协约(英、法、俄)和三国同盟(德、奥匈、意大利)演变成两个僵持对峙的集团,其灵活性的丧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19 世纪的均势体系可划分为 5 个时期。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国家使法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制定了维持均势的一些游戏规则。从 1815 年到 1822 年,这些

规则构成了“欧洲一致”（Concert of Europe）的基础。这些欧洲国家相互协调行动，经常聚会以处理争端和维持均势。它们允许在一国内部发生政治变革和可能引起该国改变政策的时候，可以采取某些国际干涉行动。1822年到1854年间，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兴起，使得国际干涉变得比较困难，但是已经受到削弱的“欧洲一致”的局面依然存在。这种局面在19世纪中叶开始瓦解，当时的自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反对过去那种以领土补偿或者恢复旧政权来维持均势的做法。民族主义变得十分强大，它不允许国家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瓜分奶酪。

第三个时期是从1854年到1870年，它比前二个时期要动荡得多，发生过5次战争。第一次是克里米亚战争，它是一场经典的均势战争，即法国和英国阻止俄国对正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但是其他几次战争则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有关，政治领袖们抛弃了过去的原则，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来追求自己的权宜目标。例如，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士，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君主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然而，俾斯麦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战争来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从而实现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重新采取比较保守的行为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均势的过程

1815—1822	欧洲一致
1822—1854	松散的一致
1854—1870	民族主义和意大利、德国的统一
1870—1890	俾斯麦恢复一致
1890—1914	灵活性的丧失

第四个时期是从 1870 年到 1890 年,它是俾斯麦的均势时期,新兴的、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俾斯麦以灵活的手段和各种各样的同盟伙伴周旋,并且努力使法国的注意力从其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他也限制了德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以便维持欧洲以德国为轴心的均势。然而,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没有像他那么高明。从 1890 年到 1914 年,欧洲的均势依然存在,但是其灵活性已经逐渐丧失。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没有和俄国续订条约,德国也开始介入海外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中: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不去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对抗行为。这些政策加深了其他国家对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恐惧,从而促使体系发生两极分化,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同盟

作为多极体系的均势和同盟的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同盟是指主权国家为了确保共同的安全而建立起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建立同盟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比如两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可能认为,双方结盟更有助于对付来自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国家的威胁。从传统上说,军事同盟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焦点。

国家也可能出于非军事的原因而结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意识形态经常把国家拉在一起,当然它也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经济上的考虑也可能是结盟的另外一个原因,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中那些单纯的军事考虑正在失去其重要性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

同盟的瓦解和同盟的形成一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总

的来说，当国家相互把对方视为自己安全的威胁源时，同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情况可能由于一国政权的更迭而发生。政权更迭之前，两国可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政权更迭之后，两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变得相互对立。1949 年以前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是盟友，但是 1949 年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之后，中美两国就成为敌手。当然，同盟的消亡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强大，它或许会把另外一个国家视为竞争对手，而对方有可能把这个国家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并且到别处寻找盟友以抵制这一威胁。

俾斯麦同盟体系具有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灵活性使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因为它允许偶尔发生一些不至于导致整个大厦坍塌的危机或冲突。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俾斯麦就好像一个能使几只球不落地的魔术师。即使一个球落地，这个魔术师也可以让其他的球不落地，甚至还可以弯下身救起那只因失误而掉落的球。

然而，复杂性也是该体系的缺陷。当俾斯麦被其不太高明的继任者取代以后，这个同盟体系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从俾斯麦去职一直到 1914 年，德国的决策者们不再坚持俾斯麦的政策，即鼓励法国在非洲殖民地进行扩张并消耗其能量，转移法国对德国的敌意，而是促使同盟的消亡和紧张局势的出现。德皇没有同俄国续订协约，让俄国和法国，连同后来的英国，结成了同盟。原来那个灵活的、多极的同盟体系逐渐演变成两个对立的同盟集团，后者极大地威胁着欧洲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超过 1500 万的人丧失生命。仅仅在

索姆河(Somme)一役中,就有130万人伤亡。俾斯麦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的那场战争导致3.6万人丧命,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5.5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令人可怕的战壕、铁丝网、机关枪和大炮,让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躺在地下。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人的死亡,也摧毁了3个欧洲帝国,即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均势的中心是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依然重要,但是美国和日本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迎来了俄国革命,由此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着20世纪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壕沟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呢?在1900年到1909年间担任德国首相的伯纳德·冯·毕洛夫(Bernhard von Bulow)公爵,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在柏林的首相府会见了其继任者贝斯曼·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下面是毕洛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描述:

贝斯曼就站在房间的中央,我永远忘不了他此时的脸

色和眼神。某个著名的英国画家画过一幅画，画中一只可怜的替罪羔羊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可言状的痛苦神情，我现在在贝斯曼的眼中就看到了这种痛苦神情。开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我对他说道，"告诉我，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举起自己那细长的胳膊，用迟钝的、疲惫的声调回答我："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在此后很多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中，我常常想，假如能够把当时贝斯曼站在房间的那个位置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抓拍下来，那该多好啊！这样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位可怜的人从未想要战争的最好证明。[3]

此后几代的历史学家都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试图解释战争为什么会爆发。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我们不可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结为一个单一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几个独立的层次加以分析。在每个层次上，均势不管是作为一个多极体系还是单个国家和领导人个人的政策，都是我们理解这场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所在。随着同盟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均势的多极结构越来越受到削弱，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三个分析层次

答案就分别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简约原则告诉我们，应该从最简单的原因着手分析，看看它们有多大的解释力，然后再根据需要，分析较为复杂的原因。因此，我们先看看体系层次（结构与过程）的解释，然后探讨国内社会层次的解释，最后分析个人层次的原因。接下来我们使用反事实推理方法，看看如何把这些原因结合起来，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结构层次上，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

的僵化。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德国把它的工业力量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能力，包括推行大规模的海军军备扩充计划。德国1911年制定的"特皮茨计划"(Terpitz Plan)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第二大海军，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德国的扩张计划令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感到不安。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将被孤立和难以保护其庞大的帝国。19世纪末英国反对荷兰在南非的移居者——布尔人——的布尔战争，使得英国的忧虑加重，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同情布尔人。

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爵士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试图解释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备忘录成为英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他的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罗声称，英国的反应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法则。

英国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反应，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结构性原因：欧洲同盟体系的不断僵化。1904年，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同法国结成同盟。1907年，英法伙伴关系扩展到俄国(它已经同法国结盟)，形成了"三国协约"。德国看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加强了同奥匈帝国的关系。随着同盟关系的僵化，外交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俾斯麦时代那种经常变换盟友的均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大国都把自己捆在两极的一极中。

德国的意图

德国或者是追求全面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其邻国，并且最终威胁英国的生存；或者并没有这么明确的野心，目前只是想利用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国家之一的合法地位与影响，试图扩展其对外贸易，传播德国的文化，扩大其影响范围，以及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全世界追求德国的新的利益……然而，我们经过研究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去判定德国所实施的政策方针到底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因为很显然，第二种计划（半自主演变，并非完全没有国策的支持）可能在任何阶段和第一个计划或者有意识地设计方案合为一体。而且，假如演变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德国地位的自然上升对世界其他地方所构成的危害之大，不亚于通过“恶意蓄谋”明目张胆地夺取类似地位所造成的威胁。

——艾尔·克罗的备忘录，1907年1月1日[4]

过程上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呢？从多极到两极的结构变迁影响了19世纪均势体系的运行过程。此外，建构主义者还可以提出导致20世纪初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另外3个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几个国家所共有的跨国性观念。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东欧出现了一个呼吁讲斯拉夫语的人联合起来的运动，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着拥有大量斯拉夫居民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德国出现了敌视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作家著文宣称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不可避免，他们还编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民族主义力量在团结工人阶级上比社会主义强大，在团结银行家上比资本主义强大。在各个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皇帝致电俄国沙皇，希望他避免与德国交战。德皇在电报中称其表兄为“亲爱的尼克”，

署名为“您的威廉”。德皇希望沙皇和自己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所面临的问题，把战争迫近的原因归结为一位皇室家族成员——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力量已经压倒贵族或君主团结一致的观念，那封家族电报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德国对英国宣战的反应

躺在坟墓里的爱德华七世（德皇的叔叔和1901—1910年间的英国国王）竟然比依然健在的我更强大！有些人认为，只要使用小小的手段就可以把英国争取过来或者让它安静下来!!! ……现在必须无情地揭穿这种诡计，要无情地当众揭下英国人脸上所戴的基督教和平主义面具，把伪善、可耻的和平论调架上颈手枷示众!! 我们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使节、代表等，必须鼓动整个伊斯兰世界起来反抗这个可憎的、骗人的、无道德的商人的国家；如果我们坚持到流完最后一滴血，那么英国至少要丢掉印度。

——德皇威廉二世[5]

20世纪初均势体系丧失灵活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和平产生了自满情绪，因为欧洲已经有40年没有发生一场有大国介入的战争了。1905—1906年在摩洛哥、1908年在波斯尼亚、1911年再次在摩洛哥发生了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得到了控制。然而，外交上的妥协也导致了挫折感。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方要退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另外一方作出更多的让步？”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关适者生存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物种的世代遗传问题，但是把它应用在人类社会和特殊事件上是有问题的。达尔文的思想被用来证明“强者必胜”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强者必胜，为什么要为

和平担忧呢？许多领导人认为，持久战争看来是不可能的，强者占上风和速战速决的战争是值得欢迎的。

20世纪均势体系失去灵活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德国的政策。正如艾尔·克罗所言，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德皇的政策有一个极其笨拙的方面。德国人的“世界野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实现野心的方式得罪了所有的人，这正好和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俾斯麦应对体系的方式相反。德国人因挑起海军军备竞赛而激怒了英国人，而且在土耳其和巴尔干问题上得罪了俄国人，在摩洛哥的一个保护地争端中刺激了法国人。德皇试图以压力迫使英国与德国和好，以为德国给英国以足够的恫吓，就会使英国觉得自己必须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英国在德国的胁迫下，先是同法国联手，然后又同俄国合作。所以，到了1914年，德国人认为必须冲出这个包围圈，因而故意冒险挑起了战争。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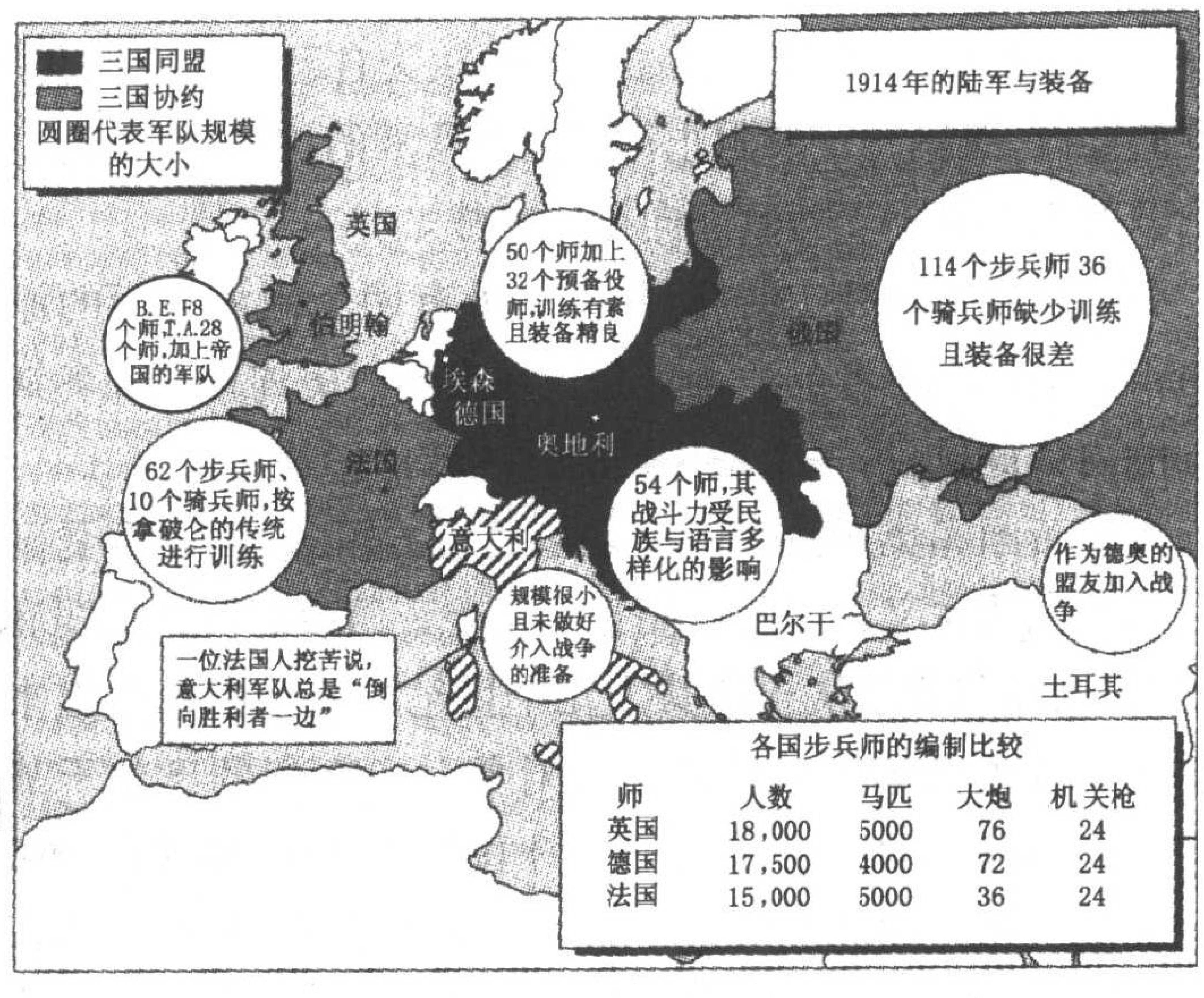
我们从第二个分析层次考察了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否定有关该层次的一种解释，即列宁所说的金融资本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观点。按照列宁的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像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苏丹的法绍达相互对峙，英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非到埃及连成南北一条线，法国则想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东西一条线。假如英法爆发战争，列宁的解释可能得到证实。但事实上，战争是在16年之后发生于欧洲，而且银行家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夕是强烈抵制战争的,他们坚信战争对经济有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认为自己必须遵循艾尔·克罗的建议,英国一定要阻止德国主宰欧洲的均势,但是他也担心伦敦的银行家不支持政府向德国宣战。

我们可以否定列宁的解释,但另外有两个国内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是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另一个是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因而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威胁。而且奥斯曼帝国政府极其虚弱和腐败,它成为那些要求从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集团较易攻击的对象。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土耳其人的统治,但是巴尔干国家在 1913 年就因为瓜分赃物而陷入相互间的战争之中。战争增大了某些巴尔干国家的胃口:我们既然可以赶跑土耳其人,那么为什么不能赶走奥地利人呢?

在巴尔干国家中,塞尔维亚带头行动起来。奥地利担心自己的帝国在这种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解体,从而丧失其地位。最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交战,这不是因为一个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而是由于奥地利想削弱塞尔维亚,防止它成为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主义的一个磁场。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Conrad)将军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动机:"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对暗杀事件的报复,奥匈帝国必须把剑指向塞尔维亚……我们的君王已经被掐住喉咙,只能选择被掐死或者作最后一搏以挽救自己。"[6]旧的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走向解体,这是战争爆发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弗兰茨·斐迪南遇刺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圆圈代表军队规模的大小
1914年的陆军与装备
英国
B.E.F8个师,T.A.28个师,加上帝国的军队
50个师加上32个预备役师,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
114个步兵师 36个骑兵师缺少训练且装备很差
埃森
德国
奥地利
62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按拿破仑的传统进行训练
54个师,其战斗力受民族与语言多样化的影响
意大利
作为德奥的盟友加入战争
规模很小且未做好介入战争的准备
巴尔干
一位法国人挖苦说,意大利军队总是“倒向胜利者一边”
土耳其
各国步兵师的编制比较
师 人数 马匹 大炮 机关枪
英国 18,000 5000 76 24
德国 17,500 4000 72 24
法国 15,000 5000 36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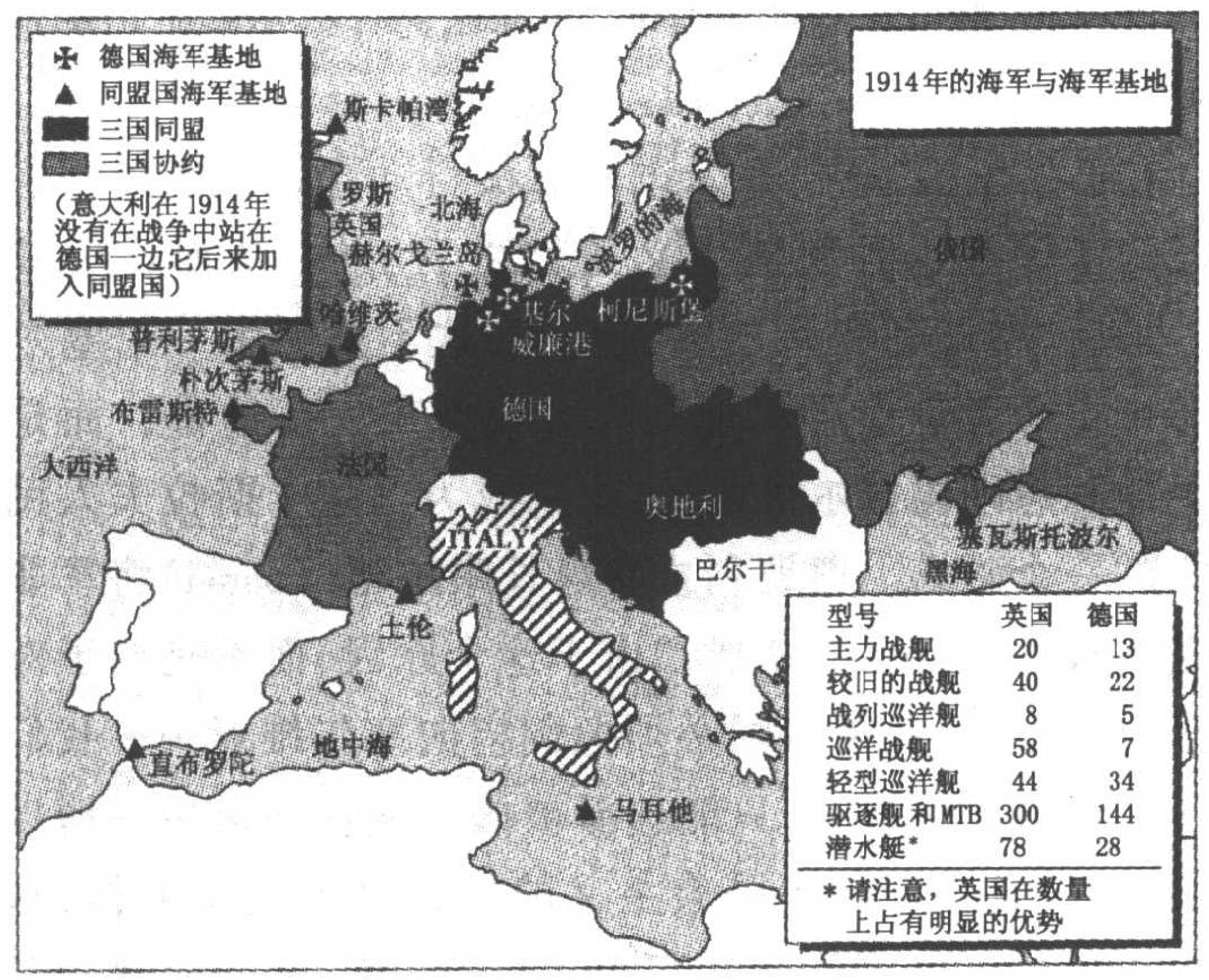

德国海军基地
同盟国海军基地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意大利在1914年没有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它后来加入同盟国)
1914年的海军与海军基地
斯卡帕湾
罗斯
英国
北海
赫尔戈兰岛
基尔
威廉港
柯尼斯堡
哈维茨
普利茅斯
朴次茅斯
布雷斯特
大西洋
德国
奥地利
ITALY
巴尔干
塞瓦斯托波尔
黑海
土伦
地中海
直布罗陀
马耳他
型号 英国 德国
主力战舰 20 13
较旧的战舰 40 22
战列巡洋舰 8 5
巡洋战舰 58 7
轻型巡洋舰 44 34
驱逐舰和MTB 300 144
潜水艇* 78 28
* 请注意,英国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图 3.1

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内层次上的原因和德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及其追随者们声称,德国的社会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在费希尔看来,德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行为,就是德国精英试图让人们的注意力从德国社会内部融合程度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的一种举动。根据这种学说,统治德国的势力是一个由土地贵族和一些工业大资本家组成的国内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为"裸麦和钢铁的联盟"。这个统治集团不进行国内改革,而是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采取冒险行动,以竞技场代替面包。换句话说,扩张主义是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这不足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在1890年以后给国际体系施加压力的原因。

第三个分析层次即个人的作用又如何呢?平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领袖们的特征。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f)是一个疲惫的老人,受康拉德将军以及表里不一的外交大臣伯克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的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作为未来的皇帝,可能会是一个制约战争的力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贵族,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抵制国内的改革。他由无能的外交和国防大臣所辅佐,而且深受其多病和神经质的妻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德国皇帝,但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是个脾气暴躁和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感情用事。他使得德国推行一个缺乏技巧或者前后不一的冒险政策。下面引用冯·毕洛夫的一段话:

> 除非在真正危急形势的压力下,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固执己见,威廉二世并不想要战争。在危急时刻,皇帝陛下会痛苦地意识到,他决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带进战场。他

很清楚自己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黩武演说，只是想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个弗雷德里克大帝或者拿破仑式的人物。[7]

个人的特性确实起作用。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因素，特别是德皇的个人因素，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体系、社会和个人原因之间的关系见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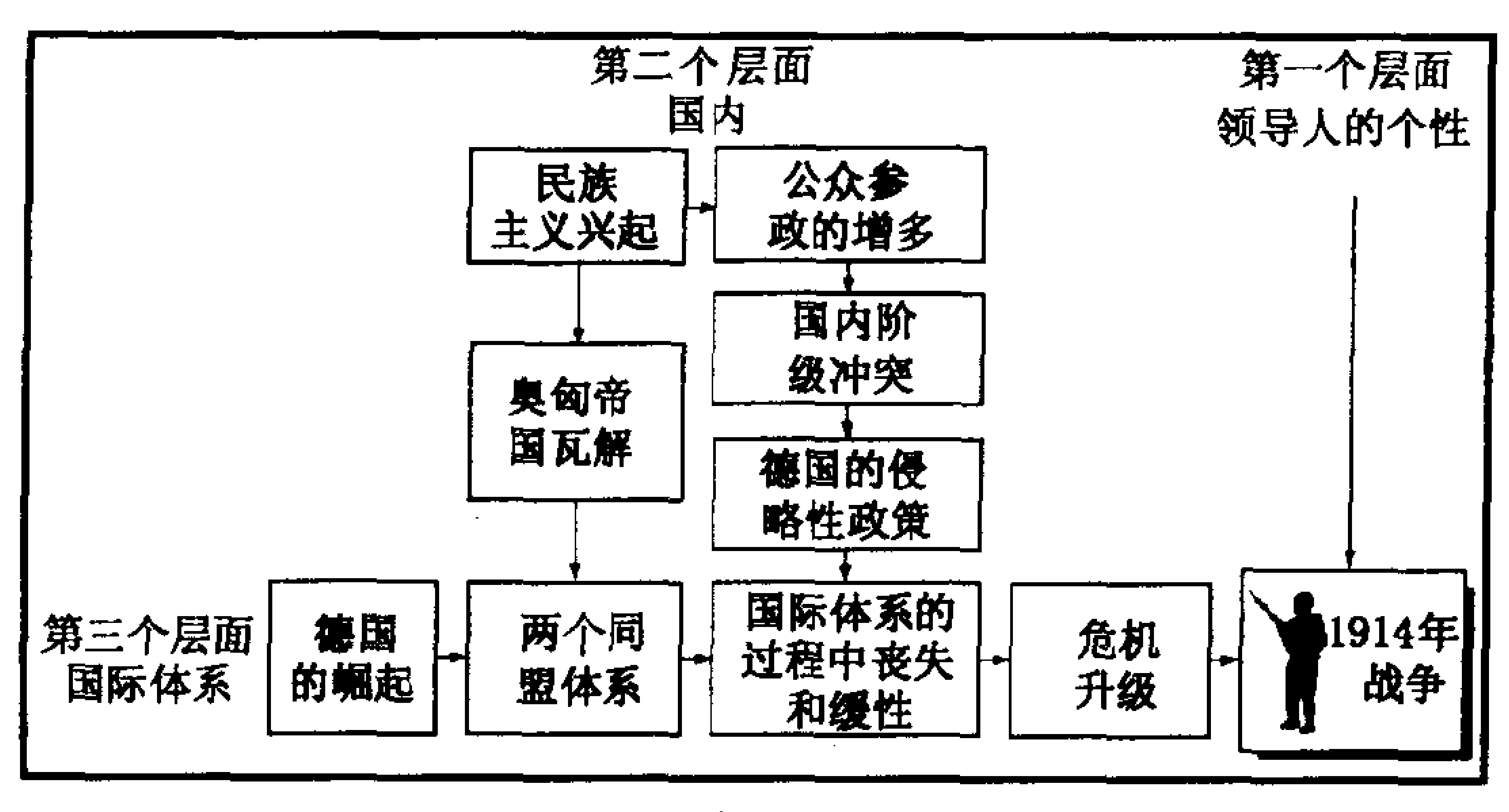


图 3.2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如果一个情势有好几个原因，而且每个原因都是充分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势是"过于确定的"(overdetermined)。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过于确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答案是否定的。一直到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此后接下来的 4 年大残杀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根据时间上的远近，来区分三种类型的原因。最远的是深层原因(deep causes)，其次是中层原因(intermediate causes)，最近的原因是突发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我们用房间里的灯光来进行类比：突发原因是你按了开关，中层原因

是有人给房子拉了电线，深层原因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dison）发明了输送电力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火来进行类比：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多前，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波茨坦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同其表兄、德皇威廉二世会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层原因是均势结构的变迁和国内政治体系某些方面的变化。特别重要的因素包括德国力量的崛起，两极力量体系的出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导致的两个衰落帝国的死亡，和德国政治。中层原因包括德国的政策、和平自满情绪的增长以及领导人的个人特性。突发原因是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者刺杀。

回顾历史，历史事件看上去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没有那次暗杀事件，其他某个突发事件也会发生。有的人说，突发事件就好比有轨电车，每隔10分钟一辆。因此，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那个特别的事件并没有那么重要，某个突发事件或许迟早都要发生。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历史研究中的反事实推理方法来加以检验。我们仔细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提出“如果……那么……”和“要是……应该……”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那么结果会怎么样？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掌权，应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由于深层和中层原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可能性很大并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用火来做比喻，木头和干柴可能放在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了，但一直都没有被点燃。如果在某个人拿来火柴之前下了场雨，那么即使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也不会燃起大火来。

假定在1914年并没有发生萨拉热窝事件，而且一直到1916年都没有发生危机，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一种可能是，俄国力量的增长会使德国不敢无所顾忌地支持奥匈帝国。冯·毛奇(von Moltke)将军和外交大臣雅戈(Jagow)这两位德国领导人在促使战争爆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坚信德国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很清楚，两线作战会出问题，德国应该先把一方击垮，然后再同另一方交战。俄国虽然国土较大，但是技术上很落后，而且交通系统也不发达，所以应该被列为第二次打击的目标。德国应当首先西进，击败法国。在西线获胜之后，德国才可以东进，来打击俄国。实际上，这就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即德国总参谋部的战争计划，它要求借道比利时(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法国发动闪电式的攻击，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把矛头转向东面。

图 3.3

但是，如果这一计划的实施被推迟到 1916 年，它或许就不能获得成功，因为那时候俄国已经用法国的钱建设好自己的铁路系统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人需要用 2 到 3 个月的时间把军队集结到德国战线，这样一来，德国就有足够的时间先把

法国击败。到1910年的时候,俄国运送军队的时间缩短到18天,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知道,德国所拥有的时间已经没有那么宽裕了。到1916年的时候,德国大概就根本没有时间先西进、后东进了,这样一来,它可能因此放弃两线作战的战略。一些德国领导人认为,从发动战争的时机看,1914年比1915年好。所以,他们想利用危机,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并获得战场上的胜利。

假如1914年没有发生暗杀事件和出现危机,那么可能直到1916年的时候战争都不会爆发,这样一来,德国人就可能被威慑住,不敢冒险发动两线战争。他们在决定给奥匈帝国一张空头支票之前,一定比1914年时要谨慎得多。他们或许会放弃施利芬计划,只把注意力放在东线的战争上,或许会同英国人达成共识,改变进攻有利的观念。

总而言之,如果再有两年的时间,俄国实力的变化就可能防止战争的爆发。假如这个期间没有发生战争,德国的工业实力会继续得到增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估计,如果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德国很可能获得对欧洲的主导权,因为德国的实力可能强大到法国和英国无法遏制的地步。

如果欧洲能再享有两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也可以用反事实推理法来假定英国内部的事态发展。历史学家乔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在《自由英国的奇怪死亡》一书中,叙述了英国的内部动荡。自由党主张英国放弃爱尔兰,而保守党人,特别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保守党人则极力反对英国放弃爱尔兰。在英国军队中也可能发生叛乱。如果阿尔斯特叛乱(Ulster Revolt)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英国很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从而不能和法国、俄国结成同盟。的确,如果再有两年的和平时间,那么

可能出现很多重大的历史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另外一组根据反事实推理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战争能否爆发,而是战争的类型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德国的政策让其邻国感到恐惧,而且德国后来也担心自己被三国协约所包围。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到底爆发一种什么类型的战争呢?不一定爆发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有可能发生四种类型的战争。

第一种仅仅是局部战争。德皇最初只希望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重演,在那场危机中,德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因此使俄国人在巴尔干遭受失败。德皇在1914年7月5日许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然后他就度假去了。德皇度完假回来以后,发现奥地利人已经填了那张他给的空头支票,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德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采取措施努力避免战争的升级,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威廉致尼克的电报。假如德皇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1914年8月发生的冲突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

第二种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在俄国进行军事动员的时候,德国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德皇询问冯·毛奇将军,他是否可以只限于准备东线的战争。冯·毛奇回答说,只准备东线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集结军队和运输给养的计划会给后勤造成严重的问题。他告诉德皇,如果改变军事计划,那么德军将变成乌合之众。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负责德军铁路运输的冯·斯塔伯(von Staab)承认,德国完全可能顺利地调整军队集结计

划。如果德皇知道这一点，并且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后来所发生的战争就很可能是一条战线的战争。

第三种可能是没有英国参加的两条战线的战争，即德国和奥匈帝国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如果英国不介入，那么德国很可能获胜。假如德国不入侵比利时，英国真有可能不介入战争，尽管德国侵略比利时并不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爱德华·格雷和外交部看来，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存在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危险。但是，英国是个民主国家，内阁中的自由党人士发生了分裂。左翼自由党人反对战争，但是在德国人侵比利时后，主战的自由党人说服了反战的自由党人，从而弥合了自由党内部的裂痕。

最后一种可能是没有美国参加的战争。假如美国不在1917年介入战争和改变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德国很可能在1918年初就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美国介入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发动了针对协约国和美国的潜艇战。德国还有一个拙劣的举动，即德国政府发送过一封电报，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 telegram)，它指示德国驻墨西哥使馆挑起针对当地美国人的事端。美国把它视为敌对的行为。上述这些因素促使美国参战。

我们从上述反事实推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战争可能不会在1914年爆发。其二，爆发了的战争不一定是历经4年的大残杀，那场战争摧毁了作为全球均势中心的欧洲。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件。人类的选择是有作用的。

选择的漏斗

历史的发展取决于道路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

件越来越迫近,选择的余地就越来越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然而,领导人所面对的选择漏斗有可能变大,选择的余地也有可能增多(见图 3.4)。假如我们从 1898 年开始考察,并且提出当时欧洲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战争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法英战争,这两个国家那时正由于在一个非洲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而怒目相视。但是,在英法于 1904 年建立起协约关系之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变得很小。1905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 1908 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得爆发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一些有意思的事件在 1910 年发生了。德国首相贝斯曼·霍尔威格极力改善德英关系,英国也暗示德国,如果德国限制其海军,英国愿意在任何一场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与此同时,英国和俄国以及英国和法国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重新激化,三国协约似乎有可能因此瓦解或者受到削弱。换句话说,到 1910 年,选择的漏斗又变大了。

但是,这个漏斗由于 1911 年发生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又变小了。当法国出兵帮助摩洛哥苏丹之后,德国要求在法属刚果获得补偿,而且派遣一艘炮舰开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则准备出动其舰队。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进行反战游说活动,德皇也让步了。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人们对德国动机的忧虑。

尽管 1912 年和 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奥匈帝国的危机为 1914 年的战争搭建了舞台,有关国家还是在 1912 年再次采取措施,努力促进局势的缓和。英国政府派霍尔丹(Haldane)勋爵去柏林,英德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很显然,英国当时已经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赢得了胜利。所以,漏斗或许还能再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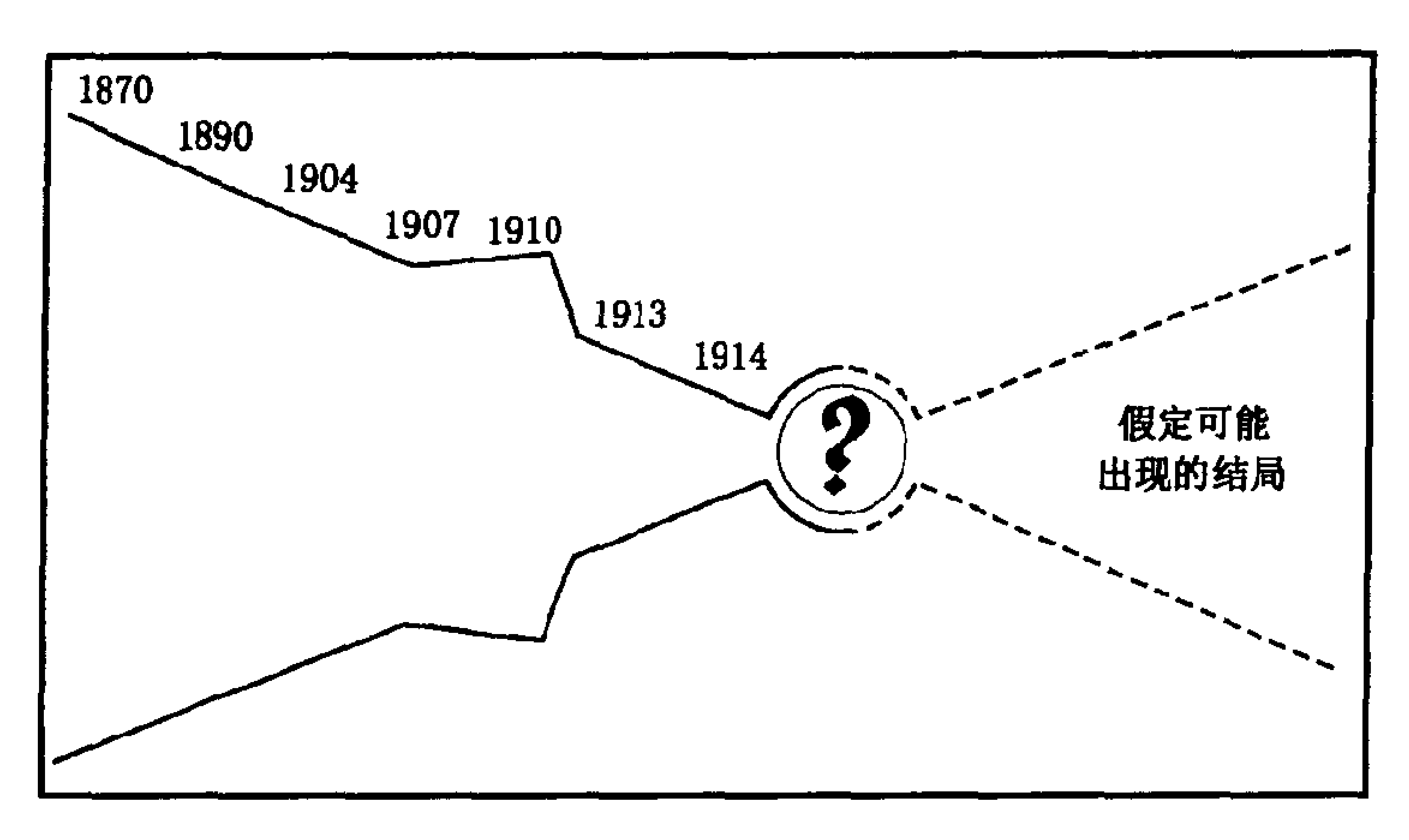


图 3.4　不断变小的选择漏斗

1914 年 6 月，英国派出 4 艘巨型战舰访问德国的基尔港，在人们看来，英德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果英国已经认定战争很快就要发生的话，那么英国最不该做的事就是让 4 艘自己的主力战舰驶入敌人的港口。英国显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战争会很快爆发。实际上，英国和德国的水兵是于 6 月 28 日一起在基尔码头行走的时候，听到了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在一个叫萨拉热窝的遥远的地方刺杀奥地利大公的消息。历史上常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再一次看到，“可能”不等于“不可避免”。

再谈历史教训

我们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吗？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历史教训。类比可能起误导的作用，人们制造了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神话。比如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偶然发生的战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的，因为奥匈帝国是有意发动战争的。如果战争迟早都要发生，那

么奥匈帝国宁愿这场战争在 1914 年而不是在 1914 年以后爆发。人们对这场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和残酷程度的估计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偶然的。

也有人说,这场战争是由欧洲的军备竞赛所引起的。但是,到 1912 年时候,海军军备竞赛已经结束,英国取得了胜利。虽然欧洲各国陆军实力的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但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军备竞赛所引发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的。

另外,战争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事态发展之后爆发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其中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均势体系的结构或者权力分布,也要关注均势体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能给现实主义理论以重要的补充。体系是否和缓(moderation)取决于过程,单靠权力分布是不能确保体系稳定的。另外一个有益的教训是,我们必须防止产生对和平的自满情绪,或者那种认为下一场危机是上一场危机的翻版的观念:人们认为 1914 年的战争只是 1908 年波斯尼亚危机的重演,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保持一支在危机中可以起稳定作用的军队是很重要的,不可认为我们要么必须使用军队,要么就不需要军队。铁路的时间表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使得政治领导人较难获得很多的时间用来采取外交行动。

21 世纪初的世界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于 1914 年的世界:其一,核武器使得预防性战争具有极大的毁灭性;其二,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今天的战争意识,或者赞成战争的观念,要比过去弱小得多。在 1914 年时,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欢迎战争,因为战争就像暴风雨一样,可

以净化空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人们的情绪的确就是这样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危机中的世界》一书中十分清楚地论述了这种情绪：

>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情绪。由于未能从物质繁荣中获得满足感，各国转而热衷于国内或国际争端。民族情绪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而极度高涨，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燃起了熊熊的(即使被掩盖着的)大火。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渴望受苦。的确，每个地方的男人们(men)都急于冒险。[8]

他们冒了险并遭到失败，这就是 1914 年的教训。

注　释

1. Richard Cobde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3); reprinted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69).

2. Winston Churchill, June 22, 1941, to his private secretary Colville, in Robert Rhodes James, M. P., ed., *Churchill Speaks: Winston Churchill in Peace and War: Collected Speeches* 1897—196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0).

3. Bernhard von Bülow, *Memoirs of Prince Von Bülow* 1909—1919 (Boston: Little, Brown 1932), pp. 165—166.

4.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y,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 III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8).

5. Quoted in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9.

6. Baron Conrad von Hotzendorff in Sidney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pp. 185—186.

7.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 144.

8. 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New York: Scribner's, 1923), p. 188.

精选阅读材料

1. Guilick, Edward,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Norton, 1967), pp. 1—34, 184—218.

2. Joll, Jame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Longman, 1984), pp. 9—147.

3. Kennedy, Paul, "The Kaiser and German Weltpolitik," in John C. G. Rohl and Nicholas Sombart, eds.,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the Corfu Paper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43—168.

4. Lowe, John, *The Great Powers, Imperialism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865—192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202—239.

其他阅读材料

1. Christiansen, Thomas,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Spring, 1990), pp. 139—168.

2. Dangerfield, George, *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1).

3. Howard, Michael, *The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Fischer, Fritz, *World Power or Decline: The Controversy ov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Norton, 1974).

5. Kennedy, Paul M.,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6. Kupchan, Charles A.,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Lebow, Richard *Ned*,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 1981).

8. Maier, Charles S., "Wargames: 1914—1919,"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49—280.

9. Miller, Steve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phen Van Evera, eds.,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1. Rock, Stephen R., *Why Peace Breaks Out: 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12. Sagan, Scott,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1:2 (Fall 1986), pp. 151—176.

13. Schroeder, Paul W., "World War One as Galloping Gertie: A Reply to Joachim Remak",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IV: 3 (1972).

14. Snyder, Jack L.,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Trachtenberg, Marc,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2.

16. Tuchman, Barbara,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17. Tuner, L. C. F.,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18. Walt, Stephe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 Williamson, Samuel R.,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89), pp. 225—248.

20. Wilson, Keith, *Decisions for War*, 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思考题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避免？

2. 你如何运用沃尔兹的三个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3. 你认为下面哪个因素最能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a. 同盟体系

b. 公众舆论

c. 军事学说和军事指挥(具体说明哪个国家)

d. 政治领导(具体说明哪个国家)

e. 经济压力或武力

f. 错误认知

g. 其他因素

4.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英国的恐惧？或者俄国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德国的恐惧？

5. 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战争,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偶发性战争？讨论"偶然发生的"战争有意义吗？它是否属于"无意识的战争"？

6.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7. 今天的决策者们可以从1914年学到哪些教训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事年表

1905—1906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皇访问丹吉尔,德国试图取代法国的地位;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解决方案让法国满意
1908	奥地利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奥地利自1878年开始统治了这两个斯拉夫人的地方;塞尔维亚以战争相威胁,但是由于没有俄国的支持,塞尔维亚人无能为力;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牵制俄国
1911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炮舰"豹号"出现在阿加迪尔,企图迫使法国以牺牲在其他殖民地的利益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

1912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打败土耳其并获得色雷斯;奥匈帝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国,以遏制塞尔维亚
1913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打败保加利亚并夺取后者的领土
1914年	
6月27日	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遇刺
7月5日	奥地利努力获得德国支持其反对塞尔维亚的行动
7月23日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7月25日	塞尔维亚拒绝接受最后通牒的某些内容;寻求俄国的支持
7月26日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建议召开一个会议以解决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反对英国的提议
7月28日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	俄国和奥地利宣布总动员;法国军队从法德边界后撤10公里
7月31日	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取消总动员;俄国拒不答复
8月1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英国动员其舰队;法国在德国军队入侵卢森堡后宣布总动员
8月2日	德国要求比利时提供通道
8月3日	比利时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德国向法国宣战
8月4日	德国军队开进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

1919年,获胜了的盟国领导人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在
签署凡尔赛条约之前

第四章　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集体安全制度的兴与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社会的大分裂,并且使得人们对冷

酷无情的杀戮行为极其反感。人们普遍认为,均势政治导致了这场战争。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 19 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均势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民主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威尔逊看来,"均势现在已经成为永远令人憎恨的游戏。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它是一种古老而邪恶的主导秩序。我们今后再也不需要均势这个东西了"[1]。

威尔逊的看法不无道理,因为民主或和平不是均势政策优先考虑的对象。我们知道,均势是维持主权国家体系的一个途径。国家努力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均势是维护国家独立所必需的,但是它允许使用武力或者违背了自决原则。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混乱性和残酷性,开始使得人们认识到,通过战争来维持均势是一种再也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然而,如果均势体系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呢?

威尔逊承认主权国家是不可能被废除的,但是他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自由主义的药方是建立起类似于国内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国际制度,使得民主程序也可以应用于国际层次上。当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使得民主在世界上长治久安,而反过来民主可以保障世界的安全。1918 年 1 月,美国宣布了 14 点参战的理由,其中的第 14 点最为重要。它主张"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基于特别盟约基础上的普遍的国家联盟"。实际上,威尔逊想把基于均势政治的国际体系改变成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体系。

国际联盟

尽管威尔逊被批评家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但他自己还是

坚信,使国际安全建立在国际组织的基础上,是可以处理世界政治的有效方法。他很清楚,仅靠纸上协议和条约是不够的,需要用组织和规则来加以补充。这就是为什么威尔逊如此钟情于国际联盟思想的原因。道义力量是很重要的,但它需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安全必须是集体的责任。假如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一起,那么力量的天平就会倒向善的一方。国际安全能成为集体的责任,爱好和平的国家可以组成反对侵略的同盟。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如何建立起这样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呢?首先,应当宣布侵略和进攻性战争为非法的行为。其次,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结成同盟,对侵略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如果大家都许诺支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受害者,那么爱好和平的力量就将占上风。再次,假如威慑失败和出现侵略行为,所有国家都要同意惩罚发动侵略的国家。集体安全原则和均势政策有相似之处,即国家都努力通过缔结强大的同盟来遏制侵略行为,一旦威慑失败,它们都愿意使用武力。

但是,集体安全和均势的方法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人们的关注点是国家的侵略政策而非国家的能力。而均势政策则不同,一些国家通过缔结同盟来反对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人们的关注点是国家的能力。第二,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同盟不是预先建立起来的,因为不能预先确定哪些国家是侵略者。一旦发生侵略行为,就是所有国家反对一个国家。而在均势体系中,同盟是预先建立起来的。

集体安全原则反映在《国际联盟盟约》上,而《国际联盟盟约》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条约之一。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国联盟约中的几个条款。国联盟约第 10 条规定,参加国承

诺保护任何一个遭受侵略的成员国。第 11 条规定,任何一个战争或者战争威胁行为都和所有的国家有关系。第 12 条和 15 条规定,成员国同意将争端移交仲裁,而且在仲裁失败后的 3 个月内不诉诸战争。第 16 条至关重要,它规定任何违背国联程序的战争都将被看作敌视所有国联成员国的战争。发动战争的国家将立即遭受经济制裁,国联行政院可以进一步建议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条款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它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国联必须经过所有成员国同意,才能实施集体安全措施。这样一来,每个国家都具有否决权。国家在签署盟约的时候许诺遵守第 16 条,但是实际上各国自己可以决定采取何种制裁措施以及如何实施制裁,它们不受一个更高权威的制约。因此,国际联盟不是建立世界政府的一个步骤,只有存在着世界政府才能使得在国家之上具有一个更高的、对国家有约束力的权威。所以,国际联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无政府国家体系的终结,它只是国家集体惩罚体系中不守规矩的行为体的一种举措。

集体安全涉及到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主权与国际法。主权的定义很简单,即国家在指定领土内享有最高的管辖权。国家道义主义者宣称,而且国际联盟也规定,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容侵犯的,一国政府在其边界之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在国家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其权威才可以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一国政府签署一项条约,允许另外一国的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某些影响,属于自愿地接受限制,而不算侵犯主权。因此,签署国联盟约的国家就自动把某些主权转让给了所参加的国际组织, 换取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保障。

根据威尔逊的理解以及国际联盟盟约的阐述,国际法的地位优先于国内法以及特定情势中的主权。甚至自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法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国家在违

背国际法的情势中不享有主权，而且应当受到惩罚。如同警察与国内法相互联系一样，集体安全与国际法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国际法被国家遵守的程度远不及国内法。许多国家拒绝接受国际法的约束，认为遵守国际法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而非强制的行为。

美国与国际联盟

国家不愿意放弃某些主权以换取集体安全，其原因在于国际联盟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不参加自己创建的这个国际组织。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国联盟约。其结果是，这个集体安全制度只能在缺少美国这个最重要的角色的参与下运作起来。

国际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有关建立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计划，但为什么美国突然又退缩了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少人把“正常”理解为避免介入国际事务之中。反对美国加入国联的人士认为，1823年的“门罗主义”把美国的利益限定在西半球。抵制“纠缠不清的同盟”思想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反对国际联盟的领军人物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担心国联盟约第16条会限制美国的主权和宪法赋予参议院的宣战权力。洛奇担心，美国可能因为国际联盟有关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的决定，而不是由于参议院的决定和人民的意愿，被拖入远方的战争。

> 我的国际联盟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光之下。
>
> ——伍德罗·威尔逊[2]

威尔逊总统与洛奇参议员的争论有时被描述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同一位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但它也可以被视为美国道德主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争论。威尔逊坚决不与洛奇进行协商以达成批准国联盟约的共识，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洛奇的孤立主义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欧洲均势政策的态度，即认为欧洲国家以均势的名义干了肮脏的勾当，美国人做得比欧洲人好。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够不关心 19 世纪的均势，正是因为英国的舰队让美国人享受免费搭车的好处，欧洲其他国家无力染指西半球和威胁美国。美国实际上并非一直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它干涉过其弱小邻邦如中美洲、墨西哥和古巴的内部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面临着在两种形式的道德主义中进行选择的困境，最后，抵制欧洲均势的孤立主义观念占了上风。其结果是，这个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均势天平发生倾斜的国家，拒绝承担创建战后世界秩序的责任。

早期的国际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能够防止德国重新崛起的军事保障。由于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法国要求英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希望两国联合采取军事防范措施，以防止德国重新崛起。英国对此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这样一个同盟违背了集体安全原则，因为它预先就确定了一个侵略者。而且英国认为法国比德国强大，英法没有必要建立同盟，即使该同盟的基础是传统的均势原则，它也是没有必要的。英国声称，应当把德国重新纳入(reintegrate)欧洲大家庭之中，这就如同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维也纳会议把法国带回到欧洲一致的体系之中。英国人的战争激情比法国人的战争激情消退得快，英国人觉得已经到了安抚(appease)德国人和让他们重新回到欧洲大

家庭之中的时候了。

法国却不为这些论点所动，它与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结成了同盟。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国家，而原属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捷克和罗马尼亚结成了“小协约”同盟。法国的政策是两头落空，因为这些同盟关系不仅违背了集体安全原则，而且从均势的角度上看对法国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波兰同其邻国的关系不和睦，而且它也代替不了俄国的作用，俄国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被排挤在外。“小协约”国家则因民族问题和国内分裂而动荡不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它丧失了2万5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和700万的人口。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把陆军人数削减到10万名，而且禁止德国拥有空军。该条约包含一个“战争罪行条款”，它断定德国发动了战争。德国由于负有发动战争的责任，所以它必须支付赔款。赔款总额达330亿美元，德国人认为这样的赔款额对于已经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德国来说实在是过高了。在德国没有按期支付赔款之后，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直至德国支付赔款。德国在进行消极抵抗之后，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吞噬了中产阶级的积蓄。这进而导致在民主化道路上艰难迈进的魏玛共和国面临动荡的国内局势。

意大利对巴黎和约或者国际联盟从来就不太热心。意大利最初是和德国及奥匈帝国结盟的，但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它便决定站到协约国的一边，以便得到更多的好处。在1915年秘密签署的《伦敦条约》中，缔约方许诺，把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即战后的南斯拉夫)划给意大利作为补偿。意大利人期望这些许诺能得到兑现，但是伍德罗·威尔逊反对这种旧式的分配战利品的行为。不仅如此，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人于1922年上台执政，其

对外政策目标是追求国家的荣耀，并且实现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的理想。

所以，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无能为力的。但是，1924年到1930年是国际联盟相对成功的时期。国际联盟制定了减少德国赔款额的方案。1924年，国联成员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议定书，同意通过仲裁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1925年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且在国联行政院中占据一个席位。

《洛迦诺公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德国保证其西面与法国、比利时的边界不可侵犯。根据《凡尔赛条约》，在1870年战争中被俾斯麦夺取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退还给法国，德国同意沿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洛迦诺公约》重申了《凡尔赛条约》的上述规定。另一方面，德国同意在寻求改变其东部与波兰和捷克的边界前，应先接受国际仲裁。然而，上述第二个条款隐藏着危机，因为这样就使德国有了两种边界，西面的边界不可侵犯，而东面的边界则可以谈判——但这样的协定在当时算作是一个进展。

1914—1918年战争死亡人数

国　　家	死亡人数
奥匈帝国	1250000
大英帝国	900000
保加利亚	100000
法　　国	1500000
德　　国	1750000
意 大 利	600000
罗马尼亚	300000
俄　　国	1750000
塞尔维亚	50000
土 耳 其	30000
美　　国	112000

国际联盟设法解决了一些小的争端,比如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争端,而且它也开始了裁军谈判的进程。在 1921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英国和日本达成了一项海军军备裁减协议,随后国联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以便进行更为广泛的裁军谈判。国联的行为促使在 1932 年召开了世界裁军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召开的时间有点太迟了。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这个公约是以美国国务卿和法国外长的名字命名的。最重要的是,国际联盟成了外交活动的中心。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成员国,但是这两个国家还是派了观察员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会议。尽管 1929 年 10 月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 1930 年国家社会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预示着严峻的问题即将出现,但于 1930 年 9 月召开的国联大会还是充满了乐观的气氛。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两场危机,使得这种有关集体安全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了。

国联在中国东北遭受的挫折

为了理解九一八事件,我们必须了解日本的处境。日本把自己从 19 世纪中叶的一个潜在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变成了 19 世纪末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 1904—1905 年的一场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在 1910 年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协约国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之一。欧洲国家和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建议国联宪章确认种族平等的原则,但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通过了种族歧视法案,排挤日本移民,英国也终止了其同日本的双边条约。许多日本人认为,在日本就要加

入大国俱乐部的时候，规则被改变了。

中国是九一八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国。1911 年的革命宣告清朝统治的终结，然而，这个国家很快就陷入了由军阀混战所引起的内乱之中。中国东北虽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处于一个军阀的统治之下。中国国民党在军事强人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试图统一中国，并且严厉谴责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自 19 世纪的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使中国饱受凌辱与剥削。20 世纪 20 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开始出现，中国宣布抵制日货。

图 4.1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人和文官在争夺领导权。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日本这个岛国极其脆弱。日本的军事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的权利。1931年9月，日本军队在南满铁路线上制造了一起事件。这起事件给日本军队夺取整个中国东北提供了一个借口。虽然日本声称其行动的目的是保护南满铁路，但它越走越远，建立了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中国向国联控诉日本的行为，但是日本阻止国联通过一项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案。该年12月，国联决定派出一个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首的委员会去调查九一八事件。

李顿勋爵最后于1932年9月向国联递交了一个报告，指责日本的干涉行为是非正义的。该报告建议国联成员国不要承认伪满洲国，但是没有呼吁根据国联盟约第16条对日本实施制裁。1933年1月，国联大会以42赞成、1票反对的表决，接受了李顿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报告。日本投了反对票，然后退出国联。总的来看，九一八事件说明，国联的程序很慢、很谨慎，也没有任何的效果。九一八事件表明，国联失败了。

埃塞俄比亚纷争

1935年发生的埃塞俄比亚事件使国联的集体安全体系面临了最大和最后的一次考验。国联在这个时候实施了制裁，但结果还是失败了。意大利很早就想兼并埃塞俄比亚，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地方紧靠意大利在红海沿岸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而且还由于法西斯分子认为，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挫败意大利在该地区殖民的企图侮辱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声称，这

个历史“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在 1934 年到 1935 年之间，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有一项和平条约，意大利也签署了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的《凯洛格 - 白里安公约》，而且意大利作为国联成员国许诺过把争端移交仲裁，并且在仲裁失败后 3 个月内不采取其他行动。但是，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行为完全没有顾及这些规定。

意大利在 1935 年 10 月入侵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国联行政院为了避免意大利投否决票，召开了一个国联特别会议，讨论对意大利采取何种制裁措施。有 50 个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侵略行为发生 80 天之后，该会议建议成员国采取 4 项制裁措施：禁止向意大利出售军事产品；禁止向意大利提供贷款；禁止从意大利进口东西；禁止出售意大利不容易在其他地方购买到的某些产品，比如橡胶和锡。但是，国联的决定没有涉及如下三项内容：没有对钢、煤和石油实施禁运，意大利仍然可以得到这些产品；没有断绝与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英国没有关闭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可以通过这个运河向厄立特里亚运送物资。

为什么国联成员国不能采取更多的措施呢？国联成员国普遍存在着乐观主义情绪，认为已有的制裁措施足以迫使意大利从埃塞俄比亚撤军。国联的制裁的确影响了意大利的经济：当年意大利出口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意大利里拉也贬值，而且人们估计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将在 9 个月内耗尽。然而，尽管制裁措施给意大利以一定的打击，但它未能迫使墨索里尼改变其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对欧洲均势的担忧胜于他们对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关注。英国和法国不想疏远意大利，因为德国的实力正在增强，这两个国家认为有必要

把意大利纳入遏制德国权力的同盟之中。1934年，墨索里尼看到希特勒似乎就要占领奥地利，于是调动意大利军队到奥地利边界，希特勒作了退让。英国和法国希望说服意大利加入反对德国的同盟。

传统的外交家并不反对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制度，他们根据古老的均势原则对此加以新的解释。从均势的角度来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在欧洲心脏地区出现十分紧迫的问题时，卷入发生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上的一场冲突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在遥远的非洲所发生的侵略行为，并不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有关国家有必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把意大利重新拉进反对德国的同盟之中。因此，英国和法国开始对制裁意大利的举动采取了不太热心的态度，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和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在1935年12月会面，并拟订了一个把埃塞俄比亚划分成两部分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属于意大利所有，另外一部分属于国联管辖。有人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新闻界，这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霍尔被指责背叛了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原则，因而被迫辞职。

但是3个月后，英国的舆论又倒转过来了。1936年3月，希特勒违反《洛迦诺公约》，派德国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地区。英国和法国顿时把埃塞俄比亚问题搁置一边，并同意大利协商如何恢复欧洲的均势。显然，欧洲均势的重要性超过了在非洲贯彻集体安全原则。1936年5月，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同年7月国联取消了针对意大利的制裁。

海地驻国联代表的一席话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悲剧："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邻近的国家还是遥远的国家，白

人的国家还是有色人种的国家，都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即我们有一天也可能成为某个国家手中的埃塞俄比亚。”[3]而且几年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入希特勒的侵略魔掌之中。世界上最初的实施集体安全原则的努力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500万到5000万之间，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这次战争还以使用先进的武器而闻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和飞机才刚刚被使用，其作用微不足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和飞机占据了主导地位。雷达在不列颠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原子弹诞生了，世界迎来了核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战败国无条件投降而告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西方盟国占领了德国和日本，并且在占领期间改变其社会。“德国问题”通过德国分裂半个世纪而得到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两极世界的出现，美国和苏联在这场冲突结束后成为实力超群的国家。这场战争宣告欧洲主导均势的时代的结束，欧洲从此成为外部大国角逐的场所，如同1870年以前的德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框架一直维持到1989年。

希特勒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常被称为“希特勒的战争”。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过于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以往事态发展的

产物，它是使欧洲霸权在1918年终结的那场大战的第二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只是一次幕间休息。希特勒想要战争，但是他想要的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想要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也就是闪电战。另外，这场战争也发生在太平洋地区，这更加说明这场战争不只是“希特勒的战争”。希特勒一直鼓动日本进攻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或者攻击西伯利亚，以迫使苏联从欧洲抽调兵力。但日本既没有进攻新加坡，也没有攻击西伯利亚，而是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这令希特勒大为吃惊。太平洋战争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但是其根源和欧洲的战争不一样，它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追求地区霸权的帝国主义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过于强调其他的原因。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近乎为希特勒开脱罪责。A. J. P. 泰勒就声称，虽然希特勒是个可怕的人物和令人讨厌的冒险者，但他只是一个闯入西方民主国家绥靖政策所制造的真空地带的机会主义者。泰勒的观点有点过分。比如，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不甚明确的计划，泰勒把它视为希特勒对法国人侵鲁尔的愤怒情绪的发泄。但是希特勒在1928年还写了另外一本秘密的书，这本书重申了《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即便那并不是一个详尽的计划，它也是希特勒所思所想的清楚表白。

> 在我看来，这就是有关希特勒是否有意发动战争这个问题的关键。他并不是一心想要战争爆发，除非他可以使用某种聪明的诡计逃避战争，如同他曾经逃避国内战争一样。那些心怀险恶动机的人很容易认为别人也怀有同样的动机，希特勒认为别人的行为与自己一样。
>
> ——A.J.P.泰勒[4]

希特勒在国会受到欢迎

泰勒对于“霍斯巴赫备忘录”也是轻描淡写。希特勒的助手霍斯巴赫(Hossbach)上校在1937年贝希特斯加登的一次会议上,记录下了希特勒准备在1943年德国开始失去其优势地位之前夺取领土的计划。希特勒十分清楚,德国一定要抓住在东面出现的机会,奥地利和捷克将是最初的目标。泰勒否定这个备忘录的重要性,认为它不是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在泰勒的著作问世之后,有更多的证据已经为人们所知晓。我们可以知道,希特勒经常谈及该时间表和那些目标。霍斯巴赫备忘录基本上预告了希特勒的行为。

希特勒的战略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可以有四种政策选择，但他否决了其中的三种。他可以采取消极的立场，接受德国的国际地位被削弱的现实。他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德国的实力(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以工业发展来扩大德国的国际影响。他可以把自己的目标限定在修改《凡尔赛条约》上，收回德国在1918年丧失的一些权益。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西方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都推到德国的头上确实有失公允。但是希特勒拒绝采取以上三种对策，而是选择了突围。在他看来，德国被夹在欧洲的中心，不应该永远处于被包围的境地，它必须获取土地。德国可以向东扩展生存空间，增强自己的地位，然后再争取在世界上发挥较大的作用。

希特勒经过四个阶段来实施上面的第四种对策。首先，他通过一系列聪明的外交行动，来破坏凡尔赛体系的框架结构。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以及国际联盟所召开的裁军会议。希特勒把导致德国采取此种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法国人的态度。他声称，由于法国在裁军会议上不愿意裁减自己的军队，所以德国不可能继续留在国际联盟内和参加裁军会议。在1934年1月，德国同波兰签署了一项条约，破坏了法国同波兰以及东欧小国通过"小协约"所达成的协议。1935年3月，希特勒指责《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宣称德国军队的数量不再限定在10万之内。他宣布了把德国军队数量增加3倍以及建立德国空军的计划。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的斯特莱沙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希特勒的行动。但是还没等这些国家组织

起来，希特勒就向英国建议，德英通过谈判缔结一项海军军备协定。英国迅速抓住这个机会，从而使得斯特莱沙会议不能提出各国协调行动的对策。1936 年 3 月，正当埃塞俄比亚事件转移了人们对中欧的注意力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军队开进了莱茵地区，这个地区根据《洛迦诺公约》应该是非军事化的。希特勒宣称是法国迫使他这么做的。他说，法国与苏联达成一个协议，这已经破坏了《洛迦诺公约》。他还暗示，假如其他欧洲国家接受他的关于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想法，德国可能回到国际联盟之中。这是一个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负罪感和犹豫不定心理的举动。

希特勒在第二个阶段（1936—1940）向邻近的小国进行扩张。希特勒在 1936 年制定了一个为期 4 年的扩充军备计划，以便在 1940 年以前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与意大利签署了轴心国条约，同日本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共产国际在 1919 年由列宁建立，旨在发起世界范围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它在 1935 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改变了自己的方针，支持所谓的“人民阵线”政府，以及由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希特勒还支持法西斯分子反对民选的西班牙人民阵线左翼政府的战争。希特勒声称，他派遣军队和轰炸机支援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的法西斯将军弗朗西斯·弗朗哥，是为了保护西方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1937 年，西班牙成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实验场，希特勒的飞行员轰炸了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且毁灭了格尔尼卡的巴斯克市（the Basque city of Guernica）。尽管国际社会广泛声援西班牙，但法国、英国和美国很少或没有采取措施保护西班牙共和国的拥护者。1938 年，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Schuschnigg）呼吁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奥地利是否并入德国，他希望奥地利人民在希特勒

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前，能够投票反对与德国合并。但是希特勒进行干预，德国军队开进了维也纳，奥地利的独立地位从此终止。

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以生活在捷克苏台德地区300万日尔曼人的民族自决问题，向捷克施加压力。靠近捷德边界的苏台德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那里的波希米亚丛山是捷克的天然防线，也是捷克开始抵抗可能发生的德国入侵行动的前沿地带。希特勒声称，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解决方案，战胜国把那些讲日尔曼语的人划在捷克的领土之内，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这是西方国家出卖德国的又一个例证。他要求让讲德语的地区脱离捷克，加入日尔曼人的祖国——德国。捷克人感到恐惧，开始动员其一部分后备军。这激怒了希特勒，他发誓要粉碎捷克。

这些事件也让英国感到不安，英国不希望欧洲爆发战争。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3次出访德国，试图阻止战争。张伯伦确信，英国无法保护捷克，因为英国离捷克很远，而且自己在欧洲大陆也没有驻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英国不值得为捷克而战，况且他也知道，英国尚未做好参战的准备。德国对格尔尼卡的轰炸表明，制空权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日益增长，张伯伦认识到英国的防空和雷达系统尚未做好空战的准备。出于这些考虑，张伯伦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同希特勒举行会晤，同意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条件是德国不侵犯捷克的其他地区。希特勒作了这个承诺，张伯伦于是回到英国并且声称自己拯救了捷克，争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仅仅经过了6个月，德国的军队就于1939年3月开进捷克的其他地区并且占领了捷克首都布拉格。英国对此深感震

惊，并且认识到希特勒还可能进一步采取行动，他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波兰。波兰在18世纪被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建国，拥有一条通往波罗的海沿岸但泽港的走廊，在该地区的居民中包括讲日尔曼语的人。希特勒再一次使用了同样的伎俩。他宣称，波兰领土包含日尔曼人的居住地，违背了自决原则，这是《凡尔赛条约》出卖德国的另外一个例证。但在这一次，英国和法国决心抵制德国的侵略行为，它们表示要捍卫波兰。

希特勒接着采取了另一个外交举措。虽然希特勒曾经表示要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西方的威胁，但是他突然在1939年8月同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使得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在西面采取行动。这项条约也包括一个关于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意各自获得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占领了自己所应得的那部分领土。希特勒这一次还想再得到一个慕尼黑协定，以不再采取侵略行动的许诺换取英国同意德国吞并波兰的一部分领土。

> 现在，波兰已经处于我赋予她的地位……我只是担心在最后关头会有某个讨厌的家伙向我提出一个斡旋方案。
>
> ——阿道夫·希特勒，1939年8月27日[5]

第三个阶段十分短暂。希特勒在1940年的时候，在军事上取得了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欧洲局势一度显得比较平静，这个时期被称为“虚假的战争”。希特勒估计英国会求和。然而，到了1940年春天，希特勒十分担心英国出兵挪威。于是，他抢在英国的前面，先向挪威出兵。然后，他又对荷兰、比利时与法国发动闪电式进攻。德国的坦克穿越了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让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十分

吃惊。他绕过了法国沿法德边界修建的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他把英军赶到了敦刻尔克,迫使英军丢下装备,让剩余的军队横渡海峡。因此,希特勒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在 1940 年的时候已经成为苏联以西的欧洲大陆的主人。

德国在第四个阶段,即"战线过长的阶段",发动了全面的战争。希特勒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向东进攻苏联,但他想先吃掉英国,避免两线作战。要是德国具有空中的优势,德军一定会渡过海峡,入侵英国。可是希特勒的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遭受重创。由于德国不具备空中优势,人们会作这样一种猜测:希特勒会推迟执行进攻苏联的计划吗?

尽管德国无力击败英国,希特勒还是决定进攻苏联,希望迅速击垮苏联,然后再来对付英国。而且,他认为德国这样做还可以阻止英国与苏联结成同盟。1941 年 6 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从而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 1941 年 12 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希特勒又犯了一个大错:他向美国宣战。或许希特勒是想让日本深陷战争之中,因为他一直希望日本站在自己的一边,而且他也对美国的船只发动潜艇战。这样一来,希特勒也就挑起了一场葬送第三帝国的全球大战。

个人的作用

希特勒的个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在第一个阶段或许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西方民主国家是那样地充满负罪感、显得软弱无力和处于内部分裂的境地,任何一个聪明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可能修改凡尔赛体系。但是,德国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使得自己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势力,则与希特勒的计谋、胆量和好战的意识形态分不开。他经常否决其思想保守的将军与幕僚们的建议。希特勒想要战争,也愿意冒险。德

国在第四个阶段的行为导致全球大战的到来和德国的失败，这也同希特勒个性的两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希特勒的胃口越来越大。他相信自己具有非凡才能，这种自负导致他犯了两个大错误：在吃掉英国之前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向美国宣战，让美国总统罗斯福获得了美国介入欧洲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借口。

希特勒另外一个方面的弱点就是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宣称雅利安人种是最优秀的。这大大削弱了德国的力量。比如，德国第一次进攻苏联的时候，许多乌克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起来反对斯大林的野蛮统治。但是，希特勒把他们视为低等的斯拉夫人，认为德国不值得与他们进行合作以对付斯大林。他也认为美国很弱，因为其人口中包含黑人和犹太人。他常常取笑罗斯福有一个犹太人的祖先，不知道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也可以是权力的源泉。不仅如此，反犹太主义的观念促使他赶走一些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至关重要的科学家。简而言之，个人的因素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的类型和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的偏执狂个性。

体系和国内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只是希特勒的战争，A. J. P. 泰勒的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还有体系的原因，包括结构和过程的原因。从结构层次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对抗该条约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和苏联长期处于欧洲的均势体系之外（它们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改变这种地位），德国的行为没有受到制约。此外，国际体系的过程也缺少和缓性。德国是一个

要改变现状、致力于摧毁凡尔赛体系的国家。而且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力量的增长，强化了国家间的敌视并阻碍了国家间的沟通。

> 希特勒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元首和一个近乎于救世主的统治者，是因为经受过民族屈辱和政治孱弱之苦的德国渴望国家复兴与团结，这使得德国成不了一个“正常”或平常的国家，也没有出现较为保守的威权主义。其政权试图通过主宰欧洲和种族净化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意味着德国要不断保持活力与生机，并且强化种族主义。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妄自尊大，它所带来的灾难就越加深重。德国为了追求世界霸权，要缔结一个同盟，对抗一些强大的国家。这是一场以弱敌强的赌局，必然导致希特勒政权和德国本身的毁灭。这正是纳粹党人极其不理智的表现。因此，希特勒成为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正表明，德国不仅具有从未有过的毁灭力量，而且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德国独裁者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不仅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且也是第三帝国合乎逻辑的生命终结。
>
> ——伊恩·科肖(Ian Kershaw)[6]

国内层次上的三个变化也特别重要。首先，西方民主国家由于阶级分化和意识形态分野而四分五裂，几乎无法通过协商一致来制定对外政策。例如，在1936年法国社会党人莱昂·布卢姆(Leon Blum)执掌政权之后，法国的保守派提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卢姆”的口号。1939年，英国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试探与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的可能性，但是该代表团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在英国人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给英国人以当头一棒。英国人迟迟未同苏联达成共识的原因，就在于英国上层人士不愿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

第二个导致战争的国内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崩溃。大萧条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波及所有国家,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协调制度,以解决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这场大萧条对国内政治和阶级冲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人员的失业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就如同往火上浇油,它导致纳粹在德国掌权,并且削弱了民主国家政府的力量。

第三个国内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它拒绝承担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责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使得美国人更为关心国内问题,其孤立主义倾向大大增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不怎么关心欧洲的事务。他在 1936 年竞选连任后才开始认识到,如果希特勒变得过于强大,德国有可能主宰欧洲,并最终威胁美国。1937 年,罗斯福开始谈论欧洲发生的事件,但是美国公众并不想介入。1940 年,罗斯福向英国提供驱逐舰,换取英国同意美国使用其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1941 年,罗斯福说服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英国提供战争物资,防止英国被希特勒击垮。然而,由于受国内舆论的限制,罗斯福反对希特勒的行为不能走得太远。只是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才得以终结。

上述国内、个人和体系的原因是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是体系因素,即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中层原因主要是国内因素,即社会和意识形态分裂,它们使得德国出现了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并导致了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弱点。突发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争夺霸权的战略(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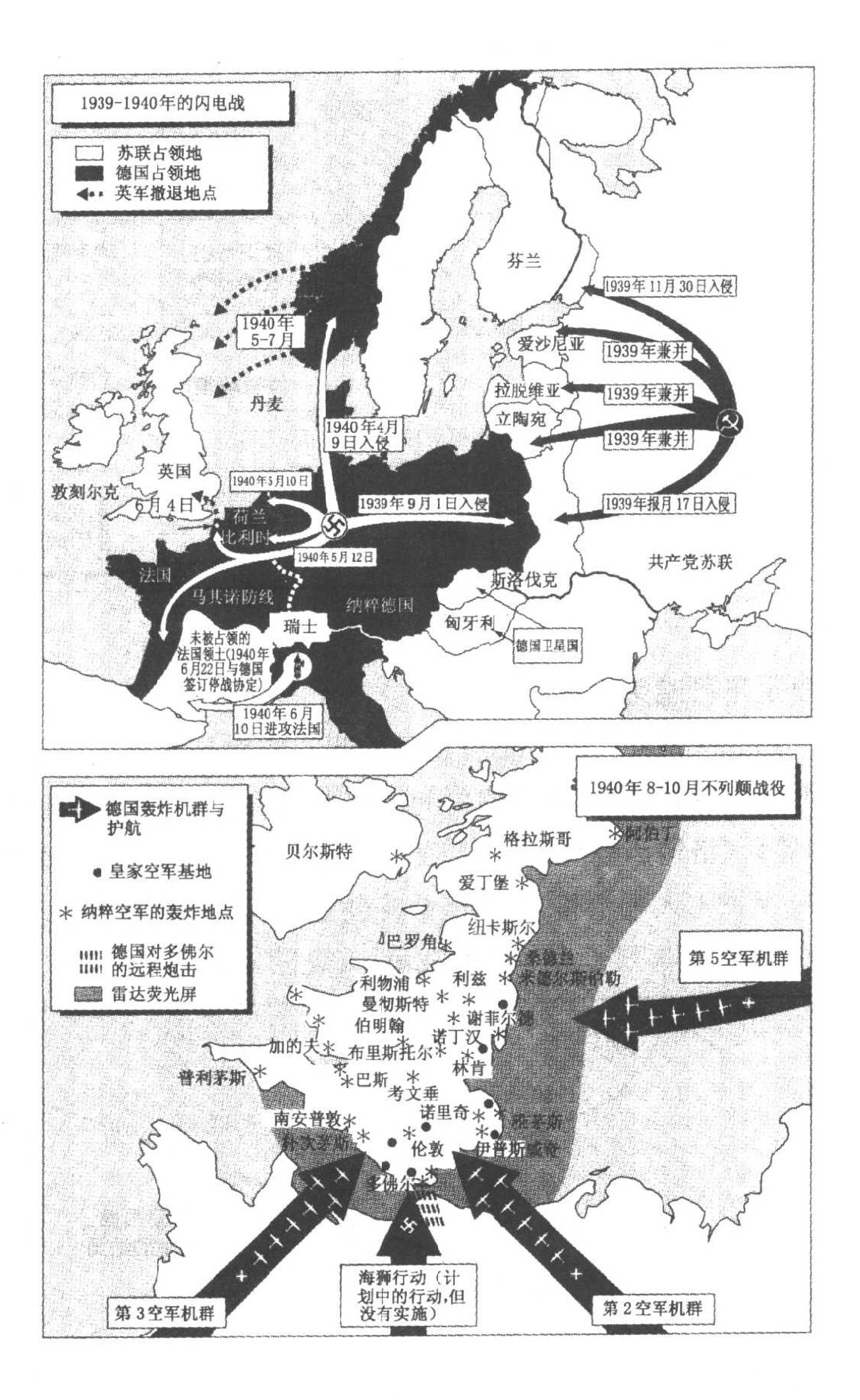

1939-1940年的闪电战
苏联占领地
德国占领地
英军撤退地点
芬兰
1939年11月30日入侵
爱沙尼亚
1939年兼并
拉脱维亚
1939年兼并
立陶宛
1939年兼并
1940年
5-7月
丹麦
1940年4月
9日入侵
英国
敦刻尔克
6月4日
1940年5月10日
荷兰
比利时
1939年9月1日入侵
1939年9月17日入侵
1940年5月12日
共产党苏联
法国
马其诺防线
斯洛伐克
纳粹德国
瑞士
匈牙利
德国卫星国
未被占领的
法国领土(1940年
6月22日与德国
签订停战协定)
1940年6月
10日进攻法国
1940年8-10月不列颠战役
德国轰炸机群与
护航
皇家空军基地
纳粹空军的轰炸地点
德国对多佛尔
的远程炮击
雷达荧光屏
贝尔斯特
格拉斯哥
爱丁堡
纽卡斯尔
巴罗角
利物浦
利兹
曼彻斯特
伯明翰
谢菲尔德
诺丁汉
加的夫
布里斯托尔
林肯
普利茅斯
巴斯
考文垂
诺里奇
南安普敦
伦敦
伊普斯威奇
多佛尔
第5空军机群
海狮行动（计
划中的行动，但
没有实施）
第3空军机群
第2空军机群

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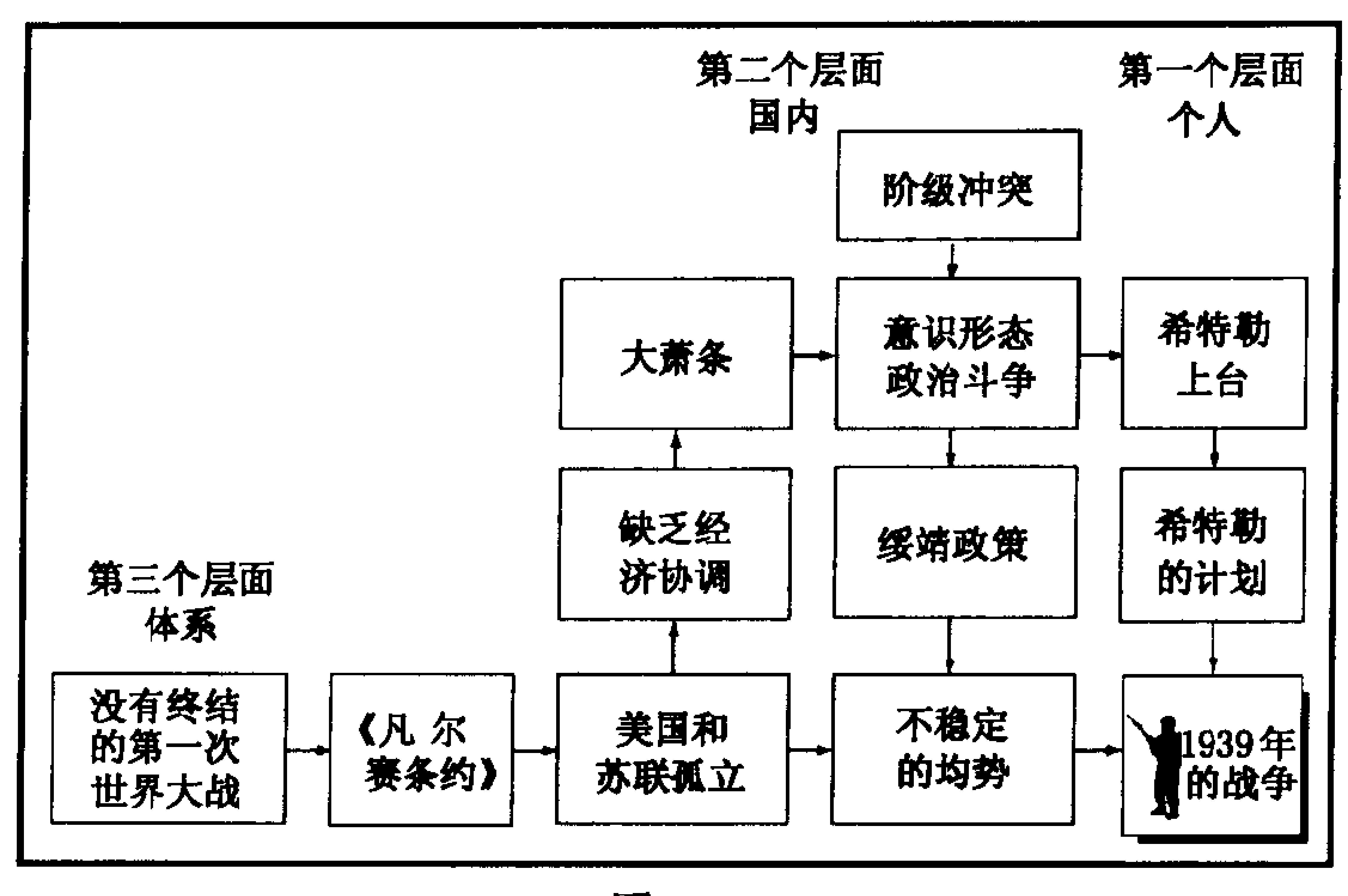


图 4.3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1926年的时候(即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但是随着1929年发生大萧条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选择的漏斗变小,最后在1941年爆发了全球性的战争。(见图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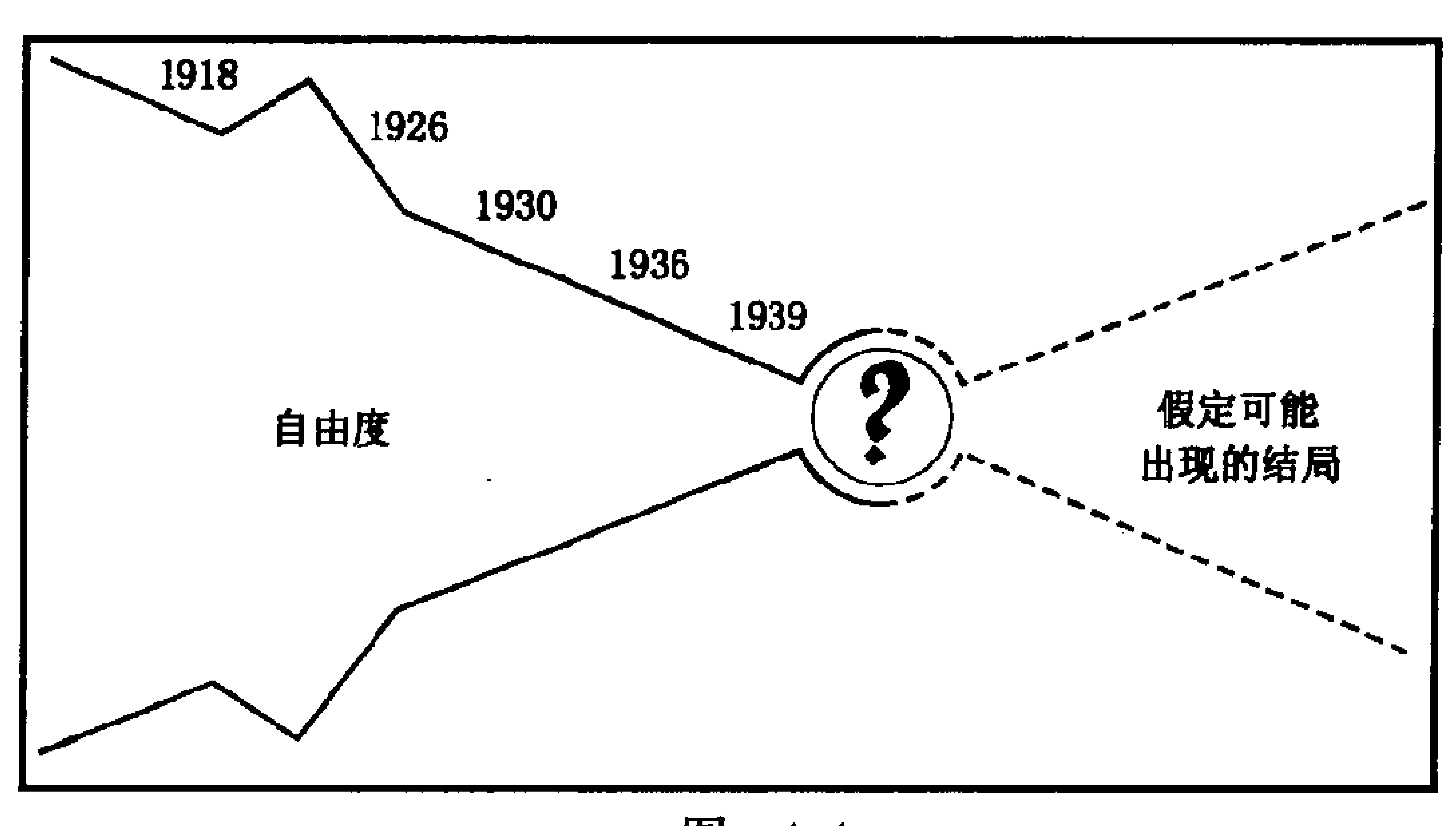


图 4.4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能解决德国问题，所以发生第二次战争的可能性在1918年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安抚德国的政策，而不是那样严厉地惩罚德国，那么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府或许可以生存下来。或者假如美国批准了《凡尔赛条约》，并介入欧洲事务（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做法一样），希特勒可能就不会上台。欧洲可能会发生某种战争，但不一定会爆发全球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使了那些美化侵略行为的意识形态之兴起，使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变大。

1941年12月7日轰炸珍珠港

假定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同德国对抗，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或者假定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样一来，希特勒就可能被遏制住或者其侵略行为被推迟。希特勒或许不能那样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获得成功，也可能会被其手下的将领所

推翻,他的将领有好几次想发动这样的政变。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希特勒的个性和战略是关键的突发原因。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当希特勒开始策划战争的时候,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如果法国和英国在 1939 年 9 月发动攻势,他们很可能击败德国。

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有自己特殊的原因。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它对欧洲事务的介入程度并不是很深。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日本远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但是已经有了议会制度。20 世纪 30 年代,军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他们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总是担心不能获得自己所必需进口的原料。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导致日本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减少,日本人担心,如果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那么日本的前途就是十分黯淡的。日本人想建立一个地区霸权秩序,即他们自己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征服邻国的一种十分委婉的说法)。日本坚信,建立这样一个共荣圈将使得它可以抵制英国和美国的威胁,这两个国家是太平洋上的主要海上力量。

日本首先向中国扩张。日本对中国发动的野蛮战争,导致日美之间产生了外交冲突,因为美国支持中国。1940 年法国被希特勒攻陷之后,日本人抓住机会,侵占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和柬埔寨。日本扩张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向西攻击苏联。由于日本和苏联军队已经在靠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发生过冲突,所以有的人认为日本和苏联很可能在靠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发生战争。第二种选择是向南进攻。虽然日本已经占领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但


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
加拿大
日本
美国
日本航母编队
珍珠港
太平洋
苏联
"日本士兵"
"那些穿着棉制衣裤、头戴尖形帽的日本士兵，军饷很少，受上司的虐待，要在极其恶劣的天气中进行艰苦的行军和战术训练，习惯于5天只靠自己所带的大米生存。他们没有'慰劳品'，只有为天皇献身的荣誉……他们要靠夺取敌人的给养为自己提供补给。"（引自卢卡斯·菲利浦斯：《通往胜利的跳板》，1966年汉拿曼）
蒙古
北平
阿留申
日本
东京
中国
往珍珠港
南京
重庆
太平洋
台湾
威克岛（美国）
滇缅路
缅甸
香港
在1941年圣诞节时被占领
关岛
（美国）
菲律宾
（美国）
对锡兰的空袭
西贡
1941年12月日本的占领领土
日军的推进
在1940年法国陷落之后，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
1942年7月时日本所侵占的领土
马来亚
0 400 800 1200
公里
"威尔士亲王"号被击沉
新加坡
婆罗洲
苏门答腊
西里伯斯岛
新几内亚
荷属东印度群岛
爪哇
对达尔文的空袭
达尔文
1941年12月-1942年7月日本帝国军队的推进
澳大利亚

图 4.5

是荷属东印度(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石油是日本最急需的。第三种选择是向东进攻美国,它是最为冒险的一种选择。

日本人最后采取了第二和第三种对策。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向东攻击美国,向南进军印尼和菲律宾。南进是出于获取原料,而攻击美国的动机则难以解释。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日本人很清楚,他们最终无法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他们希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会使美国士气低落,同美国的全面战争可能不会发生。这是日本人犯的一个极大的判断错误,但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看,与其坐等失败,还不如冒冒风险。

到 1941 年秋天的时候,日本扩张主义者已经不再把苏联当作要攻击的目标了。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消除了苏联对日本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政策,努力阻止日本的南进行动。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指出的,"美国要在日本的脖子上系上绳套,时不时勒它一下。"据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那时也声称,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战争,因为"理智的日本人都清楚,攻击美国只会给日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7]但是日本人却认为,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最终无论如何也会遭受败绩。日本 90% 的石油依赖进口,假如石油供应被切断,日本海军将坚持不到一年。因此,他们认为,与其慢慢地被绞杀,不如发动进攻。

此外,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日本人认为,日军撤出中国将使得日本失去其经济腹地。正如一名日本军官对裕仁天皇所说的,情况就好像一位患重病的人:"动手术可能十分危险,但是有挽救其生命的一线希望。"[8]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发动战争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理智,因为这可以算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假如德国击败英国,而且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人失去信心,那么

通过协商缔结和平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津久田的一席话正反映了日本领导人的这种心态：

> 总的来看，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前途并不光明。我们都在考虑是否还有某种和平的方式。没有人愿意说，"别担心，即使战争被一直拖下去，我也会承担全部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维持现状。因此，大家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发动战争。[9]

当然，日本可以选择放弃侵略中国与东南亚的政策，但是这对于那些具有扩张主义和好战思想意识的军事领导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日本人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轰炸了珍珠港(见图 4.5)。

那么，如何从三个分析层次来考察太平洋战争呢？太平洋战争中个人的作用同希特勒在欧洲的作用相比绝对要小得多，但是决策者个人无疑影响了事态的发展。主张扩张的日本将军企图增强日本的地区影响力，积极策划西侵中国，南占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东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诸如东条英机那样的领导人，在决定政府政策的时候起了主导作用。然而，东条英机的政策主张与其他许多军事和政治高层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

个人因素在决定美国政策的时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对日本实行惩罚性的制裁，以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行为，但是在国会以及整个美国，有很多人不喜欢罗斯福那种积极的和对抗性的对外政策。1940 年和 1941 年，在美国还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不少人仍然反对美国介入国际政治。假如某个像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的人担任总统,那么美国很可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绥靖而不是对抗的政策,其结果是,日本可能不会想到要进攻美国。当然,日本的侵略行动也不会受到约束,而且日本可能成为西太平洋的地区霸主。

> 即便我们向美国作出让步,放弃我们国家政策的某些目标,从而换取暂时的和平,美国随着其军事地位的增强,肯定也会要求我们作出更多的让步,最终使得我们的帝国匍匐在美国的脚下。
>
> ——《1941年日本政策会议记录》

我们从国内原因层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中日益增强的军国主义倾向,使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在20世纪30年代,与欧洲的情形一样,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崩溃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日本变得更具扩张性,而1940年以前的美国则变得更愿意推行孤立主义政策。此外,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国内战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使得它在面对日本扩张行为的时候,更加脆弱不堪。这反过来也增强了日本国内政治中军国主义者的影响力。

从体系层次上看,《凡尔赛条约》没能满足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使得日本更难完全靠贸易获得原料。本来就已经很弱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制度在1931年到1933年间完全失败,这也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受任何国际制度的制约。与欧洲的战争有所不同的是,太平洋战争的深层和中层原因主要是国内层次的,即日本的扩张倾向、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增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内战争。突发原因是罗斯福在1941年7月决定对日本实施全面的禁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军队在当年12月7日进攻美国。

绥靖与两种类型的战争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有的人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最大的教训就是，绥靖是邪恶的政策。然而，绥靖本身并不坏，它是传统的外交手段。它是一种允许均势发生变化的政策选择，有利于竞争对手。一个国家可能认为，与其遏制对手的侵略行为，还不如让对手得到一点好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人对雅典人说，雅典应该允许科林斯吞并科西拉。但是雅典拒绝对科林斯采取绥靖政策，而是选择同它打仗。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雅典在科西拉问题上对科林斯采取绥靖政策或许要比挑战科林斯好。绥靖政策在 1815 年的时候被运用得十分成功，当时的战胜国对战败但依然强大的法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英国在 19 世纪 90 年代，对正在崛起的美国也采取了绥靖政策。甚至绥靖政策也可能是西方盟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德国政策的正确选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情是，西方国家在 20 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对抗政策，在 30 年代应该对德国采取对抗政策，但是实际上却采取了绥靖政策。

绥靖是对付希特勒的一种错误政策，然而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并非像慕尼黑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胆小鬼。他想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他在 1938 年 7 月这样说道：

> 当我想起那 4 年可怕的战争，想到 700 万年轻人没能享受青春年华、1300 万人死亡和伤残以及那些身为父母和儿女的人所经受的折磨的时候，我坚信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感觉到，我的首要职责就是尽力避免在欧洲再次爆发大战。[10]

张伯伦的错误不在于其动机，而在于他的无知和自负，他未

能正确地估计形势。犯这样错误的人不只他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即偶然发生的战争和蓄意预谋的侵略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战争可以通过绥靖政策得以避免。正如政治学家戴维·卡里欧(David Calleo)所说的,"我们从中吸取的有益教训并不只是要对侵略者保持警惕,而是认识到拒绝对崛起的国家采取合理的绥靖政策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1]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结果,而是由于希特勒策划的侵略行为没有被威慑住。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政策是截然相反的。安抚德国可能有助于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遏制德国则可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实际的政策正好相反。英国领导人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政策,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威慑政策促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威慑政策遭到失败,这是由于日本感觉到,和平比战败还可怕。

但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两种类型的战争有点过于简单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单纯是偶然发生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蓄意预谋的战争。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小心对待过于简单化的历史模式。永远要对一个模式提出质疑,看看它是否同历史事实相吻合,是否与现实相一致。我们有必要记住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讲述的一个有关猫的故事。马克·吐温指出,被热炉子烫过的猫不会再爬到热炉子上,也不会爬到凉炉子上。在运用历史类比的分析方法或者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学模式的时候,需要知道哪个

炉子是凉的，哪个炉子是热的。

注 释

1. Woodrow Wilson in Ray S.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vol. I (New York: Harper, 1927), pp. 182—183.

2. Quoted in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104.

3. Quoted in F.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653.

4. Taylor, A.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nd ed. (Greenwich: Fawcett, 1961), p.281.

5. Adolf Hitler on August 27, 1939, in Gordon Craig, *Germany, 1866—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12.

6. Ian Kershaw, "Hitler and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Mary Fulbrook, ed.,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London: Arnold, 1997), p. 336.

7. Quoted in Scott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in Robert I. Rotbeg and Theodore K. T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35—336.

8. Scott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p. 325.

9. Quoted in Scott Sagan, "Deterrence and Decision: An Historical Critique of Modern Deterrence Theory",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p. 280.

10. Neville Chamberlain, *In Search of Peace: Speeches 1937—1938* (London: Hutchinson, n.d.), p. 59.

11. David P.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

精选阅读材料

1. Ross, Graham,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1919—1945* (London: Longman, 1983), pp. 109—126.

2. Bell, P. M. H.,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86), pp. 14—38.

3. Sagan, Scott,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4 (Spring 1988), pp. 893—922.

4. Taylor, A.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amilton, 1961), pp. xi - xviii, 102—109, 272—278.

5. Bullock, Alan, "Hilt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W. R. Louis,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J. P. Taylor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Wiley, 1972), pp. 117—145.

其他阅读材料

1. Barkin, J. Samuel, and Bruce Croin,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Changing Norms and the Rule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4), pp. 107—130.

2. Barnhart, Michael A.,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c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Bell, P. M. H.,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86).

4.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5. 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1).

6. Claude, Inis 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7. Cohen, Warren, *Empire Without Tears*: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1921—1933* (New York: Knopf, 1987).

8. Heinrichs, Waldo, Jr.,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Hilderbrand, Klaus,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trans. Antony Fothergil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0. Hughes, Jeffrey,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British Deterrence Failure and German Expansionism",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81—322.

11. Iriye, Akira,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12. Jervis, Robert,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 Kier, Elizabeth,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Middlemas, Keith, *The Strategy of Appeasemen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German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2).

15. Ross, Graham,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1914—1945 (London: Longman, 1983).

16. Storry, Richard, *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Baltimore: Penguin, 1960).

17. Utley, Jonathan,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18. Walters, F. P.,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19. Wolfers, Arnold,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思考题

1. 当时的决策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什么"教训"? 这如何影响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行为?

2. 集体安全概念与均势概念有什么区别? 集体安全原则是乌托邦式的观念吗? 如果不是,那么集体安全原则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被避免?

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有关领导人的个性有多大的关系?

5.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某些经验教训有助于今天的决策者们避免战争吗?

6. 日本攻击美国的行为是理智的吗?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事年表

1919	凡尔赛和会的召开;通过《魏玛宪法》
1920	国际联盟的创建
1921—1922	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
1922	海牙常设法庭成立;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拉巴洛条约》
1923	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以惩罚德国停止运煤的行为;纳粹啤酒馆暴动失败
1924	道威斯赔偿计划被接受;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议定书获得通过
1925	洛迦诺会议与公约
1926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928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被签署
1930	伦敦海军会议
1931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金本位制
1932	裁军会议;关于德国赔款的洛桑会议
1933	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国会纵火事件;德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案》,建立希特勒独裁政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1934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935	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法苏缔结同盟条约;英德达成海军协议;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霍尔—拉瓦尔协定》
1936	德国违背《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莱茵地区;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获胜;作为政治工具的国际联盟丧失信誉;罗马－柏林轴心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

1936—1939	西班牙内战
1937	日本进攻南京以及其他中国城市
1938	德国侵略和吞并奥地利;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哥德斯堡和慕尼黑会晤希特勒以解决德捷危机;《慕尼黑协定》签署
1939	捷克危机;德国占领捷克全境;英法向波兰作出许诺并答应向希腊与罗马尼亚提供安全保障;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苏德(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
1940	希特勒入侵法国;不列颠战役;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1941	希特勒侵略苏联;日本进攻珍珠港

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在雅尔塔

第五章　冷　　战

20世纪上半叶充满了暴力，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下半叶爆发了一场冷战，也就是一个没有战争的紧张对抗时期。这场对抗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许多人预言两个超级大国会发生军事冲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爆发过战争，只不过战争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不是直接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从1947年到1989年，前后持续了40多年。1947年至1963年是冷战的高潮时期，在这

个时期里，美苏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谈判。两国最高领导人甚至在1945年至1955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会晤。1952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认为，他被孤立于美国驻苏使馆内的处境同自己在二战时期被拘禁于柏林的经历相类似。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冷战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和苏联人频繁接触，他们一直在进行军备控制谈判。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随着苏联政策的变化，冷战很快就结束了。1989年，苏联在东欧的霸权地位开始消失。1991年，苏联本身也解体了。

威慑和遏制

冷战的特征在于，两个敌对国家不断进行紧张的斗争，但是双方一直没有诉诸武力。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将论及这些不同的观点。冷战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国际关系的视角，而且也揭示了国家可能进行两种对外政策选择的动力。这两种对外政策选择是威慑和遏制。

威慑是指通过恐吓，让对手打消某种念头，它并不是冷战所特有的。在历史上，国家常常通过增加军备、缔结同盟和发出威胁，来阻止其他国家发动进攻。在冷战期间，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超级大国更多地借助威胁来促使对手放弃某种行为，而不是在敌手发动进攻之后，通过防御来加以抵制。冷战中的威慑与核威慑问题密不可分，但后者也是均势逻辑的延伸。通过核威胁进行威慑，是一个超级大国努力防止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取得优势，从而避免破坏两国间均势的一种方式。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威慑经常加剧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我们难以证

明威慑是否起作用。有的因果关系是不真实的。如果一位教授说她的讲课使大象跑出了教室,那么我们很难证明她的话是错误的,因为大象根本就没有进过教室。我们可以用反事实推理来验证此种说法:大象进教室的可能性有多大?

威慑的概念同遏制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遏制指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所采取的特定政策,它旨在遏制共产主义,实现自由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然而,遏制和威慑一样,并非冷战所特有的,但这个专用名词是冷战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遏制一直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在18世纪,欧洲保守的君主制国家试图遏制法国革命所主张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而且在比法国革命更早的时候,天主教教会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企图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和马丁·路德思想的传播。遏制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它既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防御性的。它可以是战争或同盟形式的军事遏制,也可以是贸易集团或制裁形式的经济遏制。在冷战期间,美国总是在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扩张性政策和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较为有限的政策之间摇摆。

有关冷战的三种观点

到底谁导致冷战,或者什么原因导致冷战呢?几乎从冷战一开始,这些问题就一直是学者和决策者们激烈争论的东西。有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

传统派(也叫正统学派)声称,有关谁导致冷战的问题很容易回答:是斯大林和苏联导致了冷战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是防御性的,而苏联外交则是进攻性和扩张性的。苏联的威胁使得美国人慢慢地警觉起来。

传统派引用了哪些证据呢?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

结束,美国就主张通过联合国,建立起普遍的世界秩序和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则不怎么重视联合国,因为它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并且维持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执行军队复员计划,而苏联则在东欧留驻大量军队。美国承认苏联的利益,比如在罗斯福同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晤的时候,美国努力满足苏联的要求。然而,斯大林却不遵守协定,特别是不允许波兰举行自由选举。

他们还指出,战争结束后,苏联迟迟不从伊朗北部撤军,这是苏联扩张主义的又一个表现。最后,苏联是在压力之下才被迫从伊朗撤军的。1948 年,共产党人在捷克夺取了政权。苏联在 1948 年和 1949 年封锁柏林,企图把西方国家赶出西柏林。在传统派看来,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逐渐认清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性质,从而导致冷战。

修正派主要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发表著述,他们认为,冷战是由美国的扩张主义而非苏联的扩张主义所导致的。他们的证据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并不是两极的,苏联要比美国弱小得多,美国在二战中增强了实力,而且拥有核武器;而苏联的实力在战争中受到削弱,而且没有核武器。战争使苏联丧失了 3000 万人口,战争结束时,其工业产值只及 1939 年工业产值的一半。斯大林在 1945 年 10 月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苏联将致力于国内重建。而且,修正派还指出,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外行为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他试图限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行为;在希腊内战中,他试图限制希腊共产党人的行为;而且他还允许匈牙利、捷克和芬兰的非共产党政府继续存在。

修正派分为"温和"和"强硬"两个分支派别。温和派强调个人的作用,认为 1945 年 4 月罗斯福去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

件，因为哈里·S.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美国的政策变得比较强硬。1945年5月，美国突然停止执行战时租借援助计划，一些已经开往苏联港口的船只中途返回。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故意在斯大林面前提到原子弹，以此吓唬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美国国内，民主党逐渐从左倾和中间立场向右倾立场转变。1948年，杜鲁门解除了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农业部长职务，后者主张美国同苏联维持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杜鲁门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则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温和修正派认为，这些人事变动表明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

强硬修正派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个人，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例如加布里尔·科柯(Gabriel Kolko)、乔伊斯·科柯(Joyce Kolko)和威廉·A.威廉姆斯(William A. Williams)就认为，美国的经济性质决定着美国要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以及确保资本主义而非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宁的环境。美国的经济霸权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经济区。美国领导人担心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如果没有对外贸易，一次新的大萧条就会来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经济扩张的一种方式，苏联人认识到马歇尔计划对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构成了威胁，因此明智地拒绝参加该计划。用威廉姆斯的话来说，美国人总是主张在国际经济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闯进别人的门户了。

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后修正派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为代表，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声称，不论传统派还是修正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不能把发生冷战的责任归结于某个人或某一方。战后的两极均势结构决定了冷战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39年的世界是个

多极世界，存在着 7 个主要大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结构加上欧洲国家的虚弱，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并将美国和苏联拖入其中。后修正派因此认为，美国和苏联注定要发生冲突，追究发动冷战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目标是不同的。苏联的目标是具体的，即占领领土。美国所追求的则是抽象目标或者环境目标，它关心的是世界政治大环境。环境目标同占有目标发生了冲突，因为美国倡导全球性的联合国制度，而苏联则努力巩固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然而，后修正派指出，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并没有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伪善的，由于美国的盟友在表决中占有多数票，因此联合国使得美国获得了好处，而美国却不怎么受联合国的约束。苏联人在东欧拥有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在西半球也拥有一个势力范围。

后修正派宣称，美国和苏联都注定要扩张，其原因不在于修正派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而在于很早就有的、国家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所面临的安全困境。不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允许对方主宰欧洲，就像雅典不允许科林斯控制科西拉的海军一样。后修正派为了证明这个论点，引用了斯大林在 1945 年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讲的一段话："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领土，都会在那里强加它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其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1]罗斯福在 1944 年秋天也说了一段类似的话："在这次全球性的战争中，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2]后修正派指出，这种两极结构使得冲突呈螺旋状发展：一个国家的强硬路线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也采取强硬路线。两个国家都把对方视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希

特勒那样的敌手。随着双方认识的僵化,冷战不断深化。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前苏联时期的秘密档案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它促使人们再次争论有关哪一方挑起冷战的问题。比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就越来越确信,苏联要对这场超级大国争斗的开启与性质负主要的责任。他的论据包括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所持的僵硬立场,以及克里姆林宫顽固坚持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帝国。加迪斯的看法已经向传统派的观点靠拢,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也就预示着,这场争论在可见的将来不会结束。

罗斯福的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因此他反对凡尔赛式的和平,而是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体系,避免出现那种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破坏世界经济以及促使战争爆发的保护主义。美国要加入一个新型的、较强有力的国际联盟,其表现形式就是设有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国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是一位铁杆威尔逊主义者,他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一道,强烈地支持联合国。

罗斯福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在国内需要得到美国两党对其国际主张的支持。而在国外,他要让斯大林相信,加入联合国将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有人批评罗斯福的战后计划过于天真。罗斯福的计划并不天真,但他的某些策略确实是天真的。他对联合国寄以太大的期望,过高估计了美国孤立主义势力,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过分低估了斯大林的敌意。罗斯福认为他

可以用对待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方式来对待斯大林，希望通过主动拥抱斯大林，来促进美苏双方的关系。

> 总统的行为似乎表明，美国人相信真正的合作不管是在战时还是战后都是可以实现的。罗斯福显然忘记了（假设他曾经认识到），在斯大林眼里，他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都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头，其长远的企图同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相抵触的。
>
>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
>
> 《斯大林的对外政策》[3]

罗斯福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是极权主义者，“他为了防备希特勒的进攻，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条约，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战利品，像希特勒一样驱赶、消灭或奴役其周边的民族；他在德国西进的时候袖手旁观，并且挖苦那些西方民主国家，而在希特勒东进的时候又指责西方国家没有向苏联提供足够的支持。”[4]

罗斯福对斯大林的认识是不准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并非在其政策的各方面都是天真的。他试图以经济援助换取苏联作出政治让步，并且拒绝同苏联人分享原子弹的秘密。对于战争结束后哪个国家应该在欧洲驻军和对该地区事务拥有发言权这个问题，他完全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罗斯福所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斯大林看世界的方式与自己一样，相信自己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觉得可以用美国领导人那种调和分歧与增进友谊的政治技巧，与斯大林打交道。

斯大林的政策

对斯大林来说，战后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国内的控制。第二

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不仅包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员的惨重损失和工业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包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不少苏联人出于对斯大林高压统治的强烈不满,在战时同德国人合作,德国的入侵严重削弱了斯大林的控制权。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助民族主义来号召民众,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已经下降,不足以动员苏联人民。战后,斯大林采取了孤立主义的政策,旨在抵制欧洲和美国的影响。斯大林把美国当作敌手,号召苏联人民勒紧腰带,不要信任外国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后来发生的冷战正是斯大林想要的。

如果国际合作有助于苏联实现其在东欧的目标和从美国获得一些经济援助,那么斯大林愿意采取某些合作的态度。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美国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向外输出资本,以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斯大林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新的危机将在 10 年到 15 年内爆发,苏联到那个时候已经复兴,将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冲突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既要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也要维护苏联通过 1939 年苏德条约所获得的在东欧的权益。斯大林也曾试探能否在其他地方扩展自己的影响,这样的举动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成功。1941 年,斯大林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喜欢算术,不喜欢代数。换句话说,他喜欢务实性的东西,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当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一个有关瓜分战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丘吉尔的这个方案,巴尔干有些国家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和苏联在某些巴尔干国家中

的影响力各占 50%。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捷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支持都是有所节制的,这同斯大林喜欢以算术而非代数的方式追求目标的行为方式是相吻合的。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用共产主义的认识框架看世界,但是他经常采取务实的策略。

冲突的阶段

早期的冷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 年是冷战逐渐开始的阶段;1947—1949 年是冷战宣战阶段;1950—1962 年是冷战高潮阶段。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都不愿意看到冷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就派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出访莫斯科,寻求同苏联达成共识。即使是在波茨坦会议以后,杜鲁门依然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稳健、温和的人。直到 1949 年,他还把斯大林比作自己在堪萨斯城的老朋友博斯·彭德格斯特(Boss Pendergast)。1946 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试图让美国决策者了解斯大林政权的真实性质与动机;温斯顿·丘吉尔则在密苏里的富尔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警告说一个"铁幕"已经降临欧洲。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还在努力与苏联进行谈判、希望同苏联达成一项战后条约的时候,杜鲁门指派其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准备一份有关苏联真实计划的报告。克利福德与一系列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凯南的看法是正确的:苏联人会抓住一切代价不高的机会进行扩张。然而,杜鲁门在 1946 年 12 月看到这份报告后告诉克利福德,他不想让很多人知道该报告

的结论，因为他还在努力遵循罗斯福的大政方针，尚未制定出一个新的战略。

有6个问题促使美国最后调整了战略，导致冷战的爆发。首先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催化因素，并且美国人认为，斯大林违背了战后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的诺言。然而，斯大林的承诺是不甚清楚的。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会面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波兰问题，但是他主要是出于1944年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的考虑，吁请斯大林允许波兰进行选举。罗斯福自己将参加总统选举，美国有许多美籍波兰裔选民，他需要向这部分选民承诺，波兰在战后将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从来就不担心苏联的选举，所以他对罗斯福的吁请并不是很在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也比较含糊，斯大林极力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其含义，当苏联红军从波兰赶走德国人之后，苏联便在华沙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会接受现实，因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波兰。

其次是美国在1945年5月，突然终止租借援助计划，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因此陷于一个紧张的境地。租借援助计划突然终止执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官僚机构所犯的一个错误，而1946年2月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贷款要求，则是两国总体关系没能改善的结果。苏联人把这些行为解释为美国出于敌视苏联的目的而采取的经济手段。

第三是德国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同意，德国要支付200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苏联。但是雅尔塔会议并没有确定如何以及何时支付赔款，只是决定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获得10亿美元的赔款，而且它要求这些赔款应从美、英、法占

领的德国西区获得。哈里·杜鲁门关心德国的重建问题,他提出,如果苏联要从德国获取10亿美元赔款的话,那么它应该从自己占领的德国东区获得。杜鲁门声称,在德国西区实现重建之后,如果那里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告诉苏联人。这样,在有关德国如何重建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人存在着分歧。美国同英国、法国一道,在德国西占区发行新货币,开始了把德国西区融入西方的过程,这也导致了苏联加强对德国东区的控制。

第四是东亚问题。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个星期前,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还保持中立的态度。然后苏联就向日本宣战,攻占了中国东北,夺取了日本的北方四岛。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要求在日本获得一个占领区,就像美国拥有一个德国的占领区一样。杜鲁门的反应实际上是这样的:苏联人来迟了一步,所以不能获得一个占领区。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不能不让苏联人联想起东欧的情形,美国要求在东欧进行自由选举和在东欧事务上拥有发言权,而苏联军队是最先到达这个地区的。因此,苏联人把远东情势与东欧情势相类比,而美国人则把远东发生的事视为苏联努力扩张其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第五是原子弹问题。罗斯福已经决定美国不与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主要是为了使对日战争早点结束,而不是如一些修正派人士所说的旨在吓唬苏联。但是,他确实希望原子弹会产生一些政治效果。在波茨坦会议上,当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时候,斯大林脸上表情木然,显得若无其事。显然,斯大林事先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知晓了这个消息,但是他的镇定态度让美国人感到惊讶。1946年,美

国提出了由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斯大林对此表示断然拒绝，因为他想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在斯大林看来，处于国际控制下的原子弹仍然是美国的原子弹，因为只有美国人知道如何制造原子弹，苏联拥有原子弹更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安全。苏联研制的原子弹终于在 1949 年爆炸成功。

第六个问题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该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该地区发生了一些事件。首先是 1946 年 3 月苏联拒绝从伊朗北部撤军。美国在联合国的有关辩论中支持伊朗。苏联最后还是撤走了军队，但是这个事件让苏联人感到很不高兴。接着，苏联又对其南面的邻居土耳其施加压力，而且希腊共产党看上去快要获得希腊内战的胜利。这些事件让西方更加相信，苏联人正在扩张其势力。

尽管上述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某些误解的因素，但这 6 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和绥靖的方式得到解决吗？绥靖能起作用吗？或许不能。凯南声称，苏联人倾向于试探对方的每一个弱点。绥靖政策可能被视为一个弱点，从而招致苏联采取更多的试探行为。1946 年 6 月，苏联前任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告诫美国国务卿不要作出让步，因为紧张关系的根源是“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即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让步只会导致“西方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要求”[5]。绥靖政策或许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强硬的讨价还价态度可能制约了某些事态的发展、导致冷战的爆发。如果美国在采取坚定立场的同时，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行为采取一些安抚性的策略，并且作出愿意进行谈判的姿态，那么 1945—1947 年间的事态发展或许会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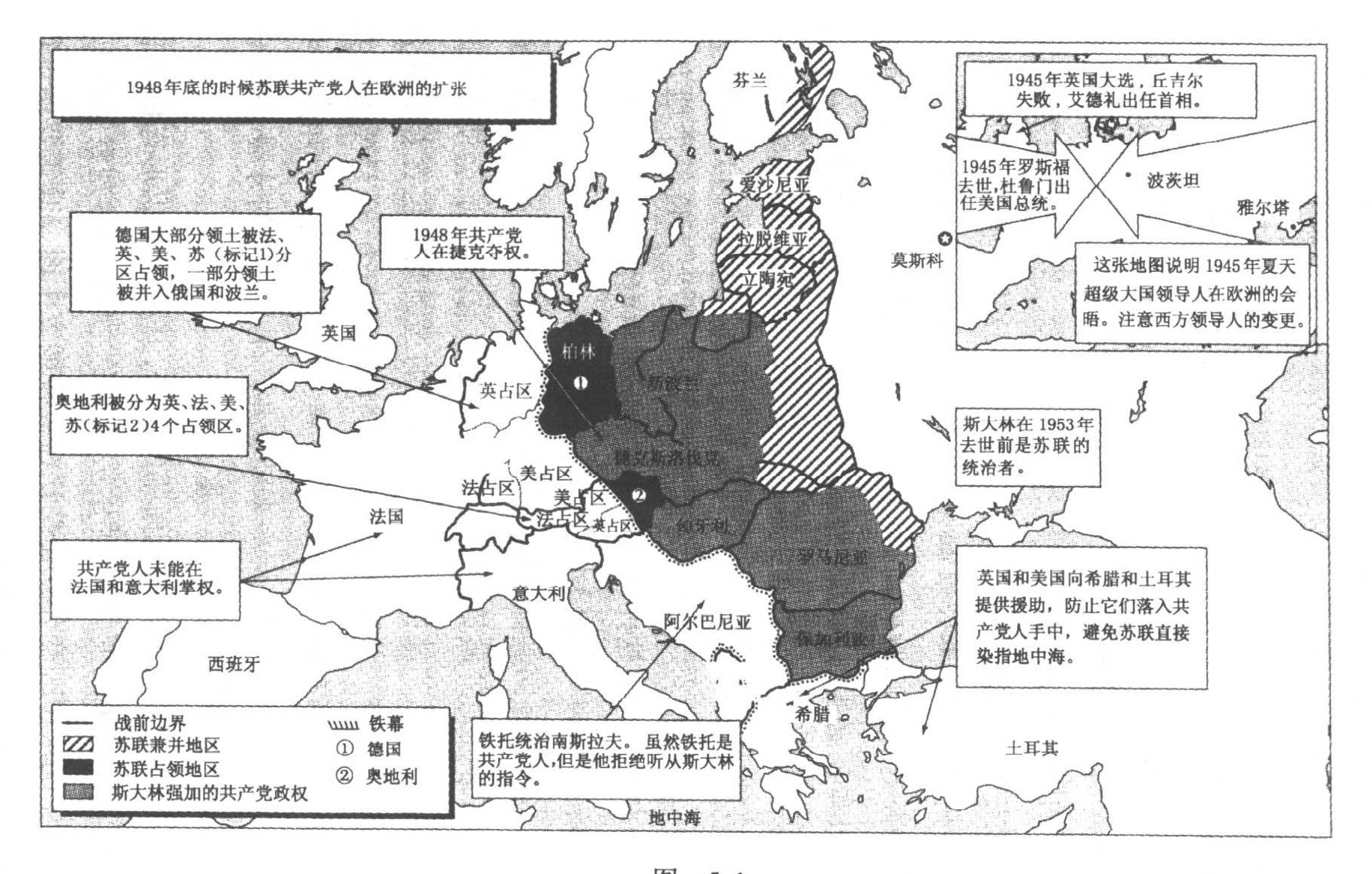

1948年底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人在欧洲的扩张
芬兰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莫斯科
1945年英国大选，丘吉尔失败，艾德礼出任首相。
1945年罗斯福去世，杜鲁门出任美国总统。
波茨坦
雅尔塔
这张地图说明1945年夏天超级大国领导人在欧洲的会晤。注意西方领导人的变更。
德国大部分领土被法、英、美、苏（标记1)分区占领，一部分领土被并入俄国和波兰。
1948年共产党人在捷克夺权。
英国
柏林
英占区
波兰
奥地利被分为英、法、美、苏(标记2)4个占领区。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前是苏联的统治者。
美占区
法占区
美占区
法占区
英占区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法国
共产党人未能在法国和意大利掌权。
意大利
阿尔巴尼亚
英国和美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防止它们落入共产党人手中，避免苏联直接染指地中海。
西班牙
希腊
土耳其
战前边界
苏联兼并地区
苏联占领地区
斯大林强加的共产党政权
铁幕
① 德国
② 奥地利
铁托统治南斯拉夫。虽然铁托是共产党人，但是他拒绝听从斯大林的指令。
地中海

图 5.1

第二个阶段，即 1947—1949 年的冷战宣战阶段，是在希腊与土耳其问题出现后开始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削弱，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再向东地中海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美国面临着或者让该地区继续存在一个真空地带，或者取代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政策选择问题。介入这个地区的事务意味着美国要改变传统的对外政策轨道。杜鲁门不敢确定美国国内舆论是否会支持这么一个举动，当时人们仍然担心，孤立主义可能继续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杜鲁门问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参议院是否支持美国政府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范登堡回答说，杜鲁门必须“让议员们感到害怕”，这样才可以使得国会支持政府改变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于是，杜鲁门在向国会解释政策变化的时候，没有提及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来维持东地中海地区均势的必要性。相反，他却大谈美国需要支持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这种从道义和意识形态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做法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当时已经回到国务院任职的乔治·凯南，反对这种用意识形态语言表述对外政策的做法，认为它是没有限度的，会使美国陷入困境。显然，“杜鲁门主义”所表述的遏制政策包含着极其含糊不清的内容。美国到底是要遏制苏联的权力，还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呢？刚开始的时候，遏制苏联的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显得是一回事，但后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含糊不清所造成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杜鲁门夸大了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且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解释美国政策的变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吗？一些观察家指出，在民主国家中改变公众舆论比在极权国家中改变政策要困难得多。他们声称，夸大威胁的做法加快了民主国家公众舆论的转

变过程。为了让一辆狂奔中的马车掉转头，勒紧缰绳是十分必要的 。不管夸大威胁的做法是否必要，它的确促使冷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提出了一个援助欧洲的计划。按照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建议，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参加该计划，但是斯大林向东欧国家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它们不敢参加这个计划。在斯大林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慷慨大方的表现，而是一个经济大槌，它被用来破坏东欧作为苏联安全缓冲区的地位。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想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后，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1948年2月，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捷克的政权。

杜鲁门从这些事件中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事态发展的回声。他开始担心斯大林可能成为另一个希特勒。美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德国西区货币改革的计划，斯大林则以封锁柏林来加以回击。美国对柏林封锁的反应是实施空运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双方针锋相对，冲突不断升级。

1949年发生的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得冷战进入了最为僵硬的阶段。一个事件是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比美国人预计的时间要早得多。另一个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除了台湾）。美国人的惊慌心理表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个绝密政策文件上，该文件预测，苏联在4年到5年内会发动一场进攻，这是它追求全球霸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NSC－68呼吁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杜鲁门由于受到财政问题的困扰，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批准NSC－68。

朝鲜战争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往小火苗上浇汽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实施集体安全原则

(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苏联抵制安理会),并且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 NSC-68 的目的在于改变美国大众对政府的认识,让他们相信总统不仅可以作出一个决定,而且可将该决定加以实施。即便是这样,假如俄国人没有那么愚蠢地鼓动对南朝鲜发动进攻和掀起"仇视美国"的运动,那么美国可能就难以在此后的几年里采取那些行动了。
>
>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参与创建》[6]

开始的时候,北朝鲜军队向南长驱直入,几乎到达半岛的最南端。但是,美国军队于 1950 年 9 月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如果美国军队就地止步,那么就能因为恢复朝鲜半岛现状而成为胜利者。然而,杜鲁门迫于国内的压力,命令美军跨越"三八"线,追击北朝鲜军队。在美国人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介入,把联合国军队赶回到半岛的中部。双方在战争中相持了 3 年,最后于 1953 年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美国开始卷入与中国的纠纷之中,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在美国国内,美国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挫折使得国内发生分裂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麦卡锡主义因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而得名,他严厉指责所谓的美国国内的颠覆阴谋,然而他的指责并没有什么根据。冷战的营垒日益分明,两大集团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

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冷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吗?假如我们把"不可避免"理解

为“可能性很大”,那么后修正派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两极结构使得双方很可能被拖入欧洲的权力真空之中,并且很难从中摆脱出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限制了联合国的作用,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使得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不和缓的。在这样的体系条件之下,国际间的冲突会因为上述6个问题或其他某些问题而产生,而且很难得以解决。

然而,后修正派过于依赖体系层次的解释。冷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冷战的激烈程度并非事先就确定的。不管怎么说,冷战具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两极体系结构一直到1989年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结构层次的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场冲突会出现不同的阶段,也说明不了为什么它的激烈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说明,诸如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这样的个人以及国内政治起了作用。我们只有考察国内政治,才能真正地理解冷战。修正派关注国内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错误地过分强调经济决定论。国内政治中的夸大其词和意识形态宣传所起的作用更大。鉴于战后苏联的国内问题,斯大林利用了意识形态,而杜鲁门则为了让美国人民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故意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把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形势相类比的思维方式,使得双方的立场更加僵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双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选择其他的政策,那么这场冲突的激烈程度或许会减轻。比如,如果美国在1945—1947年间听从凯南的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反应措施,在1947—1950年间争取同苏联进行务实的谈判和相互沟通,那么冷战很可能不会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激烈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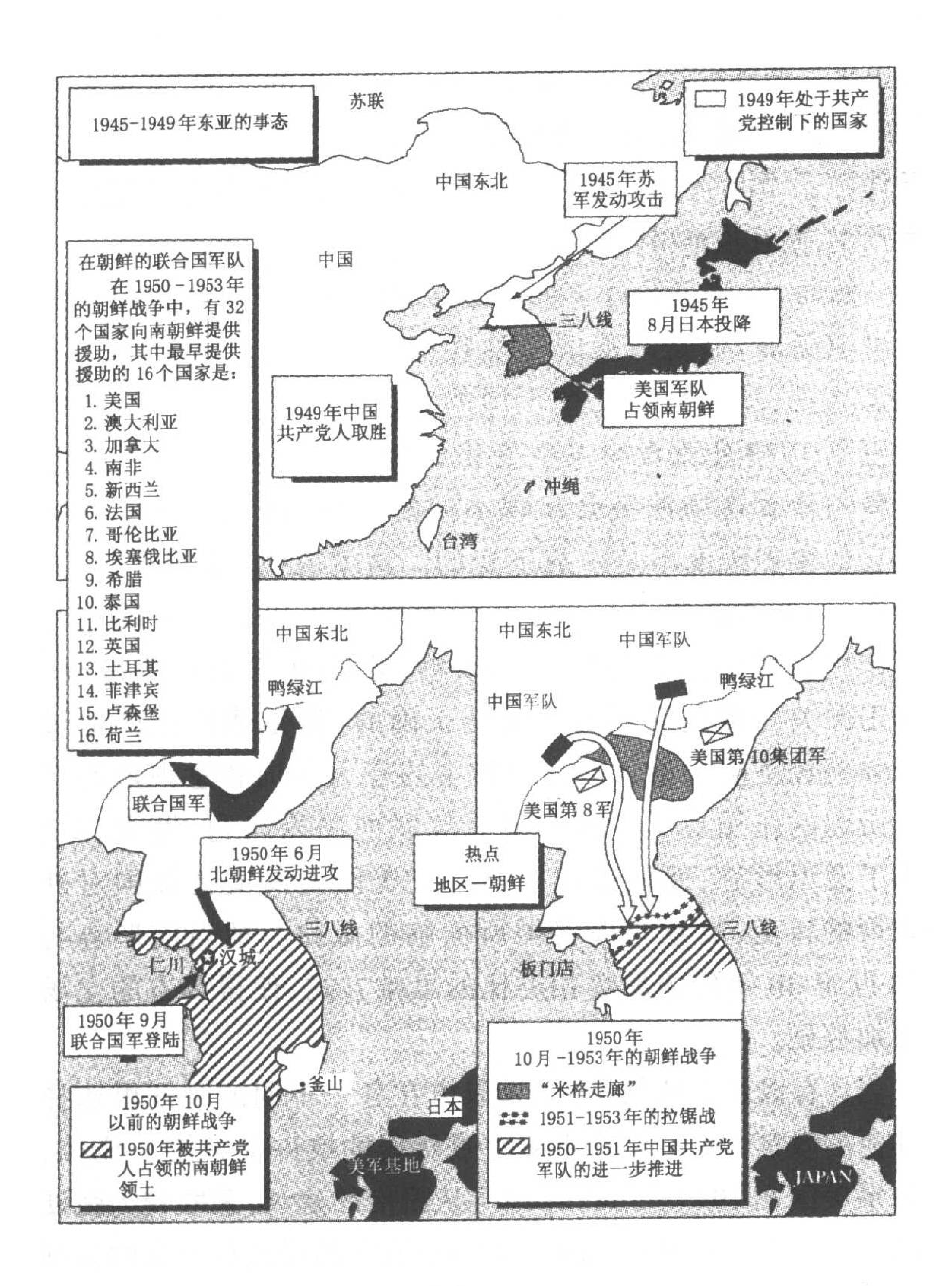

1945-1949年东亚的事态
苏联
1949年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国家
中国东北
1945年苏军发动攻击
中国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队
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有32个国家向南朝鲜提供援助，其中最早提供援助的16个国家是：
1. 美国
2. 澳大利亚
3. 加拿大
4. 南非
5. 新西兰
6. 法国
7. 哥伦比亚
8. 埃塞俄比亚
9. 希腊
10. 泰国
11. 比利时
12. 英国
13. 土耳其
14. 菲律宾
15. 卢森堡
16. 荷兰
三八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美国军队占领南朝鲜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胜
冲绳
台湾
中国东北
鸭绿江
联合国军
1950年6月北朝鲜发动进攻
三八线
仁川
汉城
1950年9月联合国军登陆
釜山
日本
美军基地
1950年10月以前的朝鲜战争
1950年被共产党人占领的南朝鲜领土
中国东北
中国军队
鸭绿江
中国军队
美国第10集团军
美国第8军
热点地区一朝鲜
三八线
板门店
1950年10月-1953年的朝鲜战争
“米格走廊”
1951-1953年的拉锯战
1950-1951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进一步推进
JAPAN

图 5.2

分析的层次

冷战的起源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或者分析层次加以解释，如图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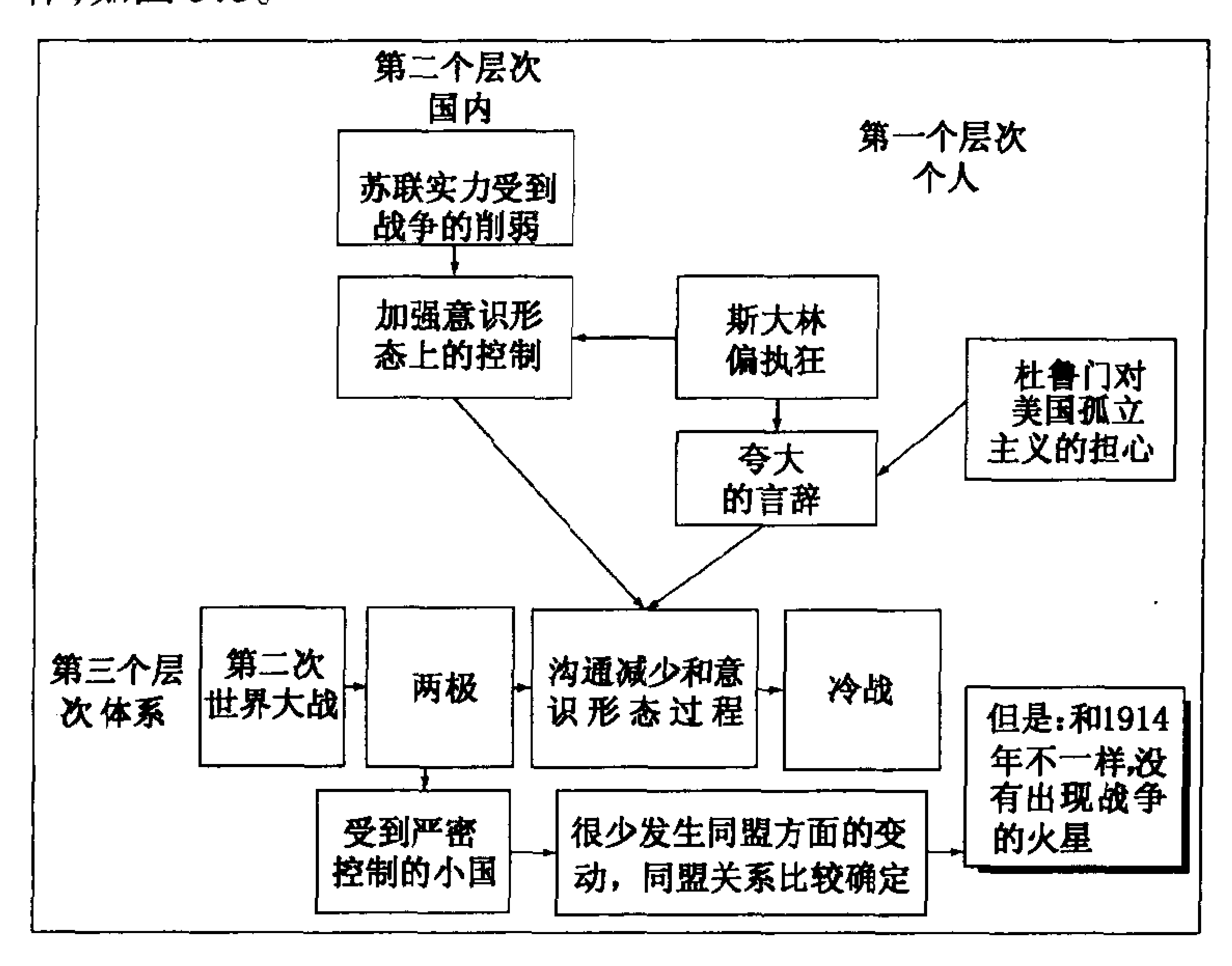


图 5.3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 19 世纪时就预言，俄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现实主义者可能因此预言，这两个国家将陷于某种形式的冲突之中。当然，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这场冲突增加了新的内涵。伍德罗·威尔逊最初获知俄国革命的消息后，对俄国人民的民主精神大加赞扬。但美国人很快就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党人处死沙皇、没收私人财产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等行为。美国派了一小支军队参加盟国干涉俄国的行

动，声称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让俄国继续参加对德作战，但是苏联人却把这一干涉行动的目的解释为西方国家企图把共产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这些不和谐的因素，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并没有发生冲突，还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叶成为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大国权力的衰落所导致的两极结构以及权力真空地带的出现，改变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虽然美苏相互不信任，但是两国相距甚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两国避免相互接触，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近距离地相互面对，欧洲被一分为二，严重的冲突在1947年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人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这种局面是否为两极结构的必然产物？不管怎么说，苏联是一个陆上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海上强国，为什么它们不能像熊和鲸鱼一样进行劳动分工、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呢？

答案在于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或者那些可以影响均势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好位于苏联的边缘地带。正如乔治·凯南在战后所指出的，世界上有4个地区具有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它们的同盟倾向将左右全球的均势。这4个地区是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结盟，共同反对苏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体系层次的解释预测冲突必然发生，但是它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为此，我们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从社会与个人层次探讨问题。简单来说，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是由俄国传统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建构主义者指出，俄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害怕出现无政府状态（因为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担心无政府状

态与异己分子的存在会导致帝国的解体);担忧外来入侵(俄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很脆弱的陆上大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多次遭受邻国的侵略);希望甩掉落后的帽子(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活力)以及崇尚秘密(试图掩盖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制度以阶级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为正义的基础。个人或者社会应当起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力量,因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被认为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意识形态因素增强了苏联对外扩张的倾向,并且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过程是秘密的、受到严密控制的。这种对外政策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斯大林在1939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正是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优点。斯大林可以不受公众舆论的制约,他也不需要担心官僚机构会拖自己的后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迅速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此时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同苏联打交道。然而,当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弱点也就暴露无遗。斯大林不敢相信希特勒会那么做,于是他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处于情绪极度消沉的状态。其结果是,苏联的军事防御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相对来说,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多样性和权力分散。美国人不仅不用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而汗颜,相反会为美国在技术和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美国不用担忧外来入侵,因为在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可以独立于两洋(以及英国海军)之外,而且其邻国皆比自己弱小。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政府文件经常在出笼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就能为新闻界所获得。美国社会十分重视个人的正义,不强调阶级的正义。基于此种政治文化的对外政策强调道义感和公开

性，而且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两种倾向之间来回摇摆不定。其结果是，从表明上看，美国对外政策的过程在很多方面常常是前后不一致、缺乏连贯性的。然而，硬币还有它的另一面。公开性和多样性的优点经常能保证美国避免犯更大的错误。

因此，两个结构迥异、对外政策过程不同的社会不能够相互理解，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我们从 20 世纪 40 年代杜鲁门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打交道的方式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很难理解苏联，因为后者就像是一个暗箱。美国领导人只能看到进出暗箱的东西，不知道暗箱里面所发生的事。美国同样也让苏联人难以理解。美国就像一个发出噪音的机器，它产生的背景声音太杂了，让人很难听清真正的信号音。也就是说，过多的人在谈论太多的事情。因此，苏联人经常搞不清楚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苏联也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比如领土扩张，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构建国际政治大环境。我们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谈判桌上所提出的目标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从德国和波兰获得权益。丘吉尔的目标是帮助法国重建，以便在美国军队“回家”之后抗衡苏联。罗斯福想建立联合国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这些目标在具体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的战后目标是想保留通过苏德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斯大林的目标和彼得大帝的目标十分相似。

一些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扩张主义者,旨在建立世界霸权。也有人认为,苏联人主要是追求安全,其扩张是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和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有所不同。第一,苏联不好战,它不想介入战争。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候,担心西方国家建议同他再签署一个慕尼黑协定,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战争,以此为其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第二,苏联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会轻率地采取冒险行动。冒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同共产主义相违背的罪恶,因为它可能打乱历史发展的进程。苏联在冷战时期,从未像希特勒那样好战与鲁莽。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苏联的行为完全是防御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在两极世界中很难区分进攻与防御行为。某些行为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可能对对方极具威胁。而且,防御性的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在 19 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在夺取埃及之后,英国人又认为应该占领苏丹以保护埃及,接着再觉得有必要吞并乌干达来保护苏丹。在占领乌干达之后,英国又不得不夺取肯尼亚,以建设一条铁路来保护乌干达。吃得越多,胃口越大,安全困境被用来说明不断扩张的合理性。苏联还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标,为其扩张行为寻找合法依据。简言之,苏联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但是其扩张行为是小心谨慎和机会主义的。

遏　制

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想遏制苏联。但是,遏制政策有两个十分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一是目标问题:

到底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第二个是手段问题：到底是使用资源阻止苏联的任何一次扩张行为，还是仅仅在对均势至关重要的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就遏制手段和目标含糊不清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乔治·凯南批评杜鲁门所提出的那种毫无限制的遏制政策。凯南自己的遏制思想与古典外交思想相吻合。它不太强调军事手段，而且是有所选择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948 年，铁托因为反对苏联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而同斯大林决裂。从遏制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美国不应该支持南斯拉夫，因为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从遏制的均势角度来看，美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以此削弱苏联的权力。美国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后一种政策选择。尽管"杜鲁门主义"提出要保护各个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还是向一个共产党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是为了在苏联的欧洲势力范围中制造分裂。

> 说美国单枪匹马就能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并很快使得苏联政权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的确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温和与克制，从而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者逐渐软化。
>
>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7]

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的遏制主张失去了说服力。在当时，NSC－68 有关苏联扩张主义的预言似乎得到了证实。在中国人加入朝鲜战争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看上去是铁板一块的，有关遏制的言论强调阻止共产主义扩张这个意识形态目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开始介入越南

的内战。美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努力阻止共产党人控制越南，为此导致58000名美国人丧生，超过100万的越南人失去生命，美国花费了6000亿美元，美国国内出现了动荡局势，遏制政策本身失去了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除了在南越遏制共产主义，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美国担心，假如它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的信誉将受到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于1975年承认失败并从越南撤军之后，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纷争，竟然成为维持该地区均势的有效力量。

冷战的发展

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曾经在竞选中表示，要结束朝鲜战争。共和党声称，遏制是一种向共产主义妥协的胆小鬼的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共产主义推回去。但6个月之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政策风险太大，因为它可能引发核战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在冷战中僵持的东西方关系开始有所缓和。1955年，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就奥地利成为一个中立国的问题达成了协议。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秘密报告被泄露出去，并导致在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动乱。匈牙利人试图发动起义，但是苏联出兵干涉，迫使它继续留在共产主义阵营之中。

赫鲁晓夫决定要把美国人赶出柏林和彻底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苏联巩固其在东欧的地位，并且利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

赫鲁晓夫和美国打交道的方式使人联想起了德皇在1914年以前试图迫使英国同德国谈判的外交风格，二者都充满着恐吓与欺骗。苏联努力迫使美国就范这种做法使结果适得其反，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都遭受失败。

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苏联和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彼此都让对方感到恐惧，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从1963年到1978年，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或者说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军备控制谈判取得了进展，1963年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条约》。双边贸易也逐步增长，缓和的范围似乎正在扩展。越南战争使得美国人给予共产党中国更多的关注。

从1969年到1974年，尼克松政府以缓和为手段，追求遏制的目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大大增加了军备开支，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与美国均等的地位。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公众对于冷战的干涉行动失去了信心。尼克松的战略是：(1)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使得双方核力量对比相对平衡；(2)打开对华外交关系，在亚洲形成一个三边的力量平衡格局（而不是促使苏联和中国联手）；(3)扩大美苏间的贸易，使得美苏关系中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4)利用"联系"原则把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起来。缓和的高潮出现在1972年和1973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苏联在非洲支持反美运动导致美苏相互指责。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如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极力主张把对苏贸易同人权问题（比如苏联对待犹太居民的态度）联系起来，反对美国按均势原则行事。这样一来，美国

的国内政治就加速了缓和的衰亡过程。1975年,在葡萄牙宣布允许其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后,苏联运送古巴的军队到了那里,支持当地具有共产党倾向的政府。到了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再也不使用“缓和”一词了。其继任者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上台后的最初两年里,还努力维持与苏联的“缓和”,但是苏联(还有古巴)介入了埃塞俄比亚内战之中,并继续扩充军备,特别是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缓和寿终正寝。

为什么美苏两国又重新进行对抗呢?一种解释是,缓和被吹过头了,人们的期望值太高。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的3个事态发展导致了缓和的消亡。首先是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国防预算的年增长率将近4%,苏联所增加的新式重型导弹特别让美国军方领导人感到不安。其次是苏联干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苏联人认为,上述地区的事态发展正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历史正朝着马列主义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最后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倾向,破坏了原先支持民主党的联盟。苏联行为和美国政治倾向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明,冷战是持久的,而缓和则是短暂的。然而,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行对抗,并不意味着两国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冷战。两国回到了50年代的冷战只是在言论上,而不是在行动上。尽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他还是准备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两国间的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在继续增长着,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交流也没有间断。两个超级大国还制定了相互关系中的某些谨慎的原则:避免直接交战,不使用核武器,进行军备与核武器控制谈判。显然,80年代的冷战与50年代的冷战是不同的。

冷战的结束

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由于冷战的起源同欧洲的分裂密切相关，所有冷战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欧洲分裂结束的时间，也就是 1989 年。1989 年 11 月，苏联决定不使用武力来支持民主德国的共产党政权，兴奋的人群拆毁了柏林墙，这可以说冷战已经结束了。

布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 1987 年在纽约

但是冷战为什么结束呢？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遏制的结果。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声称，如果美国可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那么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就会因为缺少胜利果实而受到削弱，苏联共产主义会逐渐软化。新的观念就会产生，人们会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未来，历史并不在他们那一边。总的来看，凯南是对

的。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有关冷战的时间问题:为什么冷战在 1989 年结束?为什么冷战持续了 40 年?为什么苏联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软化?为什么冷战不能再延续 10 年?遏制的确起了作用,但是它不能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另外一种观点是"帝国过度扩张"。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宣称,帝国总是过度扩张,直至耗尽帝国内部的所有能量。苏联的确是过度扩张的,因为它把 1/4 的经济资源都用在国防和对外事务上,相比来说,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这方面的开支只占其所有经济资源的 6%。但是,肯尼迪又进一步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只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之后,才会退缩到本民族的原有生存地域。然而,苏联并没有在一场大国战争中战败或者受到削弱。第三种观点是,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扩充军备迫使苏联在冷战中投降。这种观点有些道理,因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政策加重了苏联过分扩张的负担,但是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不管怎么说,美国以前的扩充军备行为并没有导致这种结果。为什么只是在 1989 年才产生这种结果呢?我们必须寻找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因为说 80 年代美国的言论和政策是导致苏联衰亡的主要原因,就好比公鸡声称自己在黎明前的啼叫导致日出一样。这是有关虚假的因果关系的又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突发、中层和深层三种类型的原因,更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导致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突发原因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个人因素。他想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革,而不是以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然而,改革就像滚雪球一样导致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在内

政和对外政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加速了苏联的衰落和冷战的结束。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上台后的最初时期,试图通过增强苏联人的纪律来克服经济停滞问题。在发现加强纪律不足以解决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改革"(perestroika)的主张,但是他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官僚们不服从他的指示。为了打击官僚主义者,他推出了"公开化"(glasnost)战略,使苏联进入公开讨论问题和民主化的过程之中;让人民发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情绪,可以对官僚主义者施加极大的压力,并且让改革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公开化和民主化允许人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并且享有表决权,许多人就会提出,"我们要自由。"戈尔巴乔夫导致了苏联的解体,1991 年 8 月保守派政变失败之后,苏联的解体很快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了 1991 年 12 月,苏联的历史已经终结了。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他自己称之为"新思维")也加速了冷战的结束。这一政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的变化,比如提出了共同安全观念,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以维护国家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指出,在一个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安全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核威胁的存在意味着,如果竞争失控,那么大家会一起死去。戈尔巴乔夫摒弃了核武器越多越好的观念,提出保持"充足"的核力量的思想,即保留最低限度的核保护力量。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是,他认为扩张主义的代价大于收益。苏联控制东欧的代价极大,而收益很小,入侵阿富汗是一个高代价的灾难。苏联不再需要通过输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种方式,来维护

苏联边界的安全。

因此，到了 1989 年夏天的时候，东欧国家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自由。匈牙利政府允许民主德国人通过匈牙利逃往奥地利，民主德国人的出逃给民主德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民主德国政府已经丧失了镇压示威者的决心（或者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该年 11 月，柏林墙被推倒了，这段时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我们可以说，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判断失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被修补的，但事实上，他努力修补的结果是挖了一个洞。如同水坝中出现一个漏洞，一旦被抑制住的压力开始消失，漏洞很快就会导致决口和破坏整个体系。

我们还没有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冷战在 1989 年结束？为什么冷战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结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戈尔巴乔夫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产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3 位苏联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去世。直到 1985 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这位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所谓的“1956 年的那一代人”）的领导人才有了机会。但是，如果苏共中央政治局在 1985 年选择一位同戈尔巴乔夫争权的、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作为苏联领导人的话，那么已经衰落的苏联很可能还会再继续存在 10 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就不会那么快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冷战结束的时间。

至于中层原因，凯南和肯尼迪两人都已经提到了。两个重要的中层原因，分别是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自由观念，以及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过度扩张。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公开化、民主以及新思维，都是西方的观念，它们已经为 1956 年的那一代人所接受。跨国交流与接触的增加，促进了自由

观念的传播，西方经济上的成就增加了这种观念的吸引力。在过度扩张方面，苏联巨额军费支出开始影响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苏联人所享受的健康福利待遇在减少，而死亡率则在上升(苏联是惟一一个死亡率上升的发达国家)。最后，甚至苏联军方也感受到了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包袱。1984年，苏联总参谋长奥加科夫(Ogarkov)提出，苏联需要进一步发展民用经济，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以及加大力度从西方引进技术。但是在那个停滞的年代里，年迈的领导人不愿意接受奥加科夫的建议，并且解除了他的职务。

自由观念和过度扩张这两个中层原因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最后还必须分析深层原因，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衰落(建构主义的解释)和苏联经济的衰退(现实主义的解释)。共产主义在战后时期逐步丧失了合法地位，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在早些时候，特别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少共产党人曾经在欧洲领导了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不少人相信共产主义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苏联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很多软权力。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由于以下事态的发展而不断下降：1956年揭露斯大林错误的非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1981年波兰事件，以及国际间自由观念交流的增加等。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阶级正义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列宁之后的领导人则是通过野蛮的国家安全制度，如劳改营、流放地(gulag)、范围广泛的书报检查和告密等等，来维持国内统治。这些压迫性措施导致苏联人民普遍丧失了对这种制度的信心，这种不满反映在地下抗议文学作品、人权活动家和异端分子的数量日益增多。

和大多数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史学家们是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在事件结束以后，来描述冷战的。我们不清楚最后的结局，我们只能确定主要角色的某些而非全部的动机……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或者说，我们现在至少要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们永远也了解不了历史的全貌：不管一个历史事件离我们有多远，我们都无法了解它的全貌。历史学家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之描述的详尽程度，超不过地图再现地上景物的详细程度。但是，我们可以描述过去，就像制图员绘制地形图一样。冷战的结束，以及至少是将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部分开放，会使得我们的描述更接近事实。

——约翰·L.加迪斯[8]

除此之外，苏联经济的衰退表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已经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个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它强调重金属和烟囱工业。它极其不灵活，即只有大拇指，没有手指头。它倾向于囤积劳动力，而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到发展服务行业上。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破坏，是灵活地应对技术变革重大趋势的方式。在20世纪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变革就是，信息成为一个经济体所具有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它的作用正日益增大。苏联的制度尤其不善于处理信息，其政治制度的高度机密性意味着，信息的流动是缓慢和困难的。

苏联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世界标准。20世纪末，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可以把劳动力转移到服务行业，可以对重工业加以重组，并且转向电脑产业。而苏联则跟不上这些变化。比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有5万台个人电脑，美国有3000万台个人电脑。4年以

后，苏联个人电脑数量达到40万台，美国个人电脑数量为4000万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和民主国家在应对技术变革的时候，比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烟囱工业时期建立起来的苏联集权制度要灵活得多。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按照世界标准，只有8%的苏联工业具有竞争力。一个92%的工业缺少竞争力的国家，是很难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

冷战的结束是20世纪发生的一个重大的革命性事件。从它对国际体系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来说，冷战的结束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分析冷战结束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冷战结束于1989年，但是某些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声称，欧洲的和平可能不会像大多数观察家所预言的那样持久地维持下去。俄罗斯或许再也不会占领其欧洲邻国了，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同脆弱的民主相结合，在今后可能导致扩张主义的复兴。一旦俄罗斯经过这个内部动荡的时期，它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以及东欧。假如事态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么1989年将被看作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风暴中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期。不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国际政治，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革过程。冷战后的俄罗斯放弃了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试探性地迈上了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上充满着危险。俄罗斯政府最初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施经济“休克疗法”，希望以此完成俄罗斯从经济集权制国家到自由民主国家的转变。然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社会大分裂，它很快就被一种较为渐进的方式所取代。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俄罗斯的民

族主义开始复苏。

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等理论家,根据自由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点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俄罗斯顺利实现转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这就有利于国际和平。我们今后还有待于观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否与民主和平论相吻合,或者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否再度兴起和挑战美国与欧洲。

不管今后的前景如何,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解答:为什么冷战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而美苏之间一直都没有爆发“热战”? 也就是说,为什么冷战没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核武器的作用

为什么冷战没有变成热战呢? 一些分析家认为,先进的发达国家吸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根本就不想打仗。另外一些人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长久和平”是超级大国追求有限的扩张主义目标的结果。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两个国家(而不是两个紧密的同盟)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的两极结构的稳定性。然而,在大多数分析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在于核武器和核威慑的特殊性质。

物理学和政治学

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百万吨级的核爆炸可使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这是太阳中心温度的5倍。1945年投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爆炸力是比较小的,相当于15000吨的炸药(TNT)。今天的导弹可以携带超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力100倍以上的核弹头。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所有炸药的爆炸力,只相当于一颗3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在

一枚重型洲际导弹的头部就可以装载上一枚这样的核弹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万件。

核爆炸所产生的某些物理效应,目前尚不确定。比如,核冬天理论认为,核战争会在大气层中产生很多的碳和粉尘,阻止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从而导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生物的死亡。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核冬天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很不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武器瞄准的是城市还是武器。燃烧中的城市会产生含碳成分很高的烟雾,挡住太阳光的照射,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烟雾到底能够飘浮多长时间。如果北半球发生核弹爆炸,那么烟雾是否会飘到南半球呢?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最坏的结果并不是出现核冬天,而是出现核秋天——这给人们一点小小的慰藉。人们难以确定的是,大规模的核战争能否导致文明的毁灭,或者至少是摧毁北半球的生命?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在1983年所发表的一份关于核武器的报告中,只是使用了如下略带夸张的表述:“我们是自创世以来具有毁灭上帝创造物能力的第一代人。”[9]

核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改变世界的基本结构。国家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那种无政府国家体系依然继续存在于核时代。1946年,美国提出有关国际控制核武器的巴鲁克计划,苏联把它视为美国的又一个阴谋。在巴鲁克计划流产之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悲叹道,什么都发生了变化,只有思维方式依然如故。据传,他说过“物理学比政治学更容易”这句话。

1945年以后核武器之所以没有导致更大后果,是由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最早的原子弹的杀伤力不及大规模地使用常规武器。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轰炸所造成的死亡

人数大于原子弹袭击广岛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尽管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一次空袭所用的全部常规炸弹,但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很少。美国在1947年时有两颗原子弹,1948年时有50颗。许多军事领导人认为,原子弹并不是全新的武器,它只是常规战争的延伸物。

美苏较量的开始也使得政治思维方式变化缓慢。苏联不信任联合国,认为它过于依赖美国。美国不能逼迫苏联同它进行合作,因为欧洲是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的人质。如果美国以核进攻相威胁,那么苏联可以用对欧洲发动常规军事进攻来威胁美国。核技术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并不足以改变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的行为方式。

1952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核革命从此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氢弹依靠原子聚变后产生的聚变能量,裂变式原子弹则不同,它依靠原子的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氢弹极大地增加了单独一件武器的毁灭力。在地球表面上所进行的最大威力的氢弹爆炸试验发生在1961年,当时苏联爆炸了一颗6000万吨级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全部炸弹爆炸威力的20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氢弹问世之后,核武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竟然是表现在弹头的小型化上。聚变技术使得很小的弹头就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早期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核弹头变大后,它所占据的空间必然增大。B-36轰炸机是一种具有8个引擎的巨型飞机,但是它只能装载一颗原子弹。而一颗威力相同的氢弹则要小得多。如果把核弹头装在弹道导弹的头部,那么发动一场洲际核战争只需30分钟,而B-36轰炸机飞行同样的距离要花8个小时。

氢弹破坏力的增强也提高了核战争的代价,人们因此不再

认为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了。19 世纪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宣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无限制的战争是个愚蠢的行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意味着,今天,军事手段和国家所追求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目标是相互脱节的。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有关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使用核武器这个终极的军事手段。1945 年以后,核武器从来没有被使用过,核武器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核武器的威力实在太大了,目标和手段太脱节了。

氢弹虽然没有改变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产生了五个重大的政治后果。第一,它让人们重新接受有限战争的观念。我们在 20 世纪上半叶看到了从 19 世纪的有限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变化,这两场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人丧生。在 20 世纪中期,分析家把 20 世纪称为“全面战争的世纪”。但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战争更像 18 世纪和 19 世纪那种旧式的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各导致超过 55000 名美国人丧生。在越南和阿富汗,美国和苏联都分别接受了失败,没有使用自己的终极武器。

第二,危机取代中心战争(central war)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在过去,战争就是在桌面上亮出手中所有的牌。在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太大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太危险了。在冷战期间,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中东危机,都起了类似战争的作用,反映了军事上的力量对比状况。

第三,核武器使威慑(通过恐吓使对手不做某事)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今天,事先调动军事力量让对手感到害怕,从而阻止对手发动进攻,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靠的是在战事爆发后进行动员和逐渐做好参战准备的能力,但是这种战争动员的方式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核战争在几个小时内就可能爆发。

第四，核武器导致超级大国事实上的行为谨慎规制(a de facto regime of superpower prudence)的产生。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也具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避免核战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介入过代理人战争或者间接的边缘战争，但是这两个国家从未迎头相撞。而且，双方都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美国大谈要在东欧把共产主义推回去，但实际上，当1956年匈牙利人起来反对苏联统治者的时候，美国由于担心爆发核战争，并没有急于帮助他们。同样地，除了古巴之外，苏联比较小心谨慎，避免向西半球渗透。另外，两个国家都遵守不使用核武器的规则。最后，两个超级大国学会进行相互沟通。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建立了热线联系，使得美苏两国领导人可以经常进行通话。技术手段使得两国在危机时期更容易进行相互合作，因为它使得两极体系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更灵活、更直接。美苏两国领导人自从1963年签署《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签订了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军备控制谈判是讨论如何在冷战体系中实现稳定的途径。

第五，核武器，尤其是氢弹，被大多数官员视为不可使用的武器。这不仅仅是由于氢弹潜在的破坏力。总是有某种力量在阻止有关国家使用核武器，而常规武器的使用则没有受到这种限制。事实上，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都在不断地想办法，使核武器小型化，使得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分别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一些小型的核武器，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坏效果。但是，不管是美国领导人，还是苏联领导人，都避免使用小型核武器，而是选择其他极具破坏力的武器，如凝固汽油弹、燃烧弹和各种常规武器。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使用任何种类的核武器，不管它们和常规武器有多么的相似，都可能导致有关国家使用所有类型的核武器，因此

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自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人们就一直怀有这么一种观念，即核武器是不道德的，它不可以在战争中使用。尽管我们很难衡量这种道义约束力的大小，但这种观念已经渗透进有关核武器的辩论之中，它是国家不愿意使用核武器的一个原因。

恐怖的平衡

核武器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均势，它有时被称为“恐怖的平衡”。双方的较量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物理上的。双方都奉行防止对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但是和以前的均势体系相比，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在 19 世纪的均势体系中，5 个大国不断更换盟友，而冷战时期的均势则明显地围绕着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展开，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迅速摧毁另一个超级大国。

传统安全困境所导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核恐怖而消失，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十分谨慎，尽管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两国这种谨慎的态度类似于 19 世纪的大国在处理多极均势的时候频繁地进行沟通。与此同时，超级大国努力计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就像以前的政治家比较双方的领土、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一样。

核恐怖平衡正好出现在两极体系时期。一些诸如肯尼思·沃尔兹那样的新现实主义者，把两极界定为全部力量几乎都集中在两个大国的一种情势。但实际上，单纯的两极状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两极状况，通常都是两个同盟的内部关系十分紧密，从而失去了灵活性，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均势状况就是这样的。尽管同盟的成员都是独立的国家，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两个同盟内部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从而导致了两极局面的产生。

核武器和越南战争

当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到1963年间决定大大增加美国军事力量的时候,……他脑中想着两个问题:假如赫鲁晓夫在1961—1962年的柏林危机中不相信他,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假如赫鲁晓夫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不相信他,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想,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国人大概不会在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这影响了美国不入侵北越的决策。军方说,虽然他们不相信中国会介入越南战争,但万一中国介入的话,核战争就可能发生,这导致美国决定不入侵北越。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10]

沃尔兹声称,两极体系特别稳定,因为这种体系使得相互沟通和计算力量变得很简单。另一方面,两极体系缺少灵活性并且提高了边缘战争(如越南战争)的重要性。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两极体系要么逐渐消亡,要么引起矛盾激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系没有引起矛盾激化呢?或许这是由于核武器使得大国的行为十分谨慎,沃尔兹把稳定归结于单纯的两极结构,实际上稳定是核武器的产物。核恐怖通过“水晶球效应”导致稳定的局面。让我们假设在1914年8月,德皇、沙皇和奥匈帝国皇帝从水晶球中看到1918年的画面。他们可能看到自己失去了皇冠,帝国被肢解,数百万国民被杀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还会在1914年介入战争吗?也许不会。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大概就好像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导人一个水晶球。由于国家不值得冒自我毁灭的危险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所以他们都不会去冒大的风险。当然,水晶球可能因为意外事件或者判断错误而被打碎,但是这个类比说明,正是两极结构和核武器的结合,导致了一个自现代国

家体系诞生以来主要大国之间最长的和平时期。上一次记录是1871年到1914年。

核威慑的问题

核威慑属于威慑的一种形式，但是核武器具有独特的性质，它改变了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核威慑促使人们这么思考问题，"假如你攻击我，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你的进攻，但是我手中的报复手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敢首先对我发动攻击"。因此，核武器使得一个古老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含义。

判断核威慑是否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进行反事实推理。假定没有核武器，冷战变成热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声称，冷战没有变成热战的事实跟核武器没有关系，正如日出跟公鸡啼叫没有关系一样。他认为，欧洲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经开始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和平的原因在于人们，至少是发达国家的人，日益认识到战争的恐怖性。在米勒看来，希特勒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少有的、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教训的人，他还想参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反战情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然而，绝大多数的分析家还是认为，核武器同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着极大的关系。假如没有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促使政治家采取谨慎的态度，那么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许还有中东危机，很可能升级和失控。

这引出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靠什么来进行威慑呢？有效的威慑不仅要求具有伤害对手的能力，也需要让对手相信某种武器将会被使用。可信性(credibility)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到底有多大。比如，美国威胁要用核武器打击莫斯科以报复苏联的核进攻，这是可信的。但是，假如美国在1980年

威胁说，苏联若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就要用核武器打击莫斯科，这能让苏联人相信吗？美国的确具有打击莫斯科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威胁不具可信性，因为苏联在阿富汗的利害关系太小，而且苏联反过来也会威胁要打击华盛顿。因此，威慑不仅和能力有关系，也和可信性密不可分。

可信性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以威慑手段抵制针对自己国家的威胁。二是把威慑范围扩大到保护自己的盟友。比如，美国不能使用核威慑来阻止苏联入侵阿富汗，但是它在40年的冷战中明确表示，如果苏联侵略西欧的北约国家，那么美国将使用核武器。因此，在判断核武器在扩大威慑范围和防止战争中的作用大小时，我们有必要考察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重要危机。

历史可以回答这些有关核武器作用的问题吗？肯定不能，但是它能给我们以一些帮助。在1945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垄断了核武器，但是没有使用核武器。因此，甚至在相互进行核威慑的局面产生之前，就已经有某些自我约束的行为了。其中部分原因包括：核武器数量很少；对这些新式武器缺乏认识；美国担心苏联会使用其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占领整个欧洲。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核武器，而且美国领导人在几次危机中曾经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朝鲜战争的时候，核武器没有被使用，1954年和1958年在中国发生台湾海峡危机时，核武器也没有被使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于某些考虑，不同意使用核武器。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搞不清楚投掷核武器能否阻止中国人介入战争，而且美国也担心苏联的反应。这场冲突一直存在着升级的危险，而且苏联人可能使用核武器来支持其中国盟友。因此，尽管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上享有优势地位，但还是存在着战争范围扩大、不只限于同朝鲜和中国交战的危险。

此外，道义和公众舆论也起了作用。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估计，如果核武器被加以使用，那么将会导致很大数量的人员丧生，所以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就没有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被问及有关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时，回答道，“我们不应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再次使用那些可怕的东西对付亚洲人。我的上帝！”尽管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比苏联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但一些因素促使美国人决定不使用核武器。

“最为严重的问题”

到了1962年10月中旬的时候，冷战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严峻起来。古巴这个曾经一直是美国事实上殖民地的国家，最近加入了苏联的营垒。在9月底的时候，美国报纸开始报道苏联向古巴运送武器的消息。约翰·F.肯尼迪告诉美国公众，据他所知，这些都是防御性武器，不是进攻性武器。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向他作过这样的保证。肯尼迪表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最为严重的问题将会出现。”

10月16日，星期二，在上午将近9点的时候，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把照片送到总统的卧室里，这些照片表明，“最为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这些照片是由U-2侦察机在高空拍摄到的，表明苏联在古巴修建了针对美国本土城市的核导弹基地。

在肯尼迪看来，美国不能容忍这些导弹的出现。而且这也证明赫鲁晓夫欺骗了他。在此后的13天里，肯尼迪和他的幕僚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他们十分清楚，可能发生的一个后果将是核战争，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中的文职防务专家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害怕的、有关美国人口易于遭受打击的情报。

——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菲利普·泽利科夫：《肯尼迪录音带》[11]

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它或许是核时代最接近于导致核战争的一个事件。如果一个纯粹的局外人或者“火星人”来考察这个事件,那么他一定会看到,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拥有17比1的优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苏联当时仅有20枚装载在洲际导弹上的核武器,但是肯尼迪并不了解这一点。为什么美国当时不对比较脆弱的苏联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呢?答案就在于,只要有1到2枚苏联导弹漏网,并且对着一座美国城市发射,就会导致美国难以承受的后果,这种风险足以对美国产生威慑的作用。除此之外,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担心,理性的战略和细心的估算可能失去控制。赫鲁晓夫在其致肯尼迪的一封信中,用了一个比喻来阐明这种想法:“我们各自抓住一根绳子的一端,在这根绳子的中间有一个我们所系的战争之结,因此我们必须格外小心”[12]。

25年之后,在佛罗里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参加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的美国官员与学者们一道,试图重新思考古巴导弹危机。与会者们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苏联到底愿意冒多大的风险?这取决于各方判断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谨慎。他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爆发核战争的几率大概是五十分之一。肯尼迪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龙(Douglas Dillon)则认为,爆发战争的几率基本上为零。在他看来,危机不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因此美国应该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冒更大的风险,而不应该像麦克纳马拉所主张的那样小心谨慎。肯尼迪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也认为,发生核战

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批评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让步太多。他指出，美国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下台。泰勒将军说道，“我确信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占上风，我对最后的结局一点也不感到担心。”[13]可是，肯尼迪总统十分担心危机失控，他极其小心谨慎，甚至谨慎到让他的某些幕僚不喜欢的程度。这件事表明，核威慑的作用是很大的。无疑，核威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的某些方面还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把危机的结局只归结于核威慑的作用。公众普遍认为，美国赢了。但是这种认识有点绝对。至少有三种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苏联多，所以苏联退缩了。第二种解释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危机中所具有的利害关系的大小程度不一样。古巴是美国的后院，而对苏联人来说只是在遥远的地方下的一个赌注。因此，美国不仅比苏联在古巴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常规军事力量。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也起了作用。苏联人背着心理包袱，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拥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随时动用常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国的威胁比苏联的威胁更具有可信性。

第三种解释是，虽然美国可以称得上是古巴导弹危机的赢家，但是这场危机的结局也是妥协的产物。美国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具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动用武力，轰炸古巴的导弹基地；第二个选择是封锁古巴，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第三个选择是收买苏联，即通过提出某种交易，比如美国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导弹，让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很长时间以来，有关当事人很少提起收买苏联的解决方案，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美国悄悄地向苏联许诺自己将从土耳其撤走其已经该退役的导弹，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1961 年在维也纳会晤

这个举动的重要性或许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核威慑在这场危机中是起了作用的,在约翰·肯尼迪的脑子里,有关核武器方面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另一方面,核武器的数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核武器的数量对比并不是那么重要,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

道义问题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的紧张程度相对来说有所缓解,似乎美国和苏联在踉踉跄跄地走到悬崖边和往下看一眼后,赶紧缩回去了。1963 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核大国签署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军备控制条约,肯尼迪宣布美国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有所缓解。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美国主要关注于越南战争,也在军备控制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在 1979 年苏联人侵阿富汗之后,人们又开始担心爆发核战争。在 1980 年至 1985 年间的"小冷战"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停顿了下来,美苏双方使用激烈的言词相互进行攻击,军费开支和核武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罗纳德·里根在谈论核战争问题时,反战团体则要求冻结和最终销毁核武器。

> 在 1962 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阅读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8 月的枪声》。这本书写的是欧洲国家如何无意地介入战争之中。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俾斯麦的一句话"在巴尔干国家中发生的某些讨厌的、愚蠢的事情"会点燃下一场战火。然后她叙述自从 1914 年 6 月 28 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很小的、本身

并不重要的事件，导致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军事冲突。在战争爆发前夕，有关国家领导人不断努力阻止冲突的发生，但是这些事件还是把他们拖入战争之中。

肯尼迪总统提醒我们注意两位德国首相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一个对话。一位问道："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继任者回答说，"哦，要是我知道就好了。"肯尼迪以这种方式来强调判断失误的危险性。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掉进灾难的深渊》[14]

许多人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核威慑符合道义吗？"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道义判断需要符合特定条件。自卫通常被视为正义的事业，但是自卫战争的手段与后果也同样重要。从手段来说，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从结果来说，目标和手段要相称。

核战争有可能符合正义战争理论吗？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小当量的核武器，比如核炮弹，其爆炸威力接近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可能被用来攻击雷达系统、海上船只或者很深的地下指挥掩体。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把战斗人员同非战斗人员分开，相对地限制核武器的影响范围。假如战争到此为止了，那么核战争并不违反正义战争的理论。但是，如果战争升级了，怎么办呢？升级的危险是很大的，它可能导致上亿人死亡，甚至是地球的毁灭。在冷战时期，一些人宣称，"与其死亡，不如赤化"。

然而，上述提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对。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为了避免一场大灾难，冒点小风险是否正当呢？据说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认为，发生常规战争的几率大概是三分之一。发生核升级的几率显然要比这小得多。肯尼迪冒核战争风险的行为是否正当呢？我们可以通过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假定赫鲁晓夫一开始就不想在古巴冒险，那么他有

可能试着采取其他更危险的行为吗？假定苏联在危机中取胜，并且后来又在柏林或者巴拿马挑起一场核危机或更大规模的常规战争，那么结果将如何呢？

核武器在防止冷战变成热战上，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大主教们说，核威慑在特定条件下是正当的，它是在寻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可以接受的暂时性措施。但是，这个暂时的阶段到底有多长呢？只要人们还具有核知识，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就肯定会继续存在。尽管核武器使得有关国家在冷战时期采取了谨慎的行为，但由此产生的自满情绪也是很危险的。美国和苏联经过一段时间才学会控制核武器，但是我们不清楚，那些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来是否会遵循这样的控制规则。

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心还将继续存在。尽管已经有180个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爆炸了核武器，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家也试图获得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非常规性武器的扩散，也同样让人担忧。比如，利比亚虽然遭受了国际制裁，但还在继续建造化学武器设施。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4年美国和朝鲜之间近乎升级的对峙，以及有关核材料从前苏联地区流到国际黑市上的报道等表明，这些武器仍然可以导致紧张局势的产生和使国家走到战争的边缘。

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抵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呼声，源于道义和现实主义的动机。从道义上谴责核武器的国家，不仅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或者想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美国、法国和俄罗斯。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芥子气、并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中引起广泛的抗议之后，人们就一直在抵制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现实主义方面的考虑很简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

且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只要这些武器还存在着,冲突的动力就是变化不定的。拥有核武器或者非常规武器的弱国能对强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而拥有这些武器的强国则可以更有效地威胁对手和产生威慑的作用。与此同时,不管是在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峙中,还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中,一旦危机失控和对抗加剧,这些武器就可能被使用。冷战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核武器和非常规武器的时代还没有终结。

注　释

1.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2), p. 114.

2. Ralph B. Levering, *The Cold War, 1945—1972* (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1982), p. 15.

3. William Taubman,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82), p. 36.

4. Ibid., p. 37.

5. Ibid., p. 131.

6.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p. 375.

7.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July 1947), p. 581.

8. John L. Gaddis,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otnotes*, 5:5 (June, 1998).

9. The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 "The Challenge of Peace: God's Promise and Our Response", *Origins*, 13:1 (May 19, 1983), p. 1.

10.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85, p. 6.

11.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 Belknap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12. 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p. 184.

13. Ronald R. Hope, ed., *Soviet View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yth and Realit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p. 48.

14 Robert McNamara, *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Pantheon, 1986), p. 14.

精选阅读材料

1. Schlesinger, Arthur, J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46:1 (October 1967), pp. 22—53.

2. Yergin, Daniel, *The Schattered Pe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69—86.

3. Gaddis, John L.,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illey, 1978), Chapters 6, 7.

4. Mueller, John,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Jervis, Robert,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2 (Fall 1988), pp. 80—90.

5. Khong, Yuen F., "The Lessons of Korea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302—349.

其他阅读材料

1. Allan, Charles T., "Extende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n from the Cold and out of the Nuclear Fi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7:3 (Summer 1994), pp. 203—233.

2. Allison, Graham T.,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3. Blight, James G., and David A.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4. Bundy, McGeorge, *Danger and Survi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5. Fursenko, Aleksandr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Norton, 1997).

6. Gaddis, John,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7. Gaddis, John,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Gray, Colin S., *Weapons Don't Make War: Policy, Strateg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9. Herring, George 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10. Kagan, Donald, *On the Origins of War*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11. Kennan, George F.,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12. Kennedy, Robert, *Thirteen Days* (New York: Norton, 1968).

13. Kolko, Gabriel,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4. LaFeber, Walt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6*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15. Larson, Deborah W.,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 Lebow, Richard Ned, and Thomas Risse-Kappe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Legvold, Robert, "Soviet Learning in the 1980s",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 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684—732.

18. Mandelbaum, Michael, *The Nuclear Revolu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 Mastny, Votjech,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 May, Ernest R.,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 Belknap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Nye, J. S.,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Summer, 1987).

22. Remnick, David,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23. Taubman, William,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 (New York: Norton, 1982).

24. Williams, William A.,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World, 1959).

25. Wohlforth, William C., ed., *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6. Yergin, Daniel,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思考题

1. 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为什么? 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是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的?

2. 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吗? 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爆发? 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可以避免?

3. 为什么政治家们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协调一致的体系? 产生了何种体系?

4. 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原因有多重要? 美国和欧洲政治家是如何认识苏联及其国际野心的? 苏联如何看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5. 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关键的问题不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而是为什么冷战没有发展成"热战"。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为什么没有爆发热战?

6. 遏制指的是什么? 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如何形成和被实施的? 苏联如何反应?

7. 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有什么不同? 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方式吗?

8. 米勒认为,核武器不是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大战的主要原因,

这一看法对吗？他认为的其他原因是什么？

9. 核威慑在道义上说是防御性的吗？或者用一个理论家的话来说，它是否在道义上类似于把婴儿绑在汽车前面的防撞器上以防止在追思节(Memorial Day)发生交通事故？是否有的威慑战略比其他的威慑战略更符合道义？

10. 除了核威慑，核武器同国际关系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多大的用处？

11. 核优势有用吗？它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冷战起源和深化时期大事年表

1943年11月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会晤
1944年7月	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1944年8月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立联合国
1944年10月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在巴尔干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
1945年2月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晤
1945年4月	罗斯福去世
1945年5月	德国投降
1945年4-6月	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
1945年7月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
1945年8月	广岛和长崎毁于原子弹；苏联参加亚洲的战争
1945年9月	日本投降
1946年3月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希腊内战重新爆发
1947年3月	杜鲁门主义出笼
1947年6月	马歇尔计划出笼
1947年10月	莫斯科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8年2月	捷克共产党发动政变
1948年3月	柏林部分封锁开始
1948年6月	柏林空运开始；南斯拉夫被情报局开除
1948年11月	杜鲁门再次当选总统

1949年4月	《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
1949年5月	柏林封锁结束
1949年8月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49年9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50年2月	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署
1950年4月	NSC-68草案出笼
1950年6月	朝鲜战争开始
1952年11月	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杜勒斯出任国务卿
1953年3月	斯大林去世
1953年7月	东柏林动乱
1953年7月	朝鲜战争停战
1953年8月	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
1953年9月	赫鲁晓夫当选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1954年9月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5年5月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华沙条约》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签署;奥地利中立化
1956年2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
1956年6月	波兰波兹南起义
1956年10月	匈牙利起义开始
1956年11月	苏联干涉布达佩斯
1957年8月	苏联发射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
1957年10月	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1958年2月	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8年8月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959年1月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胜利
1959年9月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60年2月	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0年5月	美国U-2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巴黎首脑会议流产
1961年4月	在古巴猪湾的登陆行动失败

1961 年 6 月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
1961 年 8 月	修筑柏林墙
1961 年 10 月	柏林查利检查站事件;紧张关系加剧
1962 年 10 月	古巴导弹危机

联合国大会

第六章　干涉、制度和地区冲突

主权与干涉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地区和国内冲突仍然持续不断，并且总是会产生促使大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干涉的压力。干涉（intervention）是一个容易令人混淆的概念，其部分原因在于，它既是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概

念,也是个规范性(normative)的概念。它不仅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作出价值判断。因此,讨论干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道义问题。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规范(norm)。不干涉是一个强有力的规范,因为它同秩序和正义有关联。秩序限制了混乱的程度。如果基本原则得到遵守,那么国际无政府状态,即缺少一个更高权威的状态,并不等同于混乱。主权和不干涉是保证在无政府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秩序的两个基本原则(principles)。' 与此同时,不干涉同正义也有关系。民族国家指的是由那些享有在自己国境内共同生活权利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其他国家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理想的民族国家。正如建构正义者所指出的,很多国家难以用“主权国家”这个概念加以定义。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在塞拉利昂和索马里,存在着集团与氏族(clan)的纷争,缺少能够有效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甚至孩童也被迫参与战斗。因此,正义与秩序之间经常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人们对于是否进行干涉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

干涉概念的界定

最为宽泛的定义为:干涉就是指影响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外部行为。某些分析家则使用一个较为狭窄的定义:干涉是指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强迫性的干预(interference)。我们根据强弱程度的变化,可以画出一个有关干涉的图表(见图 6.1)。在标线的左端,干涉可能仅仅表现为一次旨在影响另外一个国家内政的讲话。比如,1990 年布什总统呼吁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1999 年萨达姆号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推翻本国政府。这样的讲话的目的在于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但是经常起不到什么作用。美国政府

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马蒂电台,播放反对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息,但是卡斯特罗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依然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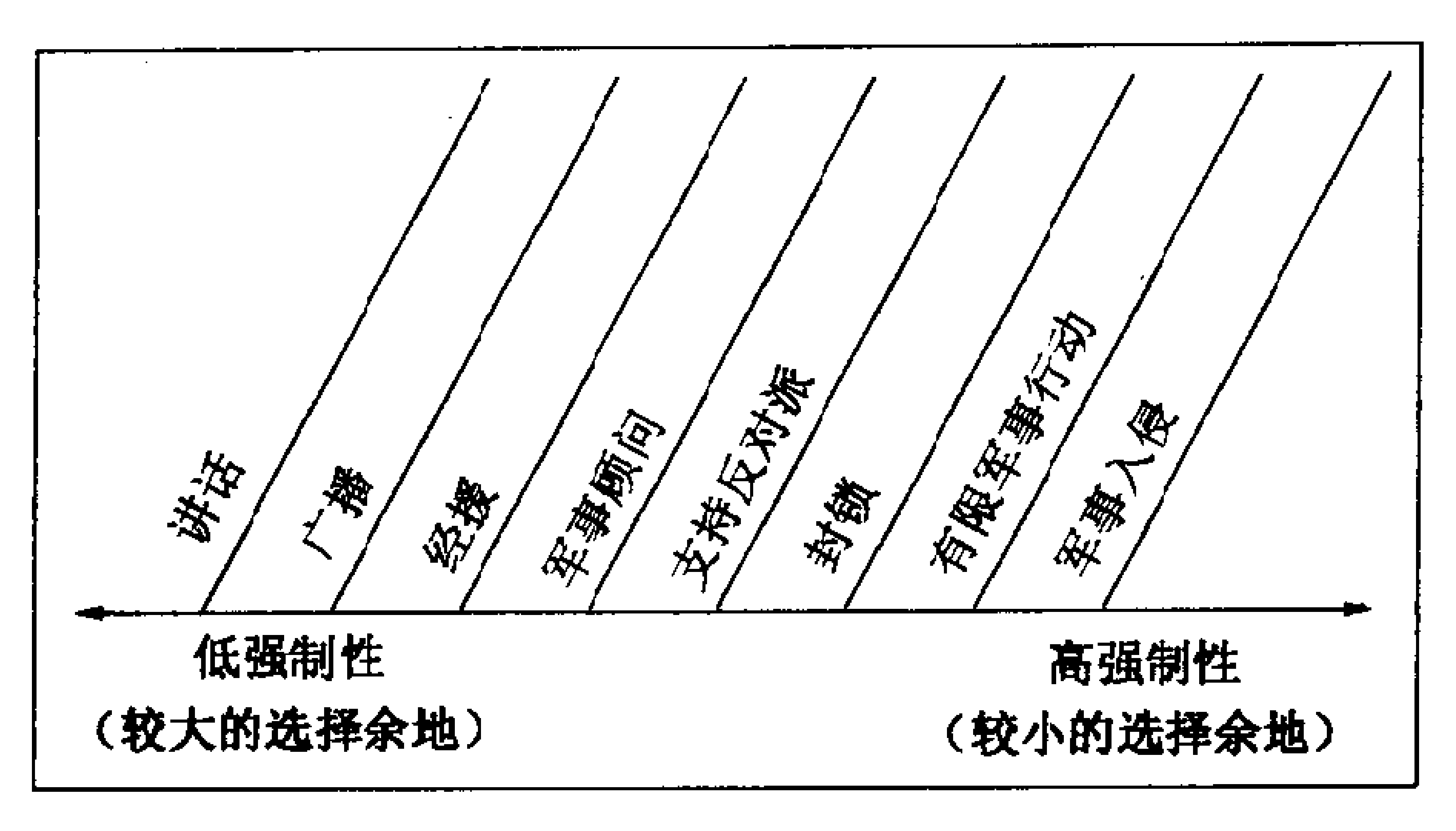


图 6.1

经济援助也可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向萨尔瓦多和古巴提供经济援助,目的在于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贿赂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援助形式。同样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关利用资源来影响外国的选举。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花了很多钱,试图帮助那些较为照顾韩国利益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

表中强度更大一点的干涉行动是派遣军事顾问。在越南战争的初期,美国的干涉行动先是经济援助,然后是军事援助。与此相类似的是,苏联和古巴向尼加拉瓜和其他"仆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另一种干涉的形式是支持反对派。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向萨尔瓦多以及智利民选总统的反对派提供金钱援助,苏联也在不同的时期用金钱支持欧洲国家的和平组织。

靠近标线最右端的是有限军事行动。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轰炸利比亚,报复该国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而苏联则支持南也门内战中的一个派别。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攻击苏丹和阿富汗,以报复针对东非美国大使馆的恐怖袭击。标线

的最右端是大规模军事入侵或者军事占领。这样的例子包括美国1965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83年在格林纳达以及1989年在巴拿马的行动，还有苏联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9年在阿富汗的行为。实际上，不只是大国才进行军事干涉。比如在1979年，坦桑尼亚出兵乌干达，越南入侵柬埔寨。1997年，小小的卢旺达有力地干涉了比它大得多的邻国——刚果的事务，后者当时处于动乱之中。某些干涉是多边的，但通常以一国为首。比如，美国在1995年领导了联合国对海地的干涉，尼日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几个西非国家干涉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宽泛的干涉定义包括了上面图表中所有的行为，其强制程度是由弱到强。干涉的强制程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和当地人选择权的大小相关，因而和当地自主权受外界力量限制程度的大小有关系。

主权

主权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进一步加强了其重要性，它也是有关干涉合法性辩论的核心问题。主权从法律上说是对一块领土的绝对控制权，而一国政府在其边界内的实际控制权往往属于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

由于一些原因，即便是得人心和强有力的政府也无法对边界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加以全面的控制。其中一个原因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比如，法国社会党1981年上台执政之初，试图对法国的经济政策作重大的调整。但是，社会党人很快便发现，法国经济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是如此地相互依赖，如果法国单方面改变政策，那么资本将逃出法国，法国法郎也将贬值。所

以，法国社会党人最后还是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采取共同的政策。相互依赖并没有限制法国在法律上的主权，但是它的确限制了法国政府事实上的控制权。法国在经济上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它不能采取完全自主的经济政策。同样地，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市场极其不稳定，从而促使像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离得较远的主权国家政府宣布本国的货币贬值和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

经济相互依赖只是侵蚀主权的几个因素之一。大规模难民流入甚至也会致使稳定的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在 1993 年和 1994 年，海地和古巴难民涌入美国给华盛顿制造了政治难题，而卢旺达难民流进毗邻的布隆迪加剧了布隆迪国内的族际冲突。毒品和军火走私也会损害主权。走私武器从阿富汗流入巴基斯坦北部，削弱了巴基斯坦政府控制其北部领土的能力，而毒品从境外非法流入美国，在美国国内制造了法律和秩序方面的难题。国家在法律上具有主权，但是境外行为体会影响其国内事务。

在另一方面，干涉也可能增加国家的自主权。某些穷国可能由于实力很弱，只拥有很小的事实上的自主权。某种形式的干涉可能在事实上增强这些国家的实力，从而增加其自主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外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可能有助于受援国变得更加独立。这就是主权、自主和干涉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一些复杂方面。

对干涉行为作出判断

对于怀疑论者来说，道义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实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对干涉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价值观(values)是秩序与和

平，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是均势。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有助于维持均势和秩序的干涉行为就是正当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冷战时期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美国 1965 年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依据是不能容忍在西半球出现更多的共产党政权，而苏联干涉东欧的依据则是保护那里的共产党政权。苏联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即苏联有权采取干涉行动，以捍卫其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实主义者可能认为这样的干涉行动是正当的，因为它们维护了秩序，并且防止了可能因为误解或者判断失误而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正义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个人组成的社会是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因此，如果干涉行为伸张了正义，那么它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应该允许为了善意的目的而进行干涉。但是如何界定“善意的”之含义呢？在冷战时期，自由的世界主义者认为，诸如反对菲律宾马科斯独裁和南非种族隔离右翼政权的干涉行为就是正当的，而保守的世界主义者则认为，反对左翼政权的干涉行为是正当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美国人宣扬“里根主义”，即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政权的干涉行动是正当的，因为这些政权侵犯了民主权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义者极力支持如下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在索马里防止饥荒的蔓延（1992），在海地恢复民选总统的权力（1994），在波斯尼亚制止一场内战（1995），在科索沃遏止由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政府挑起的“种族清洗”（1999）。左派和右派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如果干涉行为伸张了正义，那么它就是正当的。

在国家道义主义者的眼里，国家和人民的自主权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制度是国家组成的

社会，它拥有一定的规则和国际法。在这些行为规则中，最重要的是不干涉别国领土主权的原则。因此，在国家道义主义者看来，干涉行为基本上是不正当的，只有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或者抵制外来侵略的战争才是正当的。然而，现实世界有时要比这复杂得多。外来侵略的性质经常是不甚明确的。例如，1967 年 6 月，以色列军队穿过边界、首先对埃及发动了进攻。但是，人们经常认为，以色列不算是侵略者，因为它是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阻止埃及即将发动的进攻。到底谁是侵略者呢？是在边境集结军队、看上去在准备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呢，还是在埃及发动进攻之前就开始进行攻击的以色列？

不干涉原则的四个例外

政治学家和国家道义主义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其著作《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中指出，尽管没有发生公然的侵略行动，在四种情势中进行战争或者采取干涉行为可以是正当的。不干涉原则的第一个例外是先发制人的干涉行动，1967 年以色列攻击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面临着明显的和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它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采取行动了。但是，威胁必须是迫在眉睫的。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干涉阿富汗的行为是正当的。先发制人的战争不同于预防性战争，前者是在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发生的，后者则是在领导人确信早打不如晚打的时候爆发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这种预防性战争的思维影响了 1914 年的德国总参谋部。许多人担心，假如德国等到 1916 年再发动战争，那时俄国已经太强大了，“施利芬计划”将无法实施。沃尔泽所说的不干涉原则的第一个例外并不意味着允许发动预防性战争，因为德国并没有

面临着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在本书前面所列举的反事实推理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假如发生其他的事情，那么1914年到1916年的情势就可能大不一样。

不干涉原则的第二个例外是，可以用一次干涉行动来平衡上一次的干涉行为。这个规则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即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上一次发生的干涉行为使得当地人民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一次反干涉行动就是正当的，因为它恢复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美国有时就是用这个理由来说明自己介入越南的行为是正当的。根据穆勒的观点，只有针对上一次干涉行为的反干涉行动才是正当的，除此之外的干涉行动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只能允许针对第一次干涉行为的反干涉行动，因为让当地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不干涉原则的第三个例外是，为了拯救面临大屠杀威胁的人民而采取的干涉行为是正当的。如果这些面临杀身之祸的人民不能获得解救，那么旨在尊重当地人民独立或权利的不干涉原则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是在乌干达独裁者大规模屠杀当地人的时候，这个干涉行动是为了拯救面临大屠杀威胁的人民，因而是正当的。越南就是以拯救柬埔寨人为借口入侵柬埔寨的。然而，并非只要发生大屠杀或者种族灭绝事件，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就会进行干涉。比如，美国就不愿意出兵干涉卢旺达（1994）、波斯尼亚（1992和1995）、利比里亚（1996）和塞拉利昂（1999）等国所发生的这类事件。

不干涉原则的第四个例外是，如果一个分离主义运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支持它的干涉行动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国家中的一群人明确表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

么帮助他们从原来的国家中分离出去就是正当的行为，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把自己的权利放在一起、享有民族的自治权利。民族自决权就是一个群体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然而，分离主义运动在什么时候才值得帮助呢？是否说分离主义运动获得胜利就意味着外界值得向它提供帮助呢？穆勒观点的部分含义是，一个群体为了建立一个合法的民族，它必须具备拯救自己和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能力。这样的观点至少同不干涉原则以及国家组成的社会之观念是相统一的，但它作为一个道义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意味着强权即公理。

自决的问题

有关支持分离主义运动之干涉行动的一个问题是，“人群”(a people)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外人如何知道国家内的人群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共同体或者国家(state)呢？自决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问题是由谁来作决定，也就是说，“自决”中的“自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索马里的情况。索马里与许多非洲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其人群基本上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族群(ethnic)的背景。而毗邻的肯尼亚则由于殖民统治的原因，是由几十种族群或部落(tribes)所组成的，他们的语言背景和生活习俗差别很大。其中，在肯尼亚北部居住有索马里人。索马里声称，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应该让肯尼亚东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索马里人分离出去，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nation)——索马里人。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他们还处于民族创建(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中。结果是在北非发生了一系列围绕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的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结果是，索马里自己后来陷入了氏族(clans)和军阀之间的内战之中。

投票并不总能解决民族自决的问题。首先，应该在哪里投票呢？以爱尔兰问题为例。许多年来，天主教徒声称，如果在北爱尔兰的政治区域内投票，那么占三分之二多数的新教徒将居主导地位。新教徒则认为，如果在整个爱尔兰岛的地理范围内投票，那么占三分之二多数的天主教徒将说了算。到底谁来决定在哪里投票呢？最后是借助外部的调停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该在什么时候投票呢？在20世纪60年代，索马里人要求马上举行投票，肯尼亚则要求等40年到50年后再投票，在此期间肯尼亚要努力完成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或者把部落认同塑造成肯尼亚认同。

分离运动会给当事国的其他人造成伤害吗？分离主义者会从当事国带走多少资源，或者会给该国造成多大程度的混乱状况？比如，苏台德地区在1918年奥地利帝国解体之后被合并到捷克，而那里的居民却是讲德语的德意志人。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脱离了捷克并加入德国，其结果是，原先属于捷克的那个多山的边疆地区就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中，这对于捷克的防务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让苏台德的德意志人行使民族自决权，意味着剥夺捷克的军事防御能力，这样做是否正当呢？在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的东部地区要求与尼日利亚分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比夫拉，但是尼日利亚其他地方的人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其部分原因在于，尼日利亚的绝大部分石油产区位于比夫拉。他们宣称，石油属于所有的尼日利亚人，而不只是属于该国的东部地区。

在1989年以后，自决问题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变得十分尖锐起来。捷克再次按民族的界线分裂为西部的捷克共和国和东部的斯洛伐克国，但是这一次的分裂是和平进行的。在

前苏联地区，各种族群集团（ethnic groups）要求获得自决的权利，他们中的许多族群集团在1917年到1920年间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在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车臣人都要求在自决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同的族群和宗教集团采取分离主义行动和要求行使自决权。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建立起了独立的共和国，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也有少数族群，但是波斯尼亚的族群成分要比它们复杂得多，而且包括人数较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1992年以后，波斯尼亚穆斯林面临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清洗”行动。波斯尼亚战争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后来海牙国际法院设立了战争罪行法庭，以审判那些负有屠杀罪责的人。然而，在冲突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北约以及欧盟不能就如何应对这场冲突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尼亚战争让国际社会感到为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难以判断这场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在多大程度上是塞尔维亚的干涉行为？如果这场冲突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行为，那么国际社会出面干涉的惟一理由就是防止大屠杀。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情况一样，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1995年北约维和部队开往冲突地区之前，国际社会一直没能就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自决成了一个含义不甚明确的道义原则。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认为，该原则可以解决中欧的问题。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这个原则，损害了一些弱国的利益。由于世界上只有不到10%的国家是单一族群的国家，因此很显

然，如果把自决视为首要而非次要的道义原则，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在世界很多地方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动机、手段和结果

既然自决原则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其他的原则来对干涉行为作出判断呢？传统的正义战争思想是从三个层面来作出判断的：动机、手段和结果。这三个层面都很重要，我们如果只从一个层面考虑问题，那么肯定会得出错误的答案。例如，如果只从结果来判断干涉行为，那么就等于说"强权即公理"。显然，我们必须考虑除了结果以外的东西。

在另一方面，好的动机也不能证明干涉行为是正当的。例如，作家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指出，美国干涉越南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美国的目的是为了把南越人民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这里举一个类比的事例。假设某个晚上，一个朋友主动提出要开车送你的孩子回家。当时正下着雨，你的朋友车开得太快，结果车翻到路边，你的女儿死了。你的朋友说，"我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我只想让她早点到家、睡个好觉。"如果像波德霍雷兹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鲁莽但符合道义的"，那么好的动机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行为是正当的呢？我们还必须考察动机以外的因素，包括必须考虑结果。

实际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把南越从北越的渗透行动所造成的恐怖中解救出来。即便美国的动机是正当的，它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不正当的。人们可能会问，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干涉是最后的手段吗？美国有保护无辜生命的措施吗？干涉是适度（比方说罪与罚相称），还是过头？是否有确保公正性的程序？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考虑过采取国际多边措施，以克服人类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倾向？这样做的

结果如何？这样做会取得成功吗？由于不能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难以区分平民和游击队员，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对那些错综复杂、原因众多的情势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我们在作出判断之前，必须把动机、手段和结果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让我们来看看遏制政策是怎样导致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美国在二战后初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是否应该取代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以防止土耳其以及希腊遭受苏联的入侵。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向人民解释美国的干涉行动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和其他一些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如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则主张用道义的言辞来颂扬美国的行动。所以，杜鲁门总统后来在"杜鲁门主义"演说中解释自己的行动时，大谈美国要保护各地方热爱自由的人民。

曾经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斯大林侵略计划的乔治·凯南，看到遏制政策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后感到很失望。他声称，美国要遏制的是苏联的权力，因此任何可以平衡苏联的权力而又不需要动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措施都是好的。但那些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则认为，美国应该直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经过一段时间后，平衡苏联权力的主张让位于使世界远离共产主义的遏制主张，后者的目标较为广泛。这种观念导致美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低估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美国开始认为它必须遏制中国和苏联的权力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当遏制主义从 1947 年的东地中海转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东南亚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野心勃勃和注定要失败的干涉行动的依据。

美国干涉越南

美国派遣军队到越南,试图扭转当地斗争的局面,结果美国的行为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死亡和痛苦。正如最后结局所表明的,美国最终未能扭转局面,它只能推迟这种局面的终结。

我们这些反对越战但又不希望共产党获胜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即提不出能够令人满意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因为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我们在提出自己相对复杂点的想法的时候,处于很难受的境地,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管是主战派还是反战人士,只要那种简单明了的答案。

——欧文·豪,迈克尔·沃尔泽:

《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犯错误了吗?》[1]

总而言之,尽管绝对的不干涉原则在实践中经常没有得到遵守,不干涉原则依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不干涉原则的例外情况,要根据不同的个案,通过考察动机、手段和结果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被记载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章程之中。人们在理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同国内法和国内政府相类比。但是,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内政府,国际法也不同于国内法。国际组织并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其原因有二。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国际组织章程都规定要保护成员国的主权。如《联合国宪章》第2章第7条就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

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换句话说，国际组织并不想取代民族国家。

同国内政治进行类比

国际组织不是萌芽中的世界政府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国际组织本身的弱点。世界上有一个国际司法机关，即国际法院，它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由联合国选举产生，任期9年。但是，国际法院并不是世界的最高法院。各国可能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不接受它的判决。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法院判定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行为是非法的，但是里根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判决。

如果我们把联合国大会比作美国的国会，那么前者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立法机构。联合国大会的原则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这个原则既不体现民主，也不反映世界上的权力关系。民主的基础是一个人拥有一个投票权。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位于南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一样，都拥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前者人口只有10万，而后者人口超过10亿。这就是说，马尔代夫群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投票权力是中国的1万倍，这显然同立法机构的民主标准不相吻合。同样地，它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权力关系，因为马尔代夫群岛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拥有的权力与美国或者中国相同。联合国大会的这种奇特性，使得国家不愿意让该组织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因此，联合国大国通过的只是决议，而不是法律。

最后，我们可能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相当于萌芽中的世界总统。然而，这同样也会让人产生误解。秘书长是一个权力很小的行政官员，如果说秘书长有权力的话，那么他更像教皇，而不

像总统。我们如果试图通过与国内政府进行类比的方法来理解国际法,那么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国际法和国内法不同。国内法是立法机关和惯例的产物,有时被称为“习惯法”(common law)。国内法包括法律执行、由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你可以自己去法庭和提出诉讼)和立法机构按程序修改法律等规定。国际公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同国内法相类似,因为它也是由条约和惯例所构成的,条约是国家间的协定,惯例是国家普遍接受的行为习惯。但是,国际法在执行和裁决方面,和国内法区别很大。在执行方面,没有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确保一个国家服从法院的决定。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国际法有时是由大国来执行的。比如,在海洋法方面,曾经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国家拥有3海里的海洋管辖权。乌拉圭在19世纪提出要扩大领海的范围,以保护其沿海捕鱼业,而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则把炮舰开到离乌拉圭沿岸3海里的海域,以此作出反应。因此,习惯法是由大国执行的。你或许会问,如果英国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那么由谁来执行制裁英国的法律呢?答案在于,在自助的体系中执行国际法只是一种单行道的行为。

在国际法中,是由国家而不是个人提出裁决请求。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世界上几十亿人口中的某个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唯独国家才享有提出裁决请求的权利。不仅如此,除非国家自己不愿意处理某个国际争端,或者认为自己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否则它是不会把该争端移交给国际法院的。所以,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比较少。国际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波斯尼亚及卢旺达冲突的战争罪犯,而且一大批国家在1998年达成建立国际罪行法院的协议,但是一些重要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拒绝签署这个条约。此外,即使国家同意遵循一个

共同的原则,它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解释习惯规则的难题。让我们以征用原则为例来加以说明。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规则是,国家可以对其领土上的一家外国公司实施国有化,但必须给予该公司以相应的补偿。然而,到底由谁来确定什么样的补偿是合理的呢?许多不发达国家认为少量的补偿就足够了,而富国则通常要求较多的补偿。

最后,即使是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而且,它们不具有约束力。只有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所作出的决定,才是每个成员国在法律上必须接受的。《联合国宪章》第7章是关于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以及侵略行为的规定。如果安理会(而不是联合国大会)认定存在一个侵略或对和平构成威胁的行为,并且要求对此行为进行制裁,那么成员国必须实施制裁措施。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新法规的产生过程有时是这样的:先由大型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讨论和起草条约,然后各国政府签署这个条约。这类会议通常规模庞大,而且效率不高。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海洋法会议,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旨在制定有关12海里领海、200海里渔业专属经济区以及洋底锰矿瘤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等规则。其中的麻烦在于,有的国家只同意条约文本的部分内容,这就使得相关的国际法规不甚明确。

国际法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分散性质(fragmented nature)。国际政治中的共同体观念是很弱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太愿意出于履行义务或者服从权威的考虑,而遵守规则或者约束自己。由于世界上缺少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武力垄断权的全球性行政机构,主权国家处于以自助、武力和生存为特征的环境之中。当生存问题出现以后,法律通常是第二

位的。

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然而,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国家由于如下两个原因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可预见性与合法性。

国家总是被卷入相互间的冲突之中。国际间的交往,不管是政府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极其广泛的,它包括贸易、旅游、外交使团以及人员跨国接触等。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发生摩擦的机会也就增多。在摩擦出现后,国际法可以让政府避免冲突升级。比如,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因贩运毒品而在墨西哥被捕,或者一艘英国船只与一艘挪威船只在北海相撞,或者一家日本公司指责一家印度公司侵犯其专利权,有关国家政府可能不想让这些涉及个人的争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果按照国际法和普遍接受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可以使得这些问题非政治化和具有可预见性。可预见性有助于增进交往,并且有序地处理因交往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冲突。

合法性是国家需要国际法的第二个原因。政治不仅仅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也是争取合法性的较量。权力与合法性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人既不是完全按道德原则行事,也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有关对与错的信念是人们行为的动力,这是一个政治事实,因此合法性也就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一国的行为被认为缺少合法性,那么该国就要为其政策付出更高的代价。国家希望借助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证明自己的政策具有合法性,并且指责别国的政策缺乏合法性,这会影响到它们的行为及其后果。

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作用的历史个案。苏伊士运河是由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修建的,它成为英国通往印度贸易航线上的重要通道。在1956年的时候,大约1/4的英国进口货物要通过苏伊士运河。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Nasser)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认为埃及的行为对英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把纳赛尔比作新时期的希特勒,并且联想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进入莱茵地区后,英国并没有采取行动。英国担心,纳赛尔煽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行为可能损害英国在中东的地位,而且纳赛尔已经接受了苏联的武器,当时正值冷战的高潮阶段。

英国和美国在1956年8月和9月初,建议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并且提出埃及可以把运河收归国有,只是运河的控制权应该属于使用运河进行航运的国家。纳赛尔拒绝接受这一妥协方案。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以色列秘密制定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长期遭受纳赛尔所支持的游击队骚乱的以色列,将对埃及发动进攻。然后,英国和法国再以苏伊士运河面临威胁的借口出兵干涉。以色列军队按这个计划越过了边界,进入埃及的西奈地区。以色列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并且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是合法使用武力的规定。在以色列入侵西奈之后,英国和法国宣称,它们必须出面干涉,以防止运河遭受破坏。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个危机,它不接受英、法、以的辩解,并且呼吁有关各方停火。英国和法国使用否决权来反对停火的主张,它们想让干涉行动继续进行下去,直至纳赛尔下台。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和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一道,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即用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离开。这样一来,英国和法国就不再有干涉的借口了。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向西奈地区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美国没有支持其欧洲盟友,因为它担心,英法的干涉行动会刺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而为苏联介入中东创造更多的机会。美国则支持哈马舍尔德和皮尔逊的方案。不仅如此,美国为了对英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极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向英国提供一项补充贷款(backup loan),迫使得英镑面临很大的压力。最后,英国和法国作了妥协,同意实现停火。(苏联此时正忙于干涉追求自由的匈牙利。)

英国和法国不得不同意停火,一部分原因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没有了干涉的法律借口,因为现在已经有了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离开、防止对运河造成破坏的其他解决办法了。11月15日,第一批联合国紧急部队到达西奈,把以色列和埃及的军队隔离开,接着在12月,联合国开始清理苏伊士运河的沉船。我们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可以看出,运用和滥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行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国际法在重大的利益冲突中,可能对国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它往往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法律是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也许怀疑论者会说,这些只是律师们玩的游戏而已。但是,法律并非毫无作用,因为政府总是很重视援引法律依据,或者认真地考虑国际组织的决议。这就好像一句格言所说的:“如果用邪恶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是善良的,那么善良肯定要因此付出代价。”简单地说,政府的行为可能受自己提出的法律借口所束缚。

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

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占领莱茵地区,接下来成功地实施了入侵奥地利、捷克、波兰和西方的行动计划。大部分西欧人容忍和原谅了他的行为……

同样地,我们确信,夺取苏伊士运河是纳赛尔实施其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目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剥夺西方的利益,并且把西方影响清除出阿拉伯世界。他相信,如果他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并成功地挑战18个国家,那么他就能够在阿拉伯世界享有极高的威信,可以鼓动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青年军官发动革命。(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在伊拉克这个最稳定、最进步的国家里策划一场革命。)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如果不是俄国人的卫星国,那么实际上就会成为埃及的卫星国。这些地方的石油资源将处于由埃及领导并受俄国人影响的阿拉伯合众国的控制下。一旦这个时刻到来,纳赛尔就可以停止向西欧供应石油,我们就将看他的脸色行事。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6年[2]

另外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是在1967年中东战争结束后通过的,它呼吁有关国家恢复战前的边界。在此后几年里,它使得以色列对在战争中夺取的领土的占领缺少合法性,从而迫使以色列在联合国处于被动地位。阿拉伯国家虽然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但是仍然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1976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极力促使联合国开除以色列,美国花费了很多政治资本来劝说阿拉伯国家,防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开除以色列的决议。这个事例再次说明,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性象征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时,会使用武力这个

最有效的权力形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使用武力的事态只能起到很有限的作用。用国际法来处理毒品走私、海上船只相撞或者侵害专利权等是一回事,遵守国际法而使国家面临生存威胁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集体安全制度所面对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宪章》建立起了一种有所改进的集体安全制度。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集体安全

在经典的均势体系中,战争是合法的,武力也是被允许使用的,而且它被认为有助于确保体系的稳定。在 19 世纪,随着技术革新导致战争更具破坏力以及民主与和平运动的兴起,有关国家采取了一些把国家组织起来以防止战争的措施。1899 年,26 个国家在海牙召开了和平会议。1907 年,44 个国家参加了海牙会议。海牙会议所采取的是法律手段,与会者极力说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签署一项仲裁条约,以便通过仲裁而非使用武力来处理争端。他们也试图制定战争法规,以便在仲裁失败的情况下约束战争行为。

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国家创建起了国际联盟,试图通过国家的联合来阻止侵略行为和惩罚侵略者。在威尔逊及其思想的同路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一场由均势所导致的偶然的和不必要的战争,为了集体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同盟可以防止发生这样的战争。如果说建立国联的目的在于防止再次爆发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那么 1943—1945 年间建立联合国的努力则旨在防止再次爆发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1945 年,49 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旧金山,签署了一个宪章,它包含了一些创新的内容,以克服国联的弱点。除了国家出于自卫或者集体安全的需

要而使用武力外，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举动被宣布为非法的行为。这样的集体安全制度和19世纪均势体系的区别之处在于，任何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以武力发动进攻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国家只有出于自卫，或者集体自卫，或者集体安全的目的，才可以使用武力。

联合国的设计师们也设立了一个安全理事会，它由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一些有任期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安理会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的均势思想和联合国集体安全框架相结合的产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安理会可以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5个大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他们都具有否决权，否决权就好比一座房子里的照明系统中的保险盒。与其让一场针对一个大国的战火烧掉房子，不如使用否决权让所有的灯都熄灭。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冷战期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于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对立，有关国家难以就什么是合法地使用武力的行为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人们在界定侵略的定义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比如，如何判断挑起战争的是先进行秘密渗透的国家呢，还是其军队首先跨越边界的国家？在1956年的时候，以色列深受由埃及支持的游击队秘密越界攻击之苦，但是以色列的常规部队首先越过边界。对于谁是侵略者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看法，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站在冷战的哪一方。在联合国创建后的最初20年里，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试图给侵略下一个定义。它在列出一个侵略行为的清单之后，又加了一个但书，指出安理会也可以确定其他行为属于侵略行为。因此，这个定义没有什么意义。即便动用了军队，安理会也可能说没有发生侵略行为。就联合国来说，只有安理会可以认定一个行为是否为侵略行为。一切都取决于在安理会内部能否

达成共识，而这在冷战时期是很难做到的。

集体安全制度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促使了联合国预防外交思想的产生。联合国不再关注于集体安全的基本思想，即确定和惩罚侵略者，而是把来自独立国家的军队聚集起来，并部署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地带。达格·哈马舍尔德和莱斯特·皮尔逊在1956年提出的模式后来被多次付诸实施。虽然冷战阻碍了联合国实施改进过的集体安全原则，但是联合国依然采取了一些富有创意的行动，比如用国际部队把争端双方分开。根据集体安全制度，如果一个国家越过一条界线，那么其他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对付它，并且迫使它退回到原来的界线内。而根据预防性外交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越过一条界线，那么联合国就会介入，并且把当事方分开，不表明谁对谁错。在冷战期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维和部队总是由小国提供的，而不是来自苏联或者美国，这样大国就不会直接卷入冲突之中。预防性外交与维和行动是富有创意的举措，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不属于集体安全的措施。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的第一场危机。由于苏联和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集体安全原则在40年中第一次被付诸实施。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伊拉克采取了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它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行为很相似，从而促使政治家们想到当年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教训。第二，政治家们认为，如果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这么一个明显的侵略行动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维持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原则。第三，联合国内的小国支持这一行动，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很脆弱，都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萨达姆·侯赛因为其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所作的辩解，也让其他大多数的小国感到害怕。用前面引用过的海地驻联合国代表的话来

说，它们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科威特。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吗？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发挥作用需要有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当发生明显的侵略行为的时候，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最能够发挥作用，而它难以在内战中起作用。第二，集体安全制度在没有国家使用否决权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或者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集体安全制度将会再度陷于瘫痪之中。况且 1945 年设计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是不能用来反对 5 大国的，这 5 个国家在安理会都享有否决权。第三，集体安全制度只有在成员国提供资源的时候才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拥有庞大军队的国家不提供资源，那么很难想象集体安全制度会起什么作用。集体安全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在冷战时期被冷冻起来，然后在 1990 年的海湾战争中，如同拉撒路（Lazarus）一样死而复生。但这只是个例外，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中所谈到的那样，集体安全制度将来只是人们用来维持世界秩序的手段之一。

联合国发挥着政治作用，即便在集体安全原则无法得以实施的时期，它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原则，对那些想使用武力的国家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此外，安理会讨论国际暴力问题，会在危机时期增强集体关注的效果和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且它有时也可以促使人们的观点变得明确起来，增加武力侵略行为的代价，以及起着外交安全阀的作用。最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是很有成效。联合国设置的这些绊网和缓冲区，一再被大家认为是很有用处的措施。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机会更多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监督萨尔瓦多的人权

状况、尼加拉瓜选举、柬埔寨的管理以及监督维和部队等方面都起了作用。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海地和柬埔寨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未能防止卢旺达的种族清洗，也不能阻止安哥拉内战。他们在塞浦路斯发挥重要的作用长达30年之久，但是在波斯尼亚则不得不被更强大的北约军队所取代。最初的集体安全构想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否定国际法和联合国作用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国际法和联合国是无政府国家体系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法采取过于怀疑或者过于天真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国家不能只按法律行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法律，那么国家就无法生存。

中东的冲突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东，是我们考察地区冲突的一个极好的个案。它特别符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即便如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该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冲突频繁发生？民族主义、宗教和均势政治各自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伊拉克入侵比自己大的邻国呢？一个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声称对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整个水道拥有控制权。但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国王统治之后，伊朗处于纷争之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借此时机发动进攻。而且，革命后的伊朗给伊拉克国内制造了难题。伊拉克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萨达姆·侯赛因是世俗的国家元首。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鼓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起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杀死了很多伊拉

克什叶派领袖，这种跨越国界的宗教煽动行为遭到了失败。然而，伊拉克也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虽然伊朗人不属于阿拉伯人，但在靠近伊拉克的伊朗领土上生活着很多讲阿拉伯语的人，他们在伊朗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伊拉克人认为，生活在伊朗的讲阿拉伯语的人会以对待解放者的态度欢迎伊拉克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伊拉克的进攻促使伊朗人团结起来。

此后，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战事，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所期望的一场时间很短和对伊拉克有利的战争。伊拉克人很想脱身，但伊朗人紧紧抱住伊拉克人不放。伊朗遭受了伊拉克的攻击，它不愿意让伊拉克人自己想走就走。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宣称，只要萨达姆·侯赛因不下台，伊朗就不会停战。在此后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件。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朗，因为它们更害怕伊朗的革命政权。然而，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过的，虽然叙利亚是个世俗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伊拉克，但是它却出于均势的考虑，站在伊朗的一边。叙利亚担心毗邻的伊拉克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那么担心离自己较远的伊朗。

局外国家也表明了立场。美国担心伊朗力量的增强，所以向伊拉克提供秘密援助。尽管伊朗原教旨主义者号召消灭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暗地里把美国造的武器运往伊朗。以色列这样做是出于均势的考虑。以色列对伊朗和伊拉克都很担心，但是伊拉克是一个离得较近的威胁源，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援助。因此，这场战争是由错误的判断而引发的，战争的根源在于宗教、民族主义因素以及个人野心，均势的考虑进一步促使它成为一场很难解决的、持续将近 10 年的冲突。

民族主义问题

民族主义是如何引起战争的呢？什么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什么是民族(nation)？建构主义者指出，民族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按照字典的解释，民族就是声称具有一样的认同(identity)和有权建立国家的一个群体。但是，它包括哪些群体呢？一样的认同之根源又是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指在族群上相似的群体，可是美国人尽管在族群上是多样化的，他们仍然属于一个民族。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的群体，可是瑞士人尽管在语言上是多样化的，他们仍然同属一个民族。还有的人认为，宗教是民族的基础，某些国家，比如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是建立在宗教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一个具有一样的认同的群体称自己为一个民族，但是这种认同的根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里纳(Ernest Renan)指出："民族的核心因素在于，其成员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必须已经忘却了很多别的东西。"[3]民族有时也被称为"想象中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因为民族的成员太多，大家相互之间大都不认识，想象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主义概念很难被界定，因为民族主义既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词，也是一个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词。如果一个词既具描述性，又具规范性，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词汇，被应用于权力斗争之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中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因此，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主张，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果一个群体可以让其他人承认它是一个民族，那么它就可以要求获得民族的权力，并以此反对自己的敌人。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促使联合国大

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racism）。阿拉伯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剥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合法性。种族主义者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而民族主义者则基本上是一个好的称谓。宣称以色列人不是一个民族，实际上就是把言词当作武器来加以使用。

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宗教可以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宗教基础可以使得不属于该宗教的少数人更难以分享这种民族认同。以色列境内穆斯林所处的地位比犹太人要低，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教徒所处的地位比穆斯林要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用宗教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群体就是种族主义者。联合国大会最后在 1991 年通过第二次投票，废除了上述那项决议。

在 18 世纪的时候，民族主义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民族主义主张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呢？建构主义者指出，人类的效忠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上，有的在国家层次之下，而且这些效忠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正常的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人们的效忠目标就会发生变化。民族的理念往往产生于那些正常生活模式受到极大破坏、处于文化边缘地带以及认同不明确的那部分人的头脑中。他们在自己的正常生活模式被破坏之后，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民族主义主张通常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集团提出来的，例如 19 世纪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模式与效忠目标，他们所表述的有关新的认同的想法，渐渐地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导致民众形成新的认同的动力，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革命所推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新兴的政

治集团希望法兰西不再是国王统治下的国家，而是民族的国家、全体人民的国家。从外部的情况来看，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模式，促使德意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到 19 世纪的中叶，同一个民族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观念最后导致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并没有极力把讲德语的人都统一到一起，只是统一了那些普鲁士国王能够控制得了的德意志人。然而，他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模式是颇为成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殖民帝国，而且在此后的 30 年里，非殖民化运动成为亚洲和非洲的主导潮流。宗主国的社会已经受到战争的削弱，殖民地的精英们开始运用民族主义观念来反对欧洲帝国。19 世纪典型的国家是以语言和种族为基础的，如果这种模式还运用于后殖民地世界，那么它将导致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出现无数个微型国家。然而，后殖民时代的精英主张国家拥有缔造民族的权力，反对与此相反的 19 世纪模式。当地领导人声称，他们需要利用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如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把那些较小的部落群体塑造成为一个民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即民族缔造国家和国家缔造民族，同样都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可以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社会建构的。

在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早期的浪漫时代里，那些"泛"运动之间的差别被成功地掩盖了起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在欧洲兴起，它声称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具有一样的认同。在当代，中东有泛阿拉伯主义，非洲有泛非主义。早期

反对异族统治的人宣称,由于殖民地人民都遭受外来殖民者的压迫,所以他们应该组成泛非或者泛阿拉伯民族。然而,他们在获得解放或者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开始面临建立政权这个实际的问题,并且发现政权的运转需要财政机构、警察和公务员这些手段。而且这些手段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泛”的基础,而是根据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定的边界。所以,随着浪漫主义情感的消退,以国家为基础的认同开始取代以“泛”运动为基础的认同。尽管如此,“泛”运动的浪漫主义情感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依然存在着。

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中东曾经出现过奇特的情势:某些国家突然宣布组成一个国家联盟,比如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者利比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国家在1989年(应该是在1984年——译者注)宣布成立国家联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的力量在与泛民族主义运动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例如,埃及民众中关注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变得比泛阿拉伯主义观念更为强大。这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还没有完结。在大部分后殖民国家中,由于经济变革和现代通讯手段的出现,正常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治领导人极力控制这种后殖民时代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借用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另一些人借用泛阿拉伯主义的感召力,还有一些人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感召力。它们一起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冲突。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结果是,在两个声称具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和争夺一块弹丸之地的群体之间发生了6次战争。以色列声称,早在《圣经》问世的时代,那块地方就属于犹太人,它后来

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才为罗马人所占据。以色列人还援引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了《贝尔福宣言》，即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罗思柴尔德(Lord Rothschild)，表示英国将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而努力。以色列人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希特勒的大屠杀表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1948年，犹太定居者同意接受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反对这么做。联合国承认了以色列国，但是以色列人不得不为了阻止阿拉伯人的攻击、维护国家的生存而斗争。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国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是正当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反驳说，他们也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贝尔福宣言》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90%的居民是阿拉伯人。直到1932年的时候，仍然有80%的当地居民属于阿拉伯人。他们宣称，英国没有权力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来向犹太人作出承诺。阿拉伯人进一步指出，大屠杀的确是历史上一个大污点，但犯下这个罪行的是欧洲人。为什么阿拉伯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呢?

双方的观点看上去都有道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日巴勒斯坦的那块地方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同德国结盟。奥斯曼帝国在战败之后便瓦解了，其阿拉伯领土成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把自己托管的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那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把其托管的约旦河以东的地方称为“外约旦”。

在20世纪2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很少，但在30年代，随着希特勒上台和欧洲反犹太主义势力的增长，犹太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36年的时候，40%的巴勒斯坦居民

是犹太人,而且犹太移民导致阿拉伯居民发起暴动。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1939年5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英国需要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以对抗德国,所以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它会限制犹太人移民。但是,英国的限制措施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难实施。由于大屠杀,许多欧洲人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计划,而且大量犹太人悄悄地移居巴勒斯坦。除此之外,一些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采取了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当地的英国统治者。与此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的非殖民化(1947年英国宣布这个政策,1948年5月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大大衰落,它于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

> 大英帝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且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有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亦不应损害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
>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1947年,联合国建议巴勒斯坦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阿拉伯人当初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计划,那么他们的处境会更好一些,然而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计划,这导致在当地爆发了战争。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建国,其阿拉伯邻居发动进攻,企图阻止巴勒斯坦分治。第一次阿以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个月。尽管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超过以色列人,占有40比1的优势,但他们的组织性很差,而且相互之间不团结。在实现停火和经过联合国的调停之后,约旦控制了被称为西岸的那个地区,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绝大部分处于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中,以色列控制的领土面积大大超过其根据

1947 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所能得到的领土。

这场战争致使大量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这让阿拉伯人产生了耻辱感，并且促使阿拉伯人普遍抵制有关永久和平的方案。阿拉伯人不愿意接受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阿拉伯领导人极力煽动泛阿拉伯主义情感，并且声称阿拉伯人将在下一次战争中消灭以色列。事实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1951 年被刺杀，就是因为他当时努力与以色列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

第二次阿以战争发生于 1956 年。1952 年，纳赛尔和其他一些青年军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的统治。他们很快从苏联获得了军火，并且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他们派遣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骚扰性的攻击。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英国和法国不满纳赛尔在运河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担心他主宰中东。然而，美国拒绝帮助英国，联合国的决议以及维和行动促使双方停火。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

第三次阿以战争，也就是 1967 年的“六天战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后来的领土问题。纳赛尔和巴勒斯坦人继续用游击队的攻击行动来骚扰以色列人，而且埃及还关闭了蒂朗海峡，切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航线。纳赛尔并没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但他看到叙利亚和以色列即将开战后，认为这正是埃及介入战争的好时机。于是，纳赛尔请求联合国从埃及边境撤走维和部队。以色列看到埃及正在准备战争，便决定先发制人。以色列摧毁了埃及地面上的战斗机，紧接着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

超级大国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迫使交战双方同意停火。1967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换取中东实现和平和以色列获得承认。

但是第 242 号决议有意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你会从该决议的某个语种的文本中发现,决议没有提“所有的领土”,而只是提“领土”,这意味着某些领土可以不必归还。在决议中,有关巴勒斯坦人地位的表述也是模棱两可的,巴勒斯坦人既被视为一个民族,又被当作难民。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第四次阿以战争,即消耗战,其重要性较小。在 1969 年到 1970 年间,纳赛尔得到苏联的帮助,策划了一些横渡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骚扰行动。这些行动引发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空战。最后,空战逐渐陷入一个僵持的局面。

第五次阿以战争就是 1973 年 10 月的斋月战争。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埃及无法消灭以色列。萨达特认为,在提出和平倡议之前,应该取得某种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决定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但是不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萨达特同叙利亚人合谋,发动了一次颇为成功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的初期,埃及人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超级大国再次介入,呼吁双方停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飞赴莫斯科,然而以色列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包围了埃及的军队。苏联人感到受骗了,于是在苏联南部集结军队,并且致信美国政府,建议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干涉。美国以宣布其核力量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相回应,迫使苏联作了退让。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有所让步,给埃及军队留一条生路。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关各方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美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以军撤出部分领土的协议。联合国观察员也进驻西奈和戈兰高地。但是,这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却姗姗来迟。萨达特在 1977 年访问以色列,宣布埃及准备与以色

列单独媾和。1978年和1979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且达成了协议。根据《戴维营协定》,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西岸实现自治。该协定意味着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脱离了反对以色列的同盟,埃及的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萨达特瓦解了泛阿拉伯同盟,但是他在几年之后遭到反对其政策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暗杀。

第六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最初的时候,黎巴嫩处于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两种力量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该国的穆斯林又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这三种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基地设在黎巴嫩,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分裂为很多派系。黎巴嫩这个真正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中东的一个安宁的天堂。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四分五裂,陷入内战之中,给外来干涉提供了机会。叙利亚军队进驻黎巴嫩的北部,以色列则在1978年入侵黎巴嫩南部,占领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1982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Ariel Sharon)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首先宣称,以色列军队要进入黎巴嫩领土2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但实际上以军挺进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还围困贝鲁特长达10个星期。以军对贝鲁特的围困,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黎巴嫩基督教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同以色列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然而,杰马耶勒很快遭到暗杀,这项和约也流产了,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985年,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大部分黎巴嫩领土上撤退,但仍然占据其南部的一个缓冲地带。尽管以色列人成功地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了贝鲁特和黎巴嫩,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以色列继续遭受黎巴嫩南部不同派别的

火箭攻击。

中东的事态表明,地区冲突有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它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难以解决。双方的强硬派人士使对方态度更加强硬。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很快地提出和平的倡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这样反过来又增强了以色列那些反对同阿拉伯人媾和的强硬派在国内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了一个跨国同盟,它使得那些试图达成妥协方案的温和派人士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萨达特在 1973 年和 1977 年冒险采取了行动,但最后把自己的性命给断送了。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世界中,双方很难相互信任和进行合作,囚徒的困境是本地区政治模式的绝好表述。

在两极时期,中东的战争持续时间很短,其部分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每个超级大国都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在看到自己可能被盟友拖向战争边缘的时候,又把各自的盟友拉了回来。也就是说,停火的压力是来自外部的。1956 年,美国通过联合国施加了停火的压力;1967 年,美国和苏联利用热线达成了停火的安排;1973 年,美国和苏联介入冲突;1982 年,美国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退。在很多事件中,冷战加剧了地区冲突,但是冷战也给地区冲突设置了一个安全网。随着冷战的结束,较小的国家日益希望联合国能够提供这种安全网,然而我们还有待于观察联合国的安全网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在 1990—1991 年间,联合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为作出了反应,通过了其在冷战后的第一场考试。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及其后果

1990 年 8 月 2 日,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科威特的入侵,海湾危机从此开始了。伊拉克一直声称,科威特是殖民主义者人

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它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61年，伊拉克企图占领科威特，但在英国的威慑之下，伊拉克没有实现其目标。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的，有关殖民地边界毫无意义的观念，在很多后殖民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联合国会员国都不赞同伊拉克的辩解。

每一个个案都有较为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8年的两伊战争使得伊拉克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伊拉克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而且还以每年1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伊拉克的邻居科威特则是一座金矿，拥有丰富的石油和稀少的人口。而且，伊拉克对科威特的石油政策也极为不满。伊拉克声称，科威特没有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协议，每一桶石油的价格下降1美元，伊拉克每年就要损失10亿美元。因此，占领科威特似乎可以解决伊拉克的经济难题。

在政治上，萨达姆·侯赛因也担忧伊拉克的安全。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想搞垮他的国家。不管怎么说，以色列曾经在1981年轰炸过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而且随着苏联的衰落，美国和以色列似乎日益强大。萨达姆1990年2月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次讲演中指出，苏联正在衰落，它不再具有遏制美国和以色列的能力。萨达姆认为，他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试探美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极力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绥靖政策，试图把他拉回到负责任的国家共同体之中，并把伊拉克当作中东平衡伊朗势力的一个筹码。美国前后不一致的政策对萨达姆·侯赛因起了误导的作用，萨达姆·侯赛因相信自己可以侵略科威特，而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然而，萨达姆错了。联合国依据集体安全的原则，通过了一系列反对伊拉克的决议。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作出这样的反应呢？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石油。石油出口使得海

湾地区变得极其的重要，然而除了石油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英国虽然并没有从海湾进口任何石油，但却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很多国家关心集体安全问题，忘不了 20 世纪 30 年代侵略行为未能被及时制止的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即进行预防性战争。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了相关材料，以实施一个核武器计划，他已经拥有化学武器，而且据说还拥有生物武器。假如让伊拉克占有科威特并获取其石油收入的话，那么世界今后将面对一个国土面积更大、实力更强、更具有破坏力的伊拉克。一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晚打不如早打。

也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战争的手段，因为经济制裁就可以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我们很难证明这个反事实推理的假定是否正确，也很难相信联合国反伊拉克联盟可以存在几年的时间，从而让制裁措施产生作用。最后美国及其盟友只打了 1 个多月的仗就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布什政府在 1990 年 10 月就已经得出结论，即制裁不起作用。当年 11 月，美国在沙特的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不在最后一刻宣布撤军或者采取其他策略，从而解救自己呢？部分原因在于他的错误判断，正如他在 1990 年 8 月对美国大使说，美国人承受不了很多的人员伤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个受害者，因为他把海湾战争同越南战争相类比。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萨达姆很自负，而且他无法自动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心。

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场战争使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得到复兴，而且它可能对其他类似的侵略行为产生威慑作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提出了一些有关这场冲突是否具有典型性的问题。这场战争摧毁了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战争的停火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即由联合国核查人员视

察伊拉克并摧毁伊拉克的核武器与化学武器设施。但是，它没有解决由于中东国内政治分裂和国内社会脆弱而产生的冲突。

然而，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缔造和平与使双方关系正常化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布什总统利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促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政府于1991年底在马德里、1992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谈。虽然这些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之间在挪威奥斯陆的幕后谈判，促使了1993年9月巴解组织和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原则宣言》。此后，双方又达成了以色列从加沙地带以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城镇和村庄撤军的协议。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并且把当地的自治权，包括治安权，于1994年以后分阶段移交给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

与此同时，约旦国王侯赛因和以色列拉宾政府就双方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举行了谈判，并且于1994年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一项和约。在海湾战争期间，约旦对美国为首的反伊拉克联盟的支持不是很坚决，侯赛因国王认为，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以使得他重新获得美国和中东产油国的尊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海湾战争中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结果失去了科威特、沙特以及其他产油国的慷慨援助。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巴解组织开始不那么强烈地抵制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中东冲突的潜在因素依然存在。尽管阿以之间进行了和平谈判，但以色列民众对放弃占领土地的政策尚未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以色利极端保守分子把拉宾视为叛徒，拉宾在1995年底被刺杀。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巴解政府和阿拉法特很腐败、专横，他们支持那些极力破坏和平进程的反对派团体，如原教旨主义团体哈马斯。抵制和平进程的阿拉伯团体所进行的恐怖主义爆炸活动，影响了1996年的以色列大选，利库德政府上台后中东和平进程变缓。尽管如此，利库德政府还是在1998年同巴解签订了《瓦伊河协议》。

我们可以在海湾战争后的事态发展中，看到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因，我们在其他冲突中已经了解到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在个人层次上，阿拉法特、拉宾和侯赛因国王这些个人决定是否签署和平协议。然而，如果没有海湾战争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变化，中东和平进程不可能有具体的成果。有关国家政府所承受的内部压力，比如约旦的经济危机，也促成了最后的结局。

该地区国家通常的行为方式是与现实主义模式相吻合的——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追求权力和安全——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如同个人行为体一样，也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斗争。

与此同时，宗教、族群性、经济落后以及人口压力等问题，使得中东政治动荡不定。中东地区独裁政府的权威面临着内部的挑战，很多这样的挑战可能发展成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那样的内战。我们今后还会看到中东发生冲突。

注　释

1. Irving Howe and Michael Walzer, "Were We Wrong about Vietnam?"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18, 1979, p. 18.

2. Quoted in Robert R. Bowie, *Suez 1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24.

3. Ernest Renan, quoted in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95), p. 137.

精选阅读材料

1. Khong, Yuen F., "The Lessons of Korea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in George Breslauer and Philip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 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02—349.

2. Coulon, Jocelyn, *Soldiers of Diplomacy: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3. Zelikow, Philip D., and Robert B. Zoellick, *America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 Memos to a President* (Queenstown, MD: Aspen Institute, 1998).

4.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The Middle East*, 8th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4).

其他阅读材料

1. Ajami, Fouad, "The Summer of Arab Discontent", *Foreign Affairs*, 69:1 (Winter 1990/1991), pp. 1—20.

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3. Bowie, Robert R., *Suez 1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 Chayes, Abram,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Deutsch, Karl W., *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Knopf, 1959).

6. Cause, F. Gregory, "Sovereignty, Statecraft, and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5:2 (Winter 1992), pp. 441—469.

7.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8. Goodrich, Leland M., Edward Hambro and Anne Patricia Sim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Comme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9. Gordon, Michael, and Bernard Trainor, *The Generals'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nflict in the Gulf*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10. Hass, Ernest, "Nationalism: An instrumental Social Construction", *Millennium*: 22:3 (Winter, 1993), pp. 505—545.

11. Hehir, J. Bryan, "World of Faultlines: Sovereignty, Self-Determination, Intervention", *Commonwealth*, 119:16 (September 25, 1992), pp. 8—10.

12. Henkin, Louis,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 Jacobson, Harold K., *Networks of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 1979).

14. Kohn, Hans,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55).

15. Moynihan, Daniel P., *On the Law of N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Nye, Joseph S., and Roger K. Smith, eds., *After the Storm: Lessons of the Gulf War* (Queenstown, MD: Madison Books and Aspen Strategy Group, 1992).

17. Podhoretz, Norman, *Why We Were in Vietna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2).

18. Quandt, William B., ed., *The Middle East: Ten Years After Camp Davi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19. Safran, Nadav, *From War to War: A Study of the Arab-Israeli Con-*

frontation 1948—1967 (New York: Pegasus, 1969).

20. Sifry, Micah L., and Christopher *Cerf*, *The Gulf War Reader: History, Documents, Opinions*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1).

21. Vincent, R. J.,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22. Walzer, Michael, *Just and Unjust War: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1977).

思考题

1. 干涉在什么时候是正当的？自决总是正当的吗？

2. 国际法同国际道义有区别吗？国际法的重要性何在？

3. 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的区别是什么？

4.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对于目前以色列所拥有的那块领土所持的看法是什么？在你看来，哪一方的看法更有道理，或者双方的观点都很合理？

5. 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是什么？为什么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6. 1956、1967、1973 和 1982 年中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是这样，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还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战争吗？

7. 1967 年的战争确定了当今阿以争端的格局。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件？著名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的内容是什么？

8. 萨达特声称他必须在 1973 年发动战争，然后才可以与以色列媾和。试分析他的这一观点。如何比较纳赛尔在 1956 年所取得的成果和萨达特在 1973 年所获得的成就？

9. 联合国在中东地区的维和行动是成功的吗？它们有哪些局限性？

10. 大国和联合国将如何处理未来的地区冲突？

11.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如何帮助你理解中东地区的冲突？

阿以冲突大事年表

1897	赫泽尔(Herzl)的《犹太人的国家》出版；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

1915	麦克马洪-谢里夫·侯赛因协议导致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土耳其人,换取英国人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1916	有关在中东建立英法势力范围的赛克斯-皮科特秘密协议
1917	《贝尔福宣言》表明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英国政府十分清楚,不得有任何行动使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群体的公民权益和宗教权力受到损害"。
1922	英国从国际联盟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权
1936	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联合所有的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主张
193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动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三: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英国管理的地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通过一项计划,泛阿拉伯会议反对这项计划
1938	英国政府的白皮书表示要在 10 年之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
1945	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和也门建立阿拉伯联盟
1947	英国政府把巴勒斯坦争端移交联合国;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由联合国托管;犹太人接受联合国分治计划,但是阿拉伯人反对
1948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战乱;英国的托管权力终结;戴维·本-古里安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以色列国;美国和苏联承认以色列国
1948—1949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盟的战争
1949	以色列加入联合国
1952	埃及的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起义
1955	苏联和埃及达成军火交易协议;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成员包括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956	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色列军队入侵西奈;英国和法国对埃及进行轰炸并向苏伊士运河区投放伞兵

1957	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获得国会的授权，在发生共产党人入侵中东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出兵干涉
1958	伊拉克反对君王统治的起义；黎巴嫩和约旦危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
1964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1967	“六天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加沙地带、西岸和戈兰高地；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通过谈判确定永久性边界，实现中东和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只被视为“难民”问题
1969	消耗战争
1970	约旦“黑色的9月”：约旦军队把巴勒斯坦人的指挥机关逐出约旦；纳赛尔去世；安瓦尔·萨达特就任埃及总统
1973	1973年十月/斋月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
1973—1974	阿拉伯石油禁运
1974	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达成军队脱离接触协议
1975	以色列和埃及达成《西奈协定》，决定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
1977	埃及总统萨达特成为第一位承认以色列和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发表讲演的阿拉伯领导人
1978	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在戴维营举行首脑会晤
1979	伊朗革命的高潮：伊朗国王被迫流亡，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伊朗新的领导人回到德黑兰；埃以和约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伊朗人占领美国大使馆，美国使馆人员成为人质；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	卡特主义：美国将使用武力抵制苏联在波斯湾的侵略行动；伊拉克军队侵入伊朗领土；伊朗—伊拉克战争开始；伊拉克入侵伊朗
1981	萨达特在开罗被刺
1982	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
1983	多国维和部队到达贝鲁特；对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动攻击

1987	加沙地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起义
1988	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约旦放弃对西岸的主权要求;巴解宣布在西岸和加沙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990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拉克的决议
1991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逐出科威特
1991—1992	阿以在马德里和华盛顿特区举行和谈
1993	以色列和巴解的奥斯陆会谈和《原则宣言》
1994	约旦-以色列和约在华盛顿特区签署;巴解和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人管理加沙和杰里科的协议
1995	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
1996	以色列城市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使得拉宾在工党的继承人佩雷斯的支持率下降,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
1997	以色列把西岸城市希伯伦的 80%归还给巴勒斯坦人
1998	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巴解签署《瓦伊河协定》,以色列再把 13%的西岸土地归还巴勒斯坦人;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议会发表讲演
1999	约旦国王侯赛因去世;工党领袖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

中东的油井

第七章　相互依存、全球化和信息时代

一些观察家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化——对世界上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之敏感性——正随着通讯和交通费用的下降及其导致的距离制约力的减少而日益增强。新的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改变对政府和国家作用的认识，也促使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大。今天，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工业产值是由跨国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有关在什么地方从事生产活动的决定，会对一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经济学家丹

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上群体发生两极分化,一边是那些拥有技能和适应全球市场发展的群体",另一边则是缺少这种能力的群体,比如"工人、领养老金者以及环境保护论者,政府则被夹在这两者的中间"[1]。一些理论家用"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取代"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以此来分析国家之间新的竞争形式,经济制裁和禁运正在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考虑这些变化。在和平时代,安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所有的市场都是在一个政治框架中运行的,全球市场依赖于国际权力结构。安全就如同氧气,人们在失去它之前,很容易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同样地,经济制裁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工具,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使用武力,然而其效果则是很复杂的。多边制裁措施是20世纪90年代促使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和塞尔维亚政府承受极大压力的一个因素,但是它并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也没有让一个民选的总统在海地这样一个穷国恢复权力。不仅如此,早在19世纪的时候,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就已经发展得十分迅速,那时的国家奉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政策。事实上,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才使得这一长期的发展趋势受到了阻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然而,只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才使得经济冲突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自由主义者有时认为,相互依存意味着和平与合作,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冲突也是不断发生的。由于同盟变得更为复杂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力被加以使用,冲突常常就好像同时在几个棋盘中下棋。21世纪的冲突不仅需要大炮,也要用黄油。中国的毛泽东

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认识到,油桶子里面也出权力。某些现实主义者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反应有点过头,他们把这场危机比作1914年和1939年所发生的事件。现实主义思想巨匠汉斯·摩根索声称,1973年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把军事权力同以原料为基础的经济权力分割开了。

"劳工的真正敌人正无情地走来"

……工会正在加紧与全球化作斗争。在加利福尼亚,美国最大的服装行业工会组织抗议格斯公司(Guess)决定将牛仔服装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在韩国,工人们举行罢工,指责外国要求韩国开放市场和停止对产业提供补贴的压力威胁了他们的就业安全。两个月以前在丹麦,50万工人在雇主未能答应6周假期的要求之后举行罢工,雇主们则声称,由于外国的竞争,不能提供6周的假期。工会领袖们知道,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他们表示自己的目标在于把全球化改变成一种危害较轻的力量。

——1998年8月8日《纽约时报》[2]

1973年的个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允许大量的美元流向弱国,而不使用武力呢?这样一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18世纪。如果它发生在19世纪,那么富国就会使用其占优势地位的军事权力,把制造麻烦的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且根据自己的意愿解决问题。到1973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它既不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一个权力建立在原料和卡特尔基础之上的新时代,也不意味着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已经完全分离。相反,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复合式的关系之中。为了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我们必须思考相互依存怎样才能成为权力

的源泉这个问题。

相互依存的概念

“相互依存”同其他诸如“民族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词汇一样，是一个含义不清的词，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使用政治词汇的动机不一样。政治家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模糊语言，并且极力造成一种体现大家共同利益的印象：“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大家必须相互合作，都要听我的。”在另一方面，分析家则关注相互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他们强调，好与坏的问题有程度大小之分。分析家可能指出，我们所乘坐的那条船可能只是朝着一个人的目的地行驶，或者说一个人划船，另一个人掌舵或免费搭乘。换句话说，相互依存这个词既可以用于意识形态目的，也可以用于分析的目的，我们应该注意这种用法上的不同。作为一个政治动词，相互依存可以表述为“我依赖；你依赖；我们依赖；他们统治”。

作为一个分析的词汇，“相互依存”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简单地说，它指的就是互相依赖。这样一个情势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的区别，只有程度大小之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婚姻誓约就表述了相互依存的思想，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互相依赖，“同甘苦、共患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意味着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在18世纪的时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指出，摩擦和冲突同相互依存相伴相随。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孤立和分离。然而这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些试图与外界隔绝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和缅甸，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今天，一个国家很

难与外界相隔绝。

相互依存的根源

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存的情势加以分析:根源、收益、相对成本以及对称性。相互依存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中),也可以产生于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或者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存经常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互相依赖情势中选择程度的大小。

军事相互依存就是产生于军事竞争中的互相依赖状况。这里有武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而变得十分明显。然而,相互依存还包含认知上的重要内容,认知或者政策上的变化可以减轻军事相互依存的程度。美国人一点都不担心英国或者法国的核武器,因为他们不认为英法的核武器会被用来攻击美国。同样地,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西方人开始睡得更安稳一些。这并不是苏联武器数量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对苏联的敌意或者动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尽管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前苏联数千枚核弹头的安全保卫措施比较差,它们有可能落入恐怖主义者或者如同伊拉克这样的问题国家的手中,但美国公众对苏联核武库的担忧随着苏联的最后解体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总的来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类似于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同样属于传统国际政治的内容,而且具有社会的(尤其是认知上的)根源。经济相互依存涉及有关价值和成本的政策选择问题。比如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十分担心全球粮食供应满足不了世界人口的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抢购美国的粮食,导致

美国超级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由于印度洋雨季不能如期到来，以及苏联粮食歉收，美国消费者买一个面包就要比原来花更多的钱。1973年，美国为了阻止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决定停止向日本出口大豆。其结果是，日本投资于巴西的大豆生产。当几年之后供需比较平衡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主对禁运的做法十分后悔，因为日本人从巴西进口价格更为低廉的大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社会选择和物质短缺会影响经济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在作出短期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相互依存的收益

相互依存的收益有时被分为"零和"(zero sum)与"非零和"(nonzero sum)两种类型。在零和的情势中，你的所失就是我的所得，反之亦然。在正和(positive sum)的情势中，大家都获益；在负和(negative sum)的情势中，大家都受损。分馅饼属于零和情势，做一块更大的馅饼属于正和情势，而把馅饼扔到地上则属于负和情势。既有零和的相互依存，也有非零和的相互依存。

生态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一位来自加勒比国家的官员指出："最近1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一个问题上拥有了发言权。它们在债务谈判中没有发言权。但是，它们是环境的一部分，现在拥有发言权了。而且，它们正在运用这个权力。这就是它们的谈判策略。"

他指出，穷国看到自己拥有发言权，因为北方国家是首要的污染源，它们要求穷国减少气体排放、停止砍伐森林和改变其他做法。然而，穷国宣称，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它们需要资金和技术。

——1992年3月17日《纽约时报》[3]

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存,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过得好。这样的分析家没有注意到利益的不均等以及相对收益分配所导致的冲突,因而忽视了相互依存的政治层面。双方的确都能从贸易中获利,但是以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电脑和电视机贸易为例,该贸易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呢? 即使日本和韩国双方都获益了,还有一个问题,即谁获益更多一些呢,到底是日本,还是韩国? 利益分配——每一方从双赢局面中获益多少——是一种零和的情势,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其结果是,在经济相互依存情势中总是存在着一些政治冲突。即便有一块更大的馅饼,人们也会为争得最大的一块而进行争斗。即使处于相互依存状态的国家可以共同获益,它们也可能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发生争斗。

一些自由主义分析家错误地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他们的理由是,相互依存导致共同获益,共同获益又鼓励相互合作。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经济相互依存也可能被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比如利用贸易制裁来对付塞尔维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相互依存的确比武力更好使用,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种等级,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较少关心从相互依存中获得绝对收益,较多关心对手是否获得更多的收益并对自己构成危害。

甚至生态相互依存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武器使用,比如1991年伊拉克放火烧科威特的油田和把原油倒入波斯湾。国家之间也会因为全球生态问题而发生冲突。比方说,在全球气候变暖后,谁获益,谁受害呢? 如果地球气温平均上升2摄氏度,马尔代夫群岛将为海水所淹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非洲居民,也会由于沙漠向南扩展而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西伯利亚和加拿大某些地方的居民会因此受益。如果是这样,那么西伯利

亚人和加拿大人是否会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做出努力呢?

一些分析家确信,传统的世界政治总是属于零和的范畴。但是这样的解释会使人误入歧途。传统的国际政治可以是正和的,这取决于行为体的动机。例如,俾斯麦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结果同他们不掌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方极力扩张势力,正如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那么肯定会出现零和的政治局面——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但是,如果所有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反过来说,新的经济相互依存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

在相互依存政治中,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之间的界限不甚清楚。比如,前面提到的大豆问题既涉及控制通货膨胀的国内问题,又涉及美国同日本、巴西的关系问题。另外,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不需要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再看另外一个例子。1979 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石油产量缩减,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开车限速每小时 55 英里,并且关闭恒温器,以此降低能源消耗。这到底属于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呢? 如果煤被输出到国外,那么美国政府就应该因此禁止采煤吗? 进口美国煤的人是否要承担西弗吉尼亚因为开采煤矿而付出的额外成本? 相互依存使得国内问题和对外事务交织在一起,以致产生比过去更为错综复杂的联盟和冲突模式,以及不同方式的利益分配。

相互依存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影响国内政治。在 1890 年的时候,法国政治家关心相对受益,采取了阻碍德国发展的政策。今天,采取促使德国经济增长放慢的政策对法国没有任何好处。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意味着,法国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取决于德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如今这两个国家共同

拥有一种相同的货币，德国经济状况良好符合法国自身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国经济状况良好也符合德国自身的利益。古典的均势理论预言，一个国家为了阻止另外一个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一定会采取行动挫败对手。这种观点与当今的法德关系是不相吻合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势中，国家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关心相对收益。

相互依存的成本

相互依存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比如，在 1987 年，由于外国人对美国的利率以及债券和股票价格的走向产生疑虑，美国股市突然间崩溃了。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市场对外国资金的撤出极其敏感。在 1998 年，亚洲新兴市场的弊病，蔓延到了距离遥远的俄罗斯和巴西，并对这两个国家的新兴市场造成了损害。

然而，极度敏感并不等于极度脆弱。脆弱性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的是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说两个国家不太脆弱并不等于说它们不太敏感，而是说情势的改变给它们造成的损害较小。在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中，美国依赖进口的能源大约只占其所需能源总量的 16%。美国对于 1973 年阿拉伯世界石油禁运所导致的油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它不像日本那么脆弱。1998 年，美国对东亚经济形势十分敏感，但是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那里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但是当时美国经济形势很好，美国承受得了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然而，印度尼西亚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变化，不仅敏感，而

且脆弱。印尼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并且导致国内政治冲突。

脆弱性有程度大小的问题。1979 年伊朗国王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伊朗的石油生产一度中断,当时正值石油需求大、市场供应紧张。伊朗中断石油生产使得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量减少了5%。市场对此极其敏感,供给短缺很快引起石油价格上涨。但是,美国人只需要关闭汽车恒温器和限速每小时 55 英里,就可以节省 5%的能源消耗量。美国可以通过使用这样简单的办法来避免受到损害,这就表明,虽然美国很敏感,但是它并不脆弱。

然而,脆弱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依赖程度,它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迅速地应对变革。例如,美国就不如日本那样善于应对石油市场的变化。而且,市场中的个人、大公司以及投机家,可能通过观察市场形势,决定囤积居奇,因为他们认为供给短缺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他们的行为会使商品供应更短缺、市场需求更大,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所以,脆弱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相互依存的敏感性

……自从去年 5 月份以来,日本银行第四次面临着提高利率的压力,以阻止日元汇率的跌落。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地价飞涨和国家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人们也开始担心发生通货膨胀。

上周东京提高短期利率,是因为几个星期以前,美国金融市场利率上扬、股票下跌。

奥村(Okumura)先生指出,“东京市场促使新干线(Shinkansen)赶上美洲铁路(Amtrak)。东京刚刚跟上几个星期前纽约发生的事态,现在大家又在注意德国的形势了。”这里所说的“新干线”是日本著名的子弹头列车,“美洲铁路”是美国著名的铁路运输公司。

——1990 年 2 月 26 日《纽约时报》[4]

脆弱性也取决于原料是否有替代品以及其供应渠道是否多样化。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1970年警告说,美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越来越大,因而美国的脆弱性将日益严重。在13种基本的工业原料中,美国将近90%的铝、铬、锰和镍依赖进口。他预言,到1985年的时候,美国有10种基本的工业原料需要依赖进口。[5]他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脆弱程度和较不发达的原料生产国的影响都会大大增加,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世界原料价格下跌,而不是上涨。布朗的预言存在什么问题呢?布朗在判断脆弱程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原料的替代来源和供应地的多样化可以防止原料生产商人为地哄抬价格。不仅如此,技术也在进步。昨天的垃圾可能变成新的资源。如今,有的公司在利用废弃的矿渣,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使从几年前废弃的矿渣中提炼出铜成为可能。今天铜用量的减少,是由于使用了以硅制成的纤维光缆,而硅则主要来源于沙子。所以,有关美国将因为原料短缺而变得脆弱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技术的发展和替代产品。

一些分析家声称,当今发达的经济体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因为计算机、通讯和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这样的经济体有时被称为"轻量级"的经济体,因为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的价值远远大于原料的价值。这种变革会进一步降低原料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是石油,它依然在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是在交通运输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波斯湾极具战略意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藏就在这个地区。

相互依存的对称性

对称性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或者不平衡

的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存,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在国际政治中,谁能够左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一些分析家认为,相互依存只产生于对等依赖的情势之中。这种看法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最有意思的国际政治行为。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只有一方依赖另外一方的那种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见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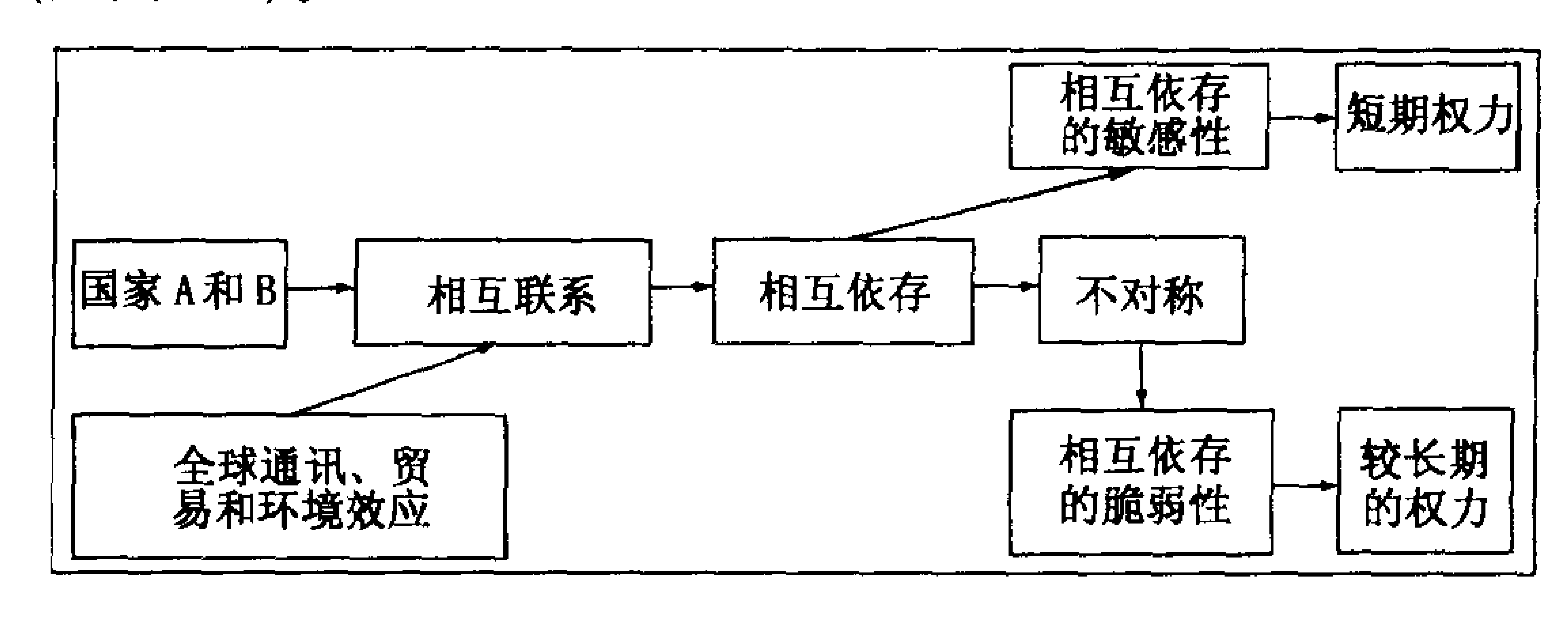


图 7.1　互相依存的不对称性

不对称性经常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实施减税和增加开支之后,依赖引进日本的资金,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一些人声称,这使得日本对美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美国以及日本自身都会受到损害。此外,如果日本停止向美国提供借贷,从而损害美国经济,那么那些在美国拥有极大利益的日本投资家也会因此遭受损失。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及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多一点,也就是说,虽然两国都需要对方以及都能从相互依存中获益,但是日本比美国更需要向对方出口。

不仅如此,安全问题通常与美日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的政策,不发展大

规模的军事力量，也不研制核武器。它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以便在东亚地区平衡苏联和中国的力量。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时候，日本人开始作出让步，以避免两国的安全关系受到损害。

如果不同问题领域的相互依存状况是不对称的，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极力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或者把它们分开。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独的纸牌游戏，所有的纸牌游戏同时进行，一个国家可能在一个牌桌上拥有最多的筹码，另一个国家可能在另一个牌桌上也拥有最多的筹码。一个国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或者要求各个牌桌的游戏单独进行，或者在所有的纸牌桌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因此，很多国际冲突都是围绕着建立联系或者反对联系而进行的。国家希望在自己占优势的领域左右相互依存情势，而避免在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领域为他人所操纵。经济制裁经常就是这种联系的例子。比如在1996年，美国威胁要对在伊朗投资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措施，但在欧洲国家提出要把它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之后，美国就退让了。

国际制度通过设定议程和确定问题领域，经常制定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交易规则。国家极力利用国际制度来制定规则，影响牌桌之间筹码的转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把较穷国家占据相对有利地位的一些冲突同强国所主导的军事问题分开，使较为弱小的游戏者获益。但是，存在着某些十分强大的游戏者推翻一张或者更多牌桌的危险。有关货币、航行、污染和贸易的制度都是独立的，如果军事上十分强大的游戏者遭受太大的打击，那么就存在他们可能推翻其他牌桌的危险。然而，尽管美国和西欧在1973年的石油牌桌上受到打击，但它们并没有使用自己占优势的军事力量来推翻石油牌桌，这是因为一个复杂的联系之网阻止它们这么做。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

种情况。

最大的国家不一定总能在争夺经济相互依存控制权的斗争中占上风。如果一个较小或较弱的国家更关注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占得先机。例如,与美国的贸易大约占加拿大对外贸易的3/4,而与加拿大的贸易大约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1/4,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大于美国对加拿大的依赖。然而,加拿大在同美国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中占得上风,这是因为加拿大威胁采取关税和限制性报复措施,对美国产生了威慑作用。如果加拿大的行动导致美加之间发生一场全面的争端,那么加拿大将比美国受到更大的损害。但是加拿大人认为,偶尔冒险实施报复性措施比接受那些会使自己总是处于下风的规则要好一些。通过操纵经济相互依存来威慑对手,有点类似核威慑,因为二者都依靠能对对方造成有效损害并使对方相信自己意图的真实性的能力。小国往往能够利用较强烈的态度和较高的信用,克服自己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情势中的相对脆性地位。

相互依存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是贸易条约的增多。在这些条约中,有关欧盟的协定是最为复杂的,它要求成员国不仅放弃某些经济主权,而且放弃某些政治主权。1994年初,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该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把两国的经济同规模更大的美国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它们的产品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增强它们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能力。对美国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出口领域,而且使得美国公司更容易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从事经营活动。

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条约可能会增强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减轻相互依存关系的不对称性。美国通过把自己的经济与墨西哥的经济连成一体,为墨西哥承担了某些经济义务,也使得

美国更容易进入墨西哥的市场。1994 年,墨西哥比索汇率大幅度下跌,克林顿政府在 1995 年初向墨西哥紧急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日益贬值的墨西哥货币。当时,美国国会正陷于有关增加国内服务支出(如医疗保险)问题的僵局之中,美国行政当局认为美国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必须出面挽救比索。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强,即便强大的国家也会发现自己对境外经济事态的发展十分敏感。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像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脆弱,它主要是通过多边制度加以应对。尽管如此,由于担心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崩溃所产生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信心,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不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世界经济中的领导者

大致说来,国际经济的规则是由那些最大的国家制定的。在 19 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货币流通领域,英格兰银行遵循金本位制度,给世界货币流通确定了一个稳定的框架。直到 1932 年,英国也一直确保了海上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并且为世界贸易提供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实力由于同德国的战争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它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远离国际事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行为体,似乎还想免费搭便车,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出现,便是由于不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不愿意充当领导者而引起的。英国力量太弱,无力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家们吸取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训,建立起一些制度(institutions),旨在维持一个开放

的国际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贷款,贷款对象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其目的在于帮助它们实现收支平衡或者偿还债务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时候一般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比如减少预算赤字和价格补贴。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有时会引起争议,并且不总是很有成效,但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帮助俄罗斯克服经济困难以及在90年代末帮助亚洲国家渡过金融危机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为较穷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贷款。(还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地区发展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制定自由贸易规则,也是一系列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的场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20多个最发达国家协调经济政策的论坛。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7个最大经济体(它们占世界产值的2/3)的领导人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晤(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讨论世界经济形势。这些制度是对各国政策的补充,促进了跨国民间交往的迅速发展,其结果是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快速提高。在1945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到9%之间,高于世界生产的年增长率。国际贸易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50年为4%,1990年上升到13%。国际投资年均增长率接近10%,那些具有全球战略的大型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管理跨国贸易,还面临着一些问题。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成了一个纯债务国,因为它拒绝在国内增加税收以实现收支平衡,而是从国外借贷。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重演,美国将步英国的后尘而走向衰落。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

没有衰落和变得内向。1999年,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意设立了单一欧洲货币单位,即欧元,它可能作为一种储备货币,来挑战美元的地位。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生长迅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世界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愿意采取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政策。总之,今天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要比过去复杂得多。将会有更多的领域、国家、问题和个人被纳入复合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那种把世界政治仅仅描述为几个大国如同坚硬的台球在均势体系中相互碰撞的看法,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现实主义与复合式相互依存

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推翻掉,那么应该如何描述这个世界呢?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是:国家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武力(force)是支配性的手段;安全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如果推翻这三个假设,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幅很不一样的世界政治图景:(1)国家不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也是重要的角色;(2)武力不是惟一重要的手段——经济控制和利用国际制度也是支配性的手段;(3)安全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福利(welfare)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反现实主义的世界称为"复合式的相互依存"。有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复合式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理想的模式",它是一个人们想象出来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现实主义观点也不能与现实世界完全吻合。复合式相互依存是一个思维试验,它让我们想象出一个不同类型的世界政治。

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都是简化的模式或者理想的模

式，真实的世界介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之间的标线中所处的位置。中东国家间的关系靠近现实主义这一端。当今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或者法国和德国的关系靠近复合式相互依存那一端。国家间关系在标线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着政治关系的特点和权力斗争的形式。实际上，国家可以改变自己在标线中的位置。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这一端，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关系移到了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之间的中心位置（见图7.2）。

现实主义 ←	以色列/叙利亚 印度/巴基斯坦	美国/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 法国/德国	→ 复合式相互依存

图 7.2　从现实主义到复合式相互依存的变化图谱

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同美日关系一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对中国的出口额。其结果是，美国有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贸易赤字。虽然美中双边贸易是不对称的、对中国有利的，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不会使美国处于很脆弱的地位，因为美国可以从其他地方采购中国的产品，从而对中国造成损失。而且，中国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大市场，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受跨国行为体的制约，难以采取对中国不利的行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东亚均势局势的认识，促使1996年美日安全同盟的强化。

跨国石油政治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们同上述两个理想模式

的基本假设的相符程度也是不尽一样的。石油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一个同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思想相关联的问题。某个特定领域中的相互依存,往往产生于一个由规则(rule)、规范(norm)和制度(institution)组成的框架之中,我们把这个框架称为规制(regime)。国际石油规制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0年的时候,石油规制表现为同主要石油消费国政府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那个时候的石油价格大约为每桶2美元,有时被称为"七姐妹"的7家跨国石油公司决定石油的产量。石油的价格取决于这些大公司的石油产量以及富裕的、进口绝大部分石油的国家的需求量。跨国公司依据富国的情况确定石油产量和价格。传统军事意义上的那些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时常采取干涉行为,以确保该体系顺利运行。例如,1953年,伊朗民族主义者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国王的统治,英国和美国秘密出面干涉,恢复了国王的统治。石油规制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国际石油规则在1973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石油生产国决定石油产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不再单独由富国市场决定。权力和财富发生了从富裕国到较穷国家的大转移。如何解释这一重大变革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产油国联合起来并且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问题,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0年,而大变革则是发生在1973年以后。尽管在1973年以前也存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但石油价格依然很低。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我们可以从三个思路来解释国际石油规制的变革:总体的均势,石油问题上的均势,以及国际制度。

现实主义者主要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来分析均势的变化,他

们在分析世界石油产地海湾地区局势的时候尤其如此。两种变革影响了该地区的均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殖民化。在1960年的时候,一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属于欧洲的殖民地,到了1973年的时候,它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国家了。伴随民族主义兴起而来的是军事干涉成本的提高。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和非殖民化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较高的代价。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干涉伊朗的代价并不高,但是如果美国在1979年试图维护伊朗国王政权,那么它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富裕国家之所以没有在1973年采取干涉行动,把产油国变成殖民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们认识到,对已经实现民族觉醒目标的国家使用武力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美国和英国权力的变化也影响了波斯湾的均势。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创立初期,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波斯湾的警察。但是到1971年,英国的经济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且英国政府也在努力减少英国在国际上的防务义务。1971年,英国放弃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让人想到1947年的情景,当时英国无力维持其在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大国地位。那时美国接替英国,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并且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但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却无力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作用。美国当时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不愿意再在波斯湾地区扮演主要的军事角色。其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制定了一个大力依靠地区强国的战略。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就是伊朗。他们想通过扶持伊朗成为地区霸权国家,以较少的代价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警察作用。因此,现实主义者会用整个权力结构的上述变化,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均势的变化,来解释石油规制的变革。

第二种解释石油规制发生变革的思路是现实主义的一个

变种，它只关注石油问题领域内的权力分布，而不考虑整个军事结构。显然，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1年达到最高值。此后，美国的石油进口开始增长，美国不再拥有多余的石油。在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但是它们的行为很容易地就被挫败了，因为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石油来供应欧洲，以防止阿拉伯国家切断石油供应。随着1971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值和美国开始进口石油，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这些国家手中。美国不再拥有在最后关头向他国供应石油、抵消石油禁运的能力。

第三个解释1973年以后石油规制变革的思路，主要不是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是根据国际制度、特别是跨国公司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作用的变化，来分析问题的。"七姐妹"在这个时期逐渐丧失了权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消失。当一个跨国公司去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时候，它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与所在国达成一项协议，使得本公司从双赢的项目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从穷国的角度来看，让跨国公司开发资源，可以使本国获益。即使穷国获得20%的收益、跨国公司获得80%的收益，穷国也比过去所得到的要多一些。所以在较早的时期，跨国公司由于垄断资本、技术和左右国际市场，它们可以同穷国达成协议，使得自己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跨国公司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过程中(而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无意识地把资源转移到了穷国。它们训练了当地人。沙特人、科威特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学会了怎样经营油田、管理泵站以及修建船坞。当地人也获得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技能。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问题

另外一个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发挥价格制定者作用的重要事态，就是新闻和远程通讯手段的发展——无数个快速的、智能化的市场监控设备，让银行家、石油贸易商和商品市场投机家随时了解石油的价格。它们也发布一些可以影响石油价格的新闻。

这种事态的发展，促使石油期货交易迅速增长，石油市场中产生了无数个新的投资家，他们的作用只限于进行“纸上油桶”(paper barrels)交易，就石油的价格变化下赌注。

1987年，光是纽约商品交易市场上这类交易的数额每天就达到4000万桶。当年全世界每天的石油消费量为4900万桶。

这意味着，投机家影响石油价格的能力，正逼近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和其他石油生产国所拥有的影响力之和。

……然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场游戏中始终是个伤心的失败者。当石油价格下跌幅度太大的时候，石油输出国组织必须倡议召开会议或者限制产量，以维持自己作为石油价格维护者的形象，但实际上它已不再拥有扮演此种角色的能力。

这个组织长期以来不能实现自己所规定的关于产量上限的目标，因此使自己受到损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一直不遵守该组织的规定，或者使自己的石油生产超过产量配额，或者低价抛售石油以增加销售量，或者同时采取这两种行为。

——1988年4月9日《国际先驱论坛报》[6]

最终结果是，穷国要求分得更多的权益。跨国公司不能再以从当地国撤出投资作为威胁的手段，因为现在穷国也可以用自己独立经营的主张来威胁跨国公司。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跨国公司与穷国讨价还价的权力，特别是在原材料行业，就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丧失”。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跨国公司无意识地把技术和技能交给了穷国，帮助它们获得了自主经营石油生产的能力。

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新的跨国公司进入石油市场，成为“七姐妹”的“小弟妹”。这些新的跨国公司虽然比不上“七姐妹”，但依然是很庞大的，它们开始同产油国做交易。这样一来，产油国为了摆脱“七姐妹”的控制，可能与较小的、独立的跨国公司达成协议。这也削弱了那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

从制度上看，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卡特尔，其作用有了一些提高。在石油行业中，卡特尔的典型作用就是限制石油供应量，但过去的卡特尔是七姐妹的私下安排。卡特尔通常有一个问题，即当市场疲软和价格跌落的时候，其成员往往不遵守市场配额的规定。卡特尔在石油短缺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但在石油供大于求的时候，大家都想出售自己的石油，并且倾向于降低价格，以争得较大的市场份额。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的力量就逐渐迫使卡特尔失去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产油国家政府间的卡特尔，而不是私营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创建初期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那时石油过剩。只要存在着石油过剩的局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就有采取欺骗行为以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的动机。从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成员国遵守有关价格的规定。但是在出现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生产国讨价还价权力的作用就上升了。

1973年的中东战争给石油输出国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它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作用了。在1973年的战争中，阿拉伯国家

出于政治原因削减了石油供应，但是这也造成了一种情势，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是美国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局势的工具。但是，伊朗国王宣布把本国的石油价格提高4倍，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也跟着这么做。从长远角度来看，由于市场的力量，石油输出国组织无法让石油价格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但油价持续居高不下，则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不无关系。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制度性因素是石油公司在危机中所起的"减轻伤痛"的作用。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危机期间的某个时候曾经说过，美国如果面临"窒息"的危险，那么就可能使用武力。阿拉伯石油禁运使得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了15%，美国的石油进口减少了25%。然而，石油公司确保每个国家承受相同的损失。它们对世界石油贸易作了新的调配。由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减少了25%，所以石油公司向美国供应了更多的来自委内瑞拉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它们减轻了伤痛，使得所有富裕国家都减少7%到9%的石油进口量，这个比重远远低于"窒息"点。它们的行为有助于防止经济冲突演变成军事冲突。

石油公司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肯定不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它们为此希望局势稳定，获得市场准入。跨国公司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势，即如果它们拒绝向某个国家出售石油，那么它们就可能被该国收归国有。比如，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要求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只向英国出售石油，不得向其他国家提供石油。但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首脑回答说，如果他服从这个命令，那么他的公司将会被其他国家宣布国有化，从而断送英国石油公司的性命。英国首相最后还是作了让步。从根本上说，石油公司是长期的、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它们极力稳定市场，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受到严

重的打击。跨国公司通过降低“窒息”的危险，减少了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简言之，石油是介于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这两种理想模式之间的一个问题。总体的均势、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以及石油问题领域内的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解释从 1960 年的石油规制到 1973 年以后的石油规制的变革。

作为权力源泉的石油

石油武器在 1973 年这个转折关头到底有多重要呢？阿拉伯国家通过减少产量和对以色列的友好国家禁运石油，使得美国关注它们的问题。它们也导致日本、欧洲和美国所组成的阵营一度陷于混乱。法国和日本为了保证自己的石油供应，采取了独立的立场。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促使美国在 1973 年斋月战争之后，在解决阿以争端问题上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在另一方面，石油武器并没有促使美国根本改变其在中东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美国人没有突然抛弃其盟友以色列、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石油是一个能产生影响的权力源泉，但是它没有强大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程度。

为什么石油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其部分原因在于相互依存的相互性。沙特是个重要的产油国，它在美国的投资额很大。如果沙特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那么沙特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遭到伤害。此外，沙特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惟一一个有能力确保波斯湾地区的均势稳定的国家，沙特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使用石油武器时不敢走得太远。

那么武力作为一种权力的源泉，在 1973 年石油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武力没有被公开使用。由于没有出现“窒息”

的局面，所以没有发生军事干涉行动。而且，美国所提供的长期的安全保障使得沙特人获益。因此，武力在幕后起了作用。安全相互依存和石油相互依存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联系。公开使用武力的代价太高，但是武力作为一种权力的源泉在幕后起了作用。

这些复杂的因素依然存在。石油依然在原材料中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并且促使美国继续在波斯湾保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是石油的价格还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全球市场的力量，跨国公司在中美洲以及其他地区开采石油、增加石油供应量的行为。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石油价格回落到 1973 年危机前的低水平。然而，如果发生破坏波斯湾石油供应的冲突事件，那么石油价格可能迅速上涨。有关石油的戏剧还没有落幕。

跨国行为体

经济问题和经济冲突的一个特征在于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的作用，跨国行为体指的是那些其行为跨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体。我们经常使用诸如“德国想得到阿尔萨斯”或者“法国害怕英国”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这种简单化的表达方式是很有用的，这在国际政治的古典时期尤其如此。在 18 世纪，君主就代表国家。如果弗雷德里克大帝想为普鲁士获取什么，那么弗雷德里克就等同于普鲁士。在 19 世纪，较为庞大的精英阶层控制了对外政策的决策，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外交基本上还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内阁外交。除此之外，在国际政治古典时期，被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领域是比较狭窄的。军事安全问题在议事日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它们主要是

由外交部处理的。

1982 年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海军合作

从特混舰队成立后的第一天起,设在马萨诸塞大街上的英国军事使团就向五角大楼要求提供包括导弹和航空燃料在内的各种东西。设在诺思伍德的英国舰队司令部的人员也直接给他们在美国海军部的朋友打了很多电话。这些请求的许多内容不为高层官员所知晓。在那些知情者看来,两国的海军有时似乎就是一家人——美国人愿意看到友邦的海军去完成一项很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们知道这一点。

——1984 年 3 月 3 日《经济学家》[7]

鉴于得克萨斯石油产业不景气,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的第一位共和党首脑计划本周去维也纳,敦促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与不是该组织成员国的其他产油国一道,采取限制产量的措施,把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 18 美元以上。

肯特·汉斯(Kent Hance)说道:“这些得克萨斯人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力,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要大。如果我们能把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 18 美元左右的水平,那么这对生产商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1985 年 4 月 25 日《纽约时报》[8]

从质的角度来看,跨国行为体几个世纪来一直起着作用,但是 20 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量变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变革。在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际政治议题更加广泛,而且每个人似乎都想介入。比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内政府机构都扮演某些国际角色。农业部关注国际粮食问题;环境保护署关注酸雨和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海岸警卫队关注海上倾倒垃圾问题;商业部关注贸易问题;财政部关注汇率问题。国务院没有把

所有这些问题都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美国政府的每一个局都有自己的小外交部。事实上,我们看看美国的驻外使团就会发现,国务院的人员在大部分美国驻外使馆中只占少数。

在复合式相互依存情势中,各种社会之间的互动点很多。这就相当于十字路口上车辆太多,或者说一个十字路口只有一位警察是不够的。这些跨越国界的、对外政策机关管辖范围之外的相互关系就是跨国关系。它们包括(但不只限于)人口的迁徙、资本每天在世界股票和资金市场上从一个国家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武器和毒品非法交易以及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政府可以努力对这些行为加以控制,而且它们必须控制恐怖主义或者走私问题,但往往要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苏联对跨国关系加以严密的控制,结果苏联经济受到不利的影响。缅甸对世界市场紧闭门户,使得自己的经济状况恶化。在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高和存在着大量跨国行为体的环境中,那种在古典时期很有用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经常说"日本同意增加进口"或者"美国反对就大陆架提出广泛的要求",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本公司在增加出口,或者一些美国公民正在国际上进行游说,希望对大陆架的定义更为宽泛一些。

这种利益上错综复杂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但它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表现要比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上的表现更加明显。在安全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通常比较一致,全体国民的生存显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存在着较多利益上的分歧。因此,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和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的上升,我们发现,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政治过程了。

让我再用石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曾经说过,在1973年的时候,消费国希望石油价格较低,生产国希望石油价格较高。但是,现实政治要比这复杂得多。消费国里头的生产商希望石油价格较高。那些较小的得克萨斯石油生产商们很高兴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有着相同的利益,而与新英格兰地区寒冬里的消费者们则没有共同的利益。核能的生产商看到石油涨价感得很高兴,因为这可能促使核能成为一种更有竞争力的能源。欧洲日益衰落的煤炭行业的经营者以及失业的煤矿工人看见油价上涨也很高兴。生态保护者认为石油价格上升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减少消费和污染。因此,在消费国内部,人们对于油价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我们如果揭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面纱,那么就会发现,政治是错综复杂的。石油消费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没有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比如动用武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消费国内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行为体认为,导致能源价格高涨的敏感性相互依存是值得欢迎的。那些欢迎石油涨价的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跨国同盟。

当然,国家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19世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是,南方农场主和北方实业家在关税问题上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国家内部存在利益分歧不是现在才有的。国内政治一直对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内政治参与权的扩大,这种影响变得更大了。而且,随着一些国内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沟通与交流的增多,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世界政治模式得以产生了。

图7.3描述了两种形式的世界政治。传统国际政治的外壳就是图表左边的那个图形。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中,国民一般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如果社会1的人想对政府2施加压力,那么他

们就得请求政府1和政府2进行对话。但是在跨国关系中，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政府2施加压力，或者社会1的人可以直接对社会2的人施加压力。右边图形中的附加线代表着跨越国界的个人行为体。当我们谈论相互依存政治的时候，我们不可假设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纳入传统的政府间关系的模式之中。复合式相互依存的一个特征就是，除了国家，其他行为体也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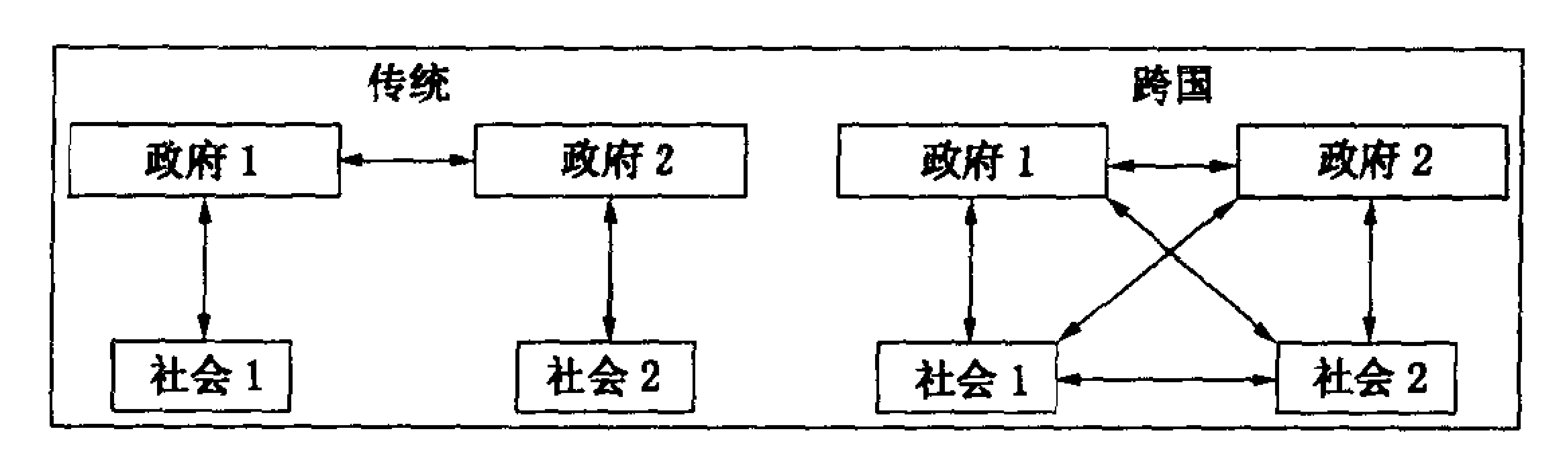


图 7.3　传统世界政治与跨国世界政治

传统的、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并没有错。它依然比较接近现实，甚至比较接近相互依存政治的现实。国家通常是主要的行为体。然而，我们如果只注意国家，那么就可能理解不了相互依存政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能很脆弱，但如果我们再进行深入一点的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国家内部的某些部分十分脆弱，而其他部分则不脆弱。而且这些比较脆弱的部分可能采取跨国性行为，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简言之，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但是它并不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和冲突。

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存

早在400年前，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爵士就写道，信息就是权力。相互依存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当今的相互依存情势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信息革命使得

距离的制约作用基本上不存在了。单单分析跨国间原材料、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已经不够了。网络空间(cyberspace)本身就是一个“场所”(place):它无处不在,但谁也看不见。传统的政治行为集中在地方层面上,政治行为只有在逃离地方管辖范围之后,才能够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问题。然而,当今的信息革命始终是全球性的。

在权力取决于以地域为基础的制度这一点上,新的世界和传统的世界有着重合之处,而且前者依赖于后者。互联网已经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但是,即便互联网用户数量如某些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到 2005 年达到 10 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还是没有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全球化远未达到遍布全世界(universal)的程度。今天,3/4 的世界人口还没有使用电话,拥有调制解调器和电脑的人就更少了。今后我们需要制定管理(govern)网络空间的规则——不仅保护合法用户免受罪犯的侵害,而且保护个人的隐私和知识产权。规则需要权威,权威的形式既可以是公共政府,也可以是个人或者共同体的管理(governance)。古典的政治问题——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管理?谁获益?——既适用于传统的物理空间,也适用于网络空间。

信息革命和国家间的权力

“信息革命”指的是计算机、通讯和软件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费用大大下降。电脑的计算能力每 18 个月增加 1 倍。今天的计算时间不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1%。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量每年增加 1 倍。环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发明于 1990 年,现在已经是当代文化和商业的一部分了。通讯宽带扩展迅速,而且通讯费用持续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用铜制导线传送电话信号,每秒钟可以传输 1 页

纸的信息；今天，一根细细的光导纤维每秒钟可以传输9万册书籍的信息。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19世纪末电的发明所产生的结果表明，当社会正在学习如何利用新技术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会进入一个停滞期。尽管很多产业和公司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但这种调整还远未完成。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

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息传输费用的大幅度降低。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实际的传输费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可传输的信息量基本上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罐头猪肉”垃圾邮件充斥互联网的原因。不仅如此，传输信息的费用和时间同距离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公司可以实施在全球组织经营活动的生产战略。人们花费很少的费用就可以组织起跨国界的非政府行为体。这些行为体不仅在环境和地雷这样的问题上成功地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而且它们还直接影响了国家内部的重要选区和州，因而使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很多这样的组织并不具备官僚等级机构的特征，而是酷似网络系统(network)。权力分散的组织和虚拟的共同体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产生，它们超越领土管辖权并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一些理论家认为，在传统的地方共同体之上，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尽管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格局，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有点类似于1648年以前的相互交叉的共同体和管理形式。

信息革命并不是损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惟一强劲的发展趋势。全球化和市场化两者相互关联，但各有自己独立的根源。从其最近的表现来看，全球化可以追溯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施的战略，它们包括：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

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帮助西欧和日本经济复兴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有关开放市场的国际框架和政治压力的形成，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但是它们也受到交通和通讯技术发展的推动，因为交通技术的发展会使得那些企图摆脱全球市场力量影响的国家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民族国家的前途何在?

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四星上将曾经对我说过，“民族国家已经寿终正寝了”。全球主义不只是一种服务于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正如民族主义据称代表了整个民族，全球主义据称代表了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等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看到，作为第二次浪潮支柱的民族国家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破坏性攻击。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许多穷国正在为确立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奋斗，因为在过去，民族性(nationhood)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正迅速超越工业化阶段的富裕国家，正在减少、取代或者贬损民族的作用。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一场以建立新的全球制度为中心的斗争，这种新的全球制度既要代表前民族(prenational)的人群，又要代表后民族(postnational)的人群。

——阿尔文·托夫勒[9]

市场化也同信息革命有关联，但它在改变国内联盟、应付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促使计划经济失败等方面，有自己独立的根源。英国理论家苏珊·斯特兰奇指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力量对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它使得国家只是众多权威源泉中的一个，而且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没有权威或缺乏管理(ungovernance)的缺口”[10]。她声称，在维持货币币值、选择经济模式、税收、提供基础设施、反衰

退政策以及阻止犯罪等方面,权力已经从政府分散到市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苏联计划经济未能有效地应对信息革命,从而导致苏联政权的垮台和两极体系的终结。

尽管如此,信息革命还没有把世界政治变成一种新型的、纯粹的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政治。其中一个原因是,信息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已经很拥挤了的政治空间中流动。在过去的 400 年中,国家建立起了一个政治结构,跨越国界的信息流动和其他交流就是在这个结构中进行的。

信息作用的上升,对传统的从资源的角度界定国家权力的做法产生了影响。在 18 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中,领土、人口和农业是步兵的基础,因而也是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当时的法国在这个意义上处于优势地位。在 19 世纪,工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它使得英国以及后来的德国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在 20 世纪中叶,科学,尤其是核物理学,成为美国和苏联的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在 21 世纪,被笼统称为信息技术的东西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权力资源。美国因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绝对领先而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力量会分散。

总的来说,信息革命具有促进权力分散的作用。随着它降低成本、制约规模经济效率的提高以及减少市场壁垒,信息革命将使大国的权力减少,使小国的权力增大。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为什么呢? 首先,在与信息相关的权力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影响进入和规模经济的障碍。传播现有信息的费用很低,但要想在收集和制造新信息上处于领先地位,依然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第二,创业者总是占据着某种优势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的调整(它为那个时期美国衰落论者们所忽视或者误解)以及冷战军事竞赛所导致的大规模投资,使得美国在

信息技术应用,尤其是在与军事冲突相关的信息技术应用上,占据极大的领先地位。

许多军事分析家提到了应用信息技术所导致的“军事革命”。部署在太空上的传感器、电视直播、高速计算机以及复杂的软件等,给人们提供了收集、分类和传播有关各地方发生的复杂事件的信息的可能性。这种战争空间观念同精确武器相结合,使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地位。萨达姆·侯赛因痛苦地认识到,除非国家拥有把信息同武器相结合起来的能力,否则那种估计武器装备(如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的。今后,很多相关的技术将在商业市场上出售,并且为较弱小的国家和恐怖主义者所拥有。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最新的硬件或某种系统,而在于具有“使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美国在这个方面很可能要继续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从信息战的角度看,某个小小的优势地位就可能改变冲突的结局。在另一方面,非国家组织拥有技术,加上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开放社会的脆弱性,这些使得未来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斗争。

信息革命和复合式相互依存

信息革命并没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均等。如果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好相反,那么现实主义者可能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但是,如何解释政府的作用和所有国家的权力不断下降这种现象呢?这种变化比较符合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观点。

复合式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表现为社会之间交流渠道的增多。跨国和跨政府交流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其交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跨国交流深受大的官僚组织

如跨国公司和天主教会的控制，它们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利。这样的组织依然很重要，但较低的成本使得松散的网络组织（network organization），甚至是个人，也介入这个领域之中。这些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组织，不需要跨越国家的边界就可以向一国内部进行渗透，并且利用国内选民来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它们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特别有效的作用。促使在1996年签署《禁止使用地雷公约》的那场运动，就是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内部的网络组织同某些政治家、名人（如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所组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同盟所发起的，它极力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和为政府确定议事日程。非政府组织在1998年讨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会议中，作为代表团之间的沟通渠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产业和工会的代表在东京竞相吸引主要国家媒体的注意力。另外一种跨国网络组织，即有时被称为"知识共同体"的专家群体，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由专家组成的网络组织，通过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提出问题，有时能在创建同盟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行为体。他们可以通过提供知识，为有效的合作创造一个基础。有关保护臭氧层问题的《蒙特利尔公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新的全球行为体

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发展阶段，制度和权威的源泉都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或者圣芳济会的领袖们所享有的地位仅次于那些大国的帝王那样，今天的大赦国际的秘书长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首席行政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远远大于马尔代夫、纳米比亚和瑙鲁的领导人。国家可能不会很快就消亡，但今天的国家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

——彼得·斯皮罗（Peter J. Spiro）[11]

为了理解廉价信息对权力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丰富的悖论"(paradox of plenty)。丰富的信息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于是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号同背景噪音加以区分的人便拥有了权力。编辑、信息筛选员以及出点子的人变得更加抢手,而且这也是权力的源泉。商标名称和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拥有信息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个人信息可能有损该信息拥有者的信誉。例如,经济学家指出,卖二手车的人比想买二手车的人更了解车的缺陷。而且,坏车的车主比好车的车主更想把自己的车卖掉。这些因素使得想买二手车的人总想把车价压低,以补偿因自己没有发现的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这样一来,二手车的卖主虽然拥有较多的信息,但是并没有把车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好的二手车。在不对称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中,权力属于那些敢于坚持立场或者断绝贸易关系一方,信息权力则不同,它属于那些可以编辑信息、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获得正确和重要信息的一方。

对编辑和点子提供者来说,可信性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信誉一直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丰富的悖论"使得它变得越来越重要。低廉的数据传输费用意味着,今天的传输能力作为一种权力源泉,其重要性同过去相比已经降低了,但是筛选信息的能力则比过去更为重要。政治冲突的焦点不在于争夺信息传播能力的控制权,而在于确立自己的信誉和破坏别人的信誉。

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免费信息,加上可信性的重要作用,软权力很可能与过去不一样,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物质资源的产物。在信息制造和传播能力缺乏的时候,控制出版社、电台和报纸就是至关重要的。硬权力——比如使用武力占领电台——可以产

生软权力。从全世界的电视业来看，财富也可以产生软权力。例如，CNN 总部设在亚特兰大，而不是在安曼或者开罗，这是因为美国在产业和技术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CNN 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的公司，它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侵略行为(类似于希特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行为)，而不是旨在洗刷殖民统治屈辱的正义行为(类似于印度的果阿在 20 世纪 60 年代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解放”)，从而影响了世界范围的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

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这种密切关系，可能在信息时代复合性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的削弱。宣传鼓动作为一种免费信息的形式，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东西。希特勒和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有效地运用了宣传鼓动手段。在 20 世纪 90 年代，米洛舍维奇控制了电视台，为维持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权力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3 年，在莫斯科发生了一场争夺电视台的战斗。1994 年，卢旺达的胡图族人控制了电台，煽动针对少数民族图西族人的种族清洗。电视广播的权力依然存在，但是互联网将日益补充广播电视的作用，互联网有众多的通讯渠道，并且受到众多行为体的控制，这些行为体不能使用武力来控制对方。影响冲突的因素不仅包括那些拥有电视网络、电台或者网站的行为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信息和误传的来源的人。

广播是一种信息，它长期以来影响着公众舆论。广播电视台通过关注某些冲突事件和人权问题，促使政治家对一些国外的冲突事件作出反应，而对另一些国外冲突事件则不予关心——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索马里冲突和苏丹南部冲突，美国只对前者作出了反应。政府一直极力影响、操纵或者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为数量相对较少的广播电视台可以被用来向数量众多的人传播相同的信息。

然而，把广播(broadcasting)变成“窄播”(narrowcasting)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使得信息发布者们吸引了一部分受众。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让人们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助于协调跨国行为。交互的费用很低，促使了新型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出现：虽然一群人相互间的物理距离很远，但他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团体中的一员。

信息革命与民主化

就国家而言，大多数信息塑造者属于民主国家，这并不是偶然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熟悉信息的自由交换，信息的自由交换不会威胁民主国家的统治制度。这些国家之所以可以塑造信息，是因为它们也能够获取信息。极权国家，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极权国家，会有更多的麻烦。极权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监视数量相对较少的用户，限制本国国民对互联网的使用。对互联网的使用加以控制是可能实现的，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而且无法为了政治目标而实施全面的控制。新加坡把政治极权主义同经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因而也把政治控制和提高互联网的作用相结合起来。但新加坡这样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普遍反对控制互联网，新加坡面临着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工人流失的危险，这些人是确保新加坡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新加坡就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它要改革教育体制，鼓励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是信息经济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它又企图保持现有的对信息流动的社会控制措施。这就说明，封闭的体系总要付出较高的代价。

封闭的体系要付出较高代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外国投

资者来说,把资金注入一个极权国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极权国家的重大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透明度正成为那些争取外来投资的国家的重要资产。防止信息外流的做法看上去似乎对极权国家有利,但是它损害了国家的信誉与透明度,而信誉和透明度是在吸引外来投资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前提条件。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信誉较低,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具有偏见性和选择性的。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镇压性措施不仅在国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会损害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韩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认识到,压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做法,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软权力。它通过启动民主化的进程,增强了自己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这同印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交易员聚集在电脑前

不管互动和虚拟的共同体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免费信息通过众多渠道增加其流通量,

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后果，即国家丧失了很多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寻求发展的国家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及其相关的组织。地缘意义上的共同体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希望本国快速发展的政府将认识到，它们必须取消那些保护官员不受外界监督、阻碍信息流动的壁垒。那些希望提高本国发展水平的政府将不能继续把自己的金融和政治形势隐藏在国家的暗箱之中。

我们还处于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任何结论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现有的情况证实了 4 个基本观点。第一，某些自由主义者预言信息和通讯革命将使得国家间的权力分布趋于均等，这是错误的观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商业和战略信息领域，规模经济和进入的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免费信息领域，较大的国家往往在有关信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第二，廉价的信息流动使得跨国交流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国性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的表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国家越来越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像一个暗箱。政治领导人将会发现，保持对外政策连贯性的难度加大了。第三，信息革命正在改变政治过程，在争夺至关重要的、有关信誉的权力资源中，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竞争力要大于极权国家。最后，随着信誉成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权力资源，相对于硬权力来说，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国家可能更难保持其政策的连贯性，但这些国家在信誉和软权力方面却很可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总之，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将在信息时代继续调整其政治结构，而以该结构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

注 释

1.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 2.

2. Steven Greenhouse, "The Relentless March of Labor's True Foe",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98.

3. "North-South Divide Is Marring Environmental Talks",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92, p. 8.

4. "German Shift Felt in Jap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1990, p. D1.

5. Lester Brown, *World Without Bord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194.

6. "OPEC: Cartel Facing the Fact That Some Producers Are Beyond Its Reac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9, 1988.

7. "America's Falklands War", *The Economist*, March 3, 1984, p. 30.

8. "Texan to Urge Limits in Non-OPEC Output",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88, p.3.

9.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pp. 342—343.

10.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

11. Peter J. Spiro, "New Global Communi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18: 1 (Winter, 1995), pp. 45—56.

精选阅读材料

1.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1989), Chapters 1—3.

2.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pp. 588—632.

3. Rodrik, Dani,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 1—85.

4.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5.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

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63—305.

其他阅读材料

1. Adler, Emmanuel, and Peter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Order, and the Creation of a Reflective Progra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1, 1992, pp. 367—390.

2. Baldwin, David A.,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Bergsten, C. Fre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91).

4. Castaneda, Jorge, "Can NAFTA Change Mexico?" *Foreign Affairs*, 72:4 (October 1993), pp. 66—80.

5. Cohen, Benjamin J.,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1973).

6. Galtung, Johan,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8:2(1971), pp. 81—118.

7.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Graham, Edward, and Paul Krugm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IIEE, 1991).

9. Grieco, Joseph,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2(Summer 1988), pp. 485—508.

10. Haggard, Stephan,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Hufbauer, Gary C., Jeff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 Elliott, *Sanctions Reconsidered*, 2nd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12. Kapur, Devesh, "The IMF: A Case or a Curse?" *Foreign Policy*, no. 111(Summer 1998), pp. 114—129.

13.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4.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6. Krasner, Stephen D.,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7. Krugman, Paul, *Pop Internationalism*(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18. Lake, David A.,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4(Winter, 1993—1994), pp. 459—490.

19. Reich, Robert B.,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New York: Knopf, 1991).

20.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Vernon, Raymond,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1971).

22. Williamson, Jeffrey,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Compared*(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6).

23.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us, *The Commanding Heights: How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思考题

1. 什么是复合式相互依存? 它是一种描述性的模式吗? 当今复合式相互依存在哪些地区发展得最为充分?

2. 什么因素使得经济相互依存成为权力的源泉? 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区别何在?

3. 1973 年石油危机的深层和中层原因是什么? 它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发生,比如 1967 年? 它是一个特殊事件,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的开端? 为什么没有使用武力?

4．自由主义理论比较乐观，它认为国际商业的发展会使得军事手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下降。国际石油规制是支持还是否定这种理论呢？

5．按照古典现实主义的假设，国家间的合作不可能在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你如何解释石油生产国在1973年实现了密切的合作呢？石油禁运达到预期目标了吗？石油禁运是成功的吗？它为什么失败了？

6．生态相互依存会导致合作吗？

7．大国在管理国际经济中起了什么作用？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8．跨国和跨政府行为体今后会变得更加重要吗？

9．信息革命如何影响世界政治？

10．全球化和距离的缩小是不可逆转的吗？

1994年的卢旺达难民

第八章　新的世界秩序?

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构想

国际政治依然属于自助的领域,国家面临着安全困境,武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有助于缓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制度,比如均势、国际规范、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但是它们不能防止所有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际冲突的逻辑依然适用于当今世界。

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很多有关新的世界秩序的言论。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所看到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并不十分清

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两极体系已经瓦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它仍然属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内的秩序，而且不一定公正。也有人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无政府国家体系的难题。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世界吗？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写道，民族国家和分裂的原子不可能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处。他认为，在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战争是防卫的终极形式，核弹头是终极武器，其中的某个东西必然消失，它很可能就是国家。

领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因此它在将来也不一定继续存在下去。从修昔底德时期至今，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分散的单位和国家体系，但作为国际政治基础的大的领土国家则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仍然具有封建战争的某些特征，因此它既是最后一场封建主义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领土国家的战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的领土国家只是在过去 300 年或 400 年中，成为了现代世界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dominant institution）。一些未来学家预言，领土国家将会消亡。他们所主张的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可以克服无政府困境的结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提出过五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

1．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

联邦主义是欧洲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它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国际联邦，来解决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国家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接受某种程度的中央政府。联邦主义者经常用北美 13 个殖民地在 18 世纪组成联邦的事实来论证这个观点。一些人认为，历史上不乏一些较小单位组成一个较大单位的事例。然而，联邦主义并没有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构想。和平不是人们所崇

尚的惟一的东西。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只能存在于坟墓之中。人们也追求正义、福利和自主权,而且他们不相信政府能够向自己提供保护。此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联邦主义会起作用,会是消除战争现象的药方。即使无政府国家体系是战争的部分根源,消灭独立的国家也不一定会使战争消亡。实际上,最近几年所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内战。

2.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由于联邦主义存在着缺陷,所以有人提出了国际功能主义的思想。功能主义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它认为,经济和社会合作将促使跨国共同体的产生,从而消除战争。主权的意义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尽管国家的外壳形式将继续存在下去,国家间相互敌视的内容已经消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功能主义思想促使联合国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当今世界中有很多跨国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功能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然而,功能主义也没有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世界秩序构想,况且大多数国家不愿意看到相互依赖程度太高,避免自己极易受到别国的伤害。

3. 地区主义(Regionalism)。

地区一体化思想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计划委员会主席让·莫内(Jean Monnet)认为,地区层次上的功能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可能把德国和法国拴在一起,从而防止再次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国际冲突。1950年,欧洲根据舒曼计划,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西欧的煤钢产业首先实现了一体化。1957年的《罗马条约》建立起了欧洲共同市场,逐步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并且逐步实施共同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在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的，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借鉴欧洲地区主义的经验，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但是，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将军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分别在1965年和20世纪80年代，对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以限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欧洲国家在应该把多少主权让渡给地区性政府这个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然而，即使建立联邦的势头有所减缓，欧洲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今日的欧洲，可能大家并不都在一条船上，但是所有的船只都以各种方式被拴在一起，这种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欧盟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但它显然只存在于欧洲。

4. 生态主义(Ecologism)。

沙漠风暴行动

一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构想。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在其著作《面临威胁的星球》中指出，有两种东西将构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即非领土的跨国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福尔克声称，结果会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大众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以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仅会增强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力量，而且会导致建立解决世界资源日益减少问题的规制。其最终结果是建立起有关和平、正义和生态平衡的国际规范，创造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福尔克过分夸大了资源稀缺问题的严重性，而过低估计了新技术弥补资源稀缺的能力。而且，大众和民粹主义运动不会轻易地促进跨国合作。让大众和民粹主义汲取力量的地方主义会阻碍跨国合作。

5. 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

正如本书上一章所提到的，信息时代的组织理论家，如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以及海蒂·托夫勒等人宣称，信息革命正在消除等级现象，并且用网络组织取而代之。20世纪那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将实现权力分散，更多的政府职能将由市场和非盈利组织来行使。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还指出，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权力分散化的组织和虚拟共同体，将超越领土管辖权，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虽然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失去其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人们将根据多种的、自愿的协议而生活，通过点击鼠标，加入或脱离某个共同体。这种相互交叉的共同体和新的统治模式，类似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前的封建世界，只不过前者的现代化程度和文明水平要高于后者。

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但是有关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并没有告诉我们，虚拟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怎样处理暴力和安全问题。人类必须生活在某个地方，而且他们最关心生活所在地点的安全问题。

现实情况与上述五种模式相反，民族国家还没有过时。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人往往使用简单的类比。他们说，今天的民族国家会被迅速飞过边界的火箭所穿透。如同火药和步兵穿透和摧毁了中世纪的城堡一样，核导弹已经使得民族国家过时了。然而，人们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政治制度实现如下三个目标：生命安全，经济福利，社会认同。国际进程的变革促使人们选择实现目标的途径，但民族国家至今依然是最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以上三个目标的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无法保障人们的安全，也不具备有助于产生共同体认同感的合法性。虚拟共同体仍然比地缘共同体弱小得多。因此，尽管人们一直努力提出新的构想，但领土国家及其相关的问题依然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

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是冷战后两股相互竞争的力量。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世界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对快速的变革坚定地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反应态度。全球化会同时导致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裂化。

通讯手段正在改变世界。外交行动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着。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侯塞因和乔治·布什都通过观看CNN，来获取最新的消息。人们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就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到地球上遥远地方的人权问题和民众的苦难。甚至早

在环球信息网问世之前，加拿大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提出，现代的通讯手段正在导致一个“地球村”的出现。但是，有关地球村的比喻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全球政治认同的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民族主义的力量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小。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球村，而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相互之间更加了解的村落。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村落中，既存在着地方观念，又存在着共同体观念。

历史的终结?

某些分析家声称，在整个20世纪，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导致了国际冲突。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比如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破坏传统生活这一现象的反应。工业化迫使人们走出了自己的村落或小社区，并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动员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资本主义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参与意识方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冷战的结束表明，自由资本主义占了上风。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然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的现象，而是出现了可以称为历史的“回归”的现象。

历史的回归意味着，现在的国际环境比较正常，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本身并不足以在国际政治中导致较大规模的冲突。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但这些竞争对手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在其他地区看到，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挑战自由资本主义的规范和习惯。我们有时对各种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不加以区别，但实际上有很多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它们

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沙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就很不一样。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反对和抵制世俗的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以后所面对的重要挑战者和竞争对手是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当认同受到重大社会变革的挑战时，民族主义就会兴起。族群特征类似的人具有相同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但是我们很有必要区分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许多东西都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比较东欧和西欧的情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被压制了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许多这类的冲突开始激化。例如，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争斗开始爆发，并且在南斯拉夫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在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存在着很多跨越国界的族群群体，今后它可能导致更多的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复兴。

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反，原先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敌对思想的国家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欧洲联盟。即便是态度不太积极的英国也接受了有关协议的基本内容。西欧国家正在克服古老的敌对思想并努力团结起来，而一些东欧国家正在重新发现古老的敌对思想。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当人们生活变好以后，相互间的敌视可能会有所缓解。另一部分原因可能同民主有关，因为当人们有机会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之后，情绪化的东西可能会被克服掉。一些古老的敌对思想就是通过民主的进程而被消除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国内的辩论导致修改教科书和重新认识德国的历史。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地区制度

的作用，这些制度把西欧人纳入一个更大的、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框架之中。

然而，即使在西欧，民族主义远未死亡和消失。许多欧洲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认同观被埋没在欧洲认同观之中。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对对方心存某些疑虑。法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牵制德国。而且，许多西欧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担忧，并且抵制外来移民。他们害怕北非人和东欧人移居西欧。那些从南面和东面蜂拥而入的移民比较贫穷，他们是单个移居西欧的。西欧的右翼政党煽动仇外情绪，这提醒我们，西欧的民族主义问题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主权国家依然在保护着世界上少数的富裕群体免受贫穷的多数群体的伤害。尽管如此，西欧和东欧的差距依然是很大的。幸运的是，很多东欧国家希望加入欧盟，这缓解了这些国家领导人和国民所承受的压力，而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则没有那么幸运。

跨国主义

硬币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样的呢？由于跨国通讯手段的作用，人们现在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比过去了解得更多，也比较容易组织起全球性的团体。跨国公司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和在全球市场的不同领域追求利润，导致了一种独特形式的世界经济。各国政府竞相吸引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本田公司在美国所生产的汽车超过其在日本本土的汽车产量，而且它把在美国生产的汽车运回到日本销售。美国政府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后者进口在美国生产的本田汽车。也就是说，美国把向欧洲出口美国生产的日本汽车，视为自己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的 IBM 是日本最大的

主流电脑生产商。IBM 的日本公司在日本从事研究和雇用日本职员。

这促使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提出"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美国人应该关心公司总部的认同呢,还是关心公司在哪里从事研究和生产?他认为,从是否有利于美国境内的居民这个角度看问题,在美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外国公司,可能比在日本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家美国公司更重要。一些批评者反驳说,赖克看得太远,其观点在目前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认同,3/4 的美国产值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所创造的。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种让人感兴趣的、对未来进行展望的思路。跨国投资使得人们不容易搞清楚认同的问题,难以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跨国性投资和生态相互依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全球问题的长远认识。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使得生态问题突出起来,因为它们促使人们加紧利用海洋、大气层、南极和生物资源,而海洋、大气层、南极和多样化的生物一直被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有关国家政府签署的环境保护条约超过 170 个,涉及渔业、酸雨、臭氧层、濒危物种保护、南极以及海洋污染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 2/3 的条约是在 1972 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以后签署的。联合国有关环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会议于 1992 年和 1997 年分别在巴西和日本举行。环境问题也促使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它们进行了跨国游说活动。最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表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变得十分强烈了。

然而,假如每个国家采取各自的应对方式,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例如,同美国相比,日本更倾向于采取限制性的措施。日

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比美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多4倍。如果美国阻止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它只会使得美国的公司无力参与国际竞争。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麻烦是,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可能和对方一样受到同等的伤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就阻碍贸易的国内壁垒问题进行了谈判。美国迫使日本在其国内管辖权限内采取措施。日本制定了限制超级市场规模和其他阻碍外国公司进入日本流通领域做法的法律。一些日本政治家和消费者对美国的压力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对日本消费者有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美国厂商和日本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跨国同盟。日本政府也迫使美国减少自己的预算赤字,它正确地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与政府预算赤字有关。换句话说,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在相互打交道的时候都不把对方逼到墙角,而是让对方采取各国主权管辖权限内的措施。

一些观察家对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一方在敏感的国内问题上对对方施加的压力越大,对方的反感情绪就越强烈。相互依存意味着更多的摩擦和冲突。也就是说,美国每次迫使日本开放一部分市场,总会让一些日本人感到高兴,但是也会刺激另外一些日本人采取民族主义的措施。自由主义者反驳说,保护主义并不能阻止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反会妨碍国家从相互依存中获益以及从竞争中提高自己的效率。

简言之,技术正在创造一个市场,它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也导致国家内部的某些民众采取民族主义的应对措施。在可见的将来,跨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互作用是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另外一个跨国性的进程就是技术的传播。公司起了传播技

术的作用。我们在石油的例子中看到了这一点，石油公司无意识地把技术转让给了较穷的国家。技术也可以通过贸易或者走私进行传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跨越国界进行传播。技术的传播会对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呢？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20 个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化学武器技术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也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扩散政策延缓了核武器的传播。但在苏联解体之后，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前苏联的继承国控制前苏联的盟国和防止核技术流出国界的能力都不如从前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世界上有 8 个核国家。其中 5 个是 1968 年《不扩散条约》(NPT)所正式确认的核国家，它们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3 个国家被普遍认为已经秘密地研制了核武器，它们是：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1998 年公开试验了核武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有 30 多个国家具有研制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它们没有这么做，也就是说，有能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数量是现有核国家数量的 3 到 4 倍。肯尼迪总统在 1963 年签署《部分禁试条约》的时候担心，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25 个核国家。

为什么核扩散的情况没有变得更严重一些呢？在主权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世界中，核武器毕竟是自助的终极形式。我们可以找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冷战当中所形成的同盟体系，每个超级大国都向自己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例如，德国和日本没有研制核武器，因为它们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许诺要防止任何国家对其盟友进行核讹诈，这使得德国和日本认为，它们不必发展核武器。同盟体系也制约了较小国家的行为。比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战争之后，韩国认为美国可能从亚

洲撤退，因此开始研制核武器，但是在美国表示了反对态度和许诺继续向它提供安全保障之后，韩国放弃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与此相类似的是，苏联也限制其东欧盟友和第三世界盟国发展核武器。

另一个原因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合作。在核时代的早期，超级大国对核武器的态度是高度竞争性的。超级大国极力利用核武器，以使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3 年大力鼓吹"原子用于和平"计划，强调原子的善良一面，并表示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以此使得美国在外交上得分。与此类似的是，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核援助。但美国和苏联在 1968 年采取了相互合作的态度，促成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1977 年，美国、苏联以及另外 13 个提供核技术的国家成立了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规定了可以出口的核技术的种类。

第三个原因是条约和制度的存在。有 180 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条约》，同意不发展或者转让核武器。无核国家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设在维也纳)的核查员视察本国的和平核设施，确保这些设施的正当使用。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没有签署该条约。也有某些签字国采取了欺骗行为。例如，伊拉克签署了《不扩散条约》，但它有一个庞大的核计划，并且对外界加以隐瞒。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因素发生了变化。苏联对其盟友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也对北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冷战后的世界面临着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同盟和安全保障的前途，另一个是核技术是否会从前苏联流到未来的核扩散国家中。肯尼思·沃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声称，核武器的扩散可能具有稳定局势的作用，因为威慑

会起作用。既然核武器有助于防止冷战变成热战，为什么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不能在中东和南亚这样的地区导致谨慎的行为和秩序呢？这种观点的毛病在于，它几乎是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威慑模式的基础之上。如果冷战后的核武器可能失控，那么这种理性的模式以及相关的预言就可能基本上毫无意义了。很多后来也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都有着因政变和军队分裂所导致的动荡的历史记录。

跨国威胁和安全观念

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配备了精密的技术装置，只有高层领导人输入一个指令密码，核武器才能够被启用。但是，很多新近研制了核武器的国家并没有这些精密的技术装置。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技术的跨国传播，准备加入核竞赛的某些新的核国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今后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比过去的半个世纪要大。而且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跨国恐怖主义者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虽然生产裂变材料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是恐怖主义者可能获得从前苏联国家盗取并走私到国外的核材料。而且，核武器还不是惟一的威胁。生物药剂已经被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研制出来了，但它们还缺乏在战场上使用的可靠性（让我们想想风对炭疽孢子烟雾剂的影响）！然而，制造生物武器要比制造核武器容易（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配方），而且可以被用于恐吓无防备能力的平民。1996年，跨国恐怖主义者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引爆了一个汽车炸弹，假如他们不是使用高强度的爆炸物，而是使用炭疽或者化学药剂沙林毒气，那么结果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害。在同一年，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导致10多人丧生。该组织已经开始

向国外发展，并且进行研制生物武器的实验活动。

恐怖主义组织也可能对控制医院、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或者银行用电供应的电脑系统发动攻击，从而引起混乱。实施这种攻击的方式可能是在重要的电脑服务器所在地放置高强度的爆炸物，也可能是电脑黑客在数万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电脑上进行操作。

威慑手段对抵制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作用不大，因为除非可以证明一个境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者，否则的话很难发现恐怖主义者的行踪。另外，犯罪集团可能控制一国的政府，并且诡称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法，根据主权的原则享有免受外来干涉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认为干涉是正当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很接近这种情况，比如美国在 1989 年入侵巴拿马、逮捕其总统曼纽尔·诺列加，并在美国以毒品走私的指控对他进行审判。

随着跨国威胁的增大，国家不仅开始质疑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截然分开的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而且开始使用扩大了的安全和防务的观念。很多新型的威胁不能靠拥有高杀伤力武器的军队来加以解决。

新的世界秩序?

既然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都在起作用，那么 21 世纪初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呢？布什总统在 1991 年说道，海湾战争“不仅仅是为一个小国而打的仗；它是一个宏大的理念；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它是“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新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起来反对侵略，减少和控制军备，公正对待各国人民”。

乔治·布什的言论同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一样，旨在通过提出宏大的目标，争取公众支持自由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然而，当战争结束和恢复常态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战争的结局并不完美，宏大的理想并不可能成为现实。

不同的秩序观念

冷战的结束确实改变了国际体系，但有关20世纪90年代是“新的世界秩序”的黎明的言论则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人们对于“秩序”这个词的各种解释是大相径庭的。现实主义者声称，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国家在无政府世界中追求权力和安全，在无政府世界中没有最后的秩序仲裁者，国家只能靠自助和使用武力。按照这种观点，秩序主要是指国家间权力分布或者结构。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冲突以及预防冲突，不仅取决于均势，也取决于国家的国内结构以及国家的价值观念、认同和文化，而且冲突的解决还依赖于国际制度。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同现实主义者相反，他们宣称，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制度，通过稳定期望（stabilizing expectations），使国家产生连续性的观念和相信今日的合作行为会在明日获得回报，从而有助于防止冲突和建立秩序。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秩序同民主和人权的观念以及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还有人认为，秩序更多地包含着阴谋。在以美国的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法国的让-马利·热潘（Jean-Marie Le Pen）为首的本土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看来，“新的世界秩序”就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为了主宰世界所策划的阴谋。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同华尔街、伦敦和东京的金融市场沆瀣一气、损人利己。在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眼中，秩序纯粹是西方主宰非西方

世界的观念。

人们对秩序的认识很不一样，这表明“新的世界秩序”的含义是很难界定的。上述每个思想流派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冲突的根源。现实主义强调均势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充分，因为长期的社会变迁正在侵蚀国家主权规范。但在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大国，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是一剂万灵药了。

过去的冷战两极秩序是稳定的。冷战使得一些第三世界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但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冲突则为这些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苏联军事威胁所抑制，而且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压制了当地深刻的族群矛盾。两极秩序已经消失了，但是冲突并没有终止。而且，冲突的根源是五花八门的。

未来的权力格局

正如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一再提到的，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权力转移就是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权力的相对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角逐。人们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冷战后的时期就是一个权力迅速发生转移的时期。然而，人们对于权力转移的方向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正表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权力转移成为冲突的潜在根源。

有关未来权力结构的一种预测是多极格局(multipolarity)。如果“多极”这个词只是指19世纪的那种情况，那么它极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19世纪秩序的基础是5个实力大体均等的大国之间保持着均势状态，而冷战后大国的实力是极不均等的。

俄罗斯虽然还拥有巨大的核武库，但是自1990年以来已经迅速地衰落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它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率。日本和德国并没有如某些人在1990年所预测的那样，成为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美国是惟一的、真正的超级大国，它在权力的各个方面，都拥有全球性的资产。

这使得一些人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单极霸权(unipolar hegemony)基础上的。某些观察家声称，海湾战争标志着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开始，从此世界将默认美国的善意霸权。虽然美国可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美国霸权的结论。很多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是美国单凭自身的权力所实现不了的。从军事权力上看，世界基本上是单极的，只有美国既拥有洲际核武器，又拥有可以部署到全世界的、庞大的现代化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但经济权力是三极的，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产值占世界产值的2/3。中国的发展可能使得在21世纪初出现经济权力结构呈四极的局面。

在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层次上，权力是极其分散的，行为体五花八门，包括银行家和恐怖主义者。这样的例子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个人行为体可以影响美国进行经济调控的利率政策；技术的跨国传播增强了昔日穷国和弱国的破坏力；一些国际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如毒品贸易、艾滋病和全球气候变暖，有国家(不只一个)内部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并且它们是跨越国界的，基本上不处于政府控制之中。因为用军事或者传统的经济手段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单独应付这些问题。

还有人认为，世界将分为欧洲、亚洲和北美三大经济集团

(three economic blocs)。即便如此,全球技术变革以及跨国公司和族群团体等非集团、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将抵制这三大集团对它们的限制作用。

目前的权力分布表现为,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权力格局都被纳入多层次的相互依存(multilevel interdependence)之中。世界政治就如同三维的国际象棋,单从一个层面是解释不清楚的。军事权力分布基本上是单极的,美国最为强大。经济权力分布是三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而跨国相互依存则表现为权力分散。

如果军事权力像货币一样具有互换性,并且可以左右各个领域的结局,那么这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军事上的强大并不能决定当今世界政治中经济和跨国关系棋局的结果。美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拥有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国霸权时代。

上述这些预测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国家今后依然是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样的假设或许是错误的。一些人认为,在今后数十年中,全球政治的轮廓将日益表现为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他们预言会发生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穆斯林世界抵制和不时挑战西方基督教世界、华人世界以及印度教世界。此外,印度教世界同相邻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穆斯林国家紧张对峙,而中国和西方在包括人权在内的规范性问题以及战略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但迄今为止,发生在这些大的文明内部的冲突多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非洲、中东和中亚,随着国家的衰败,共同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冲突随着民众试图通过族群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消除混乱局面而产生,并促使弱小的国家

走向衰败。

旧观念的牢笼

冷战后的世界是很独特的。建构主义者正确地指出，我们不应该束缚自己的思想，不应当强求大家都用传统的和机械的有关极的比喻来认识国际政治。权力变得更为多层面，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国家日益难以抵挡外来的渗透。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意味着世界秩序不可能只建立在传统军事的均势状况基础之上。

现实主义有关世界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考察正在慢慢地推动世界走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长期的社会变迁。欧洲国家经过30年的宗教战争，于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统治者可以不顾公众的态度，决定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秩序的基础是国家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在其后几个世纪中，国家之间那种机械的制衡(正如同心弹子球一样)正慢慢地受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主参政意识的提高的侵蚀，但国家主权原则一直延续下来。今天，跨国间沟通、移民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对传统观念的侵蚀，扩大了主权原则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这种演变使得自由主义的如下观念变得更有意义：人民和国家共同构成一个世界社会，秩序的基础既包括价值观、制度，也包括军事权力。过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主义观点，比如伊曼努尔·康德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张，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牵强附会，因为政治学家们指出，我们实际上找不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交战的例子。例如，在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影响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现实主义者认为，欧洲正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种

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新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它通过欧盟的制度已经同自己的西方邻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这些自由主义的秩序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冷战秩序也有规范和制度，但他们的作用很有限。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成了有关联合国的协议，该组织的基础是多极力量分布。联合国安理会负责实施集体安全和不侵略弱小国家的原则，5大常任理事国则使用否决权来保护自己。

然而，由于人们事先没有料到会出现两极体系，因此这个以制度维持秩序的威尔逊思想难以被付诸实施。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否决对方的倡议，联合国的作用被限制在派驻维和部队监督停火方面，而不能以武力赶走侵略者。苏联权力的衰落导致克里姆林宫在对伊拉克实施联合国集体安全原则的过程中，采取了同美国合作的新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了，而是表明有关国家战时预计在1945年实现的自由制度秩序构想的某个条件再次出现了。

但正如海湾战争使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构想出现了生机，这场战争也揭露了自由主义观念的一个严重弱点。《联合国宪章》所表述的集体安全原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只适用于越过边界的行为，而不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民众相互使用武力的情势。自由主义者试图以宣扬民主和自决的原则来规避这个问题：让一国内部的民众表决是否反对外来的干涉。然而，正如本书在前面所提到的，自决并没有像说的那样简单。到底谁来决定由哪个“自己”来作决定呢？当今世界上只有不到10%的国家是单一族群的。只有一半国家拥有一个在本国总人口中占75%以上的族群。前苏联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多少数族群，很多国家还有边界争端。非洲大概可以被视为这么一块大陆，大约有1000个族群生活在50多个国家内，并且跨界而居。在加拿

大的魁北克省，讲法语的居民占多数，他们要求拥有特殊地位，而且一些人鼓动脱离加拿大而独立。这种多元族群和多种语言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冲突的过程是很难结束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地方自治和国际社会对少数族群权利的关注应当得到尊重，然而，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世界陷于极大的混乱状况之中。

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

那么如何做到在保持传统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均势基础上的某种秩序的同时，又建立起以“人民间的正义”(justice among peoples)为基础的制度呢？国际制度正朝着这样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post-Westphalia)的方向发生演变。早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55和56条就要求成员国承担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集体责任。甚至在1991年安理会通过授权干涉伊拉克的决议之前，联合国有关制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议，就已经开了一个可以不受宪章有关主权规定严格限制的先例。在欧洲，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包含了少数人权利的条款，违背该条款的行为可以提交给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欧洲理事会处理。国际法也在逐渐发生演变。1965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把国际法定义为“规则和原则……用以处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20年之后，该学会的律师增加了“以及它们与个人的某些关系”这些文字。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越来越被认为不只是国家所关心的问题。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或许是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这样的原则遭到了蔑视，而且违规行为没有受到惩罚。以多边军事干涉行动来纠正错误，可能会导致极大的混乱。然而，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干涉行为有一个强度大小的问题，干涉行为轻

则发表声明和采取有限的经济措施，重则全面发动侵略行为。有限干涉行为和多边制度侵害主权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但不会突然破坏国家间的均势。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如果安理会确定国内暴力或者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对一个地区的和平构成较大的威胁，那么安理会可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三章采取行动。这样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可能逐渐扩大。另外，国家集团可能在某个地区采取行动，正如尼日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下，出兵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这些原则和制度并不完美，会给发生国内暴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行为留下很大的空间。然而，它们在道义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比起决策者动用武力纠正所有的错误或者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的做法，无疑要小一些。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出现一个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现实主义者必须懂得，传统的权力思想和纯粹军事意义上的结构观念，忽视了由全球沟通和跨国关系组成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变革。

对未来的思考

你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呢？你将生活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之中。秩序的基础既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均势，又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制度。这样的秩序并不总是公正的。正义和秩序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在自决问题上也是这样。到底是保证边界不受侵犯更重要呢，还是损害领土完整以追求人道主义目标更重要？这样的选

择如何影响秩序的原则？这样的争论是很难得到调和的。

然而，世界正在发生变革。罗伯特·吉尔平声称，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际政治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仍可以理解当今的世界。假如修昔底德突然来到中东，他可能很快就能搞清楚当地的局势。但假如他去了欧洲，他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理解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核武器的发展所代表的技术革命；降低地理和领土因素作用的信息革命；迅速发展的经济相互依存；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社会，人们日益意识到存在着跨越国家边界的特定价值观和人权观。很有意思的是，18 世纪自由主义者伊曼努尔·康德在论述国际政治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类似的变革。康德预言说，从长远来看，人类将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超越战争：战争毁灭性的增大，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他所说的共和政府，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

我们为了理解当今的世界，必须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关注建构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变革。我们需要同时思考不同的理想模式。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它们都是理想的模式。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由很多以武力追求安全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复合式相互依存的鼓吹者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经济手段、福利目标，它们比安全更加重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极端的观点，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认识真实世界的观点。这三种类型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变化中的国际政治，都是很有帮助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促使我们提出最后几个问题。未来世界在哪些方面与过去一样？欧洲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回到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发生战争吗？文明之间会发生战争吗？信息时代是否更民

主、更和平？两极世界已经消亡，但取而代之的不会是美国霸权的单极世界。世界在经济上是多极的，而且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相互依存的深化以及跨国行为体的作用日益提高，权力将会分散化。新的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一点。

精选阅读材料

1.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and Huntington, Samuel,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7(Fall 1989), pp. 3—11.

2. Mearsheimer, John, "Back to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Summer 1990), pp. 5—56; and Hoffmann, Stanley, Robert Keohane and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2(Fall 1990), pp. 191—199.

3. Deutsch, Karl, *Nation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Knopf, 1969), Chapter 1.

4. Allison, Graham T., Owen R. Cote Jr., Richard A. Falkenrath and Steven E. Miller, *Avoiding Nuclear Anarchy: Containing the Threat of Loose Russian Nuclear Weapons and Fissile Material*(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5. Rosecrance, Richard,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Basic, 1986), Chapter 2.

6. Reich, Robert, "Who Is U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1(Jan.—Feb. 1990), pp. 53—64.

其他阅读材料

1. Barnet, Richard J.,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2. Brown, Michael,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3. Clark, Grenville, and Louis Soh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Chicago: World Without War Publications, 1973).

4. Deudny, Daniel, "Geopolitics and Change",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5. Falk, Richard A., *This Endangered Planet: Prospects and Proposals for Human Survival*(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6. Finnemore, Martha,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Gaddis, John L., "Towards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70:2(Spring 1991), pp. 102—122.

8. Haas, Ernst B.,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9.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 pp. 22—49.

10.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1. Kaplan, Robert, *The Ends of the Earth: A Journey at the Dawn of the* 21_{st}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12. Kennedy, Paul 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13. Lake, David, and Donald Rothchild, *Ethnic Forces and Global Engagemen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1996).

14. Mastanduno, Michael,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4 (Spring, 1997), pp. 49—88.

15. Mathews, Jessica A., *Preserv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Challenge of Shared Leadership*(New York: Norton, 1991).

16.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Chicago: Quadrangle, 1966).

17. Moravcsik, Andrew,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Neustadt, Richard E., and Ernest R.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19. Nye, Joseph S.,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1990).

20. Nye, Joseph S.,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75:2(March/April 1996), pp. 20—36.

21. Russet, Bruce, and James S. Sutterlin, "The U. N. in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70:2(Spring 1991), pp. 69—83.

22. Sagan, Scott D.,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23. Slaughter, Anne-Marie,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24. Spiro, Peter J., "New Global Communitie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8:1(Winter, 1995), pp. 45—56.

25. Vernon, Raymond, *In the Hurricane's Eye: The Troubled Prospect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Wallace, William,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urope*(London: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nter, 1990).

27. Weiss, Thomas George, David P. Forsythe and Roger A. Coate, ed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hanging World Politics*(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28. Williams Phil,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trategic Allianc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8:1(Winter, 1995), pp. 57—72.

思考题

1. 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指的是什么?

2. 是否有一个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秩序的新的世界秩序? 它是多极的,两极的,还是单极的?

3. 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是减弱了,还是增强了? 请举例说明。

4. 核战争威胁是否已经成为历史了呢?

5. 赖克认为公司的民族性(corporate nationality)没有意义? 你同意吗?

6. 什么样的权力现在很重要,而且在今后几十年中也很重要? 这如

何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吗？

7. 现实主义者如何预测欧洲的未来？还有其他哪些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能够补充什么？

8.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如何预测今后美日关系、美欧关系和美中关系的性质？自由民主制度的传播有助于世界和平吗？

9. 冲突更可能发生在文明之间还是文明的内部？

10. 如果互联网增强了跨国集团的力量，那么这对世界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1. 21世纪的安全与20世纪的安全有什么区别？

译 后 记

我很喜欢阅读小约瑟夫·S. 奈教授的著述。奈写的书具有语言简洁明快、分析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的特点。另外，奈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努力把理论概念同历史与现实的事例相结合，给读者提供了内容极其丰富的相关知识和颇具特色的分析视角。在我看来，这本久负盛名的国际关系教科书——《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集中体现了奈的写作风格与研究思路。我相信，这本富有特色的教科书一定会给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教学与实际工作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也可以帮助正在学习和准备学习国际关系的中国学生掌握基本的相关理论概念、历史知识以及分析方法。这便是我要把该书译成中文的基本原因。

在翻译工作完成之后，我写信给奈教授，请他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奈通过他的研究助理亚利克斯·斯卡柯答复我，他很愿意为《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三版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不久我便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奈写的序言。这个中文版序言基本上保留了英文版序言的所有内容，但根据“9.11”事件以后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做了一些补充，也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鉴于中文版序言已经包含了英文版序言的内容，并且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经译者与出版社编辑协商，最

后出版的这本译著只刊出中文版序言，而没有登出英文版序言。特此说明。译者在此向小约瑟夫·奈教授和他的研究助理亚利克斯·斯卡柯表示感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在确定译著的选题、联系著作的版权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同蔚文曾经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我也很佩服他的专业眼光和敬业精神。翻译和出版奈的这本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潘丹榕女士作为这本译著的责任编辑，做了大量和细致的校阅与编辑工作，帮助我发现和更正某些翻译与文字上的错误。范蔚文先生和潘丹榕女士为这本译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译者在此深表谢意。另外，在翻译和校阅过程中，我就自己遇到的某些不甚清楚的问题，请教过李安山教授、梅仁毅教授、贾蕙萱教授、张敏秋教授以及钱雪梅老师等等，并且得到他们的热心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把一本名著译成中文，是一项极具挑战和相当艰难的工作。奈的这本教科书涉及到很多理论概念和历史事件，也包含着不少领域与学科的知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理解和表达不甚准确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小明

2002年6月于北大燕东园